

George Muller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慕勒传

George Muller: Delighted in God

(英) 罗杰·斯蒂尔◎著

Roger Steer



华夏出版社



George M

新教著名人物

慕勒传

George Muller: Delighted in God

(英) 罗杰·斯蒂尔◎著
Roger Steer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慕勒传 / (美) 斯蒂尔著; 江登兴编; 周司德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3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ISBN 978 - 7 - 5080 - 4155 - 1

I. 慕… II. ①斯… ②江… ③周… III. 慕勒 (1805 ~ 1898) —传记 IV.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903 号

copyright ©1997, Roger Ste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George Muller
Published by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Geanies House, Fearn,
Ross-shire, IV20 1TW, Great Britain.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the pictures were used 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George Muller Foundation, Muller House, 7 Cotham Park, Bristol BS6 6DA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7—2193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9.5 印张 145 千字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慕勒老年半身像

总序

何光沪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世界的现代化的确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密切联系，而比之早两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句话，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上述历史巨变的，正是那场改革中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的创立者和中兴者们的思想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

新教各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包括其思想渊源及解决思路。

但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读物中，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必然会对我国一般读者和历史学界的有关认识造成某种盲点，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世界，也不利于我国历史学术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理论界以及宗教学界，已开始注意新教的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人物传记这一领域依然资料匮乏，这也许属于资料最为贫乏的领域。

有鉴于此，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的出版，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将有助于填补空白，矫正盲点；有利于一般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有利于我国有关学术界收集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作出贡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数算新教传统中的珍宝

——策划人语

—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适逢宗教改革 490 周年，又是新教之光照临中国 200 周年。策划这一套书，是为了重回历史去追寻新教简朴而坚实的根基，并察看这信仰在历代的传承。盼望在这样的传统中我们能得以滋养，并面对当代的挑战。

二

一年多以来时常在心中追问：新教在不同的世代都有哪些最具生命力的支流？有哪些人最足以代表新教优秀的属灵传统？关于某个人物的哪一本书是最合适的选择？不断地筛选和请教，最后形成了这套书的雏形。在此特别感谢所有不吝指教的朋友们！

这一套书的前四本早先已摆在读者面前。选择加尔文，是

因为他作为改教巨擎的历史地位。当然，《加尔文传》的附录《加尔文主义讲座》也值得一再推荐，对于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加尔文的思想，中国人的认识实在非常有限，而我们非常荣幸，能把这一本论述加尔文思想的经典之作收为《加尔文传》的附录。

本套传记的第二本是《爱德华滋传》，爱德华滋作为一个杰出的新教人物，身为牧者和大有能力的讲道人，兼备罕见属灵情操与精深神学思想，实在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当效法的榜样。

如果说加尔文是清教徒的精神先父，爱德华滋是清教徒精神的顶峰的话，那么司布真则是清教徒精神的余响。他成长于一个具有清教徒传统的家庭，少年时就熟读约翰·欧文等人的作品，据说他拥有能力的秘诀之一就是他所收藏的数万册清教徒作品。我们也很高兴，这一本《司布真传》是英文作品中的上上之选，作者是阿诺德·达里茂，原版由英国的真理旌旗出版社出版。

至于《班扬传》，传主约翰·班扬的代表作《天路历程》曾被司布真阅读达百遍之多。出版这本传记，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介绍清教徒在英国追求信仰自由的历程。他们也因此承受苦难，也许上天是借此预备他们去承受新大陆的流奶与蜜之地。

三

新教的传统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宽广，实际上上帝在不同的宗派里都有他自己的工作，因此不同宗派中合乎《圣经》的优良传统都应当得到珍视。出版《慕勒传》就是这样一个拓展视

野的尝试，慕勒来自德国路德宗敬虔主义的传统，而他的主要工作在英国。

慕勒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单凭信心的祷告支撑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最多的时候收养孤儿达到 2000 人！记得有一次，孤儿院的锅炉坏了，必须拆掉砖墙来重修，正值寒冷的季节，北风大作，修理锅炉必然导致孩子们受冻。慕勒祷告道：“上帝啊！你愿意让北风变成南风吗？”果然，几天之后，南风连续刮了好几天！可以说慕勒代表了新教进入 19 世纪后的新趋势，那就是通过施行怜悯、扶助贫穷、伸张公义来见证福音。

四

未来还将出版的有《诺克斯传》，他就是那一位被钟马田称为“天不怕，地不怕，女人也不怕”的苏格兰改教家，他有生之年要与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女王交手，而无所畏惧，当然他惟独敬畏的是天上的上帝。他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据说“这个人的声音像一百只号筒向人的耳朵同时吹响”！

诺克斯是加尔文的改教同仁，也是四个身列日内瓦改教纪念碑的改教巨匠之一。他开创的长老会传统对于清教徒有深远的影响，钟马田认为他是清教徒的精神源头之一。可惜中国人对于诺克斯了解太少了。很高兴，我们将有一本最经典的《诺克斯传》可以奉献给中国读者！

此外将是莱尔的《英国复兴领袖传》。这本书体例与现在的单个人传记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人物小传的合集，所写的人物全都是 18 世纪大复兴中的英国讲道者，他们共同代表了新教历史上最辉煌的复兴年代。这些人物中包括卫斯理和怀特菲尔

德，由于莱尔独特的历史地位，这本书可以说是由名家书写的名人传记。

接下去的一本将是《怀特菲尔德传》，作者还是达里茂。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细介绍这位 25 岁就以讲道震动美洲，并带起美洲第一次大复兴的伟人。

其他在视野中的新教著名人物还有丁道尔、巴克斯特、约翰·欧文，还有远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威克里夫、胡司，20 世纪的凯波尔、钟马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按照严谨的标准来数算新教传统中的珍宝。

此外，新教的传统虽然可以由一批属灵伟人来代表，但是它更深的血脉却在于个人的心灵，在于敬虔的家庭、教会和社区。这方面我们也愿意向读者推荐另外一套新教经典敬虔读物，就是《安妮的聚宝盆》、《少年查尔斯》、《热心男孩查理》、《在班扬的马背后》、《坏脾气的格蕾丝》、《玛利·琼斯和她的圣经》。它们都是新教黄金年代的故事，是新教敬虔的具体而微的见证，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的译者和编者，是他们的艰辛劳作使这一套书得以与读者见面。

丛书策划人

2007 年 3 月 21 日

前言

今天，比 25 年前我写第一版《乔治·慕勒传》的时候，我更加痴迷乔治·慕勒。我认为他是教会历史上的巨人，给新一代提供了独特的亮光和看见；我非常赞同哈丁在 1914 年所写的：慕勒的故事描述了“世人从未见过的、见证上帝信实的、最为夺目的一个见证”。

慕勒坚信上帝应允人的祷告，并穷其一生活出这一真理。他的努力为他的一生赢得蜚声世界的荣誉。在慕勒收到的一封信很有代表性的信中，一个医生说，慕勒的成就“是对怀疑论者最为精彩的，十足的痛击”。当我开始作序的时候，我相信他所走的并非坦途。从他虚怀若谷的为人看，他可能觉得对自己的评价有点夸张，并坚持认为他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荣誉都该归于上帝。

在本书出版以前的一次见面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凯里 (Carey) 博士讲述了发生在他自己祷告生活中的一个变化，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祷告的态度是购物清单式的，上帝在那里应允我所要求的。是标准的以‘我’为中心。

之后我慢慢长大，成熟驱走了‘自我’，上帝成了我祷告的中心。赞美和感谢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代求’也被推到重要的地位。”

慕勒想必认识和懂得这些。当他的祈祷呈现出新的一面时，他确实描写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变化了的细节，比如在他生命最后的30年间，他发现祈祷伴以默想经文的重要性，那时，他的灵沐浴在上帝的爱中，静享上帝的同在。（但他并没有因此形成俗套，从而摈弃“购物清单式”的祷告，也没有为一些特殊的事情祈求上帝而愧疚。）

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7-8节）使徒保罗也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6节）

关于慕勒祈祷所得到的回答，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千零一夜》中有一著名的故事说，阿拉丁发现，当他盗得神灯时，便有一个小妖怪出现并且说：“我是那神灯的奴隶，吩咐我做什么，我必听从。”慕勒发现祈祷而来的能力却不是如此。相反，他在祈祷方面的成功是一生与上帝同行的结果。

慕勒相信那些对每一个信徒都适用的基本的圣经原则，并将之付诸行动。这些圣经原则包含奇妙的应许，以及成就这些应许所要求的条件。这些应许和条件陈列在本书第20章的第二部分。如果你研究这些原则，并有意识地决心付之于行动，我相信你的祈祷生活会发生改变。但这并不是说，在你以后的祈祷中不再有困惑，也不是说你忽然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更不是说从此以后，祈祷不再是一个奥秘了。

慕勒的一生，用圣经的祈祷原则来祈祷，不仅得到上帝奇妙的垂听，在圣洁和顺服方面也趋于成熟，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圣徒。那些认识他的人说道：他总是面带微笑，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的每一条皱纹都嵌着笑容。尽管他喜欢那有益于健康和善意的玩笑，但是在他面前，没有人轻易闲谈。因为人们认为他与上帝同行。

慕勒了解他的上帝。他喜欢花时间与上帝亲近。他坚信上帝的应许。他奉耶稣基督、他的救主、朋友和主人的名与天上的父亲亲近。他凡事顺服，凡事相信，盼望他的祷告蒙上帝垂听——正像世人所知道的，他所祷告的都蒙了应允。

教会历史上很难有人像慕勒一样，充满激情和戏剧性，几乎跨越整个 19 世纪。更没有人像他一样触动人的心灵，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基督。慕勒离世 100 年的时间里，他所建立的事工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有所调整，在新的领域更加多样化，但是它不向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募集资金的宗旨从来没有改变。乔治·慕勒基金会的朱利安·马什 (Julian Marsh) 在修订版的最后一章，将这一故事告诉现今的人，对此，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很高兴新的修订版会使读者对慕勒的故事耳目一新。

在新的千年里，乔治·慕勒的上帝仍将是永活的上帝。我祈祷在您读下面这个非凡的故事时，您对他的认识和经历都会更加进深。

罗杰·斯蒂尔^①

1997 年 6 月于科帕斯东·得文 (Coppystone Devon)

① 罗杰·斯蒂尔是深受欢迎的作家和广播节目主持人，他与家人现住在西方国家。

目 录
CATALOGUE

前言	1
第 1 章 普鲁士的花花公子	1
第 2 章 “被耶稣的爱驱使”	8
第 3 章 英国, 1829	17
第 4 章 在廷茅斯受造就	25
第 5 章 丧钟阵阵	38
第 6 章 看得见的证据	48
第 7 章 “金子和银子是谁的?”	56
第 8 章 换换环境	64
第 9 章 “不倒闭的银行”	73
第 10 章 仰望上帝的富足	86
第 11 章 正当的抱怨	97
第 12 章 风雨弥坚	108
第 13 章 慕勒的秘密财富	116
第 14 章 当南风刮起的时候	131
第 15 章 难以形容的幸福	144
第 16 章 “没有地方看起来 比这里更可爱”	153
第 17 章 平安到达荣美福地	173
第 18 章 故地重游	182
第 19 章 到达白宫	192
第 20 章 只靠祷告	202

目 录

CATALOGUE

第21章	忍冬花的芳香	210
第22章	被众人爱戴	221
第23章	渴慕上帝的美善	232
第24章	宝贵的前景	238
第25章	责备怀疑分子	250
第26章	新的基金会，相同的 基金会	264

第 1 章

普鲁士的花花公子

半个世纪以前，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中世纪城堡一直是当地贵族的首选居住地；19 世纪初，虽然王室的访客已经离去，但这个坐落在下撒克逊（Lower Saxony）地区的 17 世纪小城却风光依旧。砖木结构的房屋簇拥着城堡。一间房子里，两位士兵侍立，看守着一个眉清目秀的普鲁士青年。警官从他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开始审问这名青年。

“姓名？”

“乔治·慕勒。”

“年龄？”

“16。”

“籍贯和生日？”

“普鲁士的克罗彭施泰特（Kroppenstadt）。1805 年 9 月 27 日。”

“你在沃尔芬比特尔一直生活奢侈，但却不能付旅店费用，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这样的，但……”

“上一个礼拜，在靠近布朗司威克(Brunswick)的另一家旅店，你也是同样奢侈，但旅店主人要求你付费时，你被逼脱下衣服作抵押，这是真的吗？”

慕勒不再为自己辩解。他已经身无分文，靠举债度日。经过三个小时的审问之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判决，两个士兵把他押进监狱。

1821年12月18日，乔治·慕勒在小小的牢房里举目观望，这是他在监狱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狭小的窗户被粗实的钢栅遮蔽着，仅能透进一点点亮光，厚实的木墙将各间牢房一一隔开。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初犯，那天晚上，慕勒收到一些面包和肉，但是他厌恶那味道，放在那里一动没动。这下，一定冒犯了厨师，不再特别照顾他。第二天，他与狱友吃同样的饭食。午饭：白水加粗面包。晚饭：青菜和冻肉。由于开始感到特别饥饿，他吃了一点点。

狱吏日夜将慕勒锁在牢房，不准他走动，也不准他锻炼。

为了打发时间，慕勒请求道：“能给我一本《圣经》读吗？”

“不行！”

第三天，他将给他的食物吃了个精光，第四天以后，他总是想多得到点食物。

几天之后，他发现在隔壁牢房有一个囚犯。他透过厚墙高声呼喊，晓得那人是因为偷窃被关进监牢的。可能是因为想减少吵闹，狱吏允准他跟慕勒住在一起，他们可以消磨时光，互相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慕勒满怀兴趣，开始编造故事以给他

的狱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此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发生了争执，从此不再讲话。在孤独与痛苦中，慕勒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时光倒流到 1810 年 1 月。那时他只有四岁，他们举家从克罗彭施泰特迁往海姆斯勒本（Heimersleben），在那里，父亲被安排作税务局长。在他十岁之前，他便从父亲那里偷政府的钱。那时，因为怀疑是自己的儿子偷钱，父亲设了一个圈套。赫尔·慕勒（Herr Muller）将很少的一部分钱放在儿子住的房间里。过了不久，乔治便取出一部分，藏在自己的鞋子里。父亲回来后数点，发现了乔治所做的一切。乔治还记得由此而受的惩罚。但是，他的反应却是设法更加聪明一些，以便不被察觉。

赫尔·慕勒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牧师，但并非因为这样可以事奉上帝，而是为了他从此可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在牢房里，他还回顾了自己在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学校五年的时光；他内疚地回忆起，两年之前的一个礼拜六晚上，因为不知道妈妈已经生病，他一直打牌到礼拜天凌晨两点，在一个酒馆里酒足饭饱之后，踉踉跄跄地与朋友们在街上闲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参加了第一次的坚信礼系列学习班。当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发现父亲正在等候他。

“你母亲去世了。”赫尔·慕勒说，“收拾一下，准备参加母亲的葬礼！”

在行坚信礼三四天以前，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深感内疚，在行坚信礼的前一天，他在祈祷室里承认自己的罪，他曾欺骗牧师，把父亲给他的奉献金仅仅交了十二

分之一。

牢房里的生活像死一般的沉寂，也没有别的囚犯可以聊天，慕勒继续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1820年复活节后的礼拜天，他在哈尔伯施塔特大教堂第一次领圣餐。那天下午和晚上，为了寻求安静，他一直呆在家里，而那些与他一起行坚信礼的青年朋友早已出去玩了。

“我要开始新的一页，花更多的时间学习。”他暗下决心。

但不久，他却违反了自己的誓言，行为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在坚信礼后的20个月里，他花一部分时间学习，但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弹钢琴、弹吉他、读小说、泡酒吧。起初下的决心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1822年1月12日，牢房的开门声打断了慕勒的回忆。

“到警察办公室！”狱吏说，“跟我走！”

“你父亲已经送来了返程的路费，并还清了你在旅店的欠款和监狱的开销。”警察官告诉他说，“因此，你自由了，马上离开这里。”

赫尔·慕勒以一顿毒打来庆贺他和儿子的团聚，然后将他带到靠近马格德堡（Magdeburg）的舍内贝格（Schoenebeck）的家中，1821年夏天，他在那里谋得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乔治想方设法重获父亲的喜爱，给小学生当拉丁语、法语、德语语法、算术等课程的家庭教师。他在学业上进步很快，一段时间之后，成为人人喜欢的人，甚至包括他的父亲。但是后来他承认，他“对自己的过失，在内心深处总是深感愧疚”。

刚满17岁那一年，慕勒进入北豪森（Nordhausen）的大学预科，那是普鲁士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尽管他有学习的热情，

也很想改变自己，但慕勒仍然觉得入不敷出。一次，在收到父亲的津贴后，他故意向朋友们炫耀。然后，他毁坏了吉他箱子上的锁，几分钟之后，他脱掉外衣，跑向主任的房间。

“我父亲给我的钱都被偷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对此，每一个人都十分同情。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凑钱，想方设法凑足他被偷的钱，同时他的债权人也同意延长他欠款还款期。然而，年长而聪明的主任却对乔治产生了怀疑。从此，乔治在主任的太太面前，再也找不到平安，因为乔治生病时，她曾像母亲一样照顾他。

慕勒最大的理想是进入哈雷（Halle）大学，这所大学由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创办。这对后来慕勒的发展至关重要。哈雷大学是德国敬虔主义神学和实践的大本营。17世纪，敬虔主义给德国的信仰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当路德和改教者带来的亮光成为僵死的教条时，敬虔主义却特别注重个人重生、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和基督徒的经历。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传福音的热情。1825年的复活节，慕勒实现了他的理想。

哈雷大学位于萨勒（Saale）河畔的沙滩平原上。中世纪完美的城镇礼堂，和亨德尔（Handel）曾经学练风琴的哥特式音乐厅高高耸立于小城的中心广场上。来到哈雷，慕勒再次立志重新做人，这一次他是认真的。如果仍是目前的状况，他知道没有一个教区会选择他作牧师的。即使被教区接受，他也需要扎实的神学知识，方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在普鲁士都要依据你的大学学历而定。

但是，大学宽松的带来了诸多诱惑，慕勒再次发现过

拮据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不久，他便典当了他的手表和衣物，又开始无节制地借钱。他觉得痛苦极了！想使自己完美却又常常失败，这种事与愿违的矛盾一直摧残着他。

在哈雷的一个酒吧里（他曾在一个下午喝下十品脱的啤酒），他突然看见了他曾经认识的哈尔伯施塔特的老同学贝特（Beta）。其实，他们不是亲密的朋友，因为贝特是个安静而严肃的人。但是，对慕勒来说，如果与他结交成为亲密朋友，或许可以帮助自己过上安定的生活。于是他匆匆挤过人群，热情地握着老朋友的手。

“贝特，您好！好久不见，见到您真高兴！”

对于慕勒的热情，贝特觉得来得正是时候。他正想借此活跃他的社交生活。

慕勒喜欢旅游，于是向他的朋友提了一个建议。

“我们为何不去瑞士旅游呢？”慕勒问道。

“但是我们没有钱，也没有签证。”他的朋友答道。

“一切交给我去办吧！”慕勒说，“这是我的计划，伪造你家长的证明信，以此获得旅行签证。变卖你所有的特别是书籍，准能得到一个好价钱，那样我们便能凑够足够的钱，使这次旅行成行。把钱交给我保管，一切由我代劳，到万不得已不能逃票的时候，我再买票。”

1825年8月18日，包括贝特在内的旅游团从哈雷出发了。他们越过厄尔弗特(Erfurt)，然后向西来到法兰克福，南经海德堡、斯图加特、苏黎世到达瑞士的中心地带。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陡峭的山谷、梦幻般的云雾，还有美丽的卢塞恩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们登上里奇（Rigi）山顶，眺望倒映在湖水里的

山峰：布格斯多克峰（Burgenstock）、瑟雷斯波格峰（Seelisburg），还有远在西南方的彼拉特斯峰（Pilatus），巍峨壮观，美不胜收。大自然的美景简直让慕勒屏住呼吸。

“现在，我没有白活！”慕勒想道。

他们经由康斯坦斯湖(Constance)，向东经过乌尔姆(Ulm)、巴伐利亚中世纪的纽伦堡（Nuremberg），于9月末回到哈雷。慕勒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发觉，他们所信任一路上掌管旅费的人，却精打细算，他自己所花的旅费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少得多。

第 2 章

“被耶稣的爱驱使”

1825 年 11 月中旬，贝特告诉慕勒说：“几个礼拜以来，每周六晚我都在一个基督徒家里参加聚会。”贝特欲言又止，他在观察着慕勒的反应。

“他们的聚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他们读经、唱诗、祷告，通常还有人宣读一篇讲章。”

“今天晚上我愿意跟你一道参加。”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

慕勒已经下了决心：“我非常想去。”

“那么，今天晚上我叫你。”

聚会在赫尔·瓦格纳（Herr Wagner）家里举行。慕勒觉得他也许会不太欢迎自己，一进门，慕勒就对自己不请自到深表歉意。赫尔·瓦格纳却笑脸相迎。

“只要你乐意，随时来参加。我们的门和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着，请进，加入我们吧！”

他们唱了一首诗，然后是赫尔·凯泽（Herr Kayser）（后来

成为伦敦宣教会在非洲的宣教士) 跪下为那晚的聚会献上祷告。慕勒从来没见过人向上帝跪下,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跪下祷告过。

赫尔·凯泽宣读了一章《圣经》和一篇印好的讲章。因为当时普鲁士的法律规定, 除非有牧师在场, 临时讲解圣经是违法的。聚会结束的时候, 他们又唱了一首诗歌, 然后是赫尔·瓦格纳做结束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 慕勒心想: 虽然我的学问比这个人大得多, 但我远不能像他祷告得那么好。

“我们去瑞士所见的美景, 还有以前的喜乐, 与今晚的聚会相比, 实在算不得什么。”在回家的路上, 他对贝特这么说。

这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他躺在床上, 内心充满平安和喜乐。第二天以及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几天中, 慕勒又来到赫尔·瓦格纳的家里学习圣经。对这次学习的情况, 后来他这样写道:

我能够明白这个宝贵真理的意义,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我懂得了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受如此痛苦的原因。不但如此, 耶稣受了本该我们承受但我们却无法承受的刑罚。因此, 我懂得了耶稣对我灵魂那辽阔高深的爱, 我被他的大爱驱使, 只有好好爱他作为报答。要放弃放荡罪恶的生活, 父亲和他人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 我自己的立志也毫不奏效。但被耶稣的大爱驱使, 我能做到。盼望罪得赦免的每一个人, 一定要通过耶稣的宝血方能成就。同样, 盼望获得胜过罪恶能力的每一个人, 也必须通过耶稣的宝血才能寻到。

1826年1月，在他成为基督徒六七个礼拜后，经过多次祷告，慕勒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家探望他的父亲。

“父亲，我相信上帝要我成为一个宣教士，应德国差会的要求，我必须征求您的同意。”

他父亲吼了起来：

“为了你的学业，我不惜代价。我盼望将来在一个牧师楼上，和你住在一起颐养天年。现在你所说的，将使这一盼望成为泡影，因此，我不再认你是我的儿子！”

然后，赫尔·慕勒放声痛哭。

“我乞求您三思。”慕勒央求道。

但是，乔治决心已定，他坚信上帝会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将上帝的呼召坚持到底。

慕勒又回到哈雷，摆在他面前的，虽然还有两年的学习时间，但他决心不再向父亲索取任何费用。现在，他的父亲再也不能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他所渴望的——一个生活优越的牧师了。这样做好像错了。

如今，没了父亲的支持，如何生活成了慕勒棘手的问题。他能够实现自己的决心吗？不久证明，显然他能。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的第一件事——在向慕勒，后来更向世人证明，那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圣经·诗篇》34篇9节）。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他探望父亲返回学校不久，有几个美国人来到哈雷学习，其中三人曾在美国的大学里担任过讲师，但他们不懂德语。那时，哈雷有一个新的神学教授，陶乐(Tholuck)博士，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向刚来的三位同事提了

一个建议。

“我有一位学生，我相信他是一位极好的德语教师。这位学生的名字叫乔治·慕勒。”

这三位美国人喜出望外。

这三位美国人付给慕勒丰厚的薪金，足够他的学费，虽然没了父亲的支持，他还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并且还有节余。

现在，他开始满腔热忱地宣讲他新发现的信仰，这成为他一生的特点。在德国的不同地区，他散发一种关于两百多个差会消息的月刊。他的口袋里常常塞满福音小册子，以便送给他在路上遇到的行人，他向以前的朋友写信，央求他们归信基督。在 13 个礼拜的时间里，他一直探望一个病人，最后，这位病人终于成为基督徒。

他早期的宣教努力并非都是完全成功的。“一次，我在田野里遇到一个乞丐，我向他谈起灵魂的事，当我发觉他无动于衷时，我就用更大的声音说，当我发现仍然毫不奏效时，我向他高声喊叫，但直到我离开那里，仍是无济于事。”

1826 年 8 月，在靠近哈雷大学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小学校长向慕勒请求道：

“你愿意准备一下，到我的教区讲道吗？”

“我从未讲过，”慕勒回答说，“但如果我把讲章记住，我愿意前往。”

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记住了那篇讲章。1826 年 8 月 27 日早上，在一个小教堂里，他诵读了那篇讲章，但并不满意。后来在教区的教堂里，他又一字不落地重复了那篇讲章。一天下午，他准备第三次重复同样的讲章。但是，当他站在讲

台上，面对会众的时候，似乎有什么在告诉他读《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凭着心里的感动来讲。

他开始解释“虚心的人有福了”的含义，他感到在他开口的时候，便有圣灵的帮助。早上的讲道，对会众来说似乎太深奥难懂，但他注意到，下午的讲道，会众听得聚精会神。他所讲的，会众都听明白了，并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

从此以后，他常常到哈雷周围的村庄和乡镇布道。礼拜六的晚上，他喜欢到赫尔·瓦格纳的家里参加聚会。礼拜天的晚上，一群大学生在一起聚会，从1827年的复活节开始，这些学生聚会都在慕勒的家里进行。

1827年8月，英国大陆布道会决定向布加勒斯特派遣宣教士。他们要求陶乐教授在哈雷大学物色一个人选。慕勒思考并为此事祈祷，他发现他的父亲竟然没有反对他的想法。

“我相信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奉机会，”慕勒告诉陶乐说，“我很愿意去布加勒斯特。”

他正在等待伦敦那边更多的消息，筹措去布加勒斯特的花费，并为将来的事奉恳切祈祷。同时，因为去布加勒斯特的打算还没有落实，很奇怪地，他对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完全出于兴趣学习起来。

1827年10月末，一位意外却受欢迎的访客出现在礼拜天晚上慕勒家的聚会中，这人就是赫尔曼·鲍尔（Hermann Ball），他正在波兰向犹太人传福音。慕勒第一次遇见他是在1826年的复活节。

“因为健康原因，”他告诉慕勒说，“我不得不放弃我在犹太人中的工作。”

在谈论的时候，慕勒感觉到鲍尔希望有人能代替他的工作。但因为有布加勒斯特的合同，他没有认真考虑此事。

11月，慕勒造访陶乐博士。

“你是否想做一个向犹太人传道的宣教士呢？”陶乐开门见山地问，“我是伦敦差会犹太人事工部的代理人。”

对于这一提问，慕勒感到惊奇，便告诉了陶乐关于鲍尔的造访。

“在我正要去布加勒斯特的时候，再考虑去别的地方，这似乎不妥。”慕勒说。

陶乐点头同意。

然而，第二天早上，慕勒想去布加勒斯特的意念全消，并且认为这个想法太主观了。

“亲爱的上帝，”慕勒祈祷说，“请恢复我从前想去布加勒斯特的热情吧。”

他的祈祷立时得到了答复，但是他对希伯来语的喜爱却与日俱增。

到了11月底，大陆布道会写信给陶乐博士，说：“因为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委员会决定放弃向布加勒斯特派遣宣教士。”

“你是否再次考虑成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陶乐对慕勒说。

为了作出抉择，慕勒祷告、思考，并与朋友们商讨，邀请他们查验他的动机，最后，他向陶乐做出答复。

“成为一个向犹太人传道的宣教士，我不敢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把自己交给委员会，上帝看如何好，

就如何带领我。”

1828年春，一个针对罪刑较轻之人的新教养所在哈雷建立起来。他一面等待从伦敦来的消息，一面成功地申请成为这些犯人的临时牧师。他在讲道之余，单独劝解犯人，向他们解释基督教信仰。“在那里牧养，至少我有一些资格。”他写道，“因为我深知那些可怜罪人的状况，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十之八九，我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如此坦白的讲说，他们在任何牧师中都找不到。”

尽管他有许多学习以外的活动，但是在1828年的复活节，他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与1825年他刚到校时的倔强和闷闷不乐相比，一个判若两人的乔治·慕勒从哈雷毕业了。现在他的生活有目的，充满平安和喜乐。也许随着时间的流失，对哈雷的记忆渐渐淡忘，但他一定会清晰地记得1825年11月礼拜六晚上去造访赫尔·瓦格纳家的一幕。自此，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828年6月，他接到了伦敦差会犹太人事工部（后来成为针对犹太人的教会使命团）的来信。委员会决定让他做宣教士，并提供他去伦敦的需用，但有6个月的见习期。

然而还有一道门槛，在他获得英国的签证之前，每一个普鲁士的男性毕业生，只要证明身体健康，必须到部队服兵役一年。慕勒20岁的时候，就被宣布身体合格，需应征入伍，但是他自己要求推迟，直到他完成学业。然而，那些打算成为宣教士的人往往可以免兵役。但国王威廉·弗雷德里克三世坚持认为，此事必须提交具体的部门处理。因此，慕勒不能被免除兵役。

这一问题的解决真是出人意外：慕勒忽然身患重病。一个

著名的医生给他开了补药和药酒的处方。一个美国教授，慕勒的一个富有的朋友，将他带到靠近柏林的乡下。“只要我天天住在户外，到处散步，喝着药酒吃着滋补品，我就感觉良好。但是我一回到哈雷，便旧病复发。”主要的症状就是严重的头晕、食欲不振和无法摆脱的感冒。

慕勒和他的美国朋友一道来到莱比锡著名的米迦勒商品交易所，而后到大剧院。但是，慕勒对此索然无味。第一场演出，他喝了一杯冰水，第二场的时候，他便昏倒了。但他很快恢复过来，回到他们所住的宾馆，在那里，他度过了舒适的一夜。

“我对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感到幸福。”第二天，他对他的朋友这样说。

“我也是。”他的朋友回答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只不过对耶稣的爱渐渐冷淡了。“昨天夜里，你在剧场昏倒的时候，对我震动很大，死在那样的地方真可怕！”

在回哈雷的路上，慕勒患胃出血，都归咎于那一杯冰水。

“为什么不申请服兵役呢？你身体如此虚弱，极有可能被淘汰。”一个普鲁士军队的基督徒陆军少校对慕勒这样建议说，这是一个较含糊的但又合乎道德的办法。

慕勒接受体检，但不合格。结论说有患肺结核的可能。普鲁士军队的一个将军，在他的参谋不在的情况下，亲自写了必要的证明，可以完全免除慕勒一生在所有兵种服兵役。

“我可以特别建议你，在向犹太人传教时，去吸引他们注意保罗写的《圣经·罗马书》第11章吗？”那位将军说道，他自己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慕勒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直到他采纳一位医学教授的建

议后，放弃了一切药物，他的状况才开始好转。

1829年2月，慕勒离开柏林前往伦敦，在旅途中，在他曾经度过童年时代的海姆斯勒本的家中，辞别了父亲。在鹿特丹，河上的浮冰刚刚初融，没有轮船敢贸然前往。推迟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慕勒登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1829年3月19日，他终于到达伦敦。

第 3 章

英国，1829

你可以嗅到 1829 年伦敦春天的气息。城市几乎已经扩展到海德公园（Hyde Park）以北的乡村。约翰·纳什(John Nash)新近又在牛津街（Oxford Street）以北，划拨了 400 英亩的荒地，为摄政王建造一个美丽的公园，称为王室公园。从公园到林荫路向南的地方，是国王居住的地方。纳什设计并建造了摄政王街。作为街道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他修建了一个极好的教堂，上有圆形的爱奥尼亚式（Ionic）门廊，这座建筑的精髓，是兰格汉宫(Langham Place)。当慕勒到达伦敦的时候，刚刚修好 5 年。

1829 年，纳什又忙着为乔治四世重修白金汉宫，工程还没有完工，国王便去世了。威廉四世更喜欢住在圣雅各宫（St. James Place），而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现在住在肯辛屯（Kensington），直到 1837 年举行加冕后，才搬进白金汉宫。毫无疑问，慕勒对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闪烁的现代化气灯很感兴趣。所有这一切都在述说着伦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

慕勒最后找到了便宜的住处，不是在繁华的西区，而是在

出租马车上。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拦路强盗常常光顾的地方。他想尽快使他的英语流利顺畅，但是他大多数的同学都说德语，他说英语的机会有限，在他所租的马车旁，他第一次向一个小孩子用英语谈论灵魂的事情，他想这孩子能忍受自己蹩脚的英语。

“安东尼·诺里斯·格罗夫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在埃克塞特作牙科医生，他现在已经放弃一年 1500 英镑的实习期，计划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波斯作宣教士，将来他没有薪水，完全依赖上帝供应他的需要。”慕勒的一个同学告诉他说。

这一消息使慕勒喜出望外，在日记中将它记了下来，并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在德国的朋友。

慕勒在伦敦学习特别用功，一天 12 个小时，主要用于希伯来文、迦勒底文和犹太拉比的字母。“当我翻开我的希伯来文字典的时候，我都仰望上帝，祈求他的帮助，让我最快地找到要查的字。”

1829 年 5 月，慕勒 23 岁，他病倒了。当他离开德国的时候，身体就一直不好，加之在伦敦长时间的学习，使他的身体严重透支。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内心反省，内在的喜乐油然而生：“我所犯的每一条罪，都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与此同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有的罪都已经完全得到赦免——我被洗净，在耶稣的宝血里完全洁净。赦罪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平安，我巴不得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离世却不是现在的事。

“你正在一天天好转。”医生告诉他说。

“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巨大的喜乐。”他写道，“将我

压垮吧，与主同在是我最大的愿望，目前的痛苦不过是暂时的，后来必将恩典赏赐与我，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你应该到乡下换一下空气，”他的朋友向他这样建议说，“到南部的得文如何？”

于是，1829年的夏天，在廷茅斯（Teignmouth），慕勒与亨利·克雷克（Henry Craik）结下了36年的友谊，并改变了他的生命路程。

亨利·克雷克是苏格兰人，与慕勒一样，快24岁了，更巧合的是，他也是在大學期间归信基督的。从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荣誉毕业后，便于1826年来到埃克塞特（Exeter），成为安东尼·诺雷斯·格罗夫斯家里的家庭教师，而主人正是那位慕勒在伦敦就听说过的牙科医生。格罗夫斯极大地影响了克雷克的思想。

“我做了几年高派^①教士。”格罗夫斯告诉克雷克说。“1822年，我开始集中学习圣经，慢慢地我认为，只有圣经才是信徒灵命成长的唯一丰富源泉。”

格罗夫斯给克雷克一本小册子，是自己1825年写的。名曰《基督徒的委身》，在里面他列举了他所认为的基督所说的真理的字面意义，浅显易懂。例如，当基督这样说“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他说早期教会的信徒便响应这种精神并付诸实践，“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45节）

“这就是从圣经启示中直接推理出来的行动。”格罗夫斯对

① 编者注：高派是指英国国教圣公会中的上层人士，在宗教礼仪上接近罗马天主教。

克雷克说。

格罗夫斯将他所传讲的付诸行动，他和妻子先是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后来是四分之一奉献，把它分给贫穷的人。然后，他们放弃一切存钱的念头，也不再为孩子们留什么，省吃俭用，节省开支，将其余的完全分发出去。

为了准备自己的宣教，格罗夫斯注册为都柏林三一神学院的校外学生，想在英国教会按立他做牧师以前取得神学学位。在都柏林，他遇上了一些现在被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后来他们第一个大教会所在的位置）的创办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始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即给本已四分五裂的基督的国度里，再加上另外一个宗派，这真是不幸！

格罗夫斯去波斯作宣教士的决定迫使克雷克再寻找另一份工作，1828年夏天，在廷茅斯，克雷克又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主人也是格罗夫斯在都柏林遇到的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人之一。克雷克真正吸引慕勒的是“他内心对主的火热”。两人都迷恋于希伯来文的学习。慕勒在都柏林的发展得到克雷克全部的资助。不但如此，克雷克和慕勒两人都和格罗夫斯继续保持联系，并且因为慕勒的缘故，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

在慕勒到达廷茅斯没几天，他参加爱本内泽（Ebenezer）教堂的重新开堂典礼，其中的一个讲道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录说，“虽然他所讲的我不是都喜欢，可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与众不同的庄严和严肃。”会后慕勒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这位讲道人，并且被邀请到那位传道人住的爱克斯茅斯（Exmouth），与那位传道人同住10天。慕勒十分乐意接受了他的邀

请，他这样记录道“借着这位弟兄，上帝大大地倾福于我，为此，我有理由赞美上帝直到永远”。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位弟兄”的姓名。然而，显然是慕勒在爱克斯茅斯期间，他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反映出这位弟兄曾与早期弟兄会接触过并受他们的影响。

慕勒感到上帝正在教导他“更高标准的委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注说，他以前曾认真地学习了格罗夫斯的小册子《基督徒的委身》，他这样写道：“上帝的仆人寻求富足、显赫和世人的尊重，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他的主是贫穷的、卑贱的和被人厌恶的。”

他描写住在得文所经历的变化正如“又一次的归信”，好多年以后，在一封信中，慕勒这样描写这一次的经历：

我是1825年11月开始成为基督徒的，但是后来的四年，大部分时间处在软弱当中。但是到了1829年7月，我的心才开始完全降服。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主，我的名誉、娱乐、金钱、体力、智力都放在耶稣的脚前，我对上帝的话极度渴慕，在上帝那里，我找到了我的一切。

9月，慕勒回到伦敦，决心和他的同工分享他新的看见和经历，每天早上他组织聚会，读经祈祷。在聚会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分享他所读圣经中上帝对自己的启示。他的一个同学对慕勒对属灵事情的热情特有同感，好几个晚上，慕勒特别沉浸在与上帝同在的甜蜜相交中，半夜以后，他来到朋友的房间，发现他也处于同样的景况。他们两个继续祷告，一直到凌晨一

两点钟。然后，慕勒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好多时候，他感到喜乐充盈，直到6点钟，他都难以成眠。接着又是他与同学开始祈祷、读经的时间了。

上帝已经呼召他传讲福音，他没有坐以等待直到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宣教士，便开始在伦敦城中的犹太人中服侍，他将自己的姓名、地址写在成百上千个小册子上，当他分发出去的时候，就邀请接受者有时间到他那里去，以便跟他们谈论基督徒的信仰。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犹太人聚会点中传道，向50个犹太男孩定时读《圣经》，他成了主日学的老师。

1829年11月末，慕勒开始思忖，他是否应该继续与伦敦宣道会犹太人事工部联系。他渐渐认识到，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在传道事工中应接受圣灵而不是人的带领。委员会要求他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现在看来，对他来说，《圣经》中的方法，不是到达一个新的地方，特别地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是同样也向外邦人传福音。

12月，他多少已经拿定主意，向差会委员会写信，将自己的心意向他们表明。但是，奇怪的是，他决定推迟一个月考虑此事。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再游得文，想在那里过一个短暂的假期。然而，随着事情的变化，他再也没有回到伦敦做实习生。

他打算在爱克斯茅斯两星期，绝不荒废时间。但到第二天，一个虔诚的得文人（Devonian）找到他。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祷告，求上帝在雷普斯顿（Lymptstone）有所作为，那是一个很大的教区，但却很不复兴。那里有一个卫斯理会教堂，我相信你将被允许在那里讲道。”

慕勒愉快地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适逢礼拜天，他在雷普斯顿呼吸着爱克斯（Exe）港湾浓浓的泥滩味。在那个村子的卫斯理教堂里，他被允许一天讲道两次，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大多数日子里，在一个房间里，他与几个老太太一起聚会、读经。

鉴于以前的约定，他决定向伦敦宣道会直书其言，以便他们对自己做出决定，好使自己能够继续传道。他在信中述说了在他参加差会之前他对宣教事业的看法以及后来的变化。慕勒说很亏欠他们，因为他们把他带到英国来，如果将来他们允准自己在主的带领下，向徒有其名的基督徒，同时也向犹太人，在英国自由传道，即使没有薪水，他也愿意服侍他们。他希望差会供应自己希伯来文圣经和为犹太人而用的福音小册子。

作为答复，他收到了一个秘书的亲笔信，内容非常友善，外加一封正式的公文，信中很客气地指出，差会从不雇佣不愿意服从差会的宣教士，因此，也不再认为他是宣道会的学生之一。如果经过深思熟虑，他能回心转意，差会很乐意重新考虑此事。

于是，慕勒来伦敦差会学习的事奉得以终止。他对差会毫无指责，却对差会对他的帮助始终感激不尽。但是，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终止与差会的关系也从不后悔。现在，他可以把他的信仰自由地付诸实践。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有且只有一位主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救主带领，他必前往。

在爱克斯茅斯三个礼拜以后，慕勒前往廷茅斯，想与前年夏天在那里养病期间结交的朋友小住几日。从爱克斯茅斯到廷茅斯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爱克斯茅斯位于港湾的东部，爱克斯

与海相连，廷茅斯位于港湾西南几英里的地方，虽然近在咫尺，但是慕勒不能飞过去。路线有两条，要么迂回 20 英里，到达爱克斯伯爵夫人更衣处 (Countess Wear)，海水最浅的地方，要么乘坐使人厌倦的小驳船，从爱克斯茅斯到斯塔罗斯 (Star Cross)。然而，带给疲倦的旅行者的补偿是美丽的景色。横跨港湾到达坡得海 (Powderham) 以及迈姆海 (Mamhead) 的树林都景色迷人。另外，在黑尔顿山 (Haldon Hills) 上，观景楼已经建成，它在 1830 年也像在今天一样，是得文众多风景点中的地标。这些乡村，慕勒开始变得熟悉起来——不像他在那里停留十几天，而是在以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所感受到的。有谁曾经想到，那位说着蹩脚英语的普鲁士青年，因为身体的原因，曾经如此快地被军队辞退，如今，却愿意把英国的西部作为他的第二故乡，直到世纪末他去世的时候。他用口袋里五英镑多的钱到达廷茅斯，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但是在那两年半的时间里，慕勒为了摆在他前面的工作，开始学习适合他的功课。

第 4 章

在廷茅斯受造就

作为一个海港、渔业和集镇市场，廷茅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它成为上流社会所喜爱的一个海滨风景点。基茨（Keats）和范妮·伯尼（Fanny Burney）以及其他名流都住在这里。1827 年，连接该镇与沙尔顿（Shaldon）的大桥开通了，沙尔顿是可爱的村庄，在廷根（Teign）港湾的对面，亨利·克雷克住在那里。

“你愿意考虑成为爱本内泽的牧师吗？”慕勒刚到廷茅斯不久，一位会友便这样问他。

“我不想扎根在任何一个地方，上帝带领我去哪里，我就在哪里巡回布道。”慕勒回答说。

“你愿意在沙尔顿的浸礼会教堂替我讲道吗？”亨利·克雷克问。

慕勒接受了克雷克的邀请，当他讲道的时候，会众中有三位牧师，都不喜欢他的讲道。但是，聚会结束后，一位年轻的

太太归信基督，她曾作过三位牧师中一位的仆人。慕勒禁不住反思：她已经多少次听过她主人讲道啊！

在第一个礼拜的每天晚上，他要么在沙尔顿要么在廷茅斯讲道。其中有些听众，在夏天的时候对他相当友好，但现在变得充满敌意。

“上帝想使用我在廷茅斯为他工作，”慕勒得出结论，“出于害怕，因此，撒旦寻求对立面攻击我。”然而，在第一个礼拜，有许多人对福音做出回应成为基督徒。

尽管有一些反对声，但爱本内泽教堂会众中的一些人越来越希望慕勒成为他们的牧师，12个礼拜以后，全体会众异口同声地邀请他成为他们的牧师。

“我很高兴接受你们善意的邀请，”慕勒经过多次祷告后回答说，“但是我必须清楚，只有我确定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才能留下来做你们的牧师。”

他没有放弃在上帝的带领下自由传道的想法。教会给他年薪55英镑，后来随着信徒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后来随着慕勒观点的变化，这种供给的方法被废弃。他开始固定地在爱克塞特(Exeter)、托普沙姆(Topsham)、沙尔顿(Shaldon)、爱克斯茅斯、雷姆斯顿(Lymstone)、比斯普斯顿(Bishopsteignton)、楚得雷格(Chudleigh)、库勒姆顿(Cullompton)、牛顿·爱伯特(Newton Abbot)等地自由传道。

1830年4月初，他来到小城西德茅斯(Sidmouth)传道，结果与三位太太的争论使他陷入困惑。这三位太太很特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慕勒先生，您对婴孩的善功和信徒的受洗意见如何呢？”

慕勒常常反对信徒的再次受洗。^①

“我认为我不需要再一次受洗。”他回答说。

“对这个问题，你曾经考察过圣经，并为此祈祷过吗？”在成年以后又受过洗的一位太太问他说。

“没有。”

“因此，在你没有考察过圣经以前，我劝你不要乱说。”

面对如此挑战，慕勒决心细细考察这一主题。他开始从头到尾有重点地研读新约圣经，特别注重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他认为，只有信徒自身才是受洗的对象，完全受浸是圣经的模式。他特别被《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36-38节和《圣经·罗马书》第6章3-5节所打动。不久以后，他由亨利·克雷克施洗，几乎他所有的朋友也随之受洗。

得文郡很大，南北长大约75英里，道路四通八达，远超过英国其他的郡县。但是年轻有为的普鲁士青年在廷茅斯定居的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在北部的巴恩斯塔堡（Barnstaple），一位律师托马斯·帕格斯利（Thomas Pugsley）建好了一座教堂，邀请慕勒在1830年6月的开堂典礼中讲道。慕勒接受了他的邀请，有两个当地人在那次聚会中归信基督。实际上，现在慕勒每一次讲道，都有人回应。

1830年夏天，慕勒决定爱本内泽教堂应该效法《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7节使徒的榜样，每个主日举行圣餐纪念主，虽然他承认没有从主也没有从使徒的书信中得到对此特别的

^① 编者注：当时欧洲的教会多采用婴儿受洗，而从1640年开始的浸礼会则采用成人受洗，这三位太太可能是浸礼会信徒。

命令。

我相信，特别根据《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和《圣经·罗马书》第12章，这样做合乎圣经。我们应当给圣灵足够的余地，在他欢喜使用的每一个基督里的弟兄中自由做工。我的意思是，按着上帝所赐的各种恩赐，肢体间互相得益处。在某些特别的聚会中，如果他们认为有话要说，并对听众有所造就，每一个肢体都有机会劝勉或教导其他的人。

就这样，爱本内泽教堂，在慕勒牧师的倡导下，采取明显的弟兄会仪式领受圣餐。

整个1830年的夏天，慕勒从没有推辞去爱克塞特的机会。不仅因为从廷茅斯到斯达克罗斯沿岸的风景秀美，从爱克斯港湾到乡村小镇的路径迷人，真正吸引他的是旅途的终点，慕勒坠入爱河了。慕勒从没有向安东尼隐藏他对格罗夫斯一家的景仰，但对他妹妹玛丽的爱恋却与日俱增。她于1829年后离开格罗夫斯家，玛丽·格罗夫斯为黑克(Hake)女士看门，黑克女士身体有病，在北草屋(Northernhay House)开办了一所寄读学校。慕勒肯定地认为，对他来说结婚更好。为选择一个终生伴侣他多多地祈祷。对他的祈祷，没有比格罗夫斯女士更为理想的回答了。她欣赏哥哥对主的赤诚忠心，当哥哥决定物质供应上完全依赖上帝时，她完全支持。按照慕勒的说法，她弹得一手美妙的钢琴，爱好绘画，能够在知识方面帮助他，她学过英语语法、地理、历史、法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在天文学方

面，还能教慕勒一二。8月15日，慕勒正式向她求婚，四天以后，他碰巧在爱克塞特，被她叫到北草屋。玛丽接受慕勒的求婚，他们双双跪下，祈求上帝祝福他们的婚姻。

他们为黑克太太找到另外一位看门人，10月7日，他们结婚了。他们徒步走到圣大卫（St.David）教堂，由约翰·艾波特（John Abbot）牧师主持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然后跟朋友们一起来到北草屋。为了庆贺，他们举行了圣餐，然后乘公共马车到达廷茅斯。第二天他们便开始一起为主工作。有谁曾听说过蜜月呢？

到达廷茅斯不久后，这对新婚夫妇决定，慕勒领固定的薪金是错误的。而这些薪金又来自教堂座位的租金，较好的座位租金也相对贵些。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助长了社会的等级区别，与《圣经·雅各书》2章1-6节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慕勒取消了座位出租制度，所有的座位都免费。10月底，他宣布了这项决定。

“我不想从教会领取薪水。”

他陈述己见，并读了《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他在教堂里放了一个小箱子，并附一张告示说，若有人想帮助慕勒夫妇，可以将奉献放入箱中。

慕勒还决定，从此以后，他绝不向任何人甚至爱本内泽教堂的弟兄姐妹，以任何方式请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自己。这样将不再“求助于人，而是求助于上帝”。慕勒承认，做出这项决定“比放弃我的薪水需要更多的恩典”。但就是这一决定，可能比任何事情使得他的生活从那时起便如此激动人心。也是从那时开始，慕勒夫妇决定按照《圣经·路加福音》12章33节的教训身体力行：“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

在婚后的整个生活中，他们对刚开始在一起生活时所定的原则从未质疑过。回首这段时间，慕勒写道：“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的上帝对他儿女温柔的爱和关心。特别是在这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中，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这使我们更完全地认识我们的上帝。”

比斯普斯顿是一个诱人的村庄，站在山冈上，一览廷根港湾达特茅(Dartmoor)以上河水的秀丽风光。爱本内泽教堂的信徒有的住在这个村子里。自从诺尔曼人征服这个地方以来，一直属于爱克斯主教们的领地，传统上是他们最富有的庄园之一。但是 1830 年来到这村子里的两位访客并不富足：不要薪水以后的三个礼拜，慕勒夫妇身上只剩下 8 先令（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显然没有通货膨胀，一个典型的农场劳动者，一个礼拜赚 10 先令，即 50 便士）。那天早上，他们向上帝祈求一些钱。

那天，他们去与住在村子里的一位女会友交谈，这位女主人问慕勒说：

“你需要一些钱吗？”

“亲爱的姐妹，当我决定放弃薪水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姐妹，在将来我有缺乏的时候，我只告诉上帝。”

“但是上帝告诉我，叫我给你一些钱，大约两个礼拜前，我问上帝我该为他做点什么，上帝告诉我说给你一点钱，上一个礼拜六，这个意念又强烈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就没有离开过我，昨天夜里一直在催逼着我，我禁不住跟 P 弟兄谈起此事。”她回答说。

慕勒仍然觉得最好不要提及他们的困境，便转向别的话题。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位太太送给她两个畿尼^①。

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在爱克斯茅斯，当他们只剩下9个先令的时候，慕勒又开始为钱的事祷告上帝，在30个小时内，慕勒从三个不同的渠道，收到7英镑10便士。

“赞美上帝的慷慨。”在他们决定只向上帝支取金钱开始的几个礼拜里，慕勒这样评论说，“在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并不太试验我们的信心，并且首先给我们鼓励，在他想完全试验我们之前，允许我们看到他愿意帮助我们。”

有些人说在接受礼物上，慕勒倔强的原则有时会引起一些有趣的事情。1831年3月，他在爱克斯敏斯特（Axminster）讲道，他被邀请在萨默塞特（Somerset）的卡得（Chard）度过一个礼拜天。在那种状况下，他极力避免给人家留下讲道是为了赚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礼物。一次聚会之后，那里的一个信徒想给他一些钱，便将钱用纸包了起来，但是慕勒坚决拒绝。然而，萨默塞特的信徒却不轻易泄气，这位决心坚定的信徒，将那团纸塞到慕勒的口袋里就跑了。在卡得的一位绅士，在经过一阵扭斗之后，最终还是塞给他一金镑。

在巴恩赛堡，针对慕勒离开廷茅斯讲道，却又不愿意接受礼物这一问题，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处理方法。1831年4月，慕勒夫妇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玛丽的手提袋里有一个金币，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放进去的。当他们回到廷茅斯，打开箱子的时候，一个信封掉在了地板上，里面有两个金币三个便士，这三便士显然是为了放在空箱子里发出点响声以作提醒。

① 畿尼：旧英国金币，现合1.05英镑。

当慕勒决定不再领取薪水的时候，他要求廷茅斯一个负责的弟兄，每个礼拜开一下爱本内泽教堂的奉献箱。然而这些绅士们，要么忘了带给慕勒，要么又因为太少怕送给慕勒而感到羞愧，通常三至五个礼拜才开一次箱子，虽然这会给慕勒夫妇带来困难，但慕勒什么也没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给他带来一些困窘。1831年6月的一个礼拜六，慕勒和亨利·克雷克从托基(Torquay)布道回来，慕勒夫妇身上只剩下9便士。

“亲爱的天父，请提醒Y弟兄吧，让他打开那个箱子，我们正需要钱啊！”慕勒祷告说。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慕勒夫妇正好有足够的黄油，给他们的一个朋友和住在那里的那个亲戚摆上。对自己的困境，他从没有向他们提及，当然是为了避免使朋友们感到尴尬。早上聚会以后，Y弟兄非常意外地打开箱子，交给慕勒1英镑18先令10个半便士，相当于慕勒两个多礼拜的工资。

“昨天夜里，我和妻子彻夜难眠，担心您和太太正处在困境中。”可怜的Y弟兄显然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慕勒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微笑。

亨利·克雷克的处境也是如此，但这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6月18日，他拜访慕勒夫妇。

“我只剩下一个半便士了。”在谈话中，亨利说。后来，他回家的时候，收到了一些钱，便送给慕勒夫妇10先令，自己只剩下3先令。

7月的时候，有一位无名氏送来一只羊腿和一块面包。后来发现，有一谣言流传说，他们常常挨饿，一个焦急的朋友便送来这些。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早些日子，他们常常收入颇低，

甚至剩不下一便士。甚至当饭桌上只剩下一块面包的时候，也没有足够的钱再去买些。如果饭桌上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从不坐下就餐。慕勒承认说，有时上帝也用这些谣言，来提醒人们上帝仆人的需要。

9月10日，慕勒收到6英镑，并且在日记中，他记载说，如果加上各种礼物，上个月他收到40英镑。11月16日，慕勒不得不为晚餐祷告，因为他实在没钱准备晚餐了。祷告以后，他们收到一个从爱克斯茅斯寄来的包裹，除了别的东西以外，还包括一只火腿，足够他们一家和那位与他一起住的朋友享用。

慕勒还没有从那次使他来到得文的疾病中恢复过来，1832年2月18日，他又患胃出血，并失血过多。一个医生查看了他这段时间的日记记录，坚信他所描写的各种症状，虽然不能精确地断定他的情况如何，但表明这种出血常常是致命的。不管情况如何，慕勒从不惊慌失措。第二天，即礼拜天早上，两位爱本内泽教堂的同工听到这种情况后，来到慕勒的房间探访。

“今天的讲道怎么安排？”他们问，“今天我们都在廷茅斯以外的地方讲道，如果你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将留下一个，替你在爱本内泽教堂讲道。”

“请一个小时后再来，那时，我将给你们答复。”慕勒回答说。

他们离开后，慕勒开始祷告，觉得上帝已经给他力量使他能够起床，他决心参加早崇拜，即使走到教堂这一点点距离，也把他累得气喘吁吁，但是他仍然能够讲道。吃中饭的时候，一位医生朋友来探望他。

“我乞求你下午不要再讲道了，不然的话，将严重伤害你的

身体。”

“在通常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再讲道是愚蠢的，但是，上帝已经给我信心，我能讲道。”

结果，下午他照常讲道。过后，他的医生朋友又来探望他。

“我央求你不要再讲道了，如果你再继续的话，你将冒很大的风险。”

医生与这位倔强的普鲁士人的信心不相匹配，晚上他又继续讲道。聚会结束后，他回到家里，直接上床休息。他知道是自己该休息的时候了。

第二天，他很早起床，照例忙了一天。礼拜三，在参加了一个会议以后，与两位朋友徒步 6 英里来到牛顿·艾伯特，然后又骑马来到普雷茅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奇怪的恢复健康的方式产生了奇效，因为当礼拜四的时候，他感觉与生病前一样健康了。

我不敢说，如果事情再一次发生的话，我还能这样做。当我的血管破裂的时候，我从没有那么软弱过。没有信心，我就不能讲道。然而，如果上帝愿意赐我信心，即使比那时候还软弱，我仍能那样做。

这一次之后，慕勒经常为生病的信徒祷告，直到他们痊愈，他无条件地向上帝祈求，赐下健康。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放弃了无条件要求赐福的习惯。慕勒所有的祷告几乎都蒙垂听，但是有些情况没有得到应允，或者成就了但不按照所求的方式。慕勒将信心的“恩赐”和由信心而来的“恩典”加以区别。他

相信在他生命中的这次经历，在有些时候，他被赐下信心的“恩赐”，因此他能无条件地祈求并盼望蒙垂听。有了信心的“恩赐”，慕勒相信他能做某些事，如果他没有做，或者不相信能做这些事，也不能算作有罪的。但是有了信心的“恩典”，慕勒相信，一个人由于他有上帝的话语可以信靠，所以他能够做某事，或者相信某事，但如果他没有做，或者不相信的话，那将是有罪的。例如，要相信一个患重病的人将会恢复健康是需要信心的恩赐，因为上帝并没有应许他会痊愈。但是，只需要信心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相信，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上帝就会赐我们生命的必需品。因为这是《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的应许。

“今天我又感觉到，廷茅斯不再是我的牧场，我将离开这里。”1832年4月8日，慕勒在日记中写道。

因为在1831年8月，他就感到他在廷茅斯的工作已经完成，因此他应该搬走。他发现，不管他去廷茅斯以外的任何地方，他讲道都更有能力，更受欢迎。与他刚来到廷茅斯时的感受截然相反。

4月13日，亨利·克雷克对布里斯托尔（Bristol）进行工作访问，吸引许多人前来基甸（Gideon）教堂听他讲道，克雷克写信邀请慕勒前来帮助。慕勒回信说，如果他清楚那是上帝的旨意，他将前往。4月15日那天晚上，在爱本内泽教堂讲道以后，慕勒向他的群羊报告了这一痛苦的通知。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可能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可能记得，当我成为你们的牧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说，只有我清楚那是上帝的旨意时，我才肯留下来。”

台下是一片抽泣声，但就在这时，慕勒更加相信他明白了上帝的旨意。4月19日，慕勒在托基讲了他最后的一场周日固定讲道，第二天，便离开廷茅斯，前往布里斯托尔与克雷克相会，主要在基甸教堂和裴西（Pithay）教堂讲道。他们的到访无疑是成功的，有许多显著的转变。他们确信上帝正在显明他的旨意，要他们来布里斯托尔事奉。4月29日的晚上，他们在基甸教堂举行了他们访问的一个告别聚会，由亨利·克雷克讲道。走廊里、讲台的旋梯上、祈祷室里都挤满了人，另外还有几百人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不得不退去。第二天，他们离开布里斯托尔，数十人要求他们再回来。

“我愿意用自己的钱为你们租用毕士大（Bethesda）教堂。”一个人许诺说。

5月2日，他们又回到了廷茅斯。

5月18日，当慕勒正在为去布里斯托尔的事祷告的时候，一个念头要他拜访亨利·克雷克。

克雷克告诉慕勒说：“布里斯托尔基甸教堂的一位信徒写信说，他们答应我们去那里事奉所定的条件了。”

他们两个所坚持的条件是：他们愿意在基甸教堂事奉，但不能按照一个固定牧师的条条框框来辖制他们，他们直接领受上帝的旨意。教堂内出租座位的制度应该废除，对他们的生活供应，仍旧按照他们在廷茅斯所实行的方法。

5月21日，慕勒开始逐个与爱本内泽教堂的弟兄姐妹道别，有那么多抽泣声，真是难熬。

“我不想再听那么多的劝阻了，我们应该去布里斯托尔，我简直不能忍受这一切了。”那一夜他在日记中写道。

5月23日，他与妻子和岳父离开廷茅斯前往埃克塞特。亨利·克雷克第二天起行，他们于1832年5月25日晚上到达布里斯托尔。在他们离开廷茅斯之前，他们收到了15英镑，正好作为他们的旅费。

慕勒在廷茅斯呆了两年半的时间，在他刚到的时候，爱本内泽教堂只有18位信徒，当他离开的时候，有51位信徒。他们都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牧会经验，可以在布里斯托尔的大教会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和发挥。在他们的需要上，他们都学会了单单依靠上帝的供应。当他到达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慕勒只有26岁，他的早熟可能是他故事中最引人的品质之一，但是他确实还需要更优秀的品格，来完成上帝赋予他的工作。

第 5 章

丧钟阵阵

由于布里斯托尔高出埃文峡谷（Avon Gorge），所以这里的居民享受着从峡谷吹来的阵阵微风。虽然爱勒顿太太（Lady Elton）在慕勒来到布里斯托尔 11 个月之前，就早已立好了奠基石，但是在 1831 年 6 月举行完奠基仪式不久，就由于资金短缺，布鲁内尔（Brunel）大胆的悬挂大桥就暂时停工了。实际上，直到大桥的设计者 1859 年去世，大桥仍没有完工。他们想在埃文大峡谷将近 250 英尺以上，建成一条道路，将克里夫顿（Clifton）与雷吾德（Leigh Woods）的郊区和菲兰德（Failand）等地连接起来。

虽然风景壮观，但峡谷的悬崖会使风吞没过往的船只，加之埃文陡峭危险的泥土河岸和布里斯托尔的大雾，你就会明白为何到了 19 世纪，这座离自由出入的港湾只有数英里的城市，却将英国第二大港的地位拱手让给了利物浦（Liverpool）。然后在 1833 年，也就是慕勒到达布里斯托尔的第二年，西印度奴隶的解放给布里斯托尔又一打击，加速了早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座

城市的衰亡。然而，伊萨巴得（Isambard Kingdom）王朝时代，布鲁内尔为了维护这座城市的声望，修建了大西铁路（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并在布里斯托尔建造了两艘轮船，“大西号”（Great Western）和“大英号”（Great Britian）。

慕勒和克雷克到达后，差不多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寻找居所。最后他们每个礼拜花 18 先令，租了一个有两个起居室、三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的房子。这时，克雷克与慕勒夫妇住在一起。

6 月末的时候，慕勒和克雷克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乔治大街毕士大教堂事奉的道路终于打开了。这是在他们事先安排的在纽放得兰德（Newfoundland）大街基甸教堂工作以外的。又大又现代的毕士大教堂建于几年前，是一个脱离国教会、名叫克万（Cowan）的牧师带领一帮人建成的。然而，会众因为神学的争论起了分裂。提供给慕勒和克雷克这座空的教堂，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教会、解释圣经。一个当地的支持者提供了第一年的租金，1832 年 7 月 6 日，他们开始在毕士大教堂传道。

W·爱勒弗·泰勒（W. Elfe Tayler）回忆说：“他们轮流讲道，这个主日，克雷克先生上午讲，慕勒先生晚上讲，下一个主日再换过来。从一开始，他们就特别引人注目，特别是晚上，教堂里座无虚席。”在某种程度上，这归于他们事奉的某些独特性。他们都不是英国人，一个是苏格兰人，另一个是口音很重的德国人。慕勒说这方面使他的讲道更加风趣和引人入胜。慕勒在一个布里斯托尔人悔改后，这样记述说，她来听我讲道，仅仅是出于好奇，来听我的外国口音，涉及到她的问题的一些单词，我的发音根本不准确。但她刚刚走进教堂，就被引导看

见自己是个罪人。

1832年7月间，当信徒愿意来到祈祷室与他们单独谈话的时候，他们便将晚上的休息放在一边，并且这一做法从未放弃过。在刚开始的晚上，有那么多咨询者，这两个牧师一忙起来就超过四个小时。

1832年7月，霍乱在布里斯托尔爆发，8月中旬，霍乱蔓延到令人惊恐的程度，每天下午6点，大约有二三百人在基甸教堂祷告，祈祷上帝减少疫情。

8月24日，亨利·克雷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邻居，威廉（Williams）太太，离我们不远，今天早上3点染上了霍乱，下午3点就死了。她的丈夫也染上了，还没有恢复的希望。丧钟连续不断地敲响，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候。”同一天晚上，慕勒记录道：“刚才，夜里10点，丧礼的钟声又响了，差不多一夜，钟声一直在响。几乎整个一天都在响……如果今夜因为霍乱我被主接去，我唯一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我所有的罪都得以赦免。”

他们两人自始至终都显示出他们的勇气，临危不惧地开展他们的牧养工作，不分昼夜地探访那些霍乱患者。整个9月，疫情都没有减弱的迹象。

在如此的危险中，玛丽·慕勒的预产期又到了。当阵痛开始的时候，她病得又很厉害。尽管不是霍乱，但慕勒整夜都在祷告，第二天，玛丽生下了一个女孩。尽管有诸多不顺，但母女平安。他们给这个小女儿起名叫丽迪亚（Lydia），这是他们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一个礼拜以后，慕勒和克雷克被叫到一个身患严重霍乱的

妇女的床前。他们从未看到过如此痛苦的病人，他们简直不能对她说什么，因为她大声尖叫。慕勒觉得好像自己也染上那病一样。

回到家以后，他们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个可怜的妇女第二天便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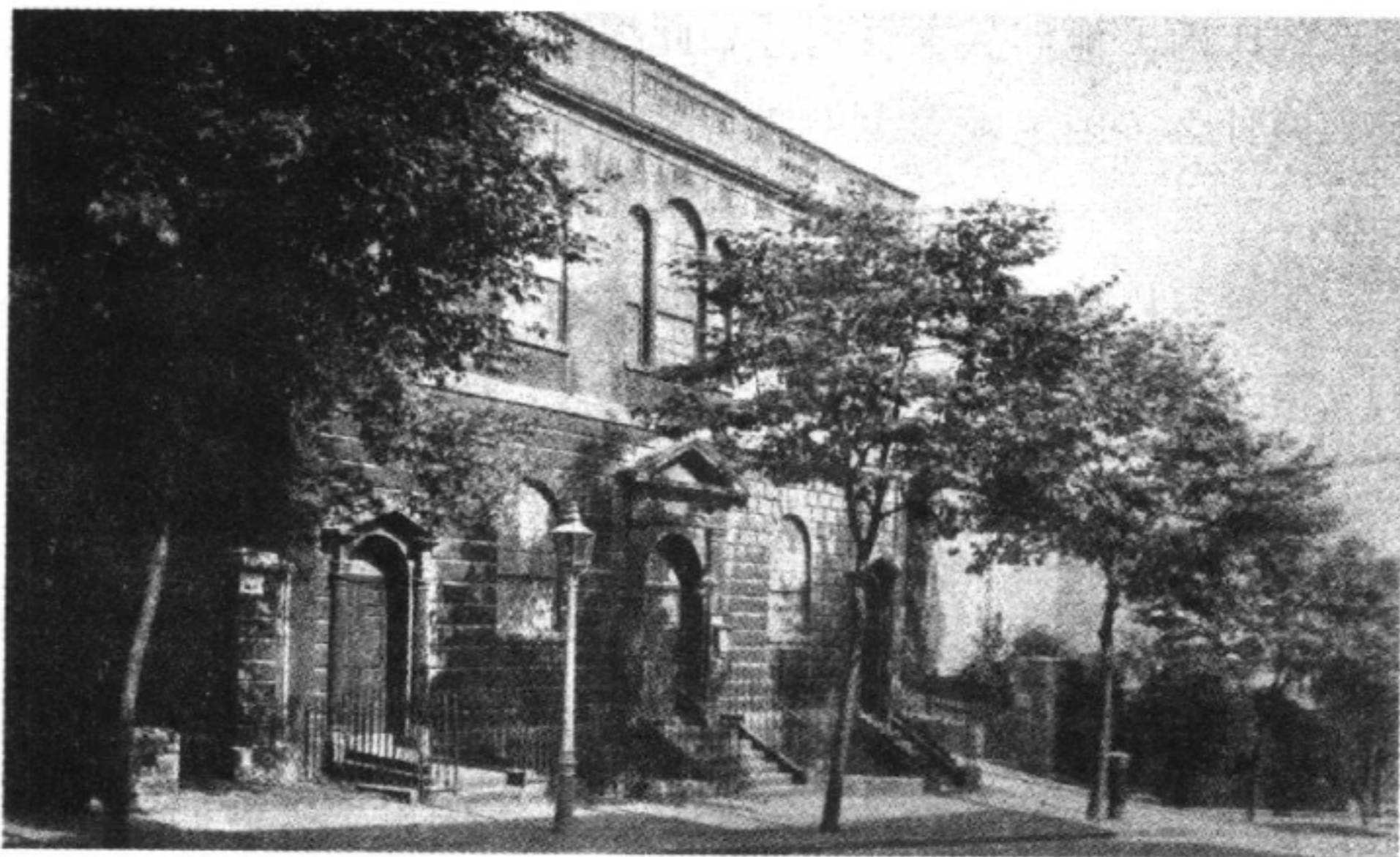
10月初，疫情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慕勒和克雷克抽出一天的时间向上帝献上感恩。非常奇妙的是，在这次疫情中，这两座教堂里只有一个人去世。

克雷克的第一位太太在1832年便在廷茅斯早逝。10月间，他再婚了。因为这个原因，又因为丽迪亚的出生，他们原先的居所显得特别狭小。原本一个租户占用着本属于基甸教堂的房子，这时，意外地不再占用了。教会便把房子让给慕勒和克雷克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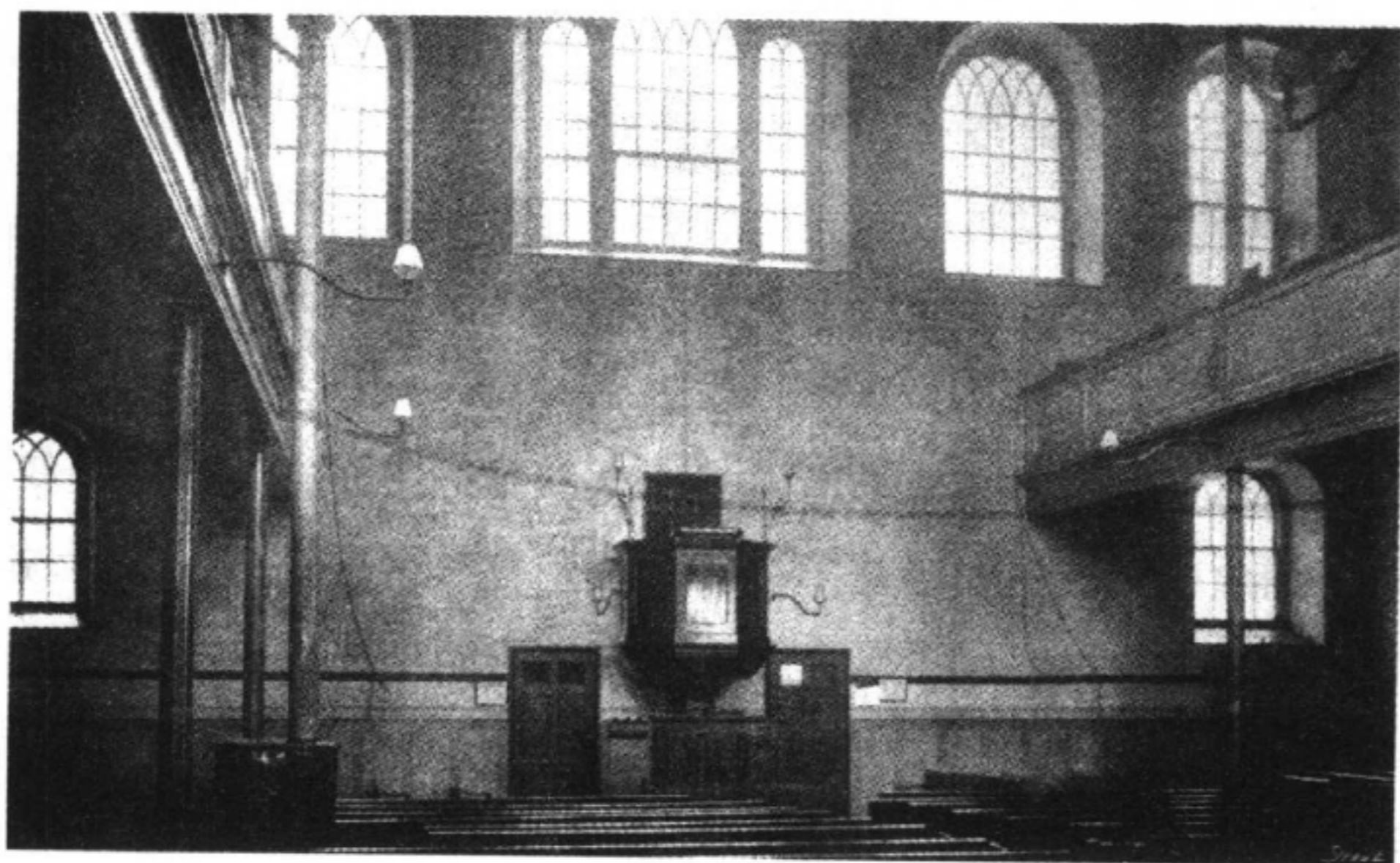
“我们愿意给你们添置一些家具，布置一下房间。”教会的长老们说。

这两个人坚决反对，深怕这样对教会是一个经济负担。但是他们的反对意见被驳回。那房子还是适当地装修了一下。慕勒记叙说，“弟兄姐妹凭着爱心，花了好多钱，远超过我们所希望的。”

1833年5月，基甸教堂和毕士大教堂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叙茶，如此盛大的场面还是第一次，慕勒喜欢得很，正像他所说的：“他们让我们品尝了羔羊婚宴时我们的团聚。”两个教堂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唱诗，畅所欲言，很有特色，还是慕勒说得清楚明白：“每一个弟兄都有机会说造就别人的话。”



毕士大教堂外景，该堂 1941 年毁于二战空袭



毕士大教堂内景

慕勒来到布里斯托尔正好 12 个月了，当他看到教堂里面拥挤的人群的时候，禁不住回想起过去的一年，毕士大教堂已经有 60 位信徒了，基甸教堂差不多也有 50 多位新信徒。在克雷克和自己的努力下，已经有 65 位新人归信基督。许多“冷淡退后”的信徒重获起初对基督的爱心，许多基督徒的信心得以坚固。慕勒想，无疑这是充分的证据，他们来到布里斯托尔是上帝的旨意。

慕勒仍然保持在廷茅斯养成的生活习惯——他和他全家的需要完全依靠上帝。他在布里斯托尔的第二个夏天，他详细记着他所收到的大大小小的礼物。

6 月 22 日，一位弟兄送给克雷克一顶帽子，也送给我一顶，以表示他的爱心和感谢，像一个感谢祭，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这是慈爱的上帝相继派人送我的第四顶帽子了。无论何时，或者不久以前，我需要一顶，在 8 月 19 日至 27 日之间，就派人送来了。又有几个人，送来了质量很好的水果。多么美善的上帝，不仅供给我们生活的必需，甚至因为我们身体软弱、很想改善胃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奢求！于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便送给我们果子酒和啤酒，或者当我们没有胃口，或者因为我们的弟兄贫穷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花钱，上帝便派人送来鸡鸭等野味，来调调我们的胃口。我们实在不是服侍一个苛刻的救主。

1833 年 12 月底，从慕勒决定不向任何人索要他所需用的、

单单依靠上帝的供应，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在第一年，他只有150英镑的收入，第二年，将近200英镑，而在1833年，却有267英镑15先令和8.25便士，慕勒的账单从未缺乏过。

1834年，慕勒和克雷克成立起“海内外圣经知识社”，尽管它的名称很平常，但直到今天还很兴盛。这个组织有三个目的：第一，帮助和建立全日制学校、主日学和成人学校，在这些学校中，主要讲授圣经知识；第二，分发圣经；第三，资助宣教事业。在1989年财政结算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向海外分发出将近七万英镑来帮助宣教事业。

在慕勒和克雷克建立这个组织开始的七个月的时间里，为120个孩子提供了主日学的学习，40个成人在成人学校和超过200个的孩子在全日制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有1000本新旧约圣经分发出去，还有57英镑被用于资助海外宣教事业。

3月19日，玛丽·慕勒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以利亚（Elijah），意思是“我的上帝是耶和华”。因为这个原因，在与克雷克一起居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慕勒夫妇觉得，他们和两个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于是，5月15日，他们搬到了保罗大街（Paul Street）21号，在国王顿（High Kingsdown）一个一端有阳台的四层楼房，虽然不美但很坚固，地下室有九层台阶通到第一层。房后有个小花园，慕勒常常在那里祈祷和默想。18世纪的国王顿，是仅次于城市郊区的居住地，因为贩卖奴隶而暴富的商人云集于此。但是在慕勒居住的日子里，此地已不再令人向往而变得有点冷清。慕勒夫妇收到了足够的钱，将新房添置了一些家具，并铺了地毯。

1834年秋天的两本日记，显示慕勒的个人需要还是很好地

得到了供应：9月18日，一个裁缝弟兄为我量体裁衣，我的衣服又破了，上帝真好，为我预备了衣服。9月25日，一个弟兄送给我一顶新帽子。

1834年末，慕勒记录说，他的收入接近230英镑，还收到好多礼物，价值大约60英镑。毕士大教堂现在有125位信徒，基甸教堂有132位信徒。在所有这些信徒中，有超过100位的灵魂是在听了慕勒和克雷克的讲道后悔改的。

1835年早些时候，慕勒回德国度过了数月，大部分时间在海姆斯勒本与他的父亲和哥哥在一起。

“请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告诉我一下，你在信中很少提及。难道是英国的政府禁止发往国外的信件谈及这些事情吗？”他的父亲向他央求说。

慕勒尽最大可能满足父亲的要求，4月中旬，他回到布里斯托尔，发现亨利·克雷克喉部感染，已经不能讲道。5月间，克雷克去得文旅行，改换一下空气。

1835年6月，对慕勒一家来说是黑暗的，对玛丽来说尤甚。22日，她失去了父亲，几天后，又轮到儿子以利亚，现在已经15个月大了，正患肺炎。

“亲爱的天父，在这样的试炼下，请托住我的妻子，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收回这孩子，请尽快将他接去，使这孩子免受疾病的痛苦。”慕勒向上帝祈祷说。

他记道，“我没有为孩子的康复祷告。”慕勒祷告后两个小时，孩子死了。“这样，我们家里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在同一个礼拜里，上帝把他们都接回去了。我那可怜的玛丽太太感到她失去了太多，但是上帝大大地托住了她。”

为什么慕勒不为以利亚的痊愈祷告呢？按照他“信心的恩赐”和“信心的恩典”的区别，这种情况，在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中，有时接受“信心的恩赐”，那时，他感到能够向上帝无条件地要求赐福健康。看来，如今的情况他感到不能这样做。在以利亚去世的前一天，慕勒在日记中简单地记道：“救主的神圣旨意将会成就在这小子身上。”几年以后，他写道：“当上帝从我手中取走那个可爱的婴孩的时候，我的灵魂是平安的，完全的平安。我哭泣的时候，是喜乐的泪水。为什么？因为我的灵魂抓住上帝的话：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因为相信，因此正如我所做的，基于上帝的话，我的灵魂欢喜，而不是悲伤，我可爱的孩子与上帝在一起远比跟我在一起幸福快乐得多。”

亲人离去后，接踵而至的是经济的缺口，早在6月间，慕勒夫妇的税金就该付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无钱支付税金，支付税金的钱，因为家里两位亲人相继去世，早已用在各种开支上了。

“亲爱的救主，请把我们需要交税金的钱送来吧！”慕勒祈祷说。

两天后他记着说：“今天我实现了，奉献箱里的钱，加上我剩下的，在该交税的最后期限之前，我交上了税金，如此快地听我的祷告，上帝真是太好了。”

8月中旬，克雷克从得文回来了，虽然他自己感觉良好，但是，仍然不能说话太多。慕勒肠胃紊乱，考虑离开布里斯托尔一会儿。一位农村的太太邀请他去农村呆一个礼拜，但是无钱支付旅费。于是有5英镑送来了，“用途很明确，换换空气”。

另外，又送来了 10 英镑，也是同样的用途。

9 月初，他开始与玛丽、丽迪亚和他们如今雇的一个佣人一起到玻体斯海得（Portishead）旅行，在那里他安静下来读福克斯（Foxe）的《血证士》，他感到很软弱，谈话、散步、写作都很困难。这本书鼓舞了他，当他的体力渐渐复原的时候，他便在乡村中骑马。但是，不久他又感到沮丧、厌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吃啊、喝啊、散步啊、洗澡啊、驯马啊——如果我的救主肯屈尊使用他最无用的仆人的话，我宁愿再回到布里斯托尔的事奉中。”

他们一家又来到怀特岛（Isle of Wight），9 月 29 日在上床休息之前，慕勒在他生病期间第一次感到能祈祷上帝使他恢复健康。“现在我渴望回到布里斯托尔，”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没有耐心，但确实感到上帝将坚固我，使我回到那里。”1835 年 10 月 15 日，慕勒一家从威特岛回到布里斯托尔，慕勒又恢复了健康，开始了信心的冒险，这将使他更加闻名遐迩。

第6章

看得见的证据

小奥立弗（Oliver Twist）真可以称为人靠衣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自从一出世唯一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不过这当儿，他给裹进一件白布旧罩衫里边，由于多次使用，罩衫已经开始泛黄，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一转眼已经正式到位——成为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世上就要尝拳头，挨巴掌，被人藐视，无人怜悯。

奥立弗尽情地哭起来。他要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成了孤儿，命运如何全得看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发慈悲，可能还会哭得更响亮一些。

这样，在《雾都孤儿》一书中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将英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孤儿的绝望境况当中来。这本书向 1834 年的《贫穷法修正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时代》杂志也曾攻击《贫穷法修正案》说:“正像一个骇人听闻的机器——压榨着孤独困苦寡妇们的心,拒绝给饥饿的儿童一点干面包,将孤儿关进济贫院的地牢,将没有亲人也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少女逼作妓女。”新修正案的目的,就是阻止慈善救济制度。原有的救济制度通过征收贫民救济税,把贫民劳动者的薪水提高到可以维持生活的水平。而新修正案不再向济贫院外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救济,除非他进入济贫院。而济贫院本身也被故意地建在不显眼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实际上,济贫院的条件成了整个国家的耻辱,关在高墙内的孩子,道德相当混乱,因为有一些不合适的、残障的成年人也住在那里。

1835 年,利亚 (Leah) 和哈雷爱特·库雷福德 (Harriet Culiford) 住在布里斯托尔,利亚五岁,哈雷爱特九岁。女孩的父母很贫穷,像他们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一样,患了肺结核,医学无能为力,可怜的利亚和哈雷爱特的前途看起来很黯淡。如果因为他们失去了父母,指望国家能帮助他们一点的话,他们能得到的只是公众的冷漠。

在 1835 年,由个人慈善机构赞助的孤儿院极少。1866 年,伯纳多 (Barnardo) 博士创建了他的第一个孤儿之家,1867 年,司布真 (Spurgeon) 尾随其后。国家儿童村建立于 1869 年,费干 (Fegan) 先生于 1870 年才开始他的工作。英国教会儿童社(后来是英国教会流浪儿社)开始于 1881 年,但是在 1835 年,私人办的孤儿之家被看作是革命性的实验。

在整个英国和威尔士，在 19 世纪 30 年代或者更早一点，要找出几个孤儿院也是有可能的，它们的规模都很小，其中 8 个在伦敦，另外 4 个在伦敦附近各郡。但是布里斯托尔却没有一个。但是，即使库雷福德住在伦敦那一地区，他也很难进入任何一家孤儿院。首先在费用上，他们就会被拒之门外，大多数的孤儿院规定，入院者由赞助人挑选，或者由每年购置物品的人挑选，或者由提供生活赞助的人挑选。每年的生活赞助大约要求在 100 到 250 英镑之间。第二，库雷福德也会因出身卑微被大多数的孤儿院拒之门外。典型的入院说明书清楚明了：他们为中产阶级父母的孩子服务——父母在一生中，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自由的教育，或者孩子出身于名门望族。一个孤儿院的宣传材料吹嘘说，该院的孩子多是牧师、政府官员和杰出人物的孤儿——所有的人选者都承认他们的父母无不得到社会的尊重。假设其余情况均相同，它的合适人选是与“出身显赫”相称的。另外的孤儿院宣称：“佣人的孩子、农民的孩子、雇工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都不合格。”

值得庆幸的是，在 1835 年年底的时候，供应孤儿，这一当今英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正在不断地占据一个布里斯托尔人的心思。1826 年，当慕勒还是哈雷大学学生的时候，他曾在最大的孤儿院里住了两个月，那个孤儿院是德国敬虔主义者、莱比锡大学希伯来文教授奥格斯特·赫曼·弗兰克（August Heran Francke）于 17 世纪末建成的。慕勒永远记得在那里的体验，1835 年年底，他特别想起弗兰克的工作。慕勒在日记中这样记着说：

11月20日晚上，我在一位姐妹家喝茶，忽然想起了弗兰克。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想以同样的方式事奉上帝，虽然规模可以小得多。不是刻意效法弗兰克，而是依靠上帝。愿上帝使其顺利。

11月21日，今天我把这事思忖良久，不是仅仅思考建造孤儿院的事，而是完全交托，我一直为此事祷告，为的是确知上帝的旨意……

11月23日，今天为孤儿院的事我从爱尔兰收到10英镑。如此看来，上帝在垂听我的祷告，在不几天的时间里，便收到50英镑。而我仅祈求40英镑。这大大地鼓励了我，激励我思考并为建孤儿院的事祷告……

11月25日，昨天和今天我又多多地为孤儿院的事祷告，越来越确信此事出于上帝，愿上帝用他的怜悯来指引我！

慕勒花了好多时间为他计划的孤儿院祷告。他查验自己的动机，问自己这整个主意是否源于自己对荣誉的渴慕。他找来朋友亨利·克雷克，帮助探求他的内心动机。

“在你的动机中，我没有发现我认为不值得做的。”克雷克告诉他说，“我想鼓励你放手去做这一事业。”

慕勒在19世纪开始关心英国孤儿的困境，比狄更斯在《雾都孤儿》描写孤儿的情况还早一年多。无论是对这一问题的灾难性的陈述，还是慕勒对此的关心都没有一点可以怀疑的地方。当他第一次来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看到儿童在大街上乞讨，他就深深地被震撼。当乞丐们叩响他的门扉时，他盼望能做一

些积极的事情对他们有所帮助。1834年10月，他在日记中记录他的痛苦感受。“我听到一个报告，一个可怜的孤儿，有时来参加一两次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灵魂极需要真正的关怀——一些日子以前，他被带到布里斯托尔几里路之外的一个贫民院。”他在日记中这样结束道：“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愿这件事能驱使我为这些贫穷的孩子今生的需要做点什么，生活的压力将这位可怜的孩子从我们的主日学里被带走了。”

慕勒打算建一个孤儿院，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他想向世人证明，上帝是真实的。当他探访布里斯托尔两个教堂里的信徒时，他多次发现人们的信心需要坚固。有一次，他探访一个习惯于忙于生意，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的人，他正在生病，而他的信仰又很冷淡。

“如果你工作的时间短些，你的身体会好些，你也会有更多的时间读圣经和祷告，那么，你将会有更多的喜乐。”慕勒向他建议说。

“如果我工作时间短一点，我就不能赚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即使现在，我每天加班加点，我几乎没有剩余。工资如此低微，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以获得我们的所需。”那人回答说。

“这不是对上帝的信靠，也不是对基督话语的信靠，基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慕勒心里想。

“亲爱的弟兄，不是你，而是上帝在养活你的家庭，当你一点也不能工作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养活你和你的家人，由于生病，上帝一定提供你和你家人所需用的。如果只是为了获取食物——为你灵魂的缘故，你不必每天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留下

适当的时间休息吧。如今事情并不是这样，匆匆祷告以后，便开始工作，当晚上下班以后，敷衍了事地读一点圣经，是不是身心疲惫？你心里真喜欢这样吗？是不是你正在读经或祷告的时候，就昏昏欲睡呢？”

当他正在等待回答的时候，慕勒看到朋友脸上的表情。他看到朋友同意刚才听到的建议，但是还有一点疑惑。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上帝和上帝的话。

“我该怎么做？如果我接受你的建议我该怎么做？”

慕勒不生气，但很悲哀。他想：“我多么盼望我有一些事实能指给这位弟兄看！这些事情作为看得见的证据，说明我们的天父上帝，与昔日一样，是同样信实的上帝，昔在、今在，对那些相信他的人，愿意显出自己是永活上帝的证据。”

有时慕勒遇到买卖人，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够诚实，结果他们的良心常常受责备。有些人寻找借口，说那是残酷竞争的结果，或者是买卖低迷的时候，如果仍按圣经原则经营他们的生意，他们将永不会兴旺发达。极少有人因为上帝而坚持立场，极少有人像慕勒那样立志，任何事情都相信上帝。在这些情况下，慕勒也渴望向他们证明，其实上帝没有改变。上帝愿意赐福那些“心里不注重罪孽的人”（《圣经·诗篇》第66篇18节）。慕勒用自己的生活见证了上帝，他急切地盼望别人也享受这同样的经验。

他写道：“我断定自己一定是基督教会的仆人，在某些特殊方面，我都得到怜悯，也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上，我能够抓住他，并且依靠他。”

他感到上帝让他与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缺少把握和确信的

基督徒认识，“就是在我心中唤醒一个愿望，即在一般的教会面前，也在世人面前，拿出我们的上帝一点也没有改变的证据来。这对我来说，最好的莫过于建立一所孤儿院。它需要做一些能看得见的事情，甚至是我们的肉眼能看得见的。”

慕勒决心来一次冒险，甚至比布鲁内在克雷夫顿所建的宏伟大桥更冒险、更令人心动。他所面临的挑战如下：

现在，如果我，一个穷光蛋，仅仅凭着信心祷告，从不向任何人求援，建立和维持一个孤儿院，除了向那些未信主之人的良心见证上帝的真实外，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在上帝的祝福下，在坚固上帝儿女的信心方面有所帮助。

导致慕勒想建立一所孤儿院这一想法的目的是渴望减轻孤儿困境呢，还是试图证明上帝的真实呢？

我确实从心里盼望被上帝使用，惠及那些可怜的孤儿们的身体，以及那些有病的孩子。在另一方面，靠着上帝的帮助，做一些对他们今生有益的事；我特别想被上帝使用，让这些可爱的孩子接受训练，使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的人。但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孤儿在我的呵护下，我和我的同工绝不向任何人求助，只凭着信心和祈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借此，人们可以看到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仍然在听人们的祈祷。借着这一事实，上帝得到尊崇。

183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慕勒被《圣经·诗篇》第81篇

10节的话深深地打动：“你们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一直到那天晚上，虽然他为建孤儿院的正反理由祷告了很多，他却并没有特别地祷告上帝，求上帝开出路。但是，通过读这节经文，他决心把这节经文用于孤儿院的需要上。

他祷告说：“亲爱的上帝，你愿意预备房屋、1000 英镑和合适的工作人员来照看这些孩子们吗？”

慕勒一家的需要，他已经学会单单依靠上帝，现在他又仰望上帝，祈求上帝为一个更大、更需要的大家庭提供房屋、食物和衣服。他竟敢要求上帝，赐下一个更大的证据，以证明上帝的真实和慈爱。

第7章

“金子和银子是谁的？”

“12月7日，今天为孤儿院的事，我收到了第一个先令，后来从一位德国弟兄那里又收到了另一个先令。12月9日，今天下午，收到了第一个家具——一个很大的藏衣橱。”

9日晚上，慕勒在一次聚会中讲话，描述了孤儿院的建议。

只有上帝提供物力和人力，这所孤儿院才能够建立起来。我越来越认识到这事出于上帝，现在，如果这样的孤儿院被建立起来的话，他能够影响世界各地他自己的子民。我不指望布里斯托尔，也不指望英国，单单仰望永活的上帝，金子和银子都是他的。在这项事工上，他将委托我和上帝所造就的克瑟（Corser）先生帮助我（约翰·克瑟原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已辞去在布里斯托尔城的牧职，过来帮助慕勒先生）。

无论如何，绝不向任何人求助金钱和物品，入住的孤

儿将不收费，也没有阶级和信仰的限制，所有愿意进来作老师、总管和助手的人，都必须是真信徒和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只有失去双亲的孩子才能接收，女孩子长大了将做事奉之事，男孩子做生意，他们将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体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帮助维持自己的生活。该院服务真正贫穷的孩子，任何孤儿，如果其亲属能够或者愿意提供维持他们的开支，将拒收。孩子们将接受普通的教育。我们所寻求的首要 and 特别的目的，是在上帝的祝福下，通过在圣经上教导他们，带领这群可爱的孩子认识耶稣基督。

当慕勒完成演讲的时候，没有举行募捐，然而，有人给他10先令，另一个妇女也说要帮助此项事工，慕勒满怀喜乐地回到家，信心百倍，他将勇往直前地从事这项事工。

第二天，这信念看起来好像开始得到回应，慕勒从一对夫妇那里收到一封信：

“如果你认为我们合格的话，我们想奉献我们自己服务于将要开办的孤儿院，我们也愿意奉献上帝给我们的那些家具为孤儿院所用，无论什么样的工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相信，如果是上帝的旨意雇用我们，他将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晚上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到慕勒的家里，带来了3个碟子，28个盘子，3个盆子，1个大罐，4个茶缸，3个盐钵，1块菜板，4把刀，还有5把叉子。这些都详细准确地记在慕勒的日记上。

“亲爱的上帝，请再给我一个证据，说明你施恩于这个孤儿院。”慕勒第二天这样祷告说。当他正跪在地上的时候，有人送来3个盘子，12个碟子，1个盆子和1床毯子。

“谢谢你，亲爱的天父，请今天再给我更多的鼓励吧！”慕勒说。过了一会儿，他从一个意外的渠道收到 50 英镑。

“亲爱的天父，就在今天，我斗胆再向你更多施恩的证据。”到了晚上，有人送来了 29 码^①布匹，并且一个妇女奉献自己从事这项事工。一切供应源源不断。

12 月 13 日，今天一个弟兄受感动，只要上帝给他收入，他每个礼拜奉献 4 先令，或一年 10 英镑 8 先令。先给了 8 先令，作为两个礼拜的奉献。今天，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奉献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有的家具，如果孤儿院能够雇用他们，而且他们对孤儿院有帮助的话，他们还将奉献他们家里所有的粮食。

12 月 14 日，一位姐妹奉献自己参与这项事工，到了晚上，另有一位姐妹也奉献自己参与这项事工。

12 月 15 日，一位姐妹从几位朋友那里带来了 10 个盆子，8 个茶缸，1 个盘子，5 个点心匙，6 个茶匙，1 个撇沫器，1 个长柄的烤面包的叉子，1 个撒面粉的器具，3 套刀叉，1 条床单，1 个枕套，1 条桌布，另外还有 1 英镑。下午，有人送来 55 码的被单料子，还有 12 码的白布。

12 月 16 日，我从我房间的箱子里拿出 1 先令。

12 月 17 日，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相当沮丧，问自己是否应该这样投入下去，后来我祈求上帝给我一些更大的鼓励。不久，一位弟兄送来 2 条版画，一条七码，一条

^① 编者注：1 码约合 0.9 米。

23 码，还有 3 平方码的白布，4 块衬里，一共有 4 码，1 条床单和 1 个码尺。今天晚上，另有一位弟兄带来了 1 个布制的玩具马，3 套儿童外衣，4 条毯子，2 个白镏制的盛盐的器具，6 个锡杯，还有 6 个金属的茶匙，他还带来了 3 先令 6 便士，是另外三个人托他带来的。同时他还告诉我，另外有人已经计划明天送 100 英镑过来。

12 月 18 日，今天下午，还是那位弟兄，从一位姐妹那里带来了 1 个床罩，1 个扁的铁支架，8 个杯子和托盘，1 个糖盆，1 个奶罐，1 个茶碗，16 个顶针箍，5 套刀叉，6 个点心匙，12 把茶匙，4 把梳子，还有 2 个小菜板。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他带来一个熨斗，一个杯子，一个托盘。同时，他还带来了上一次所提的 100 英镑。

当慕勒晓得是谁奉献了这 100 英镑的时候，他便不愿意接受了。他知道这位奉献者靠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每个礼拜只能赚 3 先令 6 便士。慕勒想去探访她。

“我对你的厚礼深表感谢，我想再确认一下，对你所做的你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慕勒说。

“父亲去世的时候，留给我 480 英镑，我将大部分用于偿还家庭债务，并给母亲 100 英镑，然后，我奉献孤儿院 100 英镑。”她这样告诉慕勒说。

慕勒语重心长地劝她再考虑一下。

“救主耶稣为我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难道我不应该给他我所有的钱吗？孤儿院又不是不该建立，我愿意奉献我所有的钱，这里还有 5 英镑，是给基甸教堂和毕士大教堂困难的弟兄姊妹

的。”她回答说。

一直到年底，给孤儿院奉献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聚积而来，给人们极大鼓舞，因此，慕勒能开始讨论次年4月初开办一个小型孤儿院。首先他限制女孩进入孤儿院的年龄为7岁到12岁，允许她们学习，直到她们能够走上家庭的事奉。英国任何地区的孩子都接收。新的一年，奉献给孤儿院的财物仍不断送来。1836年1月5日的晚上，慕勒家的门铃响了，一个仆人开了门，但没有访客，而是有人留下了一块厨房的防护板和盘子。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奉献的。

慕勒为计划中的孤儿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要求祷告，但是直到现在，却没要求上帝送来孩子。他想当然地认为，会有许多孩子提出申请。然而，2月初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宣布他愿意接受孩子了，但是却没有送来一个。因此，他整夜为孩子的到来祷告，第二天，第一份申请送来了。

“威尔逊街（Wilson）6号，一个很大的带阳台的房子，租金低廉，很合适。”有人告诉慕勒说。

房子的位置，靠近基甸教堂，非常理想，他前去检查了一下，房子有三层，又高大又坚固，能容纳30个孩子。经过祷告以后，决定先租一年。物品接连不断，正适合当时的需要：

4月2日，6床毯子，2个床罩，4条床单，8顶女帽，5套女上衣，6个小孩子的围裙。

4月6日，一打洗漱盆和一个大罐，一套炉子的生火用具，一个茶壶，一个盛煤的盒子，一个长柄有盖的深平底锡锅，一张三脚桌，一个煮茶的锅，三套杯子和托盘，一

个洗手盆，三个小盆，两个盘子等等，还有 22 本赞美诗。

4 月初，慕勒和他的助手们已将威尔逊街 6 号的房子装修一新。

1836 年 4 月 11 日，第一个孩子来到了，她的脸色看起来又苍白又惊慌，她叫哈丽亚特·库雷弗得（Harriet Culliford）。这个孩子临时的监护人，原以为慕勒年岁已高，满脸长髯，惊奇地发现他只是一个 30 岁的年轻人。孩子们虽然能看出他们的新父亲神情严肃，但都喜欢他脸上慈祥又镇静的神态。慕勒向他们介绍女总管、女保育员，她们微笑着，每一个人给这些小女孩们的印象与父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这些孩子们的亲人，决心尽最大努力弥补这些孩子们失去的爱。

前面的任务是艰巨的：每天，一天三次，一个礼拜七天，除了工作人员，有 30 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喂养，30 双脚将穿破 30 双鞋子，衣服可能变得太破或者太小需要替换。慕勒知道，如果这些孩子们缺衣少食，他的上帝将被怀疑。但是他不害怕，相反，在家里和他的助手中间，他不断地重复《圣经·马太福音》第 6 章 31 节和 33 节基督的话。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到 5 月初，将近 30 个女孩住在威尔逊街 6 号，钱财和食物仍然持续不断地送来。“20 磅咸肉，10 磅奶酪……6 个草帽……6 个睡帽，2 个童裙……一篮子苹果，还有三磅白糖。”廷茅斯的信徒显然没有忘记他们以前的牧师，6 月间，一笔数量不小的钱从廷茅斯送来，还有一个长袍，一个男孩的围裙，一双袜子，彩色的棉布，可为三个孩子做上衣，两个婴儿床上的睡

袍，五个婴儿的夜帽。9月末的时候，布里斯托尔的一个医生奉献自己服务于孤儿院，免费为他们提供药品。慕勒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服务。10月，他记着说，有人送来了四加仑半的啤酒，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允许这些孩子们饮酒放纵。

同时，慕勒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他和他的助手从不向任何个人索要任何东西，“上帝的恩手才能更彰显出来。”他毫不犹豫地祈祷上帝，感动某一个人，为这项事工奉献。1835年12月他在日记中记着一次祷告，祈求上帝感动一个他认识的人奉献100英镑。几个月以后，这位绅士送给他50英镑，后来在1836年的盖·福克斯节（Guy Fawkes' Day），他又送来了50英镑。非同寻常的是，有一天，他想起了1835年12月的祷告。兴奋之余，他召来那位捐款人，给他看1835年12月12日的日记记录，祷告蒙垂听是如此精确，以便他们能够一同快乐。

威尔逊街6号的孤儿院主要针对7岁以上的女孩。但开办以后不久，慕勒认识到很需要再建一个，针对7岁以下的孩子。1836年10月，他设法租到威尔逊街1号的房子，开办一个幼儿园，另有一块空地，作为玩耍的地方。他聘到一个既合适又合格的女总管和保育员。装修了房子以后，11月末的时候，便开始接收第一批孩子们——男孩和女孩。威尔逊街6号几个大点的女孩子，也帮着照看威尔逊街1号的小孩子，因为慕勒觉得在保育室这样的训练，对他们以后走上服侍道路是很有帮助的——哈利亚特·库雷弗得是威尔逊街1号幼儿园最早的工作人员。

1836年圣诞将近，慕勒在日记中记着说收到了好多的鸭子和火鸡，还有112磅糖蜜。慕勒很高兴。那年圣诞节，他收到了一英镑，附加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主耶稣怀抱着小孩子

时讲的话：“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圣经·马可福音》9章37节）。”

1836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的时候，慕勒带领了一个聚会，赞美上帝在过去一年中的祝福，并且祈祷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施恩。

4月的时候，有60个孩子住在两个孤儿院里，30个小一点的住在威尔逊街1号，30个女孩住在威尔逊街6号，那年春天，斑疹伤寒在布里斯托尔肆虐流行，但是感谢上帝的怜悯，只有两个孩子染上此病，并且后来都已康复。

1837年初夏，慕勒打算出版他的第一卷叙事文集《与主同行》。这是他在经过几个月的慎重思考和查验动机后的决定。一方面，他本不想在市场上再加一本宗教书籍，但是在另一方面，以他探访布里斯托尔信徒的经验，使他觉得基督徒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要么是缺少对上帝的信靠，要么是在他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

1837年5月，底稿将要送给出版商付梓。但是在此之前，慕勒希望能够记下一次特别的祈祷蒙应允：1835年12月5日，他曾向上帝为孤儿院祈祷1000英镑。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重复这一祈祷，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他已收到了900英镑。5月21日，他特别专心祈祷，祈祷上帝将那未付的款送来。到6月15日，他收到了最后的5英镑，至此，1000英镑的数目完全凑齐了，慕勒非常高兴。他收到的每一先令，还有那许多的衣物和家具，都是别人受到上帝的感动送来的，用慕勒的话说：“我从未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

第 8 章

换换环境

在伦敦，国王威廉四世的身体急剧恶化，1837年6月20日，这天是礼拜二，一大早，国王死于温莎堡（Windsor Castle）阿得雷德（Adelaide）王后的怀中。当布里斯托尔和英国的其他城市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伦敦便呈现一片急匆匆的景象。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完成了最后一道宗教仪式，带着王后阿得雷德，陪同的王宫侍臣在黑暗中穿过乡村小道向肯森顿（Kensington）进发。5点的时候，他们到达肯森顿宫，但是他们并不能顺利地进入。开始的时候，看门人不准他们进入，更不准打扰年轻的公主休息。最后，看门人允许两个人进入，并派人去叫女男爵雷潜（Baroness Lehzen），她极不情愿地通知公主们他们的到来，公主维多利亚（Victoria）走进房间，一个披巾盖过了她的睡袍、脚上的拖鞋和垂在背上的秀发，王公大臣单腿跪拜，迎接她成为女王。

维多利亚就职的时候年方18，她的统治在历史上是最长的。那时慕勒32岁，但是他一直活到女王统治60周年庆典，并在

那天讲了一篇长道。

那天的晚些时候，国王去世的消息传到布里斯托尔，轮船、教堂及公共建筑物均降半旗。但是，6月24日礼拜六是一个喜悦的日子，国旗飘扬，教堂的钟声敲得最响。10点钟，布里斯托尔城庆祝最仁慈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游行活动开始。游行队伍从大路越过大桥，来到教堂路口，穿过官邸大厦，来到女王广场，最后来到议会大厦。

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了，慕勒和克雷克仍继续在基甸教堂和毕士大教堂牧养弟兄姐妹。在处理两教堂事务的时候，他们把圣经看作最高权威。1837年夏天，一个小小的危机与之前的事件一道袭来。有人指责说他们将他们认为的圣经的最高权威与理智方法的灵活性糅合在一起，尤其当他们对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不明确时更是如此。从他们最早在布里斯托尔事奉，就对已经成为基督徒后再受洗，才应该接纳成为毕士大教堂的会友，还是不论受洗与否，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当被接纳这一问题从不十分肯定。经过长期教会内的争论，以及与罗伯特·凯普曼（Robert Chapman）的讨论，慕勒和克雷克决定他们应该“接受所有基督已经接受的人。”（《圣经·罗马书》第15章第7节）而不管他们对受洗的观点如何。后来，凯普曼，这位弟兄会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慕勒一生的朋友，放弃了在伦敦当律师的大好职业，到巴恩斯特堡去事奉上帝了。

1837年6月间，针对7岁以上的男孩，慕勒决定开办第三所孤儿院。第一，因为布里斯托尔城显然需要一个。第二，当他们收到7个男孩子的时候，没有一个孤儿院能收留他们。9月的时候，资金到位了，他们自己也有合适的工作人员，万事俱

备，只差一所合适的房子。有人在威尔逊街 3 号给慕勒提供了一处，他愉快地接受了。

11 月初，慕勒的身体健康状况又开始恶化，一天晚上他醒来的时候，他感到头部很不舒服。过了一会儿，他将一块手绢捆在头上，继续睡觉，不适似乎减轻了。但到了 11 月 7 日，他已不能工作。尽管男孩孤儿院即将开办，毕士大教堂也有许多问题，他仍然决定离开布里斯托尔休息一段时间。慕勒收到一封不具姓名的信，并有 5 英镑是给他自己的个人开支。他以此作为证据，说明他离开一段时间是正确的。

他离开家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一班到达的公共马车驶向巴斯 (Bath)，于是慕勒上了车。他决定不与基督徒住在一起，因为这将使他不得不谈论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于是，他在巴斯一间旅社订了一个房间，但发现那里太“世俗化”了，被逼无奈，他只好去拜访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基督徒朋友。这位绅士和他的婶婶们劝说慕勒与他们同住一个礼拜。但这时他头部的症状愈加严重，他想他快要发疯了，连与别人谈话都不太可能。因此一个礼拜后，他又回到布里斯托尔。因为又收到了 5 英镑作为他自己的个人开支，于是，他与玛丽，他们的女儿丽迪亚，还有他们的佣人一起去滨海韦斯顿 (Weston-Super-Mare) 小住。在韦斯顿的许多时候，他担心头上的毛病正暗示他会神经错乱。一天，他收到消息说威尔逊街 6 号孤儿院里的一个女孩去世了，但在临死之前，已相信基督。在韦斯顿 10 天以后，慕勒一家回到布里斯托尔。慕勒去看一位医生，医生向他保证说，虽然他的神经出了点问题，但不必担心神经错乱。

慕勒仍然在生病，但从朋友的关爱中他得到安慰，朋友给

他送来了熏舌肉、鸡、鸭、蛋糕和葡萄。他给父亲写信，心想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信。12月，医生诊断说，问题出在他的肝功能紊乱上。现在他觉得出席教堂任何会议都会使他更加糟糕，任何用脑的事都会让他精疲力竭。

工作不断增多，资金也充足。现在有75个孩子住在三个不同的孤儿院中，并且每天还会有新的孤儿送来。12月12日，100条质量很高的毯子送到慕勒的房间以便分发给穷人。众所周知，慕勒急切地想消除他所注意到的这一地区许多苦难的事情，尽管有病在身，他仍安排人处理事情。

1837年底，三个孤儿院里有81位孩子和9位全职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的申请人，能占满另一个孤儿院，都是七岁和七岁以上的女孩。另外还有更多的婴儿申请入住，远超过他们的接待能力。由圣经知识社所办的全日制学校，有350个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还有320个孩子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持续不断的疾病和日益增加的责任正在击垮慕勒。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我向我亲爱的妻子发怒，尤其在我刚刚在上帝面前跪下，赞美上帝赐我这么一个太太之后，便勃然大怒，真使主的名大大地受羞辱。”

1838年的开局并不是催人奋进，显然带有几分幽默。元旦夜里，盗贼闯入慕勒的家，因为有第二道坚固的门，他们才没能进入里屋，除了一些冻肉以外，盗贼一无所获。于是，盗贼乘胜进入基甸教堂的教室，打开了几个箱子，却没带走什么。第二天，一些骨头，少许的肉被发现——一些在基甸教堂教室的箱子里，另一块在慕勒院子里的树上。

现在，慕勒的医生建议他进一步休息，慕勒却不想离开布

里斯托尔。但是当一个大太太在不知道医生建议的情况下，从远离布里斯托尔 50 英里以外的地方，送来 15 英镑，并注明换换空气时，他以此当作上帝旨意的指示。他带着玛丽和丽迪亚前往特鲁大桥（Trowbridge）一些基督徒朋友的家中，他在那里安顿下来，阅读菲利普（Philip）所著的《怀特菲尔德的一生》。他被怀特菲尔德的虔诚和他跪着读圣经的习惯深深地打动。礼拜天的时候，除了花数小时的时间祷告外，他还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跪读并默想《圣经·诗篇》第 63 篇。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上帝大大赐福我的灵性……我的灵又带回到以上帝为乐的状态，至于我的身体，我现在可以从心里这样说，我愿意这病不被挪去直到上帝施行怜悯，借着这病，上帝倾倒下祝福，有什么能拦阻上帝把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锻造成另外一个怀特菲尔德呢？当然，上帝将要赐大恩与我，正像他赐给怀特菲尔德的一样。哦，我的主，吸引我与你越来越亲近，我必快跑跟随你！如果上帝愿意让我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再一次恢复我的健康，那么我盼望如此。（从上帝把我带到现在的灵性状态来看，这一点，我相信他不久就要成就，尽管我最近八天的身体比前两个礼拜更糟。）我的讲道在经过恳切祈祷和默想之后，将比以往更加有力量，我愿意与神同行，因此，“从我的腹中将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第二天，他跪祷默想《圣经·诗篇》64 篇、65 篇三个小时。在他默想《诗篇》65 篇第 2 节“听祷告的主啊”的时候，他记

下了特别的八项祷告要求，在这八项要求的底下，他写道：“我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三年后他记录说，有五项要求上帝已完全答复，其余的三项也答复了部分。

尽管身体持续不适，但当慕勒读圣经的时候，他的情绪却提高了很多，当读到《圣经·诗篇》68篇第5节，上帝被描写成“孤儿的父”的时候，他写道：

在上帝的帮助下，这也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结论，鉴于这群孤儿，在他们需要的时刻，上帝是他们的父。因此，上帝自己已经保证，正像他所做的，给他们需要，关爱他们。我只是提醒上帝这帮可怜孩子们的需要，以便能给他们摆上需用的……“孤儿的父”这一字眼，对成百上千带着巨大需要的孤儿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啊。

慕勒一家在特鲁大桥又呆了两个礼拜，尽管有时对跪读怀特菲尔德传记而不是圣经感到羞愧，但总体上来说，在此小住的日子里，他的灵性一直在增长。2月2日，虽然他的身体仍没有改善，但他放弃了一切药物，并只身一人来到牛津，到达朋友们的家中。

在牛津，慕勒决定练习骑马。他想法租到一匹性情温顺又听话的好马，他想，这样比较适合他有问题的神经，一段时间以来，这极好的疗法还很奏效，慕勒踏着卫斯理的脚步——尽管卫斯理不一定是这样，他边骑马边看圣经。但是，很遗憾的是，慕勒在马背上骑了三天之后，这匹马也病了！慕勒又开始研经和祈祷，直到主人告诉他那匹马可以重新上路了。因此，

他又开始骑马了。但是，还没等慕勒坐在马鞍上一会儿，他就很沮丧地发现，这匹以前性情温良的马，现在却变得任性和倔强。他用尽浑身解数想驾驭它，但都无济于事。那匹马不肯驯服。这样，慕勒骑马的娱乐就忽然又不愉快地终止了。

一个朋友强烈建议慕勒再试一下利明顿矿泉疗养地（Leamington Spa）的水疗，如果他愿意住在那里的话，朋友将提供他的花费。咨询了他的医生后，得到了赞成的回答。他决定接受朋友的好意。在利明顿他找到了极好的住处，一个礼拜只要 10 先令，并能坐在炉边写日记。“救主真好！”他写道，然后他就上床休息，真是典型的慕勒主义！

慕勒发现利明顿的水疗似乎对他的症状有所帮助，但是 10 天以后，内在的紧张和试探又开始扰乱他。事情的原委我们只能从他的日记中加以猜测：“恩典与一个又一个的坏想法争战，并且都已得胜，那是非常难受的日子！……今天，我恳切地祷告上帝把我的妻子送过来，因为我觉得孤单的痛苦与头疼的痛苦无异，因此，大脑处于真空状态，撒旦便胜了我。”

第二天，邮差送来了一封迟到了一天的信，信中说他的妻子玛丽正在路上，不久，玛丽来到了，这给慕勒带来极大的快乐。夫妇二人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乡村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可以进行长距离的散步，慕勒的头部也开始感到比前几个月轻松些了，尽管只是一点点的好转。

慕勒忽然想去德国进行短暂访问，一方面，他可以给那些与他保持联系、极想成为宣教士的远在柏林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另一方面，他想在父亲和哥哥面前见证基督，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可能比较乐观——故乡的空气可能

对他的健康更有益。他写信给亨利·克雷克和他的医生征求他们的意见。克雷克说可以前往，而医生的答复是再停一两个月，免得旅途劳累。于是慕勒和玛丽在利明顿过完了阳春三月，四月初的时候，慕勒的医生也来到这里，告诉他说身体状况良好，可以前往德国旅行。在他们分道离别——慕勒太太要回布里斯托尔，而慕勒要去孩童时代的故乡之前，乔治和玛丽一同读《圣经·诗篇》121篇，“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4月9日，慕勒到达汉堡，一路上因为晕船遭尽了苦头。他在柏林停了十天，与好多打算成为宣教士的人碰面，然后前往海姆斯勒本与他父亲同住。赫尔·慕勒年纪老迈，显然将不久于人世。慕勒不知道他能否活到下一个冬天。现在父子的关系很好，早已淡忘了因为慕勒献身宣教而造成两人之间的隔阂。慕勒发现哥哥完全活在“赤裸裸的罪中”，于是抓住机会向哥哥和父亲宣讲自己的信仰，当慕勒离家前往马格德堡（Magdeburg）的时候，父亲送他一程，因为此去一别，两人都以为永无见面的机会，但是他们都错了。

5月间，慕勒又回到布里斯托尔，从1837年11月6日开始，他一直不能参加基甸教堂和毕士大教堂的所有聚会。但是，1838年5月8日，基甸教堂的弟兄姐妹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在读《圣经·诗篇》103篇。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他身体的不断康复，慕勒发现自己的讲道比生病前更加陶醉、更加恳切、更加虔诚，他发现

事奉工作更加神圣。

快到慕勒三十三岁生日了。在接下来的年岁里，慕勒又生了两三次不严重的病，但是在以后很长的人生中，他再也没有像 1829 年和 1837—1838 年那样病得那么厉害。这位被军队拒绝的人，许多年后却宣告说，他感到 70 岁时比 30 岁时更健康。

第9章

“不倒闭的银行”

从1836年4月慕勒开始办孤儿院起，到1838年6月底，资金问题一点也没让人担忧，总有一些节余。但是，1838年夏天，事情却出现了危机，从慕勒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变得相当困难：

1838年8月18日：面对这些孤儿，我已身无分文。最近一两天，需要花费好多英镑。我的眼睛只仰望上帝。

晚上，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从一位姐妹那里收到5英镑。为了这群孤儿，她好多次将自己的饰品拿去变卖。今天早上，她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感动，觉得自己有5英镑，又没有欠什么账，因此，最好将这钱立刻奉献出去，因为如果是奉献首饰的话，我还要花一些时间来变卖。因此她带了钱来，一点也不知道我手中毫无分文。使我能够先支付男孩孤儿院看门的4英镑15先令5便士，而不是通常的10英镑。

8月20日：8月18日我收到的5英镑已经给了守门的，因此，今天我又两手空空。但是我的眼睛仍然仰望上帝。今天早上我祷告，知道这个礼拜我至少应该需要13英镑到20英镑。今天我的祷告又蒙垂听，我从一位以前从未谋面的住在克里夫顿（Clifton）的老太太那里收到12英镑。

8月23日：今天我又囊中羞涩，这时，从克拉珀姆（Clapham）送来3英镑另加送给孤儿的一箱新衣服。

后来慕勒回忆1838年9月到1846年底这段时期，在办孤儿院的事情上，他的信心经历了最大的考验。不是持续几年的艰难，而是几个月的拮据紧跟着几个月的富足。按照慕勒的说法，在整个这一时期，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试炼。在一次最黑暗的时期中，他记着说，“这些可爱的孩子毫无所知，因为他们的饭桌上总摆得很丰盛，像以前银行里有800英镑存款的时候一样丰盛，他们也没缺少什么。”又一次他写道：“这些孩子们从未缺少什么，如果我手中有上千英镑，他们可能吃得还没有这么好，因为他们总是有很好的富于营养的食物、必要的衣物等等。”用另外的话说，这段受试炼的时期就是这样，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多余的资金，上帝天天甚至每小时供给他们的需要，送来的足够用，但一点也不多。

慕勒在日记中常常暗示，但很少试图解释，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段受试炼的时期临到。在他的日记中，他很好地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理解。1838年秋，他从廷茅斯收到一笔款，他这样评论道：“真是雪中送炭，支付了今天的花费，这是一个鲜活的证据，说明我们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只不

过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更大的一笔还没有送来。”就像旧约圣经中的故事，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告诉他将以撒在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一样，在试炼中，慕勒也看到同样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段时间是考验慕勒的顺服，是他性格的塑造期——事实上，是为他一生的工作做准备。

9月6日，星期四的晚上，慕勒在听亨利·克雷克讲解《圣经·创世记》12章。

克雷克说：“只要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亚伯拉罕都一帆风顺。但当他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会失败。”

当慕勒听他同工讲道的时候，便开始将这教训应用于他自己的困难处境。他回忆道，那天早上，订货本已从幼儿院送到他面前，不久以后，女总管送给他一个便条。

“请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收回这订货本？”

慕勒深知，这是女总管委婉的说法，问何时她能得到下几天的口粮所需要的钱。他回了一个便条。

“明天。”

但是，他手无分文。在听克雷克讲道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尽管情况看来是多么的不可能，但他决不试图用自己的小聪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他可以考虑一下有人曾送他用以另一地区福音事工的220英镑，现在正存在银行里。他可以写信告诉那人说，因为孤儿院的困难，他已取出20甚至100英镑用于孤儿，对他来说，这是极容易的事。他可能还记得，捐助者多次告诉他说，如果他需要钱，一定让他知道。但是慕勒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不是“上帝的解决办法”。



威尔逊街的孤儿院

对于操练信心来说，不能忽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因为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在那次事件中，他只送去刚刚够的钱以解决幼儿院的燃眉之急。

礼拜六和礼拜天两天，没有收到一点钱，因此礼拜一的早上，也就是9月10日早上，慕勒描写目前的情况是“严重的危机”，他决定采取前所未有的方法。直到那一天为止，对资金状况，他从未告诉过他的任何一个助手。显然一个比较亲近的助手除外，在他的日记中只是称他为T弟兄。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一反常态，依次到达每一间孤儿院。将每一间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叫在一起，坦诚地告诉他们当前的财务状况，了解目前急需的开销。在他明确了详细的情况之后，他说：“我仍然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虽然你们不必买我们还无法支付的东西，但孩子们一定不能缺少营养的食物和必要的衣物，如果我看到孩子们缺衣少食，还不如把他们遣散。”

慕勒组织了一次清查，看看每一家孤儿院里是不是有一些不需要的物品，可以拿出去卖掉。然后，他带领工作人员开始祷告。

上午9点半，六便士送来了，是放在基甸教堂的箱子里的。慕勒解释说这是一个预示，将有更多的财物送过来。

慕勒离开孤儿院，就去拜访亨利·克雷克先生，并把情况完全告诉他。于是两人一同跪下祷告。

10点钟刚过不久，慕勒回到自己的家中，当他正在屋里祷告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来访，送给玛丽两金镑（相当于一个农场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要她用于孤儿院的孩子们。

“我一直想要来，拖了好久了。”她对玛丽说。

几分钟以后，慕勒来见老太太，她又给慕勒两金镑，其实她对目前的危机毫无所知。一会儿以后，一位工作人员从幼儿院来到慕勒的住处，慕勒给他两金镑，并把其余的钱送给男孩院和女孩院。

那一天，克雷克离开布里斯托尔，前往乡下与朋友同住。慕勒本想与他一道去，但因为孤儿院事务处于紧急状态，他不得不取消此次旅行。

那个礼拜的最后，在与工作人员一起祷告以后，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给慕勒 16 先令。

“如果我不献上我所有的，我的祷告就不诚实。”

慕勒接受了这份礼物。在这些年的试炼中，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自愿捐助孤儿工作、甚至变卖一些个人不需要的物品以帮助孤儿院走出困境。慕勒否认这样的行动代表他所倡导办孤儿院的原则的失败。相反，他解释说，除非在金钱和多余的个人物品上我们有甘心奉献的心，否则祷告祈求物质的东西决不可能奏效。他写道：任何一个机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一样，即使是富有的人都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办下去。除非无论何时，只要这个机构真正有需求，信徒都甘心乐意地奉献他所有的东西。

接下来礼拜二的一大早，慕勒面对着威尔逊街孤儿院的艰难形势：T 弟兄手中有 25 先令，慕勒自己也有 5 先令。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天一样，他必须为三个孤儿院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大约 100 人的健康尽心尽责。

1 英镑 10 先令能够买他们所需要的肉和面包、一个孤儿院所需的少许茶和三个孤儿院都需要的牛奶。那天不需要别的东

西了，手头的面包够吃两天了。但是，这个礼拜其余的几天怎么度过呢？资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员工已经倾其所能。他们像通常一样聚集祷告，但是，当他们站起来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仍一无所获。三个孤儿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慕勒又回去祷告。仍然还没有东西送过来。如何面对孩子的明天？宣布没有早餐吗？慕勒开始“灵里困倦”。七年后，慕勒回忆说，只有那天的情况才使他感到这种“困倦”。他写道，“还是第一次，上帝对我们的祷告似乎置之不理。”

大约下午稍晚的时候，慕勒家的门铃响了。一个老太太进来，她向慕勒自我介绍说：

“四五天前我从伦敦来到这里，我住在男孩孤儿院的隔壁，我女儿给我这些钱，让我奉献给你的儿童事业。”

信封里一共有 3 英镑 2 先令 6 便士，在当时的日子里，足够相当不错地供应接下来两天所有的需要。那妇人一离开，慕勒少有地兴奋欢呼起来。

在我收到那钱后，我独自一人的第一时刻，我禁不住高声赞美和感谢。今天晚上我又和我的同工聚集，祷告赞美。他们的心中非常激动。离孤儿院这么近的钱，几天都没有送过来，真是一个清楚的证据，说明在开始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帮助我们。但是因为上帝喜欢他的孩子们祷告，他允许我们祷告这么久，并且考验我们的信心，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刻真是何等的甘甜。

当 1838 年秋去冬来的时候，仍是每天只够每天的需要。11

月 21 日，三个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就再也没有余钱了。然而，三个孤儿院均分了一下面包后，看来还能够再维持一天，但是却没有一点钱买更多的面包了。

“我们必须等待，且看上帝此时如何帮助我们。”慕勒说。

午饭后，他爬上了金斯敦（Kingsdown）方向的小山，开始时感到冷得厉害，为了暖和一下，他决定多走一段距离绕过克拉伦斯宫（Clarence）回家。在离家大约 20 码距离的时候，在保罗街上遇到一位朋友与他一道回来。经过短暂交谈后，那个朋友交给他 20 英镑。慕勒拿出 10 英镑给毕士大教堂的执事们，以帮助教会里贫穷的弟兄姊妹预备过冬的煤炭，他把五镑给圣经知识社，另外五镑给威尔逊街的孤儿院。

一个礼拜后，事情看起来又很困难。11 月 28 日 12 点钟，慕勒与他的工作人员一起祷告。有人免费为 1 号院擦拭了钟表，每个孤儿院的钟表都得到了很好的维修。但在幼儿院和男孩院，面包不够了，也没有奶冲茶了。他们正祷告的时候，有人敲门，一个老姊妹离开房间去开门，其余的人仍旧静静地跪着祷告，然后起身。

“上帝一定送来帮助。”慕勒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他正在说话的时候，他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是刚才他们正祷告的时候送进来的。条子是玛丽送来的，还附了另一封信和送给孩子们的 10 英镑。前一天晚上，有人曾经问慕勒说：

“当上一次的欠账还上以后，手中的资金还好吗？”

“他们将像上帝喜悦的一样好。”慕勒回答说。

就是这个人送来的 10 英镑。

第二天，从萨福克（Suffolk）送来 80 英镑。12 月，一个捐

献者就送来 100 英镑，还有许多小礼物。

1839 年 2 月 7 日，礼拜四，资金又一次告罄。T 弟兄来见慕勒。

“为三个孤儿院买面包和应付其他开支将需要 1 英镑 2 先令。但是我们只剩 2 先令 9 便士了。我现在又不得不去克里夫顿安排接纳三个新孤儿的事情。”

“好好做吧，在你回来的时候，看看上帝是否送些钱来。”慕勒说。

那天中午，三个孤儿院午餐都很丰富。午饭后，一位来自桑伯里（Thornbury）的老太太带来一本慕勒的《叙事文集》和最近的年度报告，另外留下 3 先令。五分钟以后，面包师在男孩院叫喊，女孩院的女总管一看到他，就立即带着刚刚收到的 6 先令过去，她知道男孩院已经没钱了，有老太太送来的 3 先令，再加上手头的一些钱，她买足了三个孤儿院所有的面包。下午 4 点，T 弟兄从克里夫顿回到慕勒的家。

“上帝什么也没送来。”慕勒说。

一个工作人员献出他自己的 5 先令。慕勒一直祷告上帝，求上帝给他一段圣经，因那天晚上他要在毕士大教堂讲道。上帝似乎指示他读《圣经·马太福音》6 章 19 节到 34 节。

那天晚上，当他用浓重的普鲁士口音读他挑选的那段圣经时，可能毕士大教堂的信徒从他们年轻牧师的声里已经觉察到他炽热的语调。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在毕士大教堂聚会结束后，他又要到威尔逊街6号孤儿院祷告，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发现从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送来了一个盒子。当他打开的时候，他发现送给孩子们的8英镑，有送给圣经知识社的2英镑，还有一个3英镑的单独奉献。另外还有一些美利奴（merino）绵羊毛，3双新鞋子，2双新袜子，6本可以用来卖的书，1个金铅笔盒，2个金戒指，2个金耳环，1串项链和1个银铅笔盒。

在接下来礼拜三的下午，他们在给了T弟兄手头的钱后，慕勒对他说：“我们现在得仰望上帝更多的供应。”

那天下午，一位绅士和太太参观了威尔逊街的孤儿院。在男孩院，他们遇到了来参观的另两位太太。

“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一大笔钱，你们就不能开办这孤儿院。”一个参观的老太太说。

“你有一大笔钱吗？”绅士转向女总管，然后说。

“我们的资金存在一个永不倒闭的银行里。”为了不违背永不透露资金状况的规定，女总管这样说。

离开的时候，绅士给男孩院奉献5英镑。

3月间，慕勒收到T弟兄的一封信，那时T弟兄正在得文小住，信中说他这次出游对孩子们非常有益。他将孤儿院工作的年度报告送给一个人，此人读了年度报告后，全身心地祷告上帝，求上帝感动他的妹妹，奉献一些她贵重的珠宝以资助这些孩子们。不久，他的祷告蒙垂听，T弟兄从得文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个很重的金链，一个戒指，其上有10颗钻石，一副金手镯，另加两英镑。慕勒拿过这贵重的戒指，在变卖之前，在他

房间的一块玻璃上刷刷地写下了工整的“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上帝必预备）几个字。后来过了好久，直到他离开保罗街，当他看到玻璃上那字的时候，他的心还激动不已，得到钻戒的这个不寻常的方式，他仍记忆犹新。

1839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供应都是每日送来：一次送来的数量，很少够一两天的，但是从来没有太少。11月份一个礼拜一的经历说明，送来的东西恰好够用但一点也不多，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当上周末只剩下十先令时，慕勒开始了新的一天。礼拜一的早上，慕勒又收到了1英镑10先令，不久，从威尔逊街来信告知，那天他们需要3英镑。当他还在读信的时候，另一封信从得文送来，附加一金镑硬币。

1839年12月，孤儿院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公众聚会，来公布上帝在过去一年里对孩子们的供应。慕勒和他的工作人员现在就开始祷告，当会议开始的时候，他们盼望能够报告他们手头还有足够的资金。他们总是尽力避免在公众报告会，即唯一一次资金状况被公布的时刻给人进行募捐的印象。12月4日，上帝答应了他们的祷告，100英镑从东印度送来帮助孩子们。在那次公众聚会上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能够讲述在经受一段时间的试炼后上帝的丰富供应。

1839年年底的时候，慕勒记着说，他的身体和头脑比前几年都好。他将这些归因于上帝祝福自己清晨早起，并将头浸入冷水中的习惯做法。

他们举行了通常的年终祷告会，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大约是凌晨1点钟，有人给慕勒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夹着送给孩子们的一些钱。他知道这个奉献钱的妇

女还欠别人的债，债主已向她索要了好几次。因此，慕勒没有拆封便还给了她，他认为她不应该举债奉献。他这样做的时候，当然知道手头没有足够的钱满足元旦的开支。然而，到了早晨的时候，他收到了10多英镑，远远超过那时的需要。

1840年1月，财物源源不断地涌入孤儿院，2月初的时候，慕勒离开布里斯托尔，前往德国旅行。他在柏林呆了10天，然后来到父亲的家乡海姆斯勒本，他发现父亲已相当虚弱，但在他居家的日子，赫尔·慕勒对儿子充满柔情，慕勒发现父亲平时阅读祷文和圣经。2月底的时候，他向父亲最后道别，离开海姆斯勒本。一个月以后，父亲病故。

3月初，慕勒在汉堡登上了最早开往伦敦的轮船。在甲板上，他开始与两个俄罗斯的犹太人交谈。对慕勒所讲的，他们礼貌地听着，虽然慕勒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当慕勒离开这两个犹太人的时候，慕勒观察到他们彼此交谈，并猜测他们认为自己要么是个已受洗的犹太人，要么是个向犹太人宣教的宣教士。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又走过来对慕勒说：

“请告诉我，对那个耶稣，你的看法到底如何？”

“我相信他是弥赛亚、救主和上帝。”

那犹太人变得被冒犯了一样，从那时起，他们便远远地离开慕勒。

晚餐的时候，在船长的饭桌边，一个看到慕勒与那两个犹太人长时间谈话的旅客向他问起了那两个犹太人。

“真奇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容易被认出来，他们与别的民族迥然不同。”慕勒回答说。

“这只能从圣经中得到解释，显示圣经是真的。”船长插话说。

“我赞同。”慕勒说。在去伦敦余下的航程中，他与船长促膝长谈，慕勒称船长“是一个在主里面的真正弟兄”。

第 10 章

仰望上帝的富足

当 1832 年慕勒和克雷克来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常来基甸教堂参加聚会的还不到 70 人，他们作为一个闲置无用的建筑物接管了毕士大教堂，1840 年间，他们出让了基甸教堂，现在，毕士大教堂有超过 400 位的会友。这其中有 100 多人是 1840 年间新增的，有将近 50 人是听了他们讲道后归信的。在接下来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会友又成倍增长，所以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他们便有超过 1000 位的会友。1840 年 5 月，有 5 位孤儿受洗加入毕士大教堂的团契，现在威尔逊街共有 14 位大一点的孩子加入了团契。

1840 年，安·埃文斯（Anne Evans）女士从伦敦来到布里斯托尔，在伦敦，她曾参加了一个为上流社会所欢迎的浸礼会。在第二次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她曾偕朋友到毕士大教堂听讲道，她给我们留下了当时毕士大教堂一个难忘的画面和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威尔逊街孤儿院的情景。

他（亨利·克雷克）的讲道对我来说简直是耳目一新，确实是“骨髓肥油”，他所讲出的那段圣经的意义我从未听过，我发现自己真的是躺卧在青草地上。我所知道的人，只有曼彻斯特的麦克拉伦（Maclaren）博士能与克雷克先生相提并论。他的圣经原文知识超过大多数的饱学之士，他对经文的洞察力也是如此。能听这样的人讲道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我还要再来。”我说，我确实也一次又一次地到那里，自我来布里斯托尔的日子里，我从未去过别的地方。对我来说，简直是又一次新的归信。现在，我听到了我能理解的、清楚明白的福音，圣经成了我的一本新书。他们所表现出的兄弟之爱是我从未见过的。即使那些富足的、出入于社会最高层的人，也过着敬虔和简朴的生活，自然使人想起使徒时代的日子。我感到这确实是纯粹的基督信仰。

我 21 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开始住在威尔逊街 6 号的孤儿院。在那些孤儿中间我有五年的快乐事奉，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弟兄们幕后私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能够见证他们真正的属灵生活、他们对事奉上帝的虔诚和他们对日常环境的超然。在这里，我看到男男女女撇下一切，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效主前行。

美国的圣经教师兼作家 A.T.皮尔森（Pierson）后来描述说，毕士大教会是他所知道的两个真正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之一。

1840 年 6 月末的时候，慕勒夫妇离开布里斯托尔前往利物浦，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 8 个宣教士。慕勒陪他们上船，但还未上船之前，其中一个人送给慕勒 6 英镑 10 先令给那些孤儿们。

当他把钱交给慕勒的时候，他说：“我们所有的钱一起用，足够我们几个月的开销（他们8人一共有20英镑）。当我们上了船后，就根本不用钱了。而你需要花钱，当我们再需要的时候，上帝会供应我们的。另外的弟兄姐妹没有自己的钱，我同样也不愿有，上帝将那些孤儿特别地放在我的心中，因此你不能拒绝。”

1840年8月15日，礼拜六，一场危机看来正向威尔逊街逼近。所有的备用品都不多了，而过去几个礼拜的收入又甚微。加之礼拜六的需要几乎是平日的两倍，因为要买足礼拜天的所需。维持三个孤儿院两天，至少需要3英镑，但是他们却两手空空。

大约12点半的时候，两位老太太拜见慕勒，带来2英镑7先令6便士，慕勒带着这钱立即来到男孩院，发现孩子们正坐在那里吃午餐。B弟兄递给慕勒一张条子，是刚才要送给他的：

亲爱的弟兄，有从孩子玩耍的园里挖来的土豆，有从操场的苹果树上摘来的苹果（苹果用来做苹果布丁），还有用一位工人给的4先令6便士买的东西，我们才能吃午餐，当然需要很多，但是，上帝就预备了这些，还将要再预备。

那一天，他们卖年度报告得1先令，威尔逊街6号的奉献箱得1先令，孩子们的针线活得6先令6便士，孤儿院的一位姐妹奉献6先令。

12月，他们召开通常的公众大会，总结1840年这一年来的成绩。慕勒觉得第一次会议开得很好，晚上的时候他感到特别高兴和幸福，因此，与会的每一个人员从他脸上都看不出他手

头已经毫无所有以满足第二天的需要。会后，他家里只剩下 2 个半便士。

第二天清晨，虽然总共的资金只有 2 个半便士，但慕勒仰望永远活着的上帝。从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只有这一点点的面包，因此，早饭后，所有男孩院和幼儿院的面包都切开来分用。十分感恩的是，大约上午 11 点的时候，慕勒从巴恩斯特珀尔收到 5 英镑和半金镑硬币，第二次公众会议于晚上举行。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慕勒回忆了孤儿院第一个五年来的发展状况。

建立孤儿院的最大目的，是通过明显地看到上帝在我们需要的时刻，伸出双手答应我们的祷告，而使基督的教会普遍受益。因此，我们的愿望不是信仰中没有试炼，而是在试炼中有上帝丰盛的恩典托住我们，免得因我们的不信而使上帝的名受到羞辱。

这种生存方式使得上帝离我们特别近。他现在仍像过去一样，每早晨检查我们的储备，然后相应地将供应送来。当早饭过后，午饭无米下炊时，上帝却送来了超过 100 人的午餐，或者晚饭后，没有茶了，上帝又供应来了。比这种经历更大更多地显示上帝近距离的同在，我还从未有过。而所有这一切我们的需要，我们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种生活方式一定会引起我们不断地考虑食物衣服等等到底从何而来，这不适于我们在灵性上的操练。现在，第一，我回答说，正因为天父加给我们对这些孩子的关爱，所以我们的思想很少为生活忧虑。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他不仅允许我们这样关爱孩子，更愿意我们这样做。第二，必须记得，即使我们会为孩子的需要非常忧虑，为其他的工作绞尽脑汁，但是，正因为这些事我们单单仰望上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以祈求上帝来供应，这对我们的灵性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伤害。第三，我们认识到，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教会普遍的益处。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心上有这些试炼，而这些试炼又把我们再带回到上帝那里，使我们能够在这事工中忠心耿耿。

1840年，除了孤儿院的事，慕勒的圣经知识社还全额资助6个全日制学校300多个贫穷孩子的生活，也资助布里斯托尔其他的学校。慕勒还为那些不能读写的成年人创办了一个夜校。自从1834年创办圣经知识社以来，有超过6000本的圣经分发出去。1840年以后，除了圣经以外，也分发别的书籍——有的卖，有的送。这项工作，今天的慕勒基金会仍做得很好。1840年，通过圣经知识社，有120多英镑被用来支持海外宣教事业。

1841年春，虽然慕勒病得并不厉害，但他觉得很需要改变一下环境，当有人送他5英镑让他自己开支时，他认为这是他应当离开布里斯托尔一段时间的证据。于是他到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内尔斯沃恩(Nailsworth)旅行，与朋友们住在一起。

在内尔斯沃恩，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灵修操练，在他余生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当时，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早起床后，便立即祷告。但是在内尔斯沃恩的时候，他开始

有所改变，最重要的乃是在灵修开始的时候，先全神贯注地读一段圣经，然后对这段圣经进行默想。

这样，我的心可以得到安慰、鼓励、警戒、谴责和教诲，因此，借着上帝的话，当我默想的时候，我的心可以亲临其境地与上帝沟通。黎明的时候，我用一两句话祈求上帝祝福他宝贵的话语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默想上帝的话，找出每一节本来的含义，从中得到祝福。我的默想不是为了讲道之需，而是为我自己的灵魂获取滋养。我所发现每一次的结果几乎都一样，仅仅几分钟之后，我的灵便被引导进入忏悔、感恩、代求、恳求中。因此，虽然我没像以前那样祷告，但是通过默想，或多或少地突然将我引入祷告中。我将这种灵修的方式在户外进行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我在田间小径边走边默想，夏日里，如果我走得太远的话，便在台阶上坐着小憩，然后再吃早饭。

我发现在早饭前这样散步并默想对我的健康特别有益，当我到户外的時候，我通常带一本大号的新约圣经。为了善用时间，我常常将它带在身边。除了读经，我发现多在户外非常有益，以前没有这个习惯……我以前和现在灵性上的操练迥然不同。以前的时候，当我起床后，便立即祷告，通常在早饭前或整个时间我都在花时间祷告，但是结果如何呢？虽然我通常花一刻钟或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跪在那里祷告，才意识到自己得到安慰、鼓励及灵里的谦卑等。通常在我开始的十分钟、一刻钟甚至一个小时我的思

想都在开小差，然后才真正开始祷告。现在呢，很少再有以前的不集中，因为我的心被真理滋养，被带到与神相交的甜蜜中，我向我的父、我的朋友（虽然我是这样卑微和不配）述说他宝贵话语带给我的亮光。现在我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我没早一点发现这样呢！

1841年夏日的几个月里，对孤儿院来说是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慕勒说它是“上帝丰富之河的持续和涌流。”三年多来，威尔逊街从没有像这段时期这样富足过。但是好景不长，1841年9月以后的六个月里，慕勒报告说：“它使上帝喜悦……从孤儿院创立之初，我们的信心从没有经历这么大的试炼。”一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摆在他们的面前。

1841年9月后，有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信心确实经历了艰难的试炼，在漫长的日子里，一天又一天，上帝只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有时，甚至每顿饭我们都不得不仰望上帝。我们总是不住地长时间地祷告，然而帮助似乎总是落空。但是，那些投入到这项事工的人的信心并没有都低落下去，他们并没有完全厌倦用这种方式来从事上帝的工作，对上帝的帮助，他们从未绝望过，也没有再重新回到这邪恶世界的习惯和标准中……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上帝特殊的怜悯……在这试炼中，我完全相信，在上帝最合适的时间，他将把试炼挪去。当试炼还在的时候，即使在最小的程度上，也可以使基督的教会普遍受益。“我们遭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句话便成就在我们身上了。

那段相对富足的时期于9月结束后，情况并没有急剧下降。10月1日的早上，慕勒真实记着说，他手中又无分文了。但是，供给正在路上，上午的时候，送来了10先令，还有一张纸条：“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请相信上帝。”5分钟以后，慕勒从一位爱尔兰老太太那里收到5英镑。同时他从泰特伯里（Tetbury）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三箱物品正在路上，变卖所得归于孩子。两个小时后，又有14个小额奉献者，总共接近30先令，又给了他。

然而，一个月后，又收到10英镑，这真是一笔少有的数额巨大的奉献。

11月23日，昨天收到5先令买备用品，用于今天男孩院的早餐。一个姐妹送来一只熏腿和一些豌豆。如今，我们的确十分贫穷。孤儿院的一个工作人员用自己的钱为女孩院供应了一顿晚餐。在此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的卖年度报告的17先令收到了，虽然过去几个月一直期望得到，但是上帝在最合适的时间送来了。除了这些，小孩子作针线活得的2先令6便士也收到了，因此，今天的饮食便不用愁了。下午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证据，说明他一直继续不断地关爱着我们。一个箱子从普利茅斯送来了，里面装着衣服、小饰品等等。

第二天一大早，从普利茅斯送来的箱子里的一件东西卖了，足够维持他们一天的需要。因为目前处于非常时期，慕勒现在

要到威尔逊街的孤儿院主持祷告会。当他到达这个特殊祷告会的时候，慕勒听说，当幼儿跟随他们的老师在散步的时候，一个贫穷的妇女走近，递给她两便士。

“实在太少了，但是我必须奉献给你。”她说。

当慕勒到达祷告会的时候，其中一便士已经被用来凑去买面包了。

按照惯例，公众会要在12月召开，汇报过去一年的工作。但是在1841年岁末的时候，情况异常艰难。慕勒决定推迟会议，免得有人说他们是有预谋，来公开他们的需要，年度报告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被推迟出版。慕勒写道：

因此，我们更愿意自己单单依靠永活的上帝的证据呈现出来，而不是指望公众会议或出版年度报告。不仅如此，在我们的赤贫中，我们不喜欢开会时间来到，免得别人知道我们的景况，我们仍要静待更长的时间……上帝在我们贫穷时说：“现在我要看一看，你是否真正依靠我，是否真正仰望我。”

这样的信心并没有即刻得到答复，相反，慕勒在几年后这样写道：

从我以这种方式生活以来，在我所经过的所有岁月里，直到此时，我从没有知道任何时期我的信心曾经历如此严厉的试炼，像从1841年12月12日到1842年4月12日这段时期一样。

在整个艰难时期，孩子们既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从未缺少富含营养的食物、衣服和温暖，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却有一些勉强维持生活的困境。1842年2月8日，礼拜二的中午，三个孤儿院都有足够的食物，但却无钱买用来贮存的面包和第二天早餐的面包和牛奶了，两个孤儿院又都需要煤炭。他们从来没有如此窘迫过。慕勒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上帝第二天9点之前不送供应来，“他的名字将受到羞辱。”下午晚些时候，九个美味可口的葡萄干蛋糕送来了，是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定做的。真是鼓舞人心。当慕勒上床休息的时候，情况仍像原来一样严峻。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确实我们比以往都贫穷，但是，借着上帝的恩典，我的眼睛不是盯着空空的备用品，也不是盯着空空的钱囊，而是单单盯着上帝的富足。

第二天一大早，慕勒便向威尔逊街的孤儿院走去，看看上帝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到了以后，发现有七八个人早已在那里聚集。一个基督徒商人已经走了大约半英里，要到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那时，他想到慕勒孤儿院的孩子们可能正处于急需中。他当时并没有立即按原路返回，而是计划到晚上的时候，再带些东西去孤儿院，然而，正像他后来告诉慕勒的：

“我不能继续前往，似乎有什么东西催逼我回去。”

他向男孩孤儿院奉献了3金镑，这些钱加上很少的零钱，正好够两天的需要。

到1842年4月，慕勒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度过了六个月的艰难时期，那时，一个礼拜接着另一个礼拜，资金没有充裕过，只是短暂的接济。一次又一次，金钱和供给在孩子们坐下吃饭

前几分钟才到达，但是，慕勒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就是他和他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曾向别人募捐过。但是，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不能再加给试炼的时刻了。这种景况还要维持多久呢？

4月12日，礼拜二，资金缺口从来没有这么大过，因为上一个礼拜六，威尔逊街的孤儿院收入还不到14先令。早上很早的时候，慕勒跪下祷告：

“上帝啊，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急需一些燕麦片、几双新鞋子，还有修理旧鞋子的钱，还需要补充我们的储备，我们需要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几个老姐妹助手也需要一点点的钱，请给我们一些大的款项吧。”

过了一会儿，一个信封从东印度送来，里面有100英镑。“当上帝把这些送来的时候，我不能描写我心中的真正喜乐……当捐款到达的时候，我毫不吃惊和惊喜，因为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祷告蒙垂听，并且好久就盼望着它的到来。”

到5月的时候，慕勒认为该出版另一期的年度报告，介绍圣经知识社和孤儿院的事情。因为这一时期的试炼，年度报告整整推迟了五个月。

在先前的17个月里，圣经知识社为孤儿院里100个孩子筹措资金，还为主日学、成人学校、孩子们的全日制学校、圣经和基督教书籍的发行以及支持海外宣教等等筹集资金。在这17个月的时间里，孤儿院的孩子们极少生病，也从未有孩子夭折过。孤儿院的总共支出是1337英镑，而总收入刚好1339英镑。麦克白（Micawber）先生的不筹措未来、总幻想突然走运的乐天派的幸福将要终结了。

第 11 章

正当的抱怨

从 1843 年 8 月到 1844 年 2 月，慕勒与玛丽在斯图加特呆了六个月的时光，试图处理从一个小小的浸礼会产生的教义上的争吵。这段时期，威尔逊街的孤儿院决不是资金最宽裕的时候。慕勒外出不在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开始搬往威尔逊街的第四个孤儿院。

1844 年的整个夏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转入秋季的时候，资金便不充裕。

9 月 4 日，礼拜三的早上，威尔逊街孤儿院的总共资金是四分之一便士，而将近有 140 个人——包括孩子和工作人员——需要吃饭。但是，当慕勒开始处理上午事务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着急，他总是说，“我们的需要就是我的安慰。”今天，像许多时日一样，他正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将帮助送来呢！9 点刚过，他在保罗街收到一个无名氏的 1 金镑。在 10 点到 11 点之间，从威尔逊街的孤儿院送来一个便条说，那天将需要 1 英镑 2 先令。当慕勒刚刚读完那便条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停

在他的房子外，从曼彻斯特来了一个绅士。

“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我听说你办的孤儿院，没有正规系统的募捐，也从不向任何人申请捐款，但你的事业每年能收到超过 2000 英镑，我一直感到吃惊。”他告诉慕勒说。

他们谈了一会儿，那个商人给了慕勒 2 英镑。同时，那天早上还有 10 先令的收入，是卖老太太们奉献的旧箱包得到的。那一天还收到一些小额的奉献，一箱的旧东西也卖了。

当冬天渐渐逼近的时候，慕勒开始为一些特殊的需要迫切祷告。

“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足够的钱，我好给孩子们买许多的衣物，男孩院也需要粉刷一下，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些零用钱。”

10 月 1 日晚上，他的祷告蒙上帝垂听：他收到了一张 70 英镑的支票，捐款者曾告诉慕勒说，“如果再有特殊需要，请与捐款者联系。”但是慕勒在日记中写道：“虽然钱到得如此及时，但我不能再给好心的捐款人写信，以暴露我们的处境，免得他再奉献更多。同时也免得在供应这项事工上，由于他的奉献，上帝大能的作为不再显明出来。”结果男孩院的房子被适当地粉刷了一下，工作人员也领到了他们的奖金。

1844 年，威尔逊街孤儿院的每一个人都过了一个丰盛的圣诞节。慕勒将它描写为一个“极丰富的节日”。在寒冷的冬日里，孩子们胃口大开以抵御寒冷，因此每当有可能的时候，工作人员便采购大量的食物，例如，在 2 月的一个礼拜六，他们买了 8 英担（1 英担等于 112 磅）的大米和 8 蒲式耳（1 蒲式耳等于 36.368 升）的豌豆。2 月 12 日，是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

慕勒一边走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慕勒祷告说：

“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供给我煤炭、美好的食物和暖和的衣服，我生活得很好，但在布里斯托尔，你的另一些孩子可能正处于贫困中，请赐给我钱财，好叫我给那些贫穷的人更多的帮助。”

三小时后，他收到了别人送他自己用的 10 英镑，他用这钱做了什么，我们用不着半点怀疑，虽然他在日记中只字不提，但后人知道在慕勒的一生中，他把别人送他自己用的钱中拿出了 80,000 英镑。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奉献者注意到慕勒关心一般的劳苦大众，有时也将他们奉献的部分指定用于此目的。

丽迪亚现在已经 12 岁了，在一个私人学校里学习，慕勒描写说她接受了“极好的教育”。在她到校六个月后，慕勒问起花费的事情，女校长只是告诉说：“我很高兴能为她进行免费教育。”然而，慕勒执拗得很，最后他付了该付的钱。可是，慕勒后来发现那钱又被女校长以无名氏的方式原数返还给他。丽迪亚在那里一直呆到 18 岁，尽管几次想方设法，但是慕勒再也没有成功弄到一份欠账单。慕勒写道：“我能，并且完全能付得起她教育的花费，并且也十分愿意付清，但是上帝使其免费，这样，也显示上帝是多么愿意充分地帮助我并供应我的缺乏。”

1845 年 10 月 30 日，礼拜四的早上，慕勒从威尔逊街居民那里收到了他描写为“礼貌并友好”的信，写信人说，因为孤儿院在威尔逊街，给他和他的邻居带来了诸多不便。这封信使得慕勒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慕勒才腾出时间为这一新问题进行祷告和思考。在祈祷上帝指示他做出正确的决定后，他写下了赞

成和反对将孤儿院搬出威尔逊街的理由。

首先他接受邻居们的抱怨，“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不正当的。”确实如此，特别是在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孩子们吵吵嚷嚷，“那只是孩子们的吵闹声，因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缘故，谁也挑不出一毛病来。”慕勒坚持说。但慕勒认为，“我应当推己及人，设想自己住在孤儿院的隔壁……因此，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我也应该怎样待人。”第二，有140人到150人住在威尔逊街的四个孤儿院里，当排水不顺的时候问题就蛮厉害，甚至影响到水的供应。

还有其他的理由需要搬迁，在威尔逊街的孤儿院里，唯一玩耍的地方过于狭小，一次只能容下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在玩耍。慕勒想孩子们有更大的空间活动。他还想在孤儿院里面应该有一个花园，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在里面劳动。另外，大一点房屋还有一个优点，所有的缝缝洗洗都可以在孤儿院中进行。

慕勒同时也认识到威尔逊街的空气不是很清新，许多孩子来到孤儿院后并不是很健康，他急切地盼望孤儿院应该尽可能地坐落于高爽的位置。他想，教师和工作人员也一定会喜欢在工作之余，在田园里放松一下或在田间散步。

几年以来，慕勒一直在布里斯托尔寻找具有上述优点的房产，但却未能如愿。普通的大房子，都是私人所建，他觉得总体上不适宜作孤儿院，因为通风不好。

慕勒越思想此事，越为此事祷告，越开始觉得那是上帝的旨意，让他开始最大胆的信心冒险：建一个独特的、新型的、目的明确的孤儿院。

我开始明白上帝将带领我建造孤儿院，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孤儿的利益，使整个工作更加有序化，而是在作更大的见证，上帝能够并且愿意提供大量的财物给那些需要财物和为财物信靠他的人。因此，他愿意扩大这工作。如果我真的要建造一个孤儿院，那么它的规模要足够大，能容下 300 个孤儿，还有老师和管理人员，以及这项工作必要的服务人员。

从 1836 年孤儿院开始成立以来，还从没有像这一时期这样有这么多的孤儿申请入住，特别是男孩。因为曾拒绝这么多的男孩入住，他感到很痛苦。

慕勒征求毕士大教堂同工们的意见，八位同工一致认为他应该离开威尔逊街，对于建一个新孤儿院，没有人持反对的意见。乔治和玛丽开始每天早上为此事祷告，当他们一确定那是上帝的旨意时，就开始向上帝祈求必要的资金，慕勒估计他最少需要 10,000 英镑。

11 月，罗伯特·凯普曼来到布里斯托尔，要在那儿工作一会儿，能有机会与朋友谈论建孤儿院的事，慕勒非常高兴。

凯普曼说：“我认为你仔细考虑这项工作是对的，你必须寻求上帝的帮助来指示你的计划，因此，所有的一切才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行。”

刚刚过去的七年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多余的资金，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满足于继续维持在威尔逊街的充实而又有意义的工作，认为扩大规模既非可能又无必要。然而，慕勒并不满足于仅仅加强和完善这项工作。他现在十分确定扩大和

重建孤儿院是上帝的旨意，他常说，他的上帝是富足的，财力物力无限，“金子是他的，银子也是他的，千山的公牛都是他的”。

1845年12月10日，他收到了第一笔专门用于建新孤儿院的奉献——1,000英镑，这是他曾收到的数目最多的一笔单独奉献。他写道：“当我收到这一笔钱的时候，我的心像收到一便士那样平静安稳，因为我的心正留意我的祷告蒙垂听。”

这时，玛丽的妹妹正巧从伦敦访问回来。

她告诉她的姐夫说：“我在伦敦遇见了一位设计师，最近正饶有兴趣地读你的《叙事文集》，当我告诉他你要建一个新的孤儿院的计划时，他极想了解更多关于这项工作的信息，他草拟了一份计划，并且愿意无偿监督工程施工。”

慕勒大喜过望，他将这一喜讯加上以前有人奉献的那1,000英镑看作这是大事成就的预示。

他要在布里斯托尔的郊区寻找一块六到七英亩的地皮。那时，在整个地区有许多投机的建筑项目，一块合适的地皮要价很高。“为了更加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慕勒故意不说出他计划的细节，但是，如果谈话涉及到这一问题，他也跟朋友们谈起自己的计划。12月末的时候，他又收到专门用于建新孤儿院的两笔奉献——一笔是1,000英镑，另一笔是50英镑。收到这两笔奉献，他有点激动，他内心的喜乐不亚于新年早些时候他写的以下日记：

1月3日，其中的一个孤儿奉献了6便士。

1月10日，一个孤儿从他的远方亲戚那里收到了2个

半先令，一个主里面的姐妹奉献给我 3 先令，一个戒指，一对金耳环和一个胸针。

正月里，慕勒仔细审视了几块地皮的可行性，但是没有一块既合适又便宜。然而，下一个月，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的两次记录：

2月2日，今天我听到在阿什利顿（Ashly Down）有一块既合适又便宜的地皮。

2月3日，今天去看了那块地，是我所有看过当中最称心如意的。

阿什利顿当然可行性最大：在布里斯托尔市北边高处的连接带，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斯泰普尔顿（Stapleton），北面是霍尔高地（Horfield）。交通便利，很容易到达市中心，离毕士大教堂也不远。

第二天晚上，慕勒来到这块地的主人家。

“他去工作了。”有人告诉慕勒说。

“请问他工作的地方在哪里？”慕勒问。

打听到消息后，慕勒来到主人的办公室。

“他刚刚离开，但是今晚 8 点可能会回到家。”有人告诉慕勒说。

慕勒感到他们那晚会面将不是上帝的旨意，于是便回到金斯敦。

第二天早上，慕勒又来到那块地的主人家，叩响那豪华房

子的前门，一个仆人出来应门。

“他正在家，正盼望尽快地见到您呢！”

仆人领慕勒来到那绅士的房间，他看起来有点疲惫。

“你昨天到访想得到那块地建孤儿院的事，仆人已经告诉我了，今天早上我3点醒来，一直到5点都不能入睡，最后，我下定决心，如果你需要那地的话，我以每英亩120英镑的价格给你，而不是我以前要的每英亩200英镑的价格。”

“上帝真好！”慕勒边想边签下了将近7英亩的合同。

慕勒曾给那位愿意提供建筑设计规划的伦敦建筑师写信，现在慕勒收到了他的回信。

亲爱的先生：

能在您所从事的爱心事业上尽绵薄之力，我心中的满足远非书信所能表达。在您计划要建的孤儿院的建设中，能作为一个设计师和质量监督员，我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在上帝的祝福下，如果一切顺利，我真想按我所说的去做，我愿意免费为您提供计划、标高和剖面，并对这一工程作详细说明。因此花费可以精确地估算，我将免费为您替这项工程作估算和监督。

第二个礼拜，那位设计师从伦敦来到布里斯托尔，慕勒和他一道参观了阿什利顿。

“这是最适合的地方，无论是位置、排水还是供水，都适合建孤儿院。”建筑师告诉慕勒说。

建孤儿院的钱正源源不断地到来，2月中旬，慕勒收到了一

个口头奉献，有人将为此事向慕勒奉献 500 英镑。

4 月末的时候，建筑师完成了他的计划，这一建筑将容纳 300 个孤儿，140 个女孩和 80 个男孩，年龄都在 8 岁以上，还有 80 个幼儿，包括男孩和女孩，年龄在 7 岁以下，也有适当的地方，给工作人员和教师住。在所有的资金都到位之前，工程不会开工，这块土地和建筑将交给理事会管理。

7 月的时候，他收到了他从事孤儿事业以来的最大一笔奉献，2050 英镑，其中 2000 英镑是给建孤儿院的专项基金。慕勒写道：

当我收到这捐款时，我在主里面的喜乐用笔墨不能描述。我既不兴奋也不吃惊，因为我留心我的祷告蒙垂听。我相信上帝垂听我的祷告。然而，我的内心充满喜乐，我只能坐在上帝的面前，赞美他，就像大卫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 7 章一样，最后我俯伏在主的面前，禁不住对上帝献上感恩，将我的心重新降服于他，来做他的圣工。

11 月 19 日，慕勒早上五点便起床祷告。

“最慈悲的天父，你知道最近已公布了这一事实，就是威尔逊街的许多居民抱怨孤儿院给他们带来的不便。请为我们预备资金，以便我们开始重建一个孤儿院。上帝你知道，现在的人住申请已经超过了容纳能力，我痛恨拒绝接纳孩子们。凭你的怜悯，垂听我的祷告。”

慕勒打开圣经，读到耶稣在《圣经·马可福音》11 章 24 节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他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将赐给我这项工程的全部所需，我肯定我将拥有所需的一切，因为我相信我的祷告将蒙应允。”

早饭以后，他又在祷告，刚刚从跪祷的地方起来五分钟，他便收到一封挂号信，里面有一张 300 英镑的支票，其中 250 英镑是给建孤儿院的专项基金，这使得建孤儿院的专项基金超过 6,000 英镑。

12 月，他又收到 1,000 英镑。1847 年 1 月，又有 2,000 英镑的奉献，使建孤儿院的专项基金超过 9,000 英镑。

1846 年和 1847 年的冬天，满足威尔逊街孤儿院每天的需要并非易事。1846 年，经历了小麦和土豆的大歉收。美国的棉花等农作物收成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导致价格猛涨。许多铁路公司的可靠性遭到质疑，英国的经济遭受信任危机，结果导致经济恐慌。1847 年 5 月，慕勒写道：“自从创办孤儿院以来，供给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面包价格几乎是 18 个月前的两倍，燕麦价格几乎是以前的三倍，大米的价格是通常的两倍多，因为价格极高，已经没有土豆了，但是，孩子们毫无缺乏……我的心很平安，且十分平安。”

6 月，他又收到 1,000 英镑建孤儿院专项基金，据估计，包括装修和家具，整个工程将不低于 14,500 英镑。然而，还有一些额外的开支——主要包括供暖、煤气设备、陈设品，三个大的操场和一条小路，现在都不能考虑，直到整个建筑工程开工一些日子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因此他决定立即动工。7

月 5 日，第一个建筑工人到达阿什利顿。8 月 19 日，新孤儿院举行奠基礼。

1848 年 2 月，慕勒收到 100 英镑，使他能为威尔逊街的每个孤儿购置了一套新衣。他们已为此事整整祷告了几个礼拜。

冬去春来，当天气渐渐变暖的时候，新孤儿院的工程继续进行，到 5 月的时候，大部分的工程已进入封顶阶段。但是在第一个孩子进驻阿什利顿以前，慕勒不得不处理一个在弟兄会运动中酝酿了数年、终于爆发出来的可悲事件，其结果是悲惨的和深远的。

第 12 章

风雨弥坚

时间倒流到 1832 年，那时，约翰·纳尔逊·达比（John Nelson Darby）已经在布里斯托尔的毕士大和基甸教堂讲道，并且对“亲爱的兄弟慕勒和克雷克所做的显著的工作”有一些评论。达比是早期弟兄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著名的海军上将戈德森（Godson）得到他的第二个名字。他先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后来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受教，并且在那里获得人文科学金质肩章。

达比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方面，他一生投入到痛苦的争论当中，他固执、苛刻、粗鲁。另一方面，他又显出极深的同情心和热心肠。当他外出的时候，总是住在贫穷而不是富有的家庭当中。在弟兄会的历史上，有关于他大量的趣闻轶事，既记载于史书，也流传于民间，他特别喜欢孩子——反过来，也得到孩子们的敬慕和爱戴。

他的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建立和带领了 1500 多个教会。他著作等身，有 40 多卷，其中包括

圣经大多数书卷的注释。他曾将圣经译成三种文字，并且写了许多深刻和优美的赞美诗。

达比说导致他自己离开圣公会的原因是“盼望基督教会真正合一，他认为‘身体的合一’不应该建立在限制一个人离开教会的自由的基础上”。在这项新运动的早期，他便表明无瑕疵、无宗派的原则，说“这是教会治理的真秘密”。他写道：“心胸宽大，像基督的心肠一样，与宗派保持无限的距离……你不属于任何教派，也不属于任何人，你只是一个基督徒。”

19世纪30年代的早期，虽然他对慕勒和克雷克在毕士大教堂的工作印象很深，但他仍然评论道：“我更盼望教派之间再多一点广泛交流的原则。”这是一个奇特的评论，因为当时克雷克常常向不从国教派的牧师讲道，并且与圣公会的牧师、学者诸如迪安·奥尔福德（Dean Alford）、特伦奇（Trench）大主教和迪安·埃利科特（Dean Ellicott）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外，慕勒和克雷克有时也邀请弟兄会以外的著名牧师来毕士大教堂讲道。

然而，1835年，达比早期的博大胸怀被另一个致命的原则所侵蚀。那一年，慕勒的姐夫安东尼·诺里斯·格罗夫斯从印度回来访问普利茅斯时，他觉察到弟兄们在达比的影响下已有排外和狭隘的迹象。不是因耶稣基督的真理互相联结，相反，他们正趋向于维持一个统一的原则，即反对一切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鉴于达比在新近建立的如此众多弟兄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格罗夫斯给他写信，提及达比“博大的心胸曾折服和吸引自己”，但是他也很坦白地告诉达比，“你已经偏离了这些原则……并且又回到了你以前所离开的那座城市的原则中去。”

19世纪30年代中叶，早期弟兄会运动内部已经出现歧异的

倾向。一方面，像格里夫斯、慕勒、克雷克和凯普曼力求保持原来的无宗派的原则，接受所有“基督已经接受的人”。另一方面，达比和在他影响下日益增长的教会，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共同合一的教会，特别强调在上帝的合一原则下远离罪恶。

另外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出现，1839年，有两个礼拜的退休会，考虑到毕士大教堂出现的一些教会秩序问题，慕勒和克雷克坚决认为在教会内部很需要有认可的长老和管理机构，而达比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传道与教导职分的按立和册封，担心这样会导致一小撮被挑选出来的牧师们出现，他认为按立长老会限制圣灵自由运行做工，会导致“人为的正式的”（来自人方面的）与“自然的和非正式的”（来自圣灵的）之间的混乱。

19世纪40年代早期，另外一人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本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他在牛津大学获得第一名，并且成为埃克塞特学院的研究员。不久，他就成为英国最早的弟兄会之一——普利茅斯埃伯利顿街（Ebrington）弟兄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使得这一运动家喻户晓，通常有来自这一地区不同教会的1200到1400人听他讲道。

牛顿开始猛烈抨击达比那在他看来不可思议的关于末世的教义。达比却将它发扬光大，为的是捍卫耶稣二次再来的新教义。按照这一教义，通常称作“隐密的被提”，耶稣二次再来将分成两步，首先将有“圣徒的被提”，那时基督将所有的真信徒被提到空中，只有那时敌基督者才会兴起，并宣布进入大灾难时期。第二步是基督荣耀的显现，敌基督的统治将宣告结束。然而，牛顿还有好多人都反对这一观点。他问：“如果教会在大灾难开始就被提到空中，按照启示录所言，谁是在这大灾难

中有忠心的呢？”牛顿不认为他和达比的不同见解是无要紧要的，因为他认为达比的理论与信仰的中心教义相冲突。对牛顿而言，教会包括所有被基督救赎的人。如果在第一次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与教会分开，那么，那受苦的“忠心的余数”必被上帝的作为拯救而非基督的拯救。

达比宣称，新约《圣经》中有相当多的部分不适用于教会，而是指将来归回的犹太人的余数。

“你做这样的区分，实质上是放弃了基督教。”牛顿这样告诉他。

然而，达比的人格魅力意味着他关于耶稣二次“在任何时刻”都会再来的观点却赢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甚至远远超出弟兄会的内部。没过几年，许多圣公会的福音派和美国的许多基要派都已接受此观点。通过接受这一观点，以及在司考福（Scofield）的通俗助读本圣经中详尽阐述的末世论，使弟兄会运动不断壮大。

在抵制这有缺陷的新观点方面，牛顿并不是单枪匹马，著名的慕勒、克雷克、凯普曼和 S. P. 特里格利斯（Tregelles）等坚定地认为，在基督来临之前，某些事情一定会发生——虽然基督再临对教会来说一直是最大的盼望。在圣公会中，特伦奇大主教、迪安·奥尔福德、埃利科特和莱尔（Ryle）的主教们都站在坚持古代信仰之列。

可悲的是，在早期弟兄会之间出现的这些紧张，特别是牛顿和达比之间出现的裂痕，破坏了埃伯利顿街教会的平静。1845年，达比从欧洲大陆长时间访问归来不久，他和牛顿之间一场灾难性的争吵打破了教会的平静，几乎使工作停滞不前。

达比开始在普利茅斯独自教学，并开始对牛顿的教义和人

身展开攻击。他宣布退出埃伯利顿街的团契，后来他曾承认这一举动是鲁莽的。

1847年，冲突的重点转向另一个新的方面，即关于基督的人性和受苦方面。当然，对这一问题，在教会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的争吵，可悲的是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些争吵都源自想用有限的理性理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牛顿已经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慕勒也同意牛顿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基督二次再来的观点，但达比却将这些观点加以定罪，认为是“亵渎的教义”，说牛顿的观点好像暗指“耶稣基督本身也需要救赎”。克雷克猜想牛顿的错误仅仅是“那种知识分子的草率思考，但用心仍是好的，是在试图荣耀基督。”那年晚些时候，牛顿已意识到他思想的错误，并且发表了一篇声明，坦承那本小册子里面存在的一些错误。他的声明这样结束说：“我相信救主不仅不需要救赎，并且能抵挡来自各方面的任何邪恶的影响。”

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这真是一个悲剧，达比极力证明牛顿并没有真正放弃他的错误观点，尽管牛顿做出了意思相反的强有力的声明。结果导致埃伯利顿街的教会实质上被瓦解，牛顿与弟兄会的联系也到此为止，他被迫退入自己创建的一个很小的教会，一直到1899年去世。他仍然写一些文章和小册子，后来慕勒评价说他的作品“都正确且合乎圣经”，慕勒和太太常常爱不释手，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1848年4月末，达比访问布里斯托尔，仍像往常一样拜访慕勒。慕勒邀请他下一个主日在毕士大教堂讲道，因为他已经另有预约，只好婉言谢拒。

5月间，有两位埃伯利顿教会的弟兄来到布里斯托尔，要求

在毕士大教堂领圣餐。一位在普利茅斯事件的时候一直住在国外，因此被获准，另一位申请却被搁置考虑。毕士大教堂内一些达比的支持者对这位绅士获准领圣餐表示反对。于是，克雷克建议与三个最坚决的反对者面谈。反对者来了，说那两个人分明是牛顿异端派的。

然后，在埃克塞特的一次聚会上，达比公开宣布他再也不去毕士大教堂了，因为该教堂曾接待“牛顿的追随者”。然后他又给慕勒写信，进一步证实此事。此后，他又宣称牛顿的追随者曾在毕士大教堂传播牛顿的著作。毕士大教堂中达比的追随者开始要求教会对牛顿的著作（已经被谴责，被作者收回去了）来一个正式的调查。

6月，达比的追随者之一，乔治·亚历山大退出毕士大教堂。长老们被迫召开一个教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10个长老签署了一份宣言，后来被称为十人书，当然这10个人中包括慕勒和克雷克，由教会的大多数宣读和批准。然而，达比的同情者旋即离开教会。

这份宣言表明了毕士大教堂关于基督人性的主张，它声明说“虽然基督作为一个人、一个以色列人，肉身遭受痛苦、试炼，但是，在他的情感和经历上，在他外在的品质上，都与罪人完全有别。”

此宣言列举了九条理由，说明为什么长老们不能按照乔治·亚历山大的请求对牛顿的错误给予正式调查和评判。他们的第九条理由非常幽默：他们觉得如果按照亚历山大的请求，会把一个罪恶的先例引进来。如果一个弟兄有权要求我们对一个工作进行50页的审查，他便可以得寸进尺，说我们的调查报告有

错误，只不过是挂一漏万。因此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审查别人的错误上，而贻误了更重要的事奉。

然而，达比并没有将此视为玩笑。有一次在访问约克郡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弟兄们都同情毕士大教堂。于是8月26日，他从利兹（Leeds）发出了一道通函，开除毕士大教堂“会籍”，原因是毕士大教堂据说曾接待过牛顿观点的支持者！同时，他敦促各处的弟兄会来“评判毕士大教堂的问题”。

慕勒和克雷克对此并不惊慌，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达比的一个追随者写了一篇论文，试图说明克雷克的一篇出版物是不正统的。然而，达比深知既有才能又经验丰富的克雷克是坚定的正统派。据说，达比将他支持者的论文付之一炬。

10月31日，慕勒决定采取行动。他公开宣布他本人谴责牛顿的教训，并在一系列的聚会中清楚表明如果有人捍卫、维持和高举牛顿现已撤回的错误观点，都不能被接纳进入毕士大教堂。

从那时起，那些拒绝遵守达比命令以反对毕士大教堂的人，慢慢地被称为“开放的弟兄”，后来，他们20世纪的继承者更喜欢“基督徒弟兄”这一名称。那些跟随达比的被称为“封闭的弟兄”。安东尼·诺里斯·格罗夫斯的儿子亨利坚持认为，毕士大教堂应当比在达比命令下行动的教会做得更深入一点，批判并拒绝接受牛顿的观点。达比影响下的教会开始从内心相信毕士大教堂已经不再支持牛顿的观点。实际上，牛顿早已放弃了他的错误，而毕士大教堂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些观点。

在决定接受某人进入该教会方面，毕士大教堂和与它站在一起的“开放的弟兄会”，都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地方教会在这件事上的独立性。而“封闭的弟兄会”则认为这不是“实际上的

身体的合一。”

在这悲哀与骚动的时代，安妮·埃文斯女士仍然是毕士大教堂的会友。她描写这段时间是毕士大教堂极度痛苦的时期，充斥着巨大的悲哀和动乱，她写道：

从头到尾这是一个毁坏的时期，友情终止、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商业交往终止、健康甚至理性都遭到破坏。毕士大教堂需要彻底的谦卑，我们对自己想得太多，我们在人数上猛增，甚至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有许多上层人士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作领袖的弟兄，也毫无反省……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血肉之躯能抵挡的。因此，撒旦对我们乘虚而入，使我们在炉灰中懊悔。

但并不是所有的都随流失去，安妮·埃文斯继续写道：

在这悲哀的时代，乔治·慕勒总与我们在一起。他并没有失去主见，他用稳健的手驾驭着一切。最后，当毕士大教堂从骚乱中站起来的时候，她变得更加强大，比以往更加从容。我们的会友不断增加，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我们的会友将近有700人。孤儿院的工作也没有因此而搁浅，在世界上真是一个奇迹……

当大复兴开始的时候，开放的弟兄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是两位年轻人通过读慕勒的著作引起的。

但这是以后要谈的故事了。

第 13 章

慕勒的秘密财富

当达比发出通函开除毕士大教堂会籍的时候，孤儿院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了房顶的工程和内部涂灰。收到的奉献已达 11,000 多英镑，但要完成这项工程和内部装修，至少还需要 3,000 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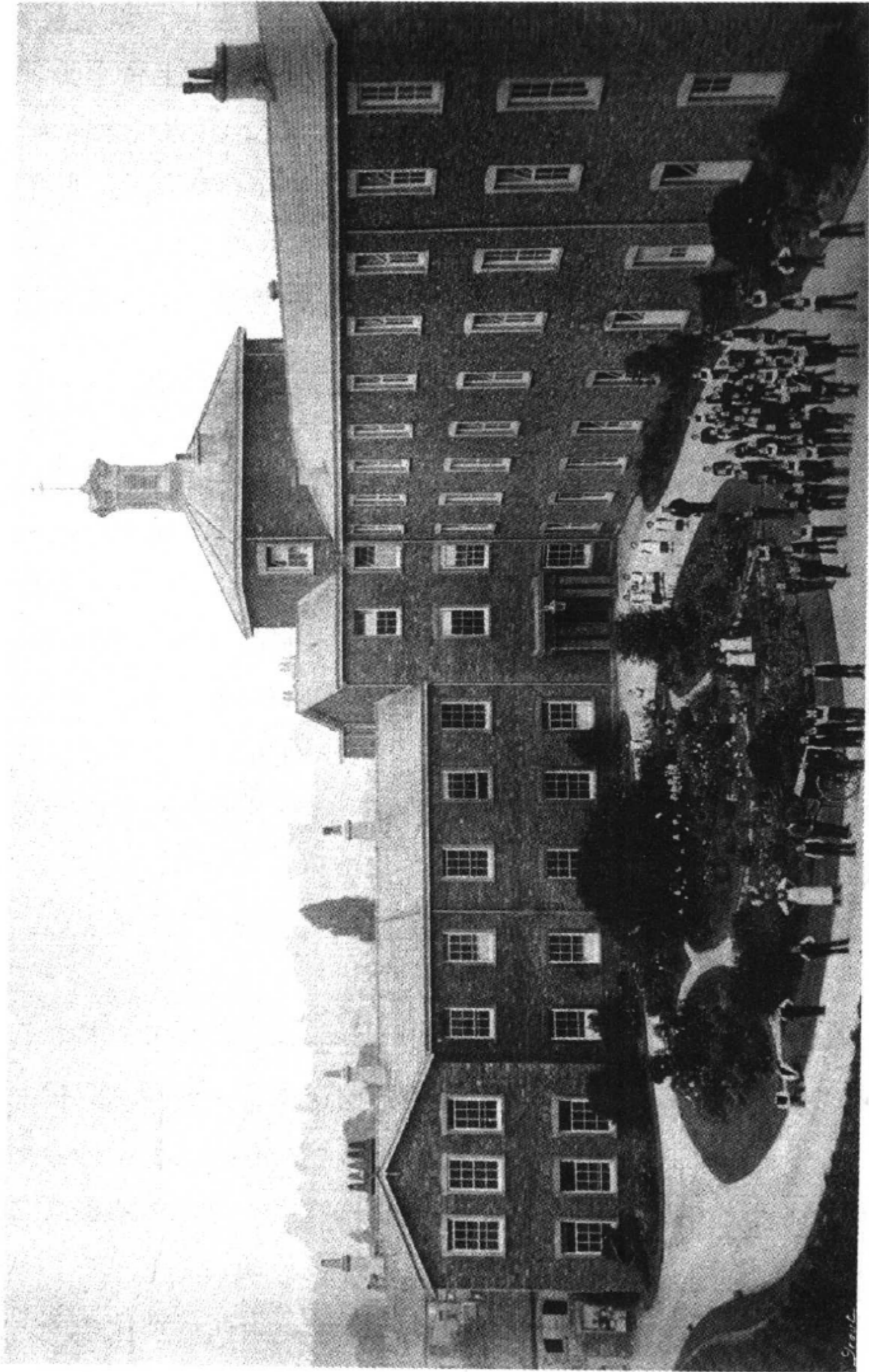
1849 年 2 月，在第一个孩子入住新孤儿院之前，慕勒花长时间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同时祈祷全部的资金到位。结果 1,500 英镑送到了，多半来自两个巨大的捐赠。

“一位来访者想要见您。” 2 月 11 日早上，有人告诉慕勒说。

在他们互作介绍后，来访者说：“我一直想在我的遗嘱中将钱留给你的事业，但是我现在决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把钱给你。我特别渴望我的名字不被人知，所以不能写一张支票，即使我的银行也不晓得我的捐献，这是现金。”

来访者将 2,000 英镑现金交给慕勒。

慕勒写道：“当我接到这笔钱的时候，简直不能描写我在上帝里面的喜乐。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激动，能够立即从事我



1号孤儿院

的其他工作……无法表达的是我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就这样，在这 1195 天的时间里，我上千次的祷告，都完全蒙上帝垂听。”这份礼物使慕勒能够满足新孤儿院的所有开支，并且还余下 60 英镑。为建这个新孤儿院，他总共收到将近 16,000 英镑，其中包括将近 70 英镑是卖孤儿院地里的青草和草根土所得，还有 750 英镑的利息。慕勒认为要做一个“钱财的管家，上帝把它托付给我，我应该好好投资，使它真正派上用场。”

1849 年 6 月 18 日，礼拜一，威尔逊街激动非常，孩子们准备搬进阿什利顿。当他们第一眼看到这宏伟建筑的时候，简直使他们大吃一惊。小鸟在歌唱，牛群在田野里悠闲地吃草，越过溪谷是斯泰普尔顿的风景，他们尽情地享受着一切。一走进新家，甚至刚刷过的油漆和新近擦过的木制品还散发着清香，整个新家宽敞明亮，通风也好。到礼拜四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教师和工作人员都搬进来了。140 个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礼拜六，慕勒报告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房子已经按照设计的标准建立起来了，其他的事情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展了。”

在第一个礼拜里，慕勒带领一位来访者参观新孤儿院。

“这些孩子一定会消费好多粮食。”

他一边说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银行的纸币，总共有 100 英镑。同一天晚上，一大木桶的蜜糖送来了，还有六只糖面包。一个制桶工人免费为孤儿院做了两个大桶用以装蜜糖。第二天，10 英担的大米送来了。慕勒说：“孤儿院在威尔逊街总共 13 年零两个月，我们的信心经历了许多长期艰难的试炼，从离开威尔逊街起，上帝使我们相对的富足，为此，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

一个月以后，一个助手告诉慕勒说：“约翰·纳尔逊·达比在楼下等你。”

会见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进行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不得而知。以下只是根据慕勒的记录：1点差10分钟的时候，慕勒来到达比所在的房间，然后两人握手寒暄。

达比说：“现在，因为你已经审理了牛顿的小册子，我们不能合一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我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了，因为1点钟我有一个约会，因此，现在不能切入到这一主题，在过去的整个事件中，你做得有点过分，许多事情必须经过调查，我们才能再一次真正地合一。”慕勒回答说。

听到这些，达比起身告辞。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相见过。达比后来否定慕勒会谈记录的准确性。很显然，达比对此事件的看法没有任何记录。今天弟兄会的领导人之一，F. F.布鲁斯(Bruce)教授这样评价说：“如果慕勒的回答多一点谦和，也许能挽回这永不会重来的机会。正像慕勒一样，达比也有他自己民族的特性，少一点刻薄的回答，他的爱尔兰人的冲动性也许会被感化。”

现在，慕勒每个礼拜都接受五到八个新来的孩子入住，到1850年5月，阿什利顿的孤儿院每天都有300多人在那里就餐，其中包括30多位工作人员。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一队队的来访者被带领参观新孤儿院。

一个参观者在回忆中记道：两点钟刚过，各行各业的许多人在大门口集合，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小走廊里，从那里经过一段石头台阶和一个花园，我们便被带到中心建筑

的一个宽敞的大厅。来访者在那里等待导游。大厅是一个标准的四方形，四角有宽大的窗户，透过窗户，我们看到巨大的铺有沥青的活动场地，上有小棚遮盖，为孩子们阴雨天使用。我们看到适合孩子们玩耍的院子，在两三个大一点的女孩的照料下，几个小孩子正蹒跚学步。另外一个院子供女孩玩耍，第三个供男孩子玩耍。透过第四个窗户，能看到刚才走过的那个花园。

我们的导游进来了，带领着这期间聚集的四五十个人，我们首先进入幼儿娱乐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一帮小孩子，正在保育员的照顾下玩耍，房子的一边排列着许多婴儿床，当小孩子们玩累的时候，可以躺在上面休息。

在一个房间里，大约有 12 个男孩，正在一位女士的指导下，安静而又忙碌地缝制袜子。他们引起一帮来访的妇女的极大兴趣，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被那位女士的工作热情所折服，一根线上来，一根线下去，缝制得相当完美。这些男孩子，有的将来可能在海军服役，有的也可能移民到海外，在如此环境下，我们很难估算学习这种简单却又必要的技术的价值。在这个国家里，即使相当有经验的学徒工，也承认这些孩子比他们略高一筹。无论如何，我们钦佩他们注重实践的智慧，即使在缝制袜子上，都坚持用最好的方式教学。在少儿部，有像鸽子洞式的小橱，当玩具玩过后，便放在里面。他们放置得整整齐齐，几乎每一个玩具都有说明书，就像一般的商店所提供的那样。

我们观察到盥洗室，配有浴室，在墙壁上，挂着每一个小孩子的小盒子，都标着号码，盒子里有梳子和发刷。很显然孩

子们得到了最严格认真的关爱，以确保个人和衣物的彻底清洁。同时也防止每一个婴幼儿、青少年在与别人接触的时候产生摩擦。

走遍整个使人倍感兴趣的孤儿院，完全没有一个孩子在穿着和脸色上显得贫穷，这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女孩的头发总是漂亮光滑，就像总有妈妈关爱着一样，面对来访者总有高兴的神情，在那稚嫩的脸上，总有会心的微笑。这一切毋庸置疑地表明，从院长到工作人员行动的源泉是爱，统辖并充满孤儿院的管理精神是仁慈的爱的约束。实际上，难以置信的是，每个部门的管理都切实可行，每个人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并且都极好地胜任，为了孤儿院的缘故，每个人都用忘我的爱心来工作。

虽然慕勒现在照看着 300 个孩子，但他仍有一个很长并且增长很快的要求入住的名单：1850 年 12 月，名单达到 78 人，到 1856 年，几乎达到 850 个。即使不让一个孩子入住，他都感到很痛苦。

当时在英国还没有哪一家孤儿院像慕勒这家一样，只要符合基本的孤儿身份条件即可入住。要想进入其他大多数的孤儿院，对真正贫穷、失去双亲的孤儿来说，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异常困难。他们采用的让捐款人投票的方式，使真正贫穷的孤儿很难入住，因为他们通常没有获得必要的投票权所需的时间或金钱。但在慕勒的孤儿院，这一切统统不需要，只需向慕勒提出申请，无需金钱、赞助者也不需要投票表决。确实贫穷的孩子，不用有影响的人，不用朋友，不用花费，不管他住在英国的任何地方，也不管他的宗教背景如何，只要有人代表失

去父母的孩子提出申请，只要孤儿院还有空位，这些孩子就能入住。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些孤儿提供适当的供应。1845年官方出版的一份报告说，在英国的监狱里有6,000个孤儿。慕勒写道：“通过上帝的帮助，我将尽其所能，使贫穷的孤儿远离监狱。”

慕勒开始思考筹建一个更大的孤儿院的可行性，那一个要足够大，能容下700人，因此他可以总共照顾1000个孤儿。他听到济贫院的条件，尤其感到痛苦：“我不止一次地从权威部门获悉，那些呆在济贫院里的孩子，因为那里有流浪儿和很坏的青年的缘故，他们都学坏了。因此好多孤儿的亲戚，虽然很穷，不能供养他们，也打消了让他们去济贫院的念头，以免他们学坏了。”

1851年1月，他收到了给孤儿院的最大一笔奉献，他这样记着说：“3000英镑。这笔捐款像从天上来的声音，向我述说着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对于再扩建孤儿院这个问题，我正在寻求上帝的带领。”五个月以来，他一直持续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他写下了八条反对扩建的理由，但每一个反对的理由都外加一个答复，那么就成了八个支持新建这个容纳700个孩子孤儿院的理由。

4月的时候，他收到了一笔捐款，是一个教区牧师、一个副主教还有女皇的一个牧师奉献的。

1851年5月，他最后决定将他的扩建计划付诸行动，他开始祷告上帝为他预备必要的资金，他估计，大约需要35,000英镑。“需要这么大的资金，简直让我暗自高兴，因为要克服的困难越大，上帝得到的荣耀也就越大，凭着祷告和信心，成就

的事是何等大呢！”

8月，他收到了一张500英镑的支票，但是，在前几个月，对于扩建孤儿院，他几乎没有收到大的捐款。1851年夏日的几个月里，一个谣言传得满城风雨，说他手中已有30,000英镑的扩建经费。但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报告。实际的扩建经费还不足12,000英镑。对于谣言，他始终保持缄默，他从不透露资金状况。

“上帝啊，与实际需要相比，你知道你仆人有多么少的资金，但是你知道你仆人也不贸然行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谨小慎微，在密室中等待了六个月后，才说出他的想法。上帝啊，求你怜悯仆人，赐你仆人信心和忍耐的心，如果是你的旨意，请让他速速振作起来，请送来大笔资金，这是他正在期待的，也是他凭信心盼望的。”慕勒这样祷告道。

祷告没有立即得到答复，几个月以来，持续的谣言说他手中已有大量的资金看来影响了捐献者。1852年3月，每日开支的数目已降到不能再低。到了3月16日，除了扩建的资金，手头实际上已没有余钱了。

慕勒正在保罗街自己的家里，等待从阿什利顿来的工作人员取更多的钱。

“亲爱的天父，请准许我不要再从建筑资金中挪用每日需要的开支。”慕勒祷告说。

就在那位助手还没来到之前，他从“一位尊贵的太太”那里收到15英镑，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慕勒收到了不足1000英镑，他拿出200英镑作日常开支，600英镑作建设经费，其余的作学校、圣经、宣传品和

宣教的经费。

因为疾病，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新孤儿院里有超过一百多的孩子患猩红热，病得很重，并有五个因此死亡，这是孤儿院历史上最沉重的时期之一。

捐献常常来自远方，一个澳大利亚的牧人，在照看群羊的时候读慕勒的《叙事文集》，便送来了礼物。一个新西兰的小女孩为孤儿院的孤儿们建了一个鸡舍，并将卖鸡蛋的钱送过来。另外的奉献来自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美国、新斯科舍、塔希提岛、加拿大、印度、锡兰（斯里兰卡）、非洲、好望角、土耳其、法国、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等等。

接近 1852 年年底的时候，慕勒祷告特别迫切，祈求上帝给他送来一些大笔的奉献。最后，在 1853 年 1 月的时候，他收到了七个基督徒的集体奉献许诺，他将要收到 8100 英镑。他写道：“19 个月过去了，我每天都在仰望更大的赐福，超过我以前经历的。我有十足的把握，上帝将送来大笔的资金帮助我们，但等待总是漫长的。请看，焦急地等待上帝是何等的宝贵！那些这样做的人又是何等的镇静！……那么我在上帝面前的自夸是徒然的吗？难道这不正显示在任何事情上依靠上帝的宝贵吗？”

6 月 13 日，礼拜一，流动资金只有 12 英镑了，各个方面又都需要钱。那时，一个礼拜需买 10 袋面粉，还需要 4200 磅的燕麦，4 英担的肥皂，除了一个礼拜大约 70 英镑的固定开支，还有好多的修理工程，因此雇用了一些工人。除了以上这些，上一个礼拜六，慕勒发现供热系统出了一个毛病，维修大约需要 25 英镑。

那天早上，当慕勒离开保罗街爬向小山朝阿什利顿走去的时候，他边走边开始祷告。

“上帝啊，今天是礼拜一，通常没有什么送来，但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能将我们所需要的送来。”

当到达孤儿院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发现一张 300 多英镑的支票。

内心的喜乐简直无法形容，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长时间，喜乐和感恩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向脸颊。因他的美善，赞美尊荣上帝，为了他的圣工，重新将自己身心献上。上帝如此帮助我，我所经历的慈爱没有比这更多的了。

1854 年 1 月早些时候，他收到了一笔更大奉献的承诺，这一次超过 5000 英镑。一年以后，他从一位基督徒朋友那里，又得到将近 6000 英镑的承诺。这几笔大的奉献，使他的二期工程的开工日期更近了。

一段时间以来，慕勒一直在思考不再建筑一个能容纳 700 人的巨型建筑，这是他原来的设想。现在他觉得建两个更好，一个容纳 400 人，另一个容纳 300 人。因此，他丈量了一期工程每边的土地，判定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他找了一位建筑师，勘定了一下地形，并为两个建筑设计了草图，进一步证实这个工程是可行的。

于是，慕勒决定在第一期工程的南边，即刻开工建造能容 400 个女孩的二期工程。5 月间，建筑工人在工地上挖了四口

井，工程开始了。那些想入住的孤儿的名单现在已经达到 600 个。

1856 年 2 月，慕勒收到了另一笔 3000 英镑的大宗捐款。3 月，另外的 4000 英镑也已经到位。

不曾向任何人伸手，慕勒却如此成功地筹集到数目巨大的款项，人们对此提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解释。有人说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有人认定慕勒一定拥有某一个秘密财富。但是，一般认为那是慕勒出版的年度报告的结果。慕勒机智地回答了这些说法。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自然会妨碍被托付予这么多的钱，而不是引诱捐助者给予。至于说新奇地获得钱财，已经早就不再新奇了。因为现在是 1856 年 6 月，而我们的事业开始于 1834 年 3 月。至于说我通向秘密财富，这一假设比反对者更值得注意，因为上帝的财富当然取之不尽，我确实通向那里，确实从那里支取，虽然仅仅这一个而已，但我仅仅借着祷告和信心，从这事业之初，已经支取 113,000 英镑了。

至于对年度报告的异议，说所有的钱是通过它筹集的，慕勒这样回答说。

编写年度报告并没有什么异常。公共机关都这么做，但是，通常的抱怨是没有人读年度报告。我们的年度报告并没有文字渲染使人惊奇，也没有故弄玄虚。只是简单地

列出事实。年度报告并不是向个人申请捐款，只是送给捐款者、盼望得到的个人或出售。如果这些年度报告产生效果，是其余的报告所没有的，我只能把它归功于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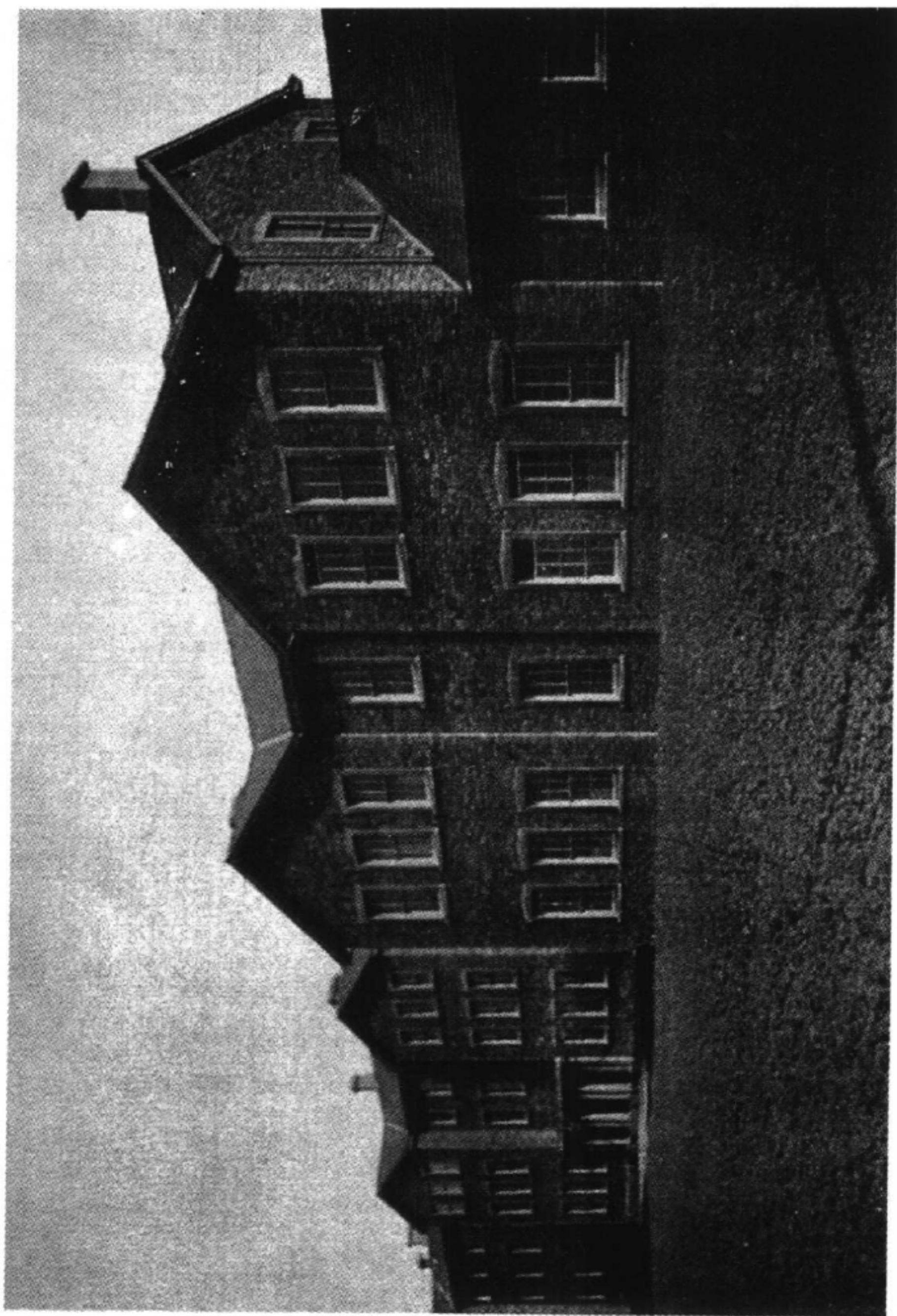
……我们毫不怀疑上帝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年度报告作为工具，以此带领人们用钱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处于需要相当数量钱财的境况，甚至需要几百英镑，可是却没有来源。我天天都恳求上帝，通常一天好多次，求上帝用钱财供应我们。求上帝向他亲爱的孩子心中说话，用基督的爱激励他们，将上帝托付给他们的钱财用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我们就这样过来了。我从未怀疑过，上帝一次又一次地藉着圣灵在读过或听说过年度报告的人心中做工。但是，不管我们是通过年度报告得到供应还是与它无关，两者都是上帝为我们做的……

1856年10月11日，一封信送到了慕勒门前的石阶：

亲爱的先生：

您为贫穷的孤儿和全人类做的牺牲，我深表敬佩。我认为当为您自己提供一些供应。先奉上100英镑作为启动资金，我也盼望更多善良的基督徒会陆续为此添加，为了您和您全家的生活，建立一个基金，因此，我希望您将这钱作为启动资金。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工作，正像迄今为止，他一直祝福您事业的各项工作一样。

慕勒将这封信看作是一个诱惑，会让他依靠别的东西而不



2号孤儿院

是上帝自己，于是他这样回信：

亲爱的先生：

对您热情洋溢的信，我深表感谢。同时告知，您 100 英镑的支票也平安收到。

我没有任何的财产，我的太太也没有，在过去的 26 年里，我作为牧师，我从没有一先令的固定工资，作孤儿院的院长及国内外圣经知识社等别的工作也是如此。当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便跪在地上祈祷上帝，上帝便高兴地将我需要的给我送来。上帝感动某人和他人帮助我。因此在过去的 26 年的时间里，我的需要都得到充足的供应，我可以这样说，愿颂赞归于上帝，我不缺少什么。我的太太和我唯一的 24 岁的女儿，也有跟我同样的心志。有这种蒙福气的生活，我们从不疲倦，我们一天天更确信必蒙赐福。

为我和太太及女儿的生活作预备，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当我看到有需要的人时，譬如一个年纪老迈的寡妇、一个病人或一个孤苦无助的孩童，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上帝给我的钱用于他们。我深信无论是我自己，或者我的太太或我的女儿，在任何时刻，确实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上帝都会丰丰富富地偿还那给穷人的部分，认为那是借给上帝的。

基于这些原因，我不能接受你善意的 100 英镑礼物，来为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作准备，因为这是我对你来信的理解。任何给我、不是我索要的东西，是那些心里想帮助我个人和家庭开支的，我感谢着领受；任何针对我所从事的

事业的奉献，作为孤儿院的管家，我也感谢着领受。但是，你善意的礼物在我看来是特地为我的生活作准备，这事我认为我天上的父亲会不喜悦，因到目前为止，他总是如此丰富地供应我日用的饮食，但如果我曲解了你来信的涵义的话，让我知道你的本意。我将支票原封不动，等待再一次接到你的信。

同时，亲爱的先生，不管你来信的意思如何，我深深地体会到你的善意，我会每日为你祈祷，无论肉体 and 灵性上，求上帝大大地酬报你。

感激不尽。

乔治·慕勒敬上

两天以后，慕勒收到了回信，在信中说，那 100 英镑用于支持孤儿们。几天以后，慕勒又收到了 200 英镑，还是那位捐助者。

1857 年 11 月，早已名声在外的阿什利顿二期工程顺利开业。在一期工程的正南方，位置恰到好处，有 400 个女孩的房间，其中有 200 个婴幼儿的房间，200 个 8 岁以上的孩子的房间，11 月中旬，第一批孩子兴高采烈地入住。

怀疑者拿不准是否慕勒能供养 700 个孩子，还有他雇用的大批工作人员。这些怀疑该受咒诅，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孤儿院扩大了三倍，简直震惊了世界。

第 14 章

当南风刮起的时候

新孤儿院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都是集中供暖。1857 年 11 月末的时候，一个助手告诉慕勒几个不幸的消息。

“一期工程散热器的锅炉严重漏水。如果不进行维修的话，我们就很难度过冬天。”

锅炉完全被砖墙包围着，如果不拆开砖墙的话，漏水的地方就不能确定。维修可能对锅炉造成更大的损坏。八个冬天过去了，都没有问题，这次出了毛病，完全出乎预料。慕勒坚定地认为如果不进行任何修理，只是说“我相信上帝会看顾这件事的”，这完全是一个草率的猜测，不是信靠上帝，而是虚假的信心。因此，锅炉需要赶快修理。

“我担心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们在冬天挨冻。”慕勒对他的助手说，“一个新的锅炉需要几个礼拜才能安装，目前使用的这个能修理吗？”

“还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先花几天的时间先把砖墙拆开，找出问题的所在。”助手回答说。

“我们临时能用气炉吗？”

“我们不能从照明系统中腾出足够的气源，来给那么多需要的炉子加热。”

“我们能用‘阿诺特炉（Arnott）’吗？”

“那也不合适，因为‘阿诺特炉’需要很长的烟囱把烟抽走。”

“不管解决的办法如何，不能让资金成为我们的拦路虎，我宁愿花几百英镑，也不能让这些孩子们受冻。”慕勒回答说。

慕勒决定让人把砖墙打开，察看损坏的程度，是否能够修理以使他们安全过冬。他决定下礼拜三让工人过来，并作了必要的安排。他知道工人过来的时候，锅炉里的火必须要熄灭。慕勒做好安排后的第二天，冬日里第一个真正的冷天开始了，刮起了萧瑟的北风。那是12月初，慕勒跪下祷告。

“上帝啊，你知道我不能停下修理锅炉的事。亲爱的天父，我向您祷告两件事情。你愿意将北风变成南风吗？您愿意使工人专心做工，就像当年你使尼希米只用了52天便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修好，‘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吗？”

礼拜二的晚上，在工人约定的时间到来之前，北风依旧，但是就在礼拜三，正像他所祷告的，南风刮了起来。天气是如此的暖和，根本不需要生火。工人到达了，按指示的去做，拆开了砖墙，找到了锅炉漏水的地方，开始修理。

礼拜三晚上大约8点半，慕勒正要回家的时候，在阿什利顿孤儿院的门卫室，他被叫住了。

门卫告诉他说：“生产锅炉的老板已经到达，来查看维修的情况如何，看看是否能加快速度。”

慕勒立即回到一期工程的地下室，见到老板并了解维修的进展情况。

老板说：“工人今晚要工作到很晚，明天一大早就赶过来。”

工头说：“我们更愿意彻夜工作。”

慕勒想起了他祷告的第二部分，上帝一定给了这人“专心工作的心志。”

第二天早上，那人完成了维修，克服了好大的困难堵住了漏水，又用了30多个小时重修砖墙。最后，他们在锅炉里重新点火。

在整个维修过程中，一直是温暖的南风拂面。

为第三期工程的奉献仍源源不断地送来：刚刚进入1858年，慕勒收到了3000英镑的一份奉献，另外两笔奉献分别是800英镑和700英镑。这些和另外同样的奉献意味着慕勒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开始第三期工程。9月，在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道路的另一边，慕勒买了11英亩半的土地，因为地皮很大，他决定建三期工程，可以容纳450个孩子。这将意味着他要照看1150个孩子。他现在需要几千英镑的追加资金。12月，一个玻璃生产商告诉他，他将免费提供三期工程350个窗户的所有玻璃。1859年1月初，慕勒收到7000英镑，他从里面拿出4000英镑作建设基金。

1859年到1860年间，奉献源源不断，还包括许多用于建筑的物质奉献。甚至三期工程正在建设中，还远远没有开放，他又考虑将他的事业进行更激动人心的扩展。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和自我反省，最后他决定在阿什利顿再建两座更大的建筑，能

容纳 850 个孩子，因此，他最终将照看 2000 个孩子。慕勒如此大胆扩张的理由是什么？真有必要吗？

至于说需要，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申请入住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几乎每日都有新申请，有时一天三四个申请。另外，直到现在，慕勒一直专注于帮助女孩子而不是男孩子。他说：“女孩，在性别上是弱勢的，与男孩相比，被遗弃得更多，如果忽视她们的话，更容易堕落。我们可以适当地把她们养到十八九岁。”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收的女孩比男孩多得多。慕勒继续说，“但是现在，我正在考虑是否为男孩也做更多的事情，如果可能，当女孩被接纳的话，尽量避免一个家庭的男孩子被拒绝。”

入住英国其他孤儿院的机会仍是不够多的，他们的入住政策很挑剔。慕勒说：“即使里面还有空余的地方，仍然不能入住，现存入住政策是由投票决定的，大多数的孤儿院都是这样。因此，那些赤贫和大多数贫穷的人，想入住是很困难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曾有一次我为几个孤儿提出申请，他们的母亲是寡妇，她试图为没有父亲的孩子获得申请的投票，竟然被淘汰，一天，她回到家里，因为讨论选票过度劳累，坐下便死了。”对这些贫穷的孩子来说，唯一的选择是继续进济贫院。

在慕勒开办孤儿院之初，被慕勒接纳的许多孩子，甚至是青少年，当他们刚来到孤儿院的时候，一点也不能读写。慕勒报告说，他们深深感到“教育数百人的喜乐，为了造就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还教他们各种各样对生活有益的东西。”但是，他继续说，“我们从不满足于他们身体和智力的增长，在我们的评估中这一切占的分量很少。如果他们灵命上没有增

长的话……这一祝福已经托付给我们，不是仅仅关于 20 或是 50 个孤儿的事，而是关于数百个孩子的大事。”

回顾将近 30 年来的工作，慕勒对扩大他的事业信心倍增。日益增长的管理工作可能会出现小小的问题。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慕勒已经拥有三个专职的私人助手，把他从众多的来往信件、账目清算等等中解放出来。他可以根据需要招聘工作人员。但是要照顾 2000 个孩子再加上工作人员的开销是巨大的。孤儿院两期工程和必要的土地就花去了大约 5 万英镑。

人们会说：“你如何能维持这项事业，如何得到供应完成这项建筑并支付一年接近 35,000 英镑的经常性开支的呢？”

慕勒回答说：“当我自然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会感到这一切的压力，我不是一个狂热者，正像许多人对我的了解，我是一个沉着、冷静、精打细算的商人，因此，如果自然地看待这些问题，我应该完全被压垮。但是从这整个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凭信心而行，凡事单单仰望永活的上帝，对于打算扩建的建筑也是如此。不管是土地、钱财和一切所需要的，我单单仰望上帝的帮助。对将要遇到的困难，我已经仔细考虑了几个月，对每一个困难都衡量再三，但是靠着上帝，把每一个困难都放在一边。”

慕勒一开始从事他的孤儿院工作的时候，就表明了通过信心可以达到的目的。

我总的初衷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通过给予一个实际的示范，仅仅借助于祷告和信心，就能达到所要成就的，从而惠及基督普遍的教会。使这个疏忽的世界看到上帝的真

实，通过上帝自己的工作，使他们看到永活的上帝与 4000 年前一样，仍是永活的上帝。我的这一目标已经大大地实现了。许多的罪人因此而悔改，通过这一工作，世界各地许多上帝的孩子受益。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期目的。但是这工作做得越大，祝福也就越大，并以我所期待的这种方式倾倒下来。因为成百上千人的注意力已经被这项工作所吸引，并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视察。这一切都迫使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更上一层楼，以此带给上帝更大的荣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么贫穷的人，仅仅借着相信上帝，通过祷告可以成就大事。因此，上帝另外的儿女，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环境中，可以被激发更加地信靠他，因此我将继续扩大规模。

1861 年 5 月末，慕勒宣布了他想扩大规模以照顾 2000 孩子的想法。可是到年底的时候，收到还不到 1000 英镑的建筑基金，而四期、五期工程需要的资金是 50,000 英镑。慕勒按这样的速率计算，大约需要 25 年的时间，才能凑够所有的建筑基金。但是他并不灰心，单单信靠上帝。

1862 年 1 月 11 日晚上，为他带领的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建筑基金，慕勒在阿什利顿祷告了数小时。当他到达保罗街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张 2000 英镑的支票，并附有下面的便条：

兹附上 2000 英镑的支票一张，以表达我对上帝由衷的感谢和挚爱，因上帝厚赐一个关心孤儿的亲密同工。很盼

望这钱用于您所打算的也是上帝喜悦的新建筑。我想为每座建筑奉献1000 英镑，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由支配。因为是为上帝做的，我知道这钱将用得合宜。

三天以后，他又收到 2000 英镑。两个礼拜以后，他又收到 2500 英镑。需要 25 年才能开工的四期、五期工程看来要缩短了！

1861 年初夏，汤森（Townsend）一家搬到布里斯托尔。约翰·汤森帮助慕勒在布里斯托尔的主日学工作，他们成为知己的朋友。当汤森一家搬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汤森的女儿阿比盖尔（Abigail）还不满三岁，但是不久便喜欢上了慕勒。常常在阿什利顿，也在保罗街与慕勒和玛丽在一起。从父母那里听到关于上帝供应慕勒和孤儿院孩子们的方法，她感到很惊愕。

“我也想与乔治·慕勒一样。”她常常这样说。

一次，她在保罗街说：“慕勒叔叔，我很想让上帝垂听我的祷告像垂听你的祷告一样。”

“亲爱的，上帝会的。”

慕勒将阿比盖尔抱在自己的膝盖上，重复着耶稣的应许：“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圣经·马可福音》11 章 24 节）。”

“那么，阿比，你向上帝要什么了呢？”慕勒问。

“一些毛线。”

她的两个小手紧紧地扣在一起，慕勒说：“现在，你跟着我说：‘请上帝给阿比一些毛线。’”

“请上帝给阿比一些毛线。”

阿比盖尔高兴地从慕勒的膝盖上跳下来，冲到院子里玩了起来，她相信毛线就要到了。

然后，她又记起上帝不知道她要哪一种毛线，因此又跑回慕勒的身边。

“我想再祷告一次。”

“可是，亲爱的宝贝，我现在很忙啊！”

“但是我忘了告诉上帝我想要的颜色。”

慕勒又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说：“是的，孩子，总应当明确，现在告诉上帝你想要什么。”

“亲爱的上帝，请给我一些彩色毛线。”阿比盖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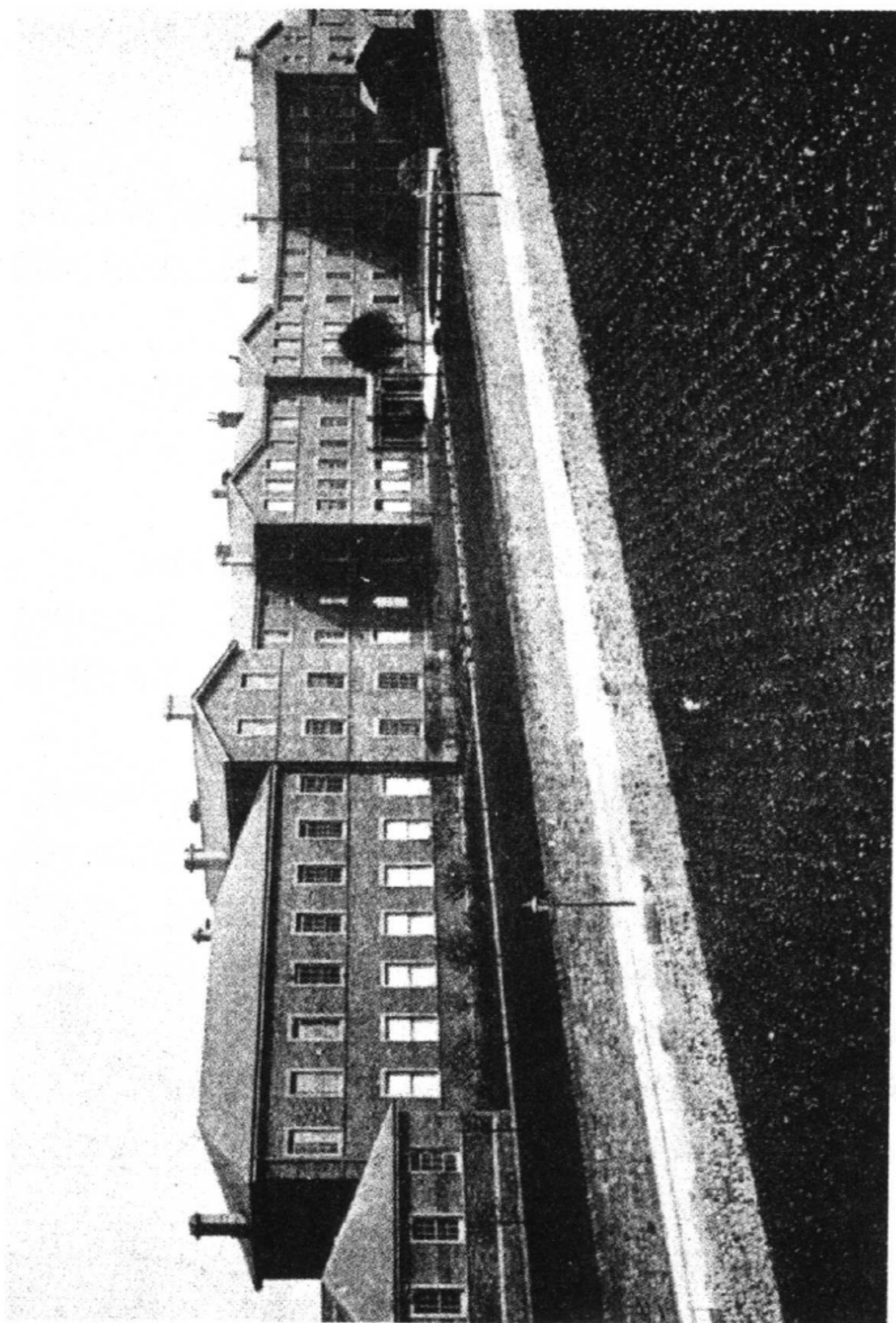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一个包裹到达了，收件人写的是阿比盖尔，里面是好多的彩色毛线。她的主日学老师，记得她的生日快到了，虽然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只记得她喜欢编织，便买了一些毛线给她送来了，虽然不是生日的那一天，但正是时候，向她证实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

最受欢迎的慕勒的轶事之一也是关于汤森·阿比盖尔的。这个故事在慕勒的日记中没有记录，但在一个短篇传记《阿比盖尔姐姐的奇遇》中有所描写。

一天早上，天还很早的时候，阿比盖尔正在阿什利顿的花园中玩耍，忽然慕勒走出来，拉着她的手说，说：

“走，看看上帝将为我们做什么。”

慕勒带着阿比盖尔进入一个很长的餐厅，桌子上摆着盘子、杯子和碗筷。按照记录（在被记录下来之前，这个故事可能有所歪曲），除了空盘子以外，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孩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吃早餐。



3号孤儿院

“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们必须按时到校。”慕勒说着，便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为你将要给我们的饮食，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然后，他们都听到敲门声。面包师站在那里。

“慕勒先生，昨天晚上我难以成眠，似乎感到你们早饭没有面包，上帝感动我给你们送些来。因此我两点就起床了，烤制了一些新鲜的面包，现在我带来了。”

慕勒非常感激那位面包师，并为上帝的关爱献上赞美。

“亲爱的孩子们，”他说，“我们不仅有面包，而且还是新鲜的面包。”

紧接着他们听到第二次敲门声，这一次是卖牛奶的人。

“慕勒先生，我送牛奶的车在孤儿院外面坏了，我很想把这些桶装的鲜牛奶给孩子们喝，以便我能够倒空马车再加以修理。”

慕勒向那位送牛奶的人道谢后，孩子们便享用他们的早餐。

由于建筑方面的一些延误，阿什利顿的三期工程直到 1862 年 3 月 2 日才得以开工。那是慕勒在阿什利顿建立起来的最大建筑物，一直保留至今。因为它的位置最为突出，因此成了布里斯托尔市的标志性建筑。一位住在霍尔高地的人，一看到阿什利顿便说：“每当他对永活的上帝产生怀疑的时候，他通常起床，透过黑夜看到阿什利顿点着灯光的许多窗户，在茫茫的黑夜中闪烁，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但是，现在等待入住的名单将近有 1000 个，慕勒渴望应该有更多的星星闪烁在阿什利顿。1864 年 10 月，一个 5,000 英镑的捐款使得建筑基金超过 27,000 英镑。慕勒着手购置土地以建

筑他的四期工程。几年来，他就看中了一块土地，也在阿什利顿路，与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同侧。在三期工程的对面。这块地皮大约 18 英亩，在地皮的一端有小房子和厕所，靠近赛夫顿 (Sefton) 公园路与阿什利顿路相交的地方。慕勒祷告了上百次，求上帝使他能在这一地方建起两个大的孤儿院。

现在他有足够的钱建筑四期工程，他见到这块土地的代理人，问他这块地是否出售。

代理人回答说：“可以出售，但要等到 1867 年 3 月 25 日。”

对于这一消息，慕勒并不灰心。借着祷告，他期望与租户达成调解，劝说他早一点出让给自己，慕勒给他合理的补偿。但是另外的两个难题出现了：首先，地的主人要价 7,000 英磅，慕勒认为价格太高；第二，他获悉布里斯托尔市水利工程公司计划在那一地方建造另一个水库，这一结果正报请市议会批准通过。

针对这三个难题，慕勒一天做几次特别祷告。然后，他去会见布里斯托尔市水利工程公司负责这一水库的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告诉他说：“修建水库只占用很小的一片土地，不足以妨碍你的计划，如果其他地方可用，如有可能，我们将尽力不占用这块地方。”

慕勒如释重负，然后去拜见租户，他希望在 1867 年 3 月租期到达之前就买下这地。

“我非常希望，”慕勒补充说，“我们用愉快并友好的方式解决此事。”

“请给我几天的考虑时间。”租户回答说。

当租户在考虑的时候，慕勒祷告上帝。一个礼拜之后，他

第二次造访租户。

“我不希望阻挠这地用于此美好的目的，”租户回答说，“但是我在这块地上投入了好多钱，因此对于早早离开这里，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赔偿。”

“我会充分准备并乐意那么做的。”慕勒回答说。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现在慕勒不得不处理最后也是最困难的问题：这块土地的要价问题。他迫切的祷告加上他精明的商业意识合为一体，就像我们看慕勒一样，他是一个典型的强硬的谈判高手。他深知这块地对他的孤儿院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他认为这不能与市场价相提并论。

“亲爱的天父，”他祷告说，“你愿意感动土地的主人接受比他现在的要价低得多的价格吗？”

他拜访了土地的主人，礼貌而强有力地告诉他为何不相信主人的要价，他们谈了一会儿，土地的主人沉默了几分钟。

“不是原来的要价 7,000 英镑，我想要 5,000 英镑。”那人说。

慕勒接受并同意支付这一价格。他知道因为这块地地势平坦，两个孤儿院打地基的时候，可以节省支出。几个月之前刚刚完成的排水管，可以大大方便孤儿院。他可以持续不断地接收布里斯托尔的供气。最后他意识到最大的好处是将来这建筑与另外的三个孤儿院之间离得很近，整个孤儿院指导起来比较容易。布里斯托尔再没有任何土地具备这样的优势，虽然他脸上没有表示出来，慕勒捡了个便宜。

“是仁慈的上帝特地给我们的。”慕勒这样认为。

一个年轻的宣教士，雅各·戴德生·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于 1865 年 8 月造访了阿什利顿，那里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从他最早的基督徒生活中，戴德生·泰勒就被慕勒的榜样所鼓舞。现在，虽然只有 33 岁，但在中国已有六年的经验，用慕勒孤儿院同样的原则，他创办了自己的宣教组织，对于布里斯托尔这位属神的人，戴德生极为看重他的祷告、判断力和建议。

8 月 22 日，他带领一帮年轻的新的中国内地会成员到达阿什利顿，他在日记中记录道：

我们与慕勒在一起一小时，他针对呼召和宣教、连贯的读经、祷告和对上帝的信心、障碍及艰难险阻等，谈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第二天戴德生这样记录说：

慕勒先生说，为上帝做工必须与上帝有好的沟通，不要盲目做事，要坦诚地与人交往，在中国人面前，我们宣教士之间不要说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最后他答应为我们祷告。

当慕勒带领这些年轻的宣教士在三个孤儿院参观的时候，他们看到幸福、健康和穿着整齐的孩子们，他们沉思慕勒答应为他们祷告的价值。因为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中国内地会的发展，慕勒的实际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 15 章

难以形容的幸福

“那天早上，我正朝阿什利山走去，”一个农夫说，“正巧碰上慕勒先生朝城里走去，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悠闲自在的绅士，静静地走在路上，举止安静而庄重！《圣经·诗篇》23 篇的内容好像都写在他的脸上。”

1865 年，慕勒已经 60 岁了，正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健康状况远比二三十岁时好得多。阿瑟·塔潘·皮尔森（Arthur Tappan Pierson），美国的圣经教师，对慕勒先生十分了解，他写道：

他身体又高又瘦，总是穿着整洁，腰板挺直，脚步坚实有力。他的面容非常平静，给人一种铁面无私的感觉。但习惯性的微笑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他的举止是那种单纯的礼貌，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会感到是微不足道的，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权力和威严的神态，仿佛在提示说他是一个天生的

王子。然而与这一切糅合在一起的是他孩子般的单纯，甚至孩子们跟他在一起，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他讲话的时候，从没有完全丢掉他那独特的外国人的特质——就是口音问题，他总是慢条斯理，口齿清楚，就像有两个表安装在他嘴唇的门上一样……

那些不甚了解他的人，仅从他严肃的神态来看，可能认为他缺少幽默感。但是，他既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对有幽默感的好故事也不乏天真无邪的欣赏，并且他还特别喜欢这样的故事，这似乎对于完全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习惯于严肃而庄重，但也喜欢没有污秽的玩笑，因这种玩笑对别人没有什么伤害。对那些他熟悉和爱戴的人，他表现出他的幽默和诙谐。就像在埃弗瑞山谷（Ilfracombe），他和太太还有别人登上最高峰，俯瞰大海，他稍微走在大家前面，坐下休息，直到大家跟了上来，然后他站起来，平静地说：“现在好了，我们休息好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慕勒喜欢埃弗瑞山谷，他喜欢沿着港湾漫步，在那里，开普斯顿山（Capstone）挡住了吹来的海风，他更喜欢在悬崖上的古城里探险。然后，如果天气晴朗，他喜欢带着他的家人登上那环绕半个古城的树木茂密的群山。

1865年9月，他再一次来到埃弗瑞山谷休养。9月4日的早上，他和太太以及女儿丽迪亚爬上了开普斯顿山，从山顶下来的时候，两个人向他们走来。

“对不起，请问您是慕勒先生吗？”其中的一个问道。

“正是。”

“我想为那些孤儿奉献点钱。”

“为什么你不跟我在那台阶上坐一会儿，那样我们可以谈得多一点？”慕勒回答说。

“我住在大山脚下，是一个商人，可以称得上是非常辛苦的商人，前些日子，一份你们的年度报告落到我的手中，但是，坦白地说，对您仅仅凭着祷告就能得到孤儿院的资金，我不太相信，并对此很怀疑。然而，为孤儿院那些孩子奉献点钱的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脑海中出现。

“于是，当我正在思考是不是上帝真的与您同在，是不是您真的仅仅靠祷告就能筹得这么多资金的时候，我听说某一房地产要出卖，如果价钱公道的话，我很愿意买下。我仔细察看了一下，又找了一个有法定资格的商人对此进行了评估，他告诉我物超所值。于是，我带着一种怀疑的口吻，自言自语说：‘现在，我将看看上帝是否与慕勒同在。如果我花比实际的价格低的钱得到这份地产，我将给慕勒先生奉献 100 英镑。’

“于是，在离我很远的拍卖会上，我委托一个人为我喊价，这份地产将在那次拍卖会上被拍卖。但是我非常好奇，很想知道在这件事上是否上帝愿意向您显现。我乘下班火车赶往拍卖会现场，好尽可能早地知道事情的结局。

“令我吃惊的是，我宿愿已偿，正是用我出的较低的价格，得到了这物超所值的地产。我很惊讶，但是，我开始更多地思考您所用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很想知道，我，或者另外的人，也能像您所说的那样，带着问题来向上帝祷告。这件事让我想得越多，我读您的报告越多，越体会到我们所需要的都来自上帝，任何事情都要依靠他，是多么地正确和恰当。

“现在，房产转让书已经作好，一切手续已经办妥，我觉得当兑现我的诺言。于是，我和我的朋友，就是刚才您看到与我在一起的那位，起身到得文郡旅游。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就是在前天，我们拜访了您的家，适逢您不在。我们昨天在布里斯托尔停了一天，晓得了您现在在这里，我们今天就来到埃弗瑞山谷，因为我很想认识您本人。”

慕勒说：“好的，对上帝如此地帮助我，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因为每天我都寻求他的帮助。正是这样，我的祷告都蒙垂听，我们从大多数不确定的、完全陌生的人中得到捐款来从事这项事业。例如，刚才我从 W 城，也就是你所居住的那城里，收到一封律师的信，要求我送他一份留给孤儿们的遗产表格，因为他的一个委托人想留下 1000 英镑的遗产给这些孤儿们。现在，据我所知，在 W 城，我连一个熟人也没有，那个要留下 1000 英镑的人的名字我也不得而知。”

“关于这份遗产，”那陌生人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以前我认为祷告不是那么真实，在我得到这份地产以后，才真正懂得，我一直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您的事工是多么的错误。为此，我决定进一步地帮助你。我自己想，虽然我身体健康，时值中年，但立下遗嘱也是很好的，所以为这些孩子留下 1000 英镑。”

1859 年，医生告诉慕勒的朋友和同工亨利·克雷克，说他的心脏很弱。从 1865 年夏天开始，很显然克雷克的身体极度恶化，他跟慕勒同龄，也 60 岁了。在 1866 年 1 月时，圣·安德鲁大学因认可他的神学论著而愿意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但他两次都拒绝了。克雷克很显然已处在弥留之际。一月间克雷克收

到的信中，有一封来自约翰·纳尔逊·达比的充满深情的信，在信中达比称他为“亲爱的弟兄”，并对他们之间“教会的不合”深表悔恨。

慕勒常常来到老朋友的病床边。有一次，克雷克非常的虚弱，慕勒亲吻了他，然后准备告辞，这时，虚弱得已经不能说话的克雷克开口说：“请坐。”他也暗示妻子坐在身边，虽然不能说什么，但是他能够看着他们。慕勒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

第二天，慕勒感冒了，只能呆在家里几天。就在那几天里，克雷克去世了。时值慕勒和克雷克信主40年。慕勒评述说：“我亲爱的弟兄和朋友现在已完成了他的事业，蒙上帝的特许和恩宠，我还能继续为主做工，但是现在我失去了能常常一起商量的弟兄，只能独自前行。”在克雷克的丧礼上，聚集在毕士大教堂那数不清的人群足以说明，他的去世对教会信徒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1866年5月，孤儿院的四期工程破土动工。1867年1月，又有7,000英镑资金到位，五期工程也开始动工。两期工程合同资金超过41,000英镑。700个窗户的所有玻璃由一个建筑承包商无偿奉献。1868年的盖伊·福克斯节（Guy Fawkes' Day），孤儿院四期工程开门营业了。1870年1月6日，在阿什利顿，慕勒的伟大建筑群中的最后一座“新孤儿院五期工程”也按时开业了。

慕勒在阿什利顿巨大的扩建工程完成了。从他开始宣布建立自己的孤儿院的计划算起，25年已经飞逝而去。但是，现在他决不能坐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停止不前。每天早上，他都是6

点半起床，尔后是通常的读经祷告时间。7点45分，开始处理他的来往信件。然后，正像几年后《时代》所记载的，10点钟，有九个助手在等待他的吩咐和指示。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秘书帮助的时候，他一年得处理3000多封来往书信。

现在，孤儿院孩子们的花费一年总计将达3万英镑。有2000个孩子需要穿衣吃饭，他们的衣服需要浆洗缝补，需要购买和修理2000多双鞋子，每年都有上百个新的孩子来到，他们需要补充新的衣服和鞋袜；数百个大一点的男孩、女孩以学徒工和佣人的身份走出去，也得为他们提供衣帽鞋袜。每一个男孩子离开孤儿院去做学徒工，都得向他的老板支付相当于一年资助的保险费。每当一个孩子离开的时候，都要负责他的差旅费。

要维修和保养有着1700个大窗户和超过500个房间的五座建筑物，粉刷、清洗、美化、维修破坏和损坏之处，成百上千的家什需要修理或替换。这些费用也是非常高的。

当孩子们生病甚至死亡的时候，都需要额外的花费。阿什利顿如此多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个学校总监、女总管、教师、医生、护士等，还有慕勒的私人助手的薪水都靠祷告蒙应允而发放。但是，慕勒记着说：“虽然不像富足的绅士那样舒适，但我们依然能够悠闲自得。仅仅通过我们的贫穷仰望那位拥有万有、无限富足的上帝，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些。”

作为五个孤儿院的指导者，玛丽·慕勒是最理想的妻子。

慕勒常常对她说：“亲爱的，上帝特别为我拣选了你，你是我希望得到的、最合适的太太。”

在1838到1846年最艰难的试炼时期，慕勒有时不得不拿

出自己的钱来满足孤儿院的开支，玛丽从来没有抱怨过丈夫，相反跟他一起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当上帝确实这样做了，正像上帝通常做的一样时，他们常常喜极而泣。

除了良好的全面教育外，玛丽在每一样针线活以及阿什利顿用来缝制衣服和饰品的面料样式和质量方面更是一个专家。她的责任是订购成百上千码各式各样的面料，当面料送来的时候，她将决定要还是不要。每月她都检查所有的账本，核对女总管数百条的账单。据说，在阿什利顿，如果任何一个裁缝或者女总管出了一个很小的差错，玛丽一定都得找出来。几乎每一天她都把时间花在阿什利顿的孤儿院上，对那些生病的孩子，她更是特别关照。

对于自己的婚姻，慕勒说：

每一年，我们的幸福感都在不断增加。在布里斯托尔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我跟妻子不期而遇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满怀喜乐的。即使在孤儿院里，当我遇到她的时候，没有一次我的心不是怦然而动的。每一天，在孤儿院的晚餐或下午茶之前，我们在洗手间相遇的时候，我的心都非常惊喜。她见到我也是同样的高兴。我曾经几千次对她说：“亲爱的，自从你成为我的太太，任何看到你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心神愉悦的。”

另外，日复一日，如果可能的话，在孤儿院晚饭后，我通常来到她的房间，在她的睡椅上坐上二三十分钟。这张睡椅连同一张安乐椅，是一个基督徒弟兄的爱心奉献……我知道，这样对她很有好处，她那纷繁的思绪和闲

不住的双手因此可以休息一会儿。同时，我深深地知道，除了她的丈夫在她身边，她不可能得到休息……我用这最宝贵的时间来陪伴我的妻子，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这已是一个习惯动作。我们用寥寥数语以作爱心交流，或相对无言，这在主里真是极大的幸福，对我们来说，不管是说话还是静默……我们彼此在主里面的幸福，是难以形容的。我们不是每年幸福几天，也不是一年幸福一月，乃是一年幸福十二个月，并且年年如此。我曾经常常问：“亲爱的，你认为在布里斯托尔，乃至整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幸福的吗？”

慕勒认为，他们婚姻幸福的最伟大的秘密之一，除了他们私人的祈祷之外，还有家庭祷告，他和玛丽常常一起祷告。

多年以来，我最亲爱的妻子和我，在早上的家庭祈祷完之后，即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一同祷告，如果那天有重要的事情需要祷告，我们便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有巨大的试炼临到我们，或者我们某一方面的需要特别巨大，我们在晚饭后还要祷告，当我来到她房间的时候……如果处在极度困难或者危急时期，我们在下午可能重复祷告一两次……

然后，到了晚上，在我们就要离开孤儿院的时候，虽然她或者我的工作从来都如此繁多，但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来祷告的时间。我亲爱的妻子来到我的房间，我们开始祈祷、恳求、代求并感谢。通常持续四五十分钟，有时到

一个小时。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把 50 个甚至更多的不同的问题、个人或环境带到上帝的面前。

1870 年时，玛丽·慕勒已经 72 岁了。很显然近一两年来，她的身体逐渐衰弱，她越来越消瘦，很容易疲劳。慕勒总是尽力劝说她要工作少一点，吃得多一点，但却从未成功。有时，玛丽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都不能入睡，慕勒关切地询问她。“亲爱的，”她会说，“我正在变老，老年人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

两年以前，玛丽对慕勒说：“亲爱的，我想上帝将允许我看到新孤儿院的四期、五期工程完工并开业，然后我可以回天家了。但是，我最盼望的是主耶稣回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一同回天家了。”

的确如此，上帝已经允许她看到四期、五期工程的开业。整个 1869 年，她几乎把每一天都花在五个孤儿院中。

令人心酸的是，她工作得太劳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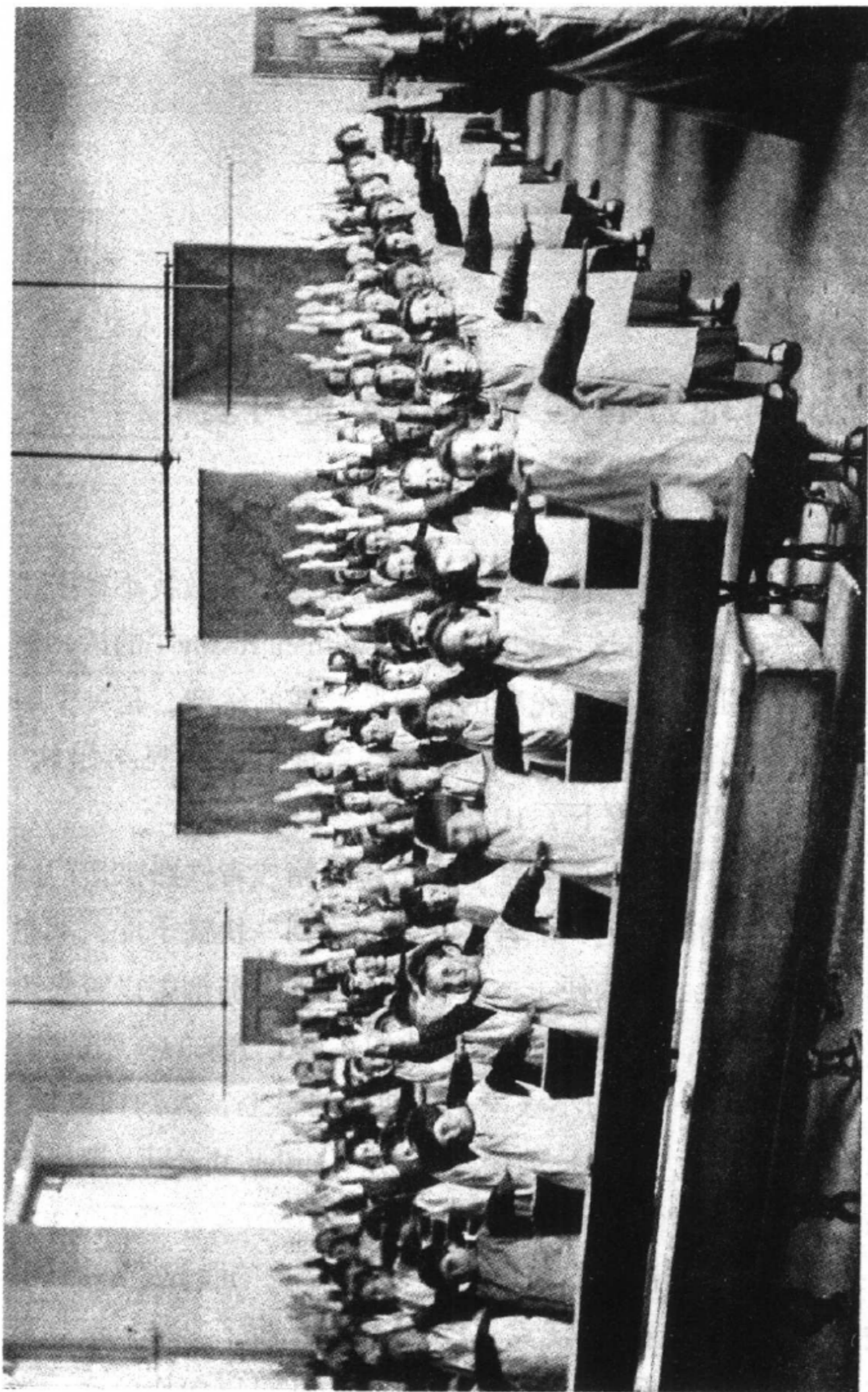
第 16 章

“没有地方看起来比这里更可爱”

“我从来不知道妈妈抚摸我、带我去教堂或者教我小孩子式的祷告是怎么回事。”这是威廉·里德（William Ready）的话，他于 1860 年 1 月 23 日生于伦敦的济贫院。他的父亲，是一个嗜酒成性的人，已无力供养他的妻子和威廉的九个兄弟姐妹，1865 年，父母双亡，撇下了 10 个孤儿。

威廉开始了流浪儿的生活，夜宿垃圾箱或者铁路拱形门的黑暗角落。他后来说道：“许多次，我捡到一块橘子皮，那急切的心情就像捡到了六便士，有时甚至咬着雪茄烟蒂以减轻饥饿的痛苦。有时，我们到小酒吧唱我们在街上学来的喜剧歌曲，通常可以得到多一点的小钱……星期天的早上，大约四点钟，我通常去考文垂（Covet）的公园市场（Garden Market）搬运农产品，我的手脚常常被冻僵。”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872 年，在他 12 岁的时候，威廉·里德被伦敦的宣教士雅各·沃克（James Walk）救了出来。沃克最后安排里德去阿什利顿。里德回忆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当



孤儿院的女孩子在上课前做操

我发现自己在大楼里面，身后是紧锁着的大铁门时，那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幸福。我不能把这些看作我的朋友，因为它干涉了我在街上的自由。门一关上，我便开始感到自己被束缚起来，我非常怀念先前的时光，我思慕都市的街道和伦敦的夜灯。我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一定会对他说：‘谢谢你，先生，你是我的朋友。’”

阿什利顿的工作人员给威廉洗了一个澡，然后换上他的制服——灯芯绒的裤子、蓝色的背心、外套和白色的领结。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被领进食堂时的场面。男孩子都围在他的周围，拧他并拽他的头发。铃声响了，所有的孩子各就各位，坐在饭桌边。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感到不饿！哦，我应该回到老家去，回到车站码头的人流中去！他们将两片面包和一些蜜糖放在一个锡盘子里，摆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你不要一份茶吗？”一个男孩对他说。

“不要！”

坐在他对面的孩子们不一会儿就把他的食物吃完了。

那天晚上，其余的孩子们都奚落他，直到他的爱尔兰脾性发作。他与一个孩子打了起来，然后，一个健壮的家伙，柯里·奥利弗（Curly Oliver）见到这一场面，也急不可待地冲了进来。威廉脱下他的外套和背心，向柯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打得正起劲的时候，一位先生拄着拐杖走了进来，领着威廉来到他的宿舍。

“你的床号是 22 号。”他说。

第二天早上 6 点，铃声响了，孩子们都从睡梦中醒来。8 点

的时候，他们都去吃早餐。饭桌上摆着盛着粥的盆子，威廉没给那些孩子们问他是否吃早餐的机会，他的胃口已经来了。在这次早餐上，威廉第一次听到读圣经。

那天早上的第一堂课是阅读。但是，威廉的老师发现他连字母都不认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老师教威廉准确拼读，他们告诉他关于上帝、基督和救赎的事，他也记住了一些圣经章节。不久他就跟别的男孩子打成了一片，甚至有些时候，还指导一个秘密的学习班，教那些好奇的孩子学习伦敦街头的戏法和杂技。一个老师还发现，对那些能付得起钱的孩子们，他还收他们学费，即一个星期一便士的邮票。然而，当老师发现，那些孩子是自愿付费，并不是出于压力时，也不再言语了。

有一次，威廉领着一帮男孩子冲进了老师的餐厅，黑暗中吃光了老师剩余的晚餐。他被逮住，“按通常教导的方式”被鞭笞，忽然，老师大发慈悲，给他一些糖果。

里德说：“这种方法比鞭笞和传教更能驱逐我心中的魔鬼，用温柔和爱心比惩罚更能使我安静下来，趋于理智和守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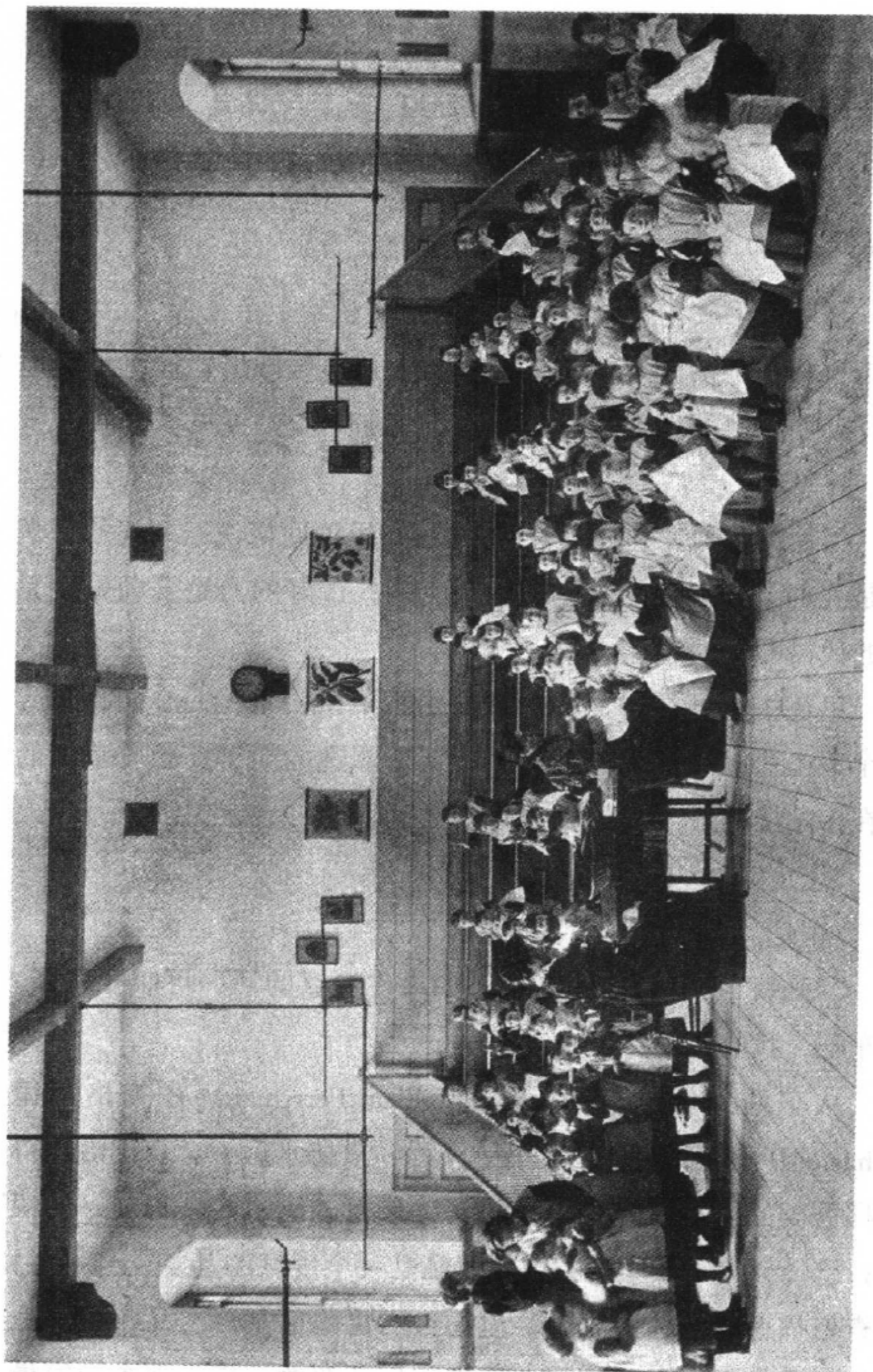
1876年的一天早上，威廉被叫出学校会见弗伦奇（Mr French）先生，弗伦奇先生专门负责男孩子的学徒事宜。

“里德，你喜欢成为一个面粉磨坊工人吗？”

“我愿意，先生。”威廉回答说。其实对这项工作究竟干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

不久，按照正常的实习，孤儿院为他量身订做了三套衣服。然后，来见慕勒先生做最后的面试。

慕勒在3号孤儿院他的祷告室里友好地接待了他。他将半克朗硬币放在他的左手里，将一本圣经放在他的右手里。



孤儿院的女孩子们在学习做缝纫

“你可以将你的左右手抱紧，能做到吗？”慕勒眨了眨眼，说道。

“好，先生。”

“那么，将这本书的教训牢记在心，你将总会有左手所握的东西。现在，我的孩子，请跪下。”

慕勒将手放在威廉的头上，将他交托给上帝来保守。然后，又把手放在他的脚上，说：“相信上帝，做好事，你将承受地土，并吃得富足（《圣经·诗篇》37篇3节）。再见了，我的孩子，再见了！”

当他离开阿什利顿的时候，威廉·里德回忆说：“我的行李就是我的圣经、我的衣服和半个克朗，最好的乃是慕勒先生无价的代祷和祝福。”

里德搭上开往得文郡牛顿艾伯特（Newton Abbot）的火车，一个看上去长得使人非常舒服、蓄着飘逸的胡子、戴着草帽的人在车站接他。

“您是威廉·里德吗？”

“正是。”

“好的，我就是你的老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叫我父亲。上车吧，我的儿子！”

从车站到威廉·佩里曼（William Perryman）在查格福德（Chagford）的家，有17英里的路程，里德永远不会忘记沿途得文郡秀美的乡村风光。威廉的新父亲通过他的善良和友好的谈话，已经赢得了威廉的心。佩里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久，在查格福德的学徒生涯中，里德自己也归信基督。几年后，他成为一个自由教会的牧师，后来移居新西兰，成为那个国家最

受欢迎的牧师之一。

回首他在阿什利顿的岁月，他写道：“现在我知道，对我来说，去的正是地方，我被送往那里真是莫大的祝福。如果我的孩子成了孤儿，我所希冀的，莫过于让慕勒培养和照看他们。”

今天，慕勒的孤儿院已经开始跟上目前的政策，那就是以小的家庭小组接纳孩子，生活尽可能地符合家庭的氛围。然而，按照十九世纪的习惯和标准，慕勒无疑被认为是一个拓荒者和激进分子。他单枪匹马，为数以千计的孩子提供了现代化的家，且没有让他们的贫穷、阶级和信仰成为进入慕勒孤儿院的障碍。不然的话，这些孩子要么流落街头，要么被送往济贫院或欠债之人的监狱，或者聊以投靠在亲戚过度拥挤的家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能够进入其他的孤儿院不是很容易的，那些孤儿院不是按照小孩子亲戚的需要，而是根据个人的推荐或者在捐款者定期会议上大多数人的投票决定是否接纳一个孩子。凯思琳·海斯曼（Kathleen Heasman）称赞慕勒开创了孤儿事业的先河：

把孩子们的需要放在首位……捐款者的会议不再举行，特别奉献的姓名和数目不再公开，这意味着孩子们通常获准进入只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或者凡是申请者都被获准。这样，投票制度在福音派教会的孤儿院中变得罕见，慕勒的这一典范渐渐地使整个投票制度被废除。

慕勒这么大的孤儿院具有好多长处是小的孤儿院所不能有

的。生活可以被严密地组织，日常工作提前告知，这么多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意味着生活经常是有趣的。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小的孤儿院则没有。一个在伦敦很小的孤儿院开始生活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到达4号院，便注意到明显的区别：在伦敦，工作人员和孩子经常换来换去。但是，在阿什利顿，“一个工作了25年的教师却仅仅只是开始。”一些离开阿什利顿的孩子，后来带着他们的孙子故地重游，结果发现他们原来的老师还在那里！同样，小的孤儿院提供有限的选择朋友的机会，而阿什利顿的孩子们如果挑剔的话，他们也能找到新的朋友。

从前的一个孤儿，这样描写她在阿什利顿的岁月：“我很高兴看到有许多的孤儿还记得我们可爱的老家，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对我而言，没有比我在3号院过的日子再幸福的了，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在如此圣洁的氛围中长大，是多么幸福啊！”

另外一人写道：“当我回首学生时代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日子。”还有一人回忆说：“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孩，当我回想起阿什利顿的时候，我仍然是个孩子。那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可爱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可爱。”

对那些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在有着极深的基督信仰的人们的关爱下生活，还有许多同时代的人到这里分享这相同的信仰时所产生的振奋，这样的生活经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在这一虔诚的氛围中，数以百计的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对阿什利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一个基督徒女孩，在她走上家庭服侍

后不久，给慕勒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被我们爱戴和尊敬的先生，当我在孤儿院的时候，得到您父亲般的关爱，对我所得到的呵护，永远感激不尽。我可以老实地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我在那里不仅得到身体上的关爱，还得到灵性上的滋养。我确实非常感谢上帝，在那里我成了一个基督徒，并且很快他就带领我认识了他自己。我心里诚挚地渴慕更多地认识他，更多地像他，因为他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至高和至爱……我被放在这样可爱的环境中，我向您献上感谢。我的女老师对我很好，我盼望对她献上深深的谢意……希望您一直是孤儿的朋友和呵护者，您为那些不信的、可爱的孤儿们的归信献上的众多的祈祷，愿上帝给你更多的答复……亲爱的先生，一直感激您，也尊敬您的……

南希·加顿（Nancy Garton）描写过在慕勒的时代，孩子们所穿的那些优雅高贵的衣服，那些衣服即使在穿旧了以后仍然让人恋恋不舍。而1936年开始使用的现代服装，如一直到膝盖的长裙，软毡帽，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按照加顿女士的描写：

大一点的男孩子，都穿着海军蓝的伊顿公学男学生制服、背心，用纽扣连着白色的笔挺的领结，它们都用很重的哗叽布做成，褐色的灯芯绒裤子，有一个闪亮的隆起的帽子，如果天气不好，还配加一个短大擎。每一个孩子有三套衣服。

小一点的男孩子，八岁或者九岁以上，每天都穿着长袍，



工作人员带着婴幼儿在户外游玩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奇怪的选择，这是平直剪下来的罩衫，没有衣领，都用白色或者没有漂白过的棉布做成。可能因为是白色的，煮泡过以后，很快就恢复原来的洁净。了解到男孩子的邈邈，人们禁不住怀疑一定要花好多时间使其衣服洁白。孩子们穿着蓝色的哗叽短裤，袜子和搭扣鞋与之相配，为了穿得更好，小的孩子抛弃了他们的罩衫，穿上诺福克（Norfolk）服装，配以宽大的伊顿领结。穿上这些衣服后，看起来更惹人喜爱。他们的帽子与大孩子的帽子一样。

在寒冷的天气，女孩的户外服装是蓝色或绿色的方格呢长大氅；在暖和的天气，则是牧羊人穿的方格呢的披巾，在炎热的天气，为了穿得更好，衣服通常是淡紫色的薄棉布做的，头上加一个小的斗篷或披肩，也是同样的面料，脖子上有一个很小的宽而硬的轮状硬领。整整一年，女孩子都戴着童帽或者天然颜色的草帽。每一个童帽上，都系着绿色或白色有花格子图案的、面料很薄的长带子，在帽子的顶部形成一个箍带，绕过背面在两边被缝合起来，因此两边都有一条带子，童帽被系得很牢。

所有女孩的日常服装面料都是海军蓝的棉布点缀上白色的小花，如果外出，天气太热，不宜穿大氅或围巾的话，便加一个白色的披肩。在室内，14岁以上的女孩，都穿着蓝色的有格子花的方格围裙，绕过脖子后面用纽扣系着。14岁以上的女孩，已经离开学校，被称作“家庭女孩”，穿着系着带的围裙，以与他们的学生时代有区别。大多数年长的女孩，在几个月之内，都要离开孤儿院走上工作岗位，被称作“戴帽子的女孩”，他们戴着帽子，腰间系着围裙，戴着白色的领结。每一个女孩有五

套衣服。

所有的袜子都是女孩自己用手织的，黑色的羊毛袜用于冬天，白色的棉线袜用于夏天。在慕勒孤儿院的博物馆里，仍可以看到一双这样的白色袜子。鞋子大多是搭扣鞋的那种样式。

因为是老式的制服，女孩的衣服都不能防水，在阴雨的天气里，每两个孩子一把棉布伞。打伞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想获得的，下雨天走路时常常产生争吵，因为在两人一排的队列中，总有执拗的一个会把伞强推给她不情愿的同伴。

对那些孩子们头发的样式，南希·加顿也给我们一个迷人的描写：

女孩的头发梳理得相当灵巧，会让你认为数百个孩子的头发每天都梳得无可挑剔。很小的女孩的头发几乎跟男孩的一样短，但梳得油光可鉴。从8岁到11岁的孩子，都理这种荷兰式的短髻发，中央分开并有前刘海，这样的样式，没有别人的帮助，他们自己也可以梳理。大一点的孩子，都能自己梳理头发，允许有披肩发或者更长的头发，在背上用绒状的丝带扎起来。最大的孩子则将她们的头发盘起来。

以前阿什利顿的孩子们告诉我，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一道来参观孤儿院，有时对孤儿院的孩子们的发型感到嫉妒。

慕勒教育政策的优点，也使得慕勒被看作是一个开拓者和激进分子。实际上他被批评教育孩子“超出了孩子们的身分”，不多年以前，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博士在他的书《在教育上的实验》中写道：

贫穷的孩子接受奢华的教育，甚至连教他们写写算算

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这样不加区别的教育，将会带来一种危险。有些人注定每日劳苦做苦力，而超出他们生活条件的教育，会使得他们对他们的命运感到不满足和不幸福。以一种经济的方案，笼统地教一下，他们能读圣经，明白我们神圣信仰的教义就足够了。

慕勒却不赞同。像宗教教育一样，他也教他的孩子们读、写、算术、听写、语法、地理、英文、世界历史、作文、唱歌、针线活。作为女孩子，还教她们家政学。男孩子要学会整理床铺、刷洗鞋子、打扫房间，可以派去当差、掘土、种植或锄草。女孩子的家政学包括厨房工作，洗涤碗碟、蔬菜，清洗房子以及在五个家庭中浆洗衣服。刘易斯·考特（Lewis Court）曾经说，即使在慕勒的年代，如果一个人显示出某种天赋，他就可以得到某种更高的专业教育，但是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多见。

慕勒招聘了一个学校总监，来维持阿什利顿的孩子们学校教育的水准，并负责学校的财政及圣经知识社的运转。1885年的学校总监霍恩（Horne）先生写道：“孩子的年终考试在二三月间举行，按照政府的法规，学生被考核许多项目，并且排列成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等级。每个孩子都单独考核阅读能力，每个孩子展示他的习字帖来决定他书写的分数，以下的每个科目都出十个问题，即圣经、地理、历史、语法，算术出六道算术题，答案用纸写出来。孩子们在考试中得到的平均分是91.1。”

这样的事情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最后的一句将显示我们的孩子在受教育上的成功。”慕勒略带一点骄傲地评论道。

因为他提供持久的教育，慕勒被指控抢走了工厂、磨坊和矿山的工人。但是，他毫不惧怕。通常情况下，女孩子在他的关爱下一直要呆到 17 岁，有时更长一点。然后，她们通常被推荐做适合的家庭工作，孤儿院为她们出培训费，使她们能胜任工作。有些接受培训作护士。男孩子通常到十四五岁的时候便开始做学徒。在理论上，慕勒避免不变的规则，维持一个灵活的政策，以便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得到重视，允许每一个男孩子选择他喜欢学的东西，虽然在实践上，挑选的过程无疑常常雷同于上文所引用的里德的例子。

孤儿院为每个男孩子提供三套衣服，并且承担他一切与学徒有关的开支。一些孩子离开孤儿院后成为邮局和电报业的职员，或者别的部门的职员。另外最出色的可能去作老师，也可能留在孤儿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在普顿（Purton）、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学校里接受培训，经费和运作由圣经知识社提供。

至于孤儿院的纪律，南希·加顿曾贴切地归纳道，“严格但不苛刻，在慕勒去世后不久，一群前孤儿院的孩子，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受惩罚的话，那是我们该受的。’”只是偶尔，慕勒不得不开除一个孩子，因为他在其他的孩子中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坏影响。但是，开除——就是把他送回亲戚或他的监护人家，总是最下策，这总是发生在屡次警告和百般规劝都无效之后。屡教不改者离开之后，慕勒和他的工作人员总是用祷告伴随着他（她）。

慕勒回忆起 1849 年 10 月到达阿什利顿的一个男孩子的故事。

那时，他还不到8岁，虽然很小，但是不久就发现他在犯罪上很老练，因为他是一个撒谎和偷窃的惯犯。他在其他孩子面前还引以为荣，告诉他们说自己属于一个少年偷窃团伙。在他获准进入孤儿院之前，常常偷窃轮船上的铁、铜及其他东西然后卖掉。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他说这些，仅仅是一种吹牛。但事实证明，他在偷窃的事情上真的是很老练。因为他曾经两次偷走属于其他孩子的东西逃离孤儿院。更有甚者，他甚至偷锁具。在他跑了两次之后，我们仍收留他，希望宽容他，用其他方式，使他可以悔过自新。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在宽容和考验了他五年零四个月之后，我们在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面前，为他祈祷，他被严肃地宣布开除，我们实在没有对他行之有效的更好的方法。对这个可怜的年轻的罪人，我们仍然为他祷告，并且希望上帝将他的错误道路向他显明，甚至使我们在想到他时感到喜乐，就像我们以前在类似的经历中所体验到的一样。

一次，一个男孩子将要在全体孤儿面前被开除，因为好长时间以来他一直重复着坏行为，那时，慕勒按手在他头上为他祷告。为了显示他多么刚硬和满不在乎，他转过来面对慕勒，怒目圆睁。让这个男孩子感到惊异的是，泪水从慕勒的脸颊上滚了下来。于是，按照故事的记叙，这个男孩子归信基督，他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后来描述自己被慕勒开除和慕勒最后泪眼相送的话语：



孤儿院的餐厅



孩子们每年在普尔顿的郊游



男孩子们在拔河

“对不起，上帝祝福你！”

《时代》曾经报道说，在那些造访慕勒的孤儿院的人当中，对其管理和工作表示钦佩的有德比的厄尔（Earl of Derby），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汉普顿（Hampton）勋爵还有许多对社会关怀有兴趣的人。

一次，查尔斯·狄更斯造访阿什利顿。他听到一个谣言说，孩子们遭受虐待，有时忍饥挨饿。因此决定亲自调查一番。慕勒礼貌地接待了他，叫过他的一个助手，给他一串钥匙。

“请带狄更斯先生去五个孤儿院中他想去看的任何一个。”

一切均按狄更斯先生要求的做了，据说狄更斯先生满意而归。

前阿什利顿的孤儿，回忆慕勒时代的生活时说，固定的礼拜一、礼拜四和礼拜五都有肉吃，礼拜三和礼拜六，他们吃肉汤和肉。礼拜二和礼拜天（那时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到毕士大教堂参加早上的崇拜），午饭通常是一盘伴着葡萄干的米饭。肉，通常是澳大利亚羊肉，或者更多的是咸牛肉。由于阿什利顿吃饭时最喜欢用的一个感恩祷告是：“为这些你爱的礼物，我们感谢上帝。”因此，孩子们常常指面包为“礼物”。布里斯托尔是一个港口城市，意味着孩子们经常可以得到新鲜的水果，特别是香蕉和桔子。偶尔，在过剩的时候，大量的新鲜水果被免费送到阿什利顿，以防止烂掉。鸡蛋是菜谱上固定有的，但是某些情况下也加餐：小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每人两个鸡蛋，一个是自己的，另一个送给最好的朋友。通常的饮料是牛奶和水。

如果菜谱和日常的事件总是如预定的那样一成不变，阿什

利顿的生活就会有几分单调了。每年总会有一些重大事件来打破这种常规的生活，给孩子们留下幸福的记忆，他们会一直盼望着那一时刻（除了他们过生日的那天）。

首先，每年夏天难得的乐事是到普尔顿（Pur Down）郊游。那时，孩子们早上出发，每个孩子配以粉红色或者蓝色的棉布袋，里面装满了路上吃的糖果和点心。当到达田野的时候，五个孤儿院的孩子们可以自由组合地玩耍。中午野餐是面包和乳酪，下午茶是面包、黄油和蛋糕。这些食物都用有盖的大篮子送到普尔顿。一群年纪很大的前阿什利顿的孤儿们，曾骄傲地指给我看一棵很老的橡树，许多年前，在一次郊游中，他们曾在这棵树下玩耍，却一点也不记得那天在普尔顿下着倾盆大雨。郊游结束的时候，孩子们燃放五个火气球，每个孤儿院一个。

孩子们翘首等待的可能就是圣诞节了。早在节日来到之前，他们便开始预备庆祝——学唱圣诞颂歌和阿什利顿圣歌集里的其他诗歌（通常是无伴奏合唱），处处装饰一新，背诵诗词、短剧和小品，预备在晚会的时候进行朗诵和演出。

每年的12月，慕勒的日记都带有节日的语气：

1878年12月23日，从克利夫顿，我们的孩子收到了好多洋娃娃，一些花式的盒子、画片集、游戏器具、弹珠、陀螺和许多其他各式各样的玩具。从达勒姆顿（Durdham Down），孤儿们收到的圣诞礼物有穿着衣服的洋娃娃，各式各样的盒子和一包包的巧克力和糖果。花鼓、陀螺、弹珠、小鞭子和玩具枪、成箱的玩具、图画书、花式的卡片、彩色的盒子、透明的写字板、小手绢、羊毛的领结和宽而

硬的皱领、花篮和盒子、铅笔、喇叭和其他的玩具……从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批发店里，送来了15箱水果，10箱桔子，10箱的花果，还有一麻袋的坚果，让孩子们庆贺圣诞。

1884年12月16日，从布里斯托尔的一间批发店里，送来了八桶的面粉，一桶无核小葡萄干，还有装满了16个大盒子的斜纹呢布，为圣诞节孩子们包布丁用。

一次圣诞节，康沃尔（Cornwall）的一个捐献者，给阿什利顿的孩子们送来了150只野鸡。

从前的一个孤儿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在四号院度过的快乐圣诞节，在预备装饰时，便送来了巨大的圣诞树，树上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圣诞节之前，那上面将缀满玩具和礼物，在众多玩具中，挂在某地方的一个将是我的！”另外一个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向孤儿院写信道：“我希望届时会像我在那里的时候一样激动兴奋。我猜想，装饰已经预备好了，是圣诞节中最神秘的，然后是学习好听的圣诞颂歌，还有圣诞节商店！我真想再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与过去一样。我想不可能比那时更好。”圣诞节商店是很小的糖果店，在每一个孤儿院的侧房开放，由学校的工作人员管理，他们用特殊的方式从布里斯托尔大的糖果制造商那里弄到糖果。在圣诞节和其他的节日里，这些小店就向孩子们开放。

在慕勒去世后，也可能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每年最快乐的另一个日子就是慕勒的生日——9月27日。每当到这一时候，孩子们从学校放假一个礼拜，正像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回忆的那样：“大多数的日子，我们出去游玩，采摘黑莓，每一个人

都是那么的快乐！”那一天的特殊标记是一份特殊的慕勒蛋糕，用淡黄色无核小葡萄干制成，每个孩子一个巨无霸苹果布丁。

当然，我们也不能掩饰说，在阿什利顿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幸福的，有些明显地感到不幸福。那些经历过父母的爱，曾过着正常生活的孩子在这里的经验尤其如此。这些孩子，到达阿什利顿的时候，可能已有十一二岁或者更大一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五座巨大的建筑物好像部队的营房，一点也不可爱。无疑，由于工作人员安排的错误，他们有时缺少友爱和理解。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难免会犯错误，这会促使慕勒再去学习。当然，孩子们在阿什利顿太隐蔽，与外面真实的世界太遥远。今天，慕勒的孩子们到正规的地方学校读书，完全与其他的男孩女孩一道学习。但是在慕勒的年代，布里斯托尔市不可能为两千个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也很难建议正规学校对慕勒的孩子们开放。

然而，在这里，孩子们接受了健全的教育，当然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在别处也能获得。但他们更得到了不可估量的珍宝：就是教导他们“得救的智慧”，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得到了更加“丰盛的生命”。

第 17 章

平安到达荣美福地

1870 年 1 月，5 号院开业不久，已经 73 岁高龄的玛丽·慕勒得了一次重感冒，并给她留下了令人烦恼的咳嗽。

“亲爱的，你一定要让普里查德（Pritchard）医生给你看一下。”慕勒说。

玛丽同意了，但很勉强。

“你不能再从保罗街步行到阿什利顿了，从现在开始，坐车去吧。晚饭后，你必须坐下来，为一天的工作好好休息一下。”医生说。

夜间，慕勒摸一下玛丽的脉搏，微弱而又没有规律，但是玛丽觉得毫不碍事。1 月末的时候，她感到整个背部的下半部和右臂疼痛，虽然疼痛越来越厉害，但是，玛丽仍然和丽迪亚一道去阿什利顿，像通常一样指导孤儿院的工作。在下午茶的时候，她与妹妹格罗夫斯女士和丽迪亚一道坐车返回保罗街。慕勒则到撒勒姆（Salem）教堂参加祷告会。当他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的医生，普里查德已经吩咐玛丽躺在床上。

“她一定要卧床休息。房间里要生个火炉，她患风湿病，正在发烧。”普里查德医生对慕勒说。

慕勒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说：“由于极度的痛苦，我的心悲痛欲裂，但我对自己说：‘上帝是好的，他所做的一切也都尽善尽美，一切都将按上帝的美善成就，美好的东西，就像他自己一样，没有一件不是从他出来的。如果他愿意取走我的太太，也是好的，正像他自己一样。作为上帝的孩子，我能做的，是对天父所做的感到满意，使我可以荣耀他的名。’”

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二的晚上，慕勒独自坐在3号院他太太的房间里。九年来，玛丽第一次在这个时间躺在家里的床上。墙上是每日的日历《无声的安慰者》，慕勒抬头看到那天的经文：“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圣经·诗篇》119篇75节）。慕勒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节经文。

“主啊，是的，”他对自己说，“你的判语是公义的，我都非常满意。你知道你可怜的孩子，为了她心爱的妻子痛苦极深，但是，我仍然对你的判语感到满意，我灵魂的深处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你在基督耶稣里对我的爱成就的，不管事情如何，一切旨意都是好的。”

这节经文的下面，另有一行字，“我的时候在你的手中”（《圣经·诗篇》31篇15节）。

“是的，我的天父，”慕勒心想，“我亲爱妻子的时候在你的手中，不管是生是死，你对我和我的妻子所做的，都是最好的。虽然她病得很重，如果是你的旨意，让我最亲爱的妻子再站起来，你一定能够做到。然而，你对我所做的，只是帮助我

继续完全地对你至善的旨意感到满意。”

那一个礼拜中，赞美诗“超乎一切”的歌词一直萦绕在慕勒的脑海中：

他为我们预备最好福气，
我们未曾经历但却甜美无比，
他将带我们去荣美福地，
啊，主爱何殷！

“我的心仍在回荡——我们未曾经历但却甜蜜无比。”他说。

礼拜三的时候，玛丽感到不怎么疼痛，在慕勒离开保罗街去阿什利顿之前，慕勒坐在太太的床边，读《圣经·诗篇》84篇的一节经文：“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亲爱的，我们都已得到恩惠，因此，我们也将得到荣耀。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行动正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慕勒对玛丽说道。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告诉他们的女儿丽迪亚，慕勒所读的那节经文以及那节经文如何安慰了自己。当慕勒去阿什利顿开始他工作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我行动正直，因此，我的天父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因此，如果我亲爱的妻子玛丽能以康复对我来说是好处的话，上帝一定给我的。如果相反的话，我将完全顺服他至善的旨意，以寻求荣耀上帝。”

那天晚上，普里查德医生告诉慕勒说：“整个晚上，每隔

两个小时，请给你的太太用汤匙喂少许的啤酒茶或满满一茶匙的葡萄酒。”

慕勒这样做了，每一次他都和玛丽一起祷告。

普里查德医生对慕勒说：“如果我的同事布莱克（Black）医生能来看慕勒太太的话，我应该感到轻松一点，我必须告诉你，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

“对你的诊疗我非常满意。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安排会诊。”慕勒回答道。

礼拜六上午，慕勒呆在家里，陪伴着玛丽。午饭后，慕勒说：“亲爱的，非常对不起，我不得不离开你一会儿，但是我会尽快赶回来。”

“耶稣与我同在。”玛丽说。

那天晚上，她的疼痛加剧，整个晚上慕勒尽其所能使其舒服一点。现在，玛丽的四肢一点也不能动。

第二天早晨，布莱克和普里查德医生被叫来了。

“已经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了。”布莱克医生对慕勒说。

慕勒走进他们的卧房。

“主耶稣马上就要来接你了。”慕勒对玛丽说。

“他很快就要来了。”玛丽欣喜地说。

夜里1点半的时候，慕勒给玛丽服了药，还有一汤匙兑着水的葡萄酒。玛丽很艰难地吞咽下去，她说话渐渐变得含糊不清。乔治·慕勒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看着她明亮的眼睛渐渐黯淡下去……

一会儿，他离开房间。

“玛丽正在弥留之际。”他平静地对丽迪亚和玛丽的妹妹

说道。

两位女士和慕勒一同来到玛丽的床边。不久，玛丽的另一个妹妹也来了。四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着，过了两个半小时，1870年2月6日，礼拜天的早晨4点20分，玛丽·慕勒去世了。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释放了她，”慕勒跪在床边祷告说，“谢谢你把她带你那里去。现在，请你帮助我们，托住我们。”

乔治和玛丽已经结婚40年了。

1870年2月11日，在毕士大教堂和墓地，慕勒亲自为玛丽举行丧礼。大约有1200个孩子跟在送葬的队伍中，他们由阿什利顿的工作人员带领，还有毕士大教堂数百位的会友一道参加。在葬礼讲道之前，他坐在祈祷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轻轻呼喊着他妻子的名字：

“哦，玛丽，我的玛丽！”

他将“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圣经·诗篇》119篇68节）作为讲题。他回忆道，1832年毕士大教堂重新开堂，克雷克和自己在哪里作牧师的时候，玛丽已成为那里的第一个会友，她一直活着看到有2700个信徒加入到这一团契。当她去世的时候，教会有920个会友，对她的一生和工作，慕勒给了一个详细的概括。

在他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慕勒对他们说，“可能所有听我讲道的人，看见上帝这么长时间将我的妻子放在我身边，都不难从心里赞成‘主本为善，所行的也善。’现在，上帝从她的丈夫身边挪去了相依为命的、可爱的、完美的妻子，因此，每时每刻，从人的角度说，他比以前更需要她。但是，我请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再与我更进一步，在这件事上，让你们从心里说，

‘主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内心的寂寞。那位可爱的人已经离我而去，已经不能再分担我的喜乐和痛苦。每一天我都越来越思念她。每一天我越来越感到她的离去对孤儿院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是的，我的灵魂深处已经习惯了为那些离开我们的人而喜乐，她此刻在天堂的幸福给了我喜乐和盼望。即使叫她从天堂回来易如反掌，我亲爱的女儿和我也不会这样做。一切都是上帝自己做成的，我们对上帝的作为表示满意……”

尽管在丧礼上发出这刚强的话语，但在玛丽去世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慕勒感到巨大的失落。他记录说，“我地上的欢乐已荡然无存。”在玛丽去世后大约十天的日子里，有一阵子，他变得非常病弱。当他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发现：“现在，晚上八九点之间，我从孤儿院回家，不再与我可爱的妻子结伴回来，像过去的许多年那样，因为她总是与我在一起。我对自己说：‘在家里，我将遇不见我亲爱的妻子了，但是我将遇到主耶稣，我最宝贵的朋友，他将安慰我。’我谢谢上帝，因为他将我可爱的女儿留给我，她总是留意我，问候我，尽其所能抚平我失去亲人的创伤。但是，损失是巨大的，创伤是很深的，虽然过去了数周数月，虽然我仍习惯于对上帝表示满意，对他以这种方式使我丧失亲人向他献上赞美。但伤口没有医好，相反更加加深，更加感到丧失亲人之痛……”

那些在孤儿院里生活过的孩子们也感到了丧失亲人的痛苦。即使在几个月之后，慕勒仍然收到数百封慰问信。其中有一封来自威尔逊街的第一批孩子：

亲爱的慕勒先生，一直没有给您写信，不是忘恩负义，而是我知道您有许多信要处理。但是，我对慕勒太太的爱，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已经写信的人。我认为我爱她和您就像我的父母一般。当然，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他们。但是，我知道如何去爱您和师母。我从心里说，我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我知道您每日思念她，我也思念她在孤儿院里走来走去的样子，因为我总是注意到你们。但是，现在只有您独自一人。我相信上帝喜悦将您存留在地上，为我们也为你所爱的孩子和家庭。为了我们！如果您离开我们，一切都将是空白。尊敬如初。

如果慕勒有个三长两短，后果将难以预料，不仅仅是写信人自己有这样的担心。

“如果你被上帝接去，孤儿院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们问道。

慕勒将会回答说：“孤儿院归 11 个理事掌管，基于同样的立足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像其他的福利机构一样。”

“但是，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他要有你那样的工作精神，在与孤儿院工作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凡事都单单地相信上帝。”

“当上帝愿意把我从这位子上挪去，他自己将证明，他不依靠我，他可以很容易地兴起他的另外一个仆人，用我一直所遵循的原则来从事这项工作。”

“你应当祈祷上帝，在你以后为你预备一个后继者来从事你

的工作。”

“我正按部就班地做呢！”慕勒总是这样回答说。

在玛丽去世后不久，慕勒对一个助手说：“你愿意去叫雅各·赖特（James Wright）先生来看看我吗？”

从赖特的孩提时代，慕勒就观察到他的“一贯举止敬虔”，将近12年来，在圣经知识社以及孤儿院各方面的工作，他一直都是慕勒先生最宝贵的朋友。几年来玛丽和慕勒特别地祷告，求上帝使他成为合适的后继者。

“我不得不告诉你，”慕勒对雅各·赖特说，“你应该接续我成为孤儿院的负责人，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赖特陈述了许多他不适合这项工作的理由，但没有一件慕勒认为是站得住脚的。

“我感觉你发现那项任务有很大的压力，我乞求你不要接受慕勒的邀请。”赖特的妻子对赖特说。然而，几个礼拜以后，她改变了主意，赖特又来拜见慕勒先生。

“现在，我感到不能再拒绝你的邀请了。”

“那么，您同意了，”慕勒微笑着说，“如果我被上帝接去，你将接续我。”

这事后不久，赖特的妻子去世了。

他们谈到赖特时说，他那“漂亮的脸庞和放光的微笑比任何语言都能说明他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他高贵和礼貌的举止立刻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的工作见证了他的信仰和爱心，并且，他的谦卑对一个正观察他的人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

赖特喜欢音乐，多年来他优美的男低音一直带领着毕士大教堂的歌唱，他喜欢跟一帮人一起围坐在钢琴和风琴旁，唱布

里斯托尔赞美诗中的诗歌。

18个月以后，即1871年8月，赖特为个人的私事拜见慕勒先生。

“我来向您的女儿求婚。”

对慕勒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日记中记着说：“我知道，没有别人使我如此愿意将我地上的心肝宝贝托付给他。”

对赖特的求婚，两个礼拜来，丽迪亚感到非常痛苦。慕勒发现，她的唯一难处是她不得不离开他的父亲。

“我恳求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慕勒对丽迪亚说，“看到你跟这样的丈夫结合，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快乐。”

1871年11月16日，他们在毕士大教堂结婚了，赖特45岁，丽迪亚39岁。赖特后来描写说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幸福时光”。

毕士大教堂不久又看到了另一场婚礼。

第 18 章

故地重游

玛丽去世后将近两年，有人劝说慕勒再婚，最后慕勒同意了。他说：“我敬畏上帝，并且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上帝会同意这件事。”他记着说，他早就认识苏撒拿·格雷斯·桑格（Susannah Grace Sangar），从克里夫顿来的家庭女教师，比自己年轻 20 岁，因为“她作为一个坚实的基督徒，已经超过 25 年了。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我各样的事奉上，她都将证实是我的一个好帮手。”1871 年 11 月 30 日，他们结婚了。

在以后的两年里，苏撒拿·慕勒不断学习事奉，尽其所能以减轻丈夫的重担。1874 年 3 月，她开始发高烧，本来是伤寒，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怎么严重。

3 月 26 日，礼拜四，慕勒将苏撒拿和丽迪亚留在保罗街的家里，这比她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要好。午饭刚过，丽迪亚来到阿什利顿接慕勒回去。

“苏撒拿大出血。”

慕勒连忙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得了严重的失血。威廉医

生来了。慕勒回忆道：“我亲爱的妻子，脸像死了一样苍白，死亡的汗水已经在她的眼睫上，但是，采取治疗以后，过了一会儿，她又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

4月5日，礼拜天，苏撒拿神志昏迷，发高烧。到了晚上的时候，威廉医生与布莱克医生会诊。

“如果慕勒太太能够入睡的话，她可以恢复过来。”布莱克医生说。

苏撒拿已经30个小时没合眼了。医生们又派来了第三个护士，好让另外的两个可以休息。慕勒尽其所能，让其接受所有的医药治疗。“但是，我的指望仅仅在上帝那里，我知道他，并且知道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甚好。我的心对上帝十分满意，我自己以上帝为乐。”苏撒拿的情况现在好多国家都知晓，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她祷告。

那夜，病情忽好忽坏。苏撒拿睡了五个小时，直到礼拜一的时候。从那天开始，大家开始看到她一点点好转。尽管苏撒拿的脉搏每分钟跳120下，且极其微弱。

“像慕勒太太那样失血如此之多以后，竟能恢复，这样的病人我还不曾知道一个。”伦敦一个杰出的专家说。对这个专家，慕勒曾描写他是“伦敦最杰出和最有经验的医生”。

慕勒写道：“现在是第三次我灵魂的深处对上帝感到满意，在上帝那里我得到快乐，她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以……从他乐于启示自己的圣经中，知道上帝是满有慈爱、满有恩典的上帝。我相信这些启示，从我自身的经历，我也知道这些真理。因此，我对上帝心满意足，我自己也以上帝为乐。确实如此，他使我心里所愿得以满足，他使我心爱的

妻子得以康复。”

5月初的时候，苏撒拿已经能坐着轮椅走出卧室，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一会儿了。5月中旬，她第一次坐着马车在户外进行短暂的旅行。5月末，他们夫妇能够到伯纳姆（Burnham）、萨默塞特（Somerset）旅行，以便苏撒拿可以享受海边空气的好处。9月，他们去维特岛的文特诺（Ventnor）旅行，在那里，慕勒太太完全得以康复。

自从1832年来到布里斯托尔以来，慕勒几乎都在这座城市里讲道。他作为毕士大教堂的牧师、孤儿院和文字工作的指导者，已经牢牢地被捆在了布里斯托尔。但是，毕士大教堂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有几个很有恩赐并富有经验的同工可以肩负重任。雅各·赖特已经证实是阿什利顿孤儿院和整个机构出色的领袖。因此，经过多次祷告之后，慕勒决定将他的余生奉献给全世界作布道和教导工作。

慕勒相信，有许多的人，他们确实真诚地渴望与上帝和好，但是他们缺少平安，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感觉。在经过半个多世纪每天的、系统的和连续性的对圣经的学习后，慕勒现在瞄准向更广的听众分享他业已发现的真理，并且鼓励基督徒成为热爱圣经的人，能用上帝的话来应对任何事情。

另外，慕勒开始旅游布道的目的可能是发扬格罗夫斯和早期弟兄会的真正精神——打破宗派的樊篱，促进“真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

虽然不尽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然而，我都在他们中间讲道，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主耶稣自己的真门徒之间

存在的许多不合，主耶稣的心一定非常伤痛。基于这个原因，因此，我这样微小的器皿愿意与所有的真信徒合一。然而，我们都常常失败，我们只是与基督里的弟兄站得远远的，直到他们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只要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清洁的良心所不能做的，我就走向他们，与他们联合。

苏撒拿酷爱旅游，是慕勒最理想的伙伴。虽然慕勒的身体依然健康，但没有苏撒拿在身边担任护士兼秘书，慕勒就不可能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艰巨任务，那是世界范围的邀请他讲道的任务。她将确保整个旅行不是都在工作而没有一点游玩。因为，无疑受苏撒拿的影响，夫妇两个会从许多的邀请中忙里偷闲，去旅游热点、美丽的风景点和历史文化古迹游玩。

1875年的暮春和初夏，他们第一次出游，是在英国本土的一个短期旅行。慕勒年方70，苏撒拿大约50岁。司布真（Spurgeon）邀请慕勒在首都大教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讲道，慕勒在布里斯托尔开拓性的工作，已使得他在伦敦名声大噪，因此有许多会众来听他宣讲。他在纽卡斯尔（Newcastle）讲道，然后又折回伦敦，在中途岛公园（Mildmay Park）联合会讲道，这是正在形成的超宗派的凯斯威克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先驱。

加文·柯克哈姆（Gavin Kirkham）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布道家，是露天布道会的首任秘书，在慕勒那次讲道的时候，他这样记着说：



慕勒坐像

慕勒的相貌特别引人注目，高大威严。那年他已经70岁了。他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但每一个英国听众都能听懂。在他公开的事奉中，他是一个卓越的老师，他常常以清楚的、和蔼的和温柔善劝的态度，将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讲出来。传道者可以学习他讲道的方法。他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信息：通过读经、默想和祷告，一直在上帝面前等候，直到认识到自己该讲什么为止。有时，他一直在犹豫，直到最后的一分钟，但是上帝从来没有使他失望过。他极力提倡和实行解经式的讲道。不是从一段圣经中摘出一节经文，他挑选一段，可能是几节经文，他一句一句连续地仔细读。他首先关心的是找出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用别的经文加以阐明，最后是实际应用。每句都这样做，因此从头到尾都有定义、阐述和应用。然而，当他讲道结束的时候，他的听众没有一点疑问，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就提示有多少的经文他有意去思考。他的举例偶尔也取自历史、人物传记或者自然，但主要源自圣经和他自己的个人经验。

慕勒的讲道，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劝导听众重新思考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他常常说，“让我们问问自己，这一点我已经懂了吗？我如何应用？这是我的经验吗？”

第一次旅行时间相对短少，慕勒讲道70次，但是已经很明显，在以后的年日里，不管他去哪里，他一定有热切和专心的听众。

1875年8月，慕迪（Moody）和桑基（Sankey）在完成使他

们声名大噪的在英国的侍奉后，又回到纽约。慕迪曾描写说，慕勒是他在英国渴望见到的三个人之一，他适时地参观了布里斯托尔，用他传记作家的语言说：“对慕勒的信心，来一个令人兴奋的吸收。”

在慕迪和桑基到达纽约的那一天，乔治和苏撒拿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英国之旅，时间一直持续到1876年的7月。慕勒说，他的特殊目的是“帮助推动忠实的弟兄慕迪和桑基的工作……这两个可爱的弟兄，由于在每一个地方呆的时间都相对短促，在知识和恩典上还不能带领刚刚信主的肢体继续前进。因此，我想接续他们的劳苦，用我微小的器皿，来补上这缺少的事奉。”由于急切地教导刚刚归信者，他在伦敦中途岛公园的议会大厅里讲道14次，一次常常向3000人宣讲。

然后，他转向苏格兰，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聚会中，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向5000人讲道。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能进入大厅，慕勒接受邀请，在隔壁的一间教堂里，向1200个分会场的信徒讲道。在格拉斯哥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讲道近40次，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在威尔士王子剧院里，他都向3000人讲道。

然后，他又到都柏林呆了三个礼拜，在拥挤的梅林大厅（Merrion Hall）里讲道数次。尔后，慕勒夫妇来到利物浦，他在专门为慕迪和桑基而建的巨大的维多利亚大厅里讲道。W·H哈丁（Harding）回忆说：“在这众多的听众当中，坐着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是一个商船的船长，过去曾是孤儿院里的孩子。当这位白发苍苍，年纪已经很大的恩人，再一次像好多年前一样，对他传讲这永生蒙福的信息时，这个还未相信基督的人，怎能平静地坐在这儿呢？这位受过伤害的船长听着、哭泣着、

体会着慕勒生命的动力，他也开始驶向灵魂安歇的天堂。”

慕勒在利物浦讲道 50 多次，礼拜天的时候，听众有五六千人。然后，匆忙地游览了苏格兰，在此期间，苏撒拿记着说，“当住在克雷斯村（Crathie）的时候，我们与住在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的一个基督徒守门人很熟，一天下午，他带领我们游览女王在苏格兰的宫殿，在我们离开前不久，女王正巧来到城堡，我们偶然看到她驾车出来，由比阿特丽斯（Beatrice）公主陪同。”

第三次旅行将他们夫妇带到欧洲大陆来，1876 年 8 月的最后两个礼拜是在巴黎度过的。9 月，他们来到伯尔尼（Berne），在那里，他 36 年后第一次用德语讲道。一天下午，他们去狄恩格（Die Enge），在伯尔尼外一座陡峭山坡上的一个大厅里，布林（von Buren）上将已经邀请了大约 150 个人来欢迎他们。他们坐下来喝着咖啡，远眺遥远的阿尔卑斯（Alps）山，在落日的余晖下，冰雪覆盖的山顶显出红红的玫瑰色，有一个人说：“多么伟大的上帝！为着让我们得享乐趣而彰显他的全能。”

在开始众多的一系列聚会之前，乔治和苏撒拿在卢塞恩（Lucerne）登上了一艘汽船，越过日内瓦湖来到位于里奇（Rigi）山下的维姿瑙（Vitznau）。1825 年夏天，慕勒和贝特还有另外的同学曾登上了这座山的山顶，一晃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人很有创见地修了嵌齿轮的铁路，慕勒夫妇没有费力便登上了山顶。但越过伯尔尼山地到南面的日内瓦，一直到北面的黑森林（Black Forest）的风景却依然如故。

当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夫妇俩很高兴在山顶下的旅馆里找到避风处。慕勒太太写道：“第二天早上 4 点半的时候，我

们起床登上里奇库勒姆 (Rigi Kulm)，冰雪覆盖着无数灿烂的山峰，以及远处的冰川尽收眼底。这一切在初升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灿烂的五光十色的颜色，我们在那里伫立一会儿，满怀深情地望着周围那广袤的、原始的、荒凉的、静寂的地区。”

在圣哥达要隘 (St Gothard Pass) 海拔九千英尺的山顶上，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中，慕勒夫妇对旅客招待所提供的简单接待深表感谢，几个意大利人在这小房间里生起了火，尽管充满了烟气，但他们很高兴被允许与他们一道分享火的温暖，还有另外一些碰巧进来的游客也与他们在一起。

在苏黎世的安纳卡柏勒 (Anna Kapelle)，慕勒向挤满楼梯间和走道的会众讲道两次。在康斯坦茨 (Constance)，慕勒夫妇参观了设在商业大厅的议会大厅，约翰·胡斯 (John Huss) 因为直言改革前教会的腐败，曾在那里被审判并被处以火刑。

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沃特姆堡 (Wurtemberg) 女王在王宫里与慕勒见面，问了许多关于布里斯托尔孩子们的问题。在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在宫廷牧师的房子里举行了一个接见会：四个客厅都开放，卡尔王妃 (黑森州的路易斯王子的母亲，而路易斯王子是英国艾丽斯公主的丈夫)、巴滕贝格 (Battenberg) 的公主还有其他几个从宫廷来的人。

在杜塞尔多夫 (Dusseldorf)，那城里的宣教士与慕勒见面的时候，正为他的儿子感到非常不安。

“我有六个儿子，为他们的归信我一直祷告了好多年，但他们没有一点反应，我该怎么做呢？”

“继续为你的儿子祷告，”慕勒告诉那宣教士说，“希望祷告蒙应允，你将赞美上帝。”

1877年春天，乔治和苏撒拿参观了靠近哈雷的瓦尔特堡(Wartburg Castle)，1521年，马丁路德曾秘密居住在此地。他们参观了马丁路德的起居室，在那里这位改教者曾将圣经翻译成德语。在哈雷，慕勒在弗兰克创办的孤儿院演讲，它曾鼓励了慕勒早期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慕勒很高兴地发现，他早年的导师陶乐教授仍健在，现在是普鲁士最高宗教法庭的顾问。两人久别重逢倍感欣喜，促膝长谈。

在回柏林的路上，在威登堡，他们见到了那著名的教堂，1517年，马丁路德曾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那个教堂的大门上。他们也参观了奥古斯丁修院的一个房间，马丁路德作为修士时曾呆在这里。

在柏林三个礼拜的时间里，慕勒向许多会众讲道。比斯马克(Bismarck)伯爵，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的堂兄，专程从120英里外赶来，仅仅为了见一见慕勒，听听他讲道。

“你的《叙事文集》对我的灵魂一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比斯马克伯爵告诉慕勒说。

在荷兰的主要城市讲道之后，慕勒在欧洲的旅行布道宣告结束，总共讲道300多次。回到保罗街后，一封来自美国、由特温(Thwing)和另外四位牧师签名，邀请他去美国讲道的信早已在等候他。

邀请他去美国的信，他曾收到了好多，这是最近收到的一封信，这一次，他决定接受邀请。

第 19 章

到达白宫

1877 年 8 月，慕勒夫妇乘坐 4000 吨级的萨丁尼亚号 (Sardinian) 轮船前往美国。不知为什么，他们被安排到船上大副位于甲板上的房间，他们的客舱，苏撒拿发现是“还算相当的舒适”。

大西洋航道崎岖，但航程一直按计划进行，可是，当航行离开纽芬兰岛 (Newfoundland) 进入浓雾时，轮船抛锚了。达顿 (Dutton) 船长已在驾驶台等候了 24 小时，这时，慕勒出现在他的身边。

“船长，我不得不过来告诉你，礼拜六下午我必须到达魁北克 (Quebec)。”

“不可能！”船长说。

“好的。”慕勒说，“如果你的船不能载我到那儿，上帝将用其他的方法，在过去的 52 年里，我从来没有违约过。让我们到海图室祷告吧！”

船长正想知道慕勒是从哪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

“慕勒先生，”他说，“你知道这雾有多么浓厚吗？”

“不知道，我的眼睛不专注在雾的浓厚上，我只专注于掌管我生命一切的永活的上帝身上。”

然后，慕勒又跪下简单地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船长正要祷告，但是，慕勒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不要祷告了。第一，你不相信上帝会垂听。第二，我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不需要你再为此事祷告了。”

船长诧异地看着慕勒。

“船长先生，”慕勒继续说，“我认识我的上帝已经 52 年了，52 年来，从没有一天，我的王、我的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起来，船长先生，打开门，你将发现雾已经散了。”

船长绕到门边，打开门，雾已经散了。

在他作为萨丁尼亚号船长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达顿船长多次重复着这个故事。19 世纪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后来描写达顿船长是“他所知道的最虔诚的人之一”。

当他们靠近魁北克的时候，萨丁尼亚号船鸣枪示意已经到达。在圣路易斯宾馆（Hotel St Louis），一大堆邀请慕勒去讲道的信件在等待着他们。但是在南去纽约之前，他们安排时间去尼亚加拉（Niagara）大瀑布游览。

夫妇二人第一次远距离看这瀑布时感到相当失望。他们把车开到在美洲大瀑布上边的一座桥后，爬上了去月亮岛的一段楼梯，然后，站在靠近悬崖的护栏边，他们开始欣赏美洲大瀑布的宏伟和壮观。

“这个瀑布，”他们想，“真是无与伦比，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

但是，再走几级之后，他们看到了马蹄铁瀑布（Horse Shoe Fall）的全貌，在加拿大的那一边，每小时有 1500 立方英尺的水从悬崖峭壁上流下，瀑布的底部好像沸腾的锅炉。他们看见的激流正是尼亚加拉大瀑布落下的地方，正像苏撒拿描写的：“狂澜漫过崎岖不平的岩石、数不清的石头和巨礁，那里波涛澎湃，水花四溅，砰訇翻腾，好像急不可待地冲过悬崖投向下面的万丈深渊。”

9月9日，礼拜天早上，在塔尔梅奇（Talmage）博士的教会里，教授兼牧师 E.P.特温（Thwing）向会众介绍慕勒先生，据说这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教会。从布里斯托尔来的客人宣讲了 45 分钟。晚上聚会结束之后，现已嫁到美国并定居的一个前阿什利顿女孩，走上前来问候慕勒夫妇。

慕勒在布鲁克林和纽约地区大约讲道 50 次，包括几次用德语向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讲道。然后，他们来到波士顿，那里，他第一次照约定在慕迪的教会讲道。那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可以容纳 7000 人。

慕勒在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古老的长老会教堂讲道两次，这个教堂是由乔治·怀特菲尔德建立的。40 年前，慕勒曾读过这位伟人的传记。当慕勒打开属于这位伟人的圣经时还引起了一阵骚乱，因这本圣经通常是不准打开的。慕勒讲道所站的讲台，正是怀特菲尔德埋葬的地方。

在华盛顿，在米切尔（Mitchell）博士的教会讲道之后，一个牧师对慕勒说：“亲爱的弟兄，感谢上帝派你来到美国，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奋起和唤醒基督徒，也震动未归信者。先生，真是上帝派你来美国的，对此，我深信

不疑。”

1878年1月10日上午9点半，慕勒夫妇有一个特殊的约会。他们被邀请到白宫会见海耶斯（Hayes）总统^①和夫人。苏撒拿记着说，“他们非常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在询问了我们在英国的工作之后，总统先生与慕勒先生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来总统夫人带领我们参观白宫，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还带领我们参观了美国国务院，里面有各式各样有趣的东西。”

慕勒在华盛顿三个礼拜，一天常常讲道两次，他因此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们还忙里偷闲，爬上了有400英尺高的美国国会大厦的穹顶，并且对此惊叹不已。

离开华盛顿，他们又来到塞勒姆（Salem）、弗吉尼亚，在阿勒格尼山（Allegheny Mountains），慕勒的名声甚至超过了阿勒格尼山。在路德会教堂，“有数百位的年轻人在场，大多是罗阿诺克（Roanoke）大学和神学院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紧紧地挤在入口处，其余的则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讲台周围。边座都挤得水泄不通。在教堂的后边，几个年轻人站在长凳上，他们的头部接近天花板。在边座前排的座位边上，几个男孩子攀在那里，他们的脚悬在长凳上，真有点危险。”

罗阿诺克大学学报在1878年1月的头版文章《乔治·慕勒牧师》中说：“这个好人，举世闻名、深受爱戴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孤儿院的创办人，《信靠的生活》的作者乔治·慕勒牧师刚刚对我们进行了访问……他身高大约六英尺，腰杆笔直，满头

^① 编者注：鲁瑟福特·伯查德·海耶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22—1893），美国第19任总统，1877—1881在位。

银发，他脸上有文雅的德国人明显的轮廓。而他的人格魅力，显然是第一流的和军人式的，充满希望和圣洁信念的演讲还没有开始，脸上的表情便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求错了’和‘求对了’是他讲道的两大主题，‘求错了’是从自我的动机提出疑问，‘求对了’有三个要素：1. 渴望上帝的荣耀；2. 承认我们一无是处并恳求耶稣的恩惠；3. 相信我们一定能得到我们所求的。”

下一站，他们夫妇来到 400 英里外的南卡罗莱纳州 (Carolina) 的哥伦比亚，在那里，他们与法院院长威拉德 (Willard) 住在一起，威拉德先生带领他们去州议会大楼，向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和秘书长介绍他们。在州众议院，慕勒用祷告开启了他们那一天的工作。

2 月末的时候，慕勒夫妇上了一艘汽船，开始了乏味的旅途。他们经过赛万那 (Savannah) 河来到杰克逊维尔 (Jacksonville)，在这一旅途中，船在布里奇顿城 (City of Bridgetown) 搁浅了好几次。在杰克逊维尔，好多的听众聚集要听慕勒讲道，据说这是那个镇曾有过的最大的聚会。

在蒙哥马利 (Montgomery) 和新奥尔良聚会之后，这对坚韧不拔的夫妇登上了约翰·斯卡德 (John Scudder) 汽船，开始了上行密西西比河去孟菲斯的长途航行。虽然船上提供的食物很好，但乔治和苏撒拿发现没有饮用水，只有没过滤的河水，这令他们非常头痛。河水里充满了杂质和泥沙的沉淀物，如果将水倒在杯里，在底部会形成厚厚的一层。可怜的乔治和苏撒拿对直接喝冷水还是以茶和咖啡的形式喝下去犹豫不决，最后，他们采取权宜之计，他们将壶灌满冰，然后将冰融化，再兑上一点

点的酒以去掉寒气，结果非常好喝。慕勒尽可能地向旅客、有色人种的服务员和轮船公司来的人传福音，但是，慕勒发现旅客大多数是世俗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以音乐、唱歌、跳舞和打牌来自娱自乐。慕勒夫妇无处可去，在船舱里，就能看到并听到这一切。如果慕勒夫妇晚来十年旅游，已经开始流行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可能会来增加一点刺激。

1878年4月18日，慕勒夫妇5点半就起床了，他们开始了从圣路易斯到旧金山的长途旅程，行程将近2400英里。他们乘预定的普尔门式火车（Pullman carriage）的卧铺前往，车上的躺卧设备非常舒服。第一天早上，当他们拉开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被一大帮去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围了起来，慕勒夫妇便向他们分发小册子。火车过了奥马哈（Omaha）、内布拉斯加（Nebraska），穿过辽阔的大草原，好长一段时间，苏撒拿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一小时只行15英里，最后，她意识到（也可能是慕勒告诉她的）他们正渐渐地在高于海平面数千英尺的路上爬行，爬坡又长又陡，机车熄火了，旅客踉踉跄跄地走出来感叹那壮丽的风景。慕勒夫妇抓住这一机会，分发更多的小册子。经过临时性的修理之后，他们以更慢的速度爬向谢尔曼（Sherman），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那里非常寒冷，积雪很厚。

火车到达韦尔斯（Wells），他们发现一帮印第安人裹着红色的毯子和鲜艳的羊毛斗篷，因为那时西方还没有电视转播，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印第安人，慕勒太太对他们那“用羽毛和很宽的带子加以点缀、样式稀奇古怪的帽子”倍感兴趣，并且注意到他们“将他们的脸染成一片一片的朱红色”。

4月23日，天刚破晓的时候，他们第一眼看到了加利福尼

亚的风光。“难以描述的、宏伟壮丽的景色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远处数不清的群山直插云霄，阳光明媚，照在雪上发出眩惑的白色；深深的湖水，峡谷和沟壑围绕着我们；山坡上有数不清的松树和冷杉树；数千英尺以下，覆盖着茂密的草木，增添了无数秀美。”

八点的时候，列车员打开了车门。

“合恩角 (Cape Horn)!”他叫道。

旅客跳了起来，纷纷从窗户向外观看，发现火车正在两千五百英尺的悬崖边徐徐前进。经过“移民隘口” (Emigrant's Gap)，他们开始向加利福尼亚下降。天气变得温暖，苏撒拿发现“田野里披着青草，里面掺杂着无数的野花，白羽扁豆、花翎草、野玫瑰、天竺葵正开着花……数不清的加利福尼亚罌粟花聚成一片金黄，已成深黄色，比别的一切更灿烂。”

“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前，我简直像没看过花。”一个旅客喊着说。

在旧金山的奥克兰车站，有两位朋友接待他们，将他们带上埃勒凯普坦 (El Capitan) 船，绕过旧金山湾，然后来到皇家酒店。他们被领进一套房间，这是朋友们为他们预定的。

在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个礼拜天，慕勒在泰勒街 (Tyler Street) 的长老会教会向两千会众讲道。礼拜二，一个朋友叫他们坐上自己的马车，带他们出去观光旅行。他们沿着海岸线慢行，太平洋的微风吹在他们的脸上。苏撒拿回忆说：“然后，我们的朋友带我们去了悬崖宾馆 (Cliff House)。这宾馆建在一块耸出大海的高高的磐石上，从宾馆的一个阳台上，我们有机会看到海狮，海里凸出的岩石上，常常有海狮出没。那里有数

百只稀奇古怪的两栖动物，他们尖尖的脑袋和身子与蓝色的海水相映衬。有的在岩石的干燥处晒太阳，有的在嬉水，有的正在爬向岩石的斜坡，有的在不协调地乱叫。”

在悬崖宾馆，一个服务员来到他们的桌子边。

“慕勒先生，我得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埃玛·埃文斯(Emma Evans)的哥哥，埃玛·埃文斯以前曾住在阿什利顿，接受您的关爱。好多年前，我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常常听您讲道。我听说您来到了美国，真让我高兴，刚才我认出了您。”

在慕勒夫妇离开宾馆之前，那位服务员送给他们一束鲜花。

在奥克兰，所有主要的教堂都关门了，以便他们的会友和牧师能够在第一长老教会听慕勒讲道。由于来的人太多，数百人不能进入，没有听到慕勒根据《圣经·耶利米哀歌》3章22-26节传讲的信息。

“这是一次辉煌的盛会。”后来一位牧师告诉慕勒说。

在圣何塞，一位妇女写给慕勒一封信，她的女儿在14岁的时候就归信基督，但是，两年后掺杂了招魂术，已经迷恋达9年之久。然而在旧金山，她听了慕勒几次讲道，对一次特别的讲道印象颇深。“9年来，你是第一个发现她内心问题的人，”那位妇女向慕勒写道，“她说，即使给她100美元，她也不愿意错过那次听道的机会。”

在圣何塞和斯托克顿不断地讲道后，慕勒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他们夫妇接受了他们应该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Valley)参观的建议。他们早就被告知说，乘加利福尼亚的驿马车旅行，将会证明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冒险。后来，苏撒拿记着说：“赶马车的人兴致很高地驾驶着，尽管道路高高低低、翻

山越谷，他都习以为常。一会儿我们碾过一块巨石，一会儿又与另一块石头产生碰撞，在下山坡的时候，他会用力一拽刹车。无疑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驾驶员，不管是什么速度，他从不害怕，因为我们是严肃的人，对这样冒险的举动很不习惯，对更加稳重地处事我们也许更感激。除了这些，我们急切地盼望没有损伤、没有骨折地到达目的地。然而，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宾馆，我们下车过夜，经过 11 个半小时的旅行，我们非常劳累，于是立即休息。”

在优胜美地呆了三天后，他们四点半就起床，与另外 10 位乘客坐着有五匹马拉的驿马车开始返回。下午 4 点的时候，一辆坐着一男一女的轻便马车走了过来，他们靠近路的一边，先让这大车通过。忽然，那位妇女跺起了脚：

“那是乔治·慕勒吗？”

“是的。”

“那么，我必须跟您握一下手，先生，我读过您的《信靠的生活》，它对我的灵魂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乔治和苏撒拿从窗子里斜侧出头来，与那位妇女和她的丈夫握手。

当两辆马车互相错开一段距离的时候，那位妇女喊着说：“为我祷告！”

在摩门教的大本营盐湖城，他们参观了名人屋，那是摩门教的创始人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故居。“他的身体埋在后院一块蹩脚的、不被注意的地方，他的坟墓被巨大的、扁平的刻着碑文的石头盖着。”但是，苏撒拿挖苦地加上一句，“我们无意弄清楚墓志铭是什么。”在卫斯理教会，慕勒向许多会众

讲道，其中还有几个摩门教的信徒。

6月底，在慕勒讲道超过300次，行程超过1900英里之后，他们搭乘亚得里来号（Adriatic）轮船驶往利物浦。这次旅行持续了一年。7月8日，“四点半的时候，我们乘敞篷马车到达阿什利山顶，发现一小队的男孩女孩还有几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孤儿院等候迎接我们。当我们徐徐行进的时候，男孩们由衷地发出欢呼，女孩们则舞动着他们的手帕。正像一个旁观者评论的：他们决心来一个十分盛大的欢迎，在3号孤儿院的入口处，一大群孩子簇拥着我们，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致意。”

第 20 章

只靠祷告

从慕勒按照自己规定的原则建立和维持孤儿院，以证实“上帝的真实性”，到现在 40 多年已经飞逝而过。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上帝的真实，信心代替了怀疑。那些已是基督徒的人的反应通常是更加全身心地奉献自己，过一个祷告和事奉上帝的生活。最为显著的乃是慕勒的生命影响了爱尔兰青年雅各·麦克奎肯（James Mcquilkin），后来又通过他影响了 1859 年的复兴。

麦克奎肯 1856 年成为基督徒后，便看到慕勒所著《叙事文集》前二卷的海报。他设法弄到 1857 年 1 月的一本，读后，感到非常惊奇。

“看看慕勒先生只通过祷告得到的吧，”他想，“这样，我也可以借着祷告得到祝福。”

接下来的秋天，麦克奎肯在凯尔特（Connor）向一群一起祷告的青年人讲道。

“通过拜读上帝对乔治·慕勒所做的一些事情的记叙，上帝

确实祝福了我。现在我认识到相信祷告蒙应允的大能，为了圣灵倾倒在這一地区，我建议我们应当定时聚会祷告。你们可能听到过横扫美国的大复兴。看到慕勒仅仅借着祷告，上帝通过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祝福呢？”

1859年3月，靠近巴利米纲（Ballymena）的地方，这些年轻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聚会，这一地区的属灵气氛变得令人震惊，在大街上数百人跪着悔改祷告。5月的时候，这一运动抵达贝尔法斯特（Belfast），开始影响所有宗派的教会。在接下来的复兴中，成百上千人的生命都有改变。

没到年底，复兴之火已经烧遍了整个英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复兴的结果是上千人被上帝呼召成为全职的宣教士。在英国，有一位埃克塞特的鞋匠名字叫乔治·布里尔利（George Brearley），他将自己奉献，在得文和萨默塞特边界的布莱克顿希尔（Blackdown Hills）传道和工作。他像一个牧师那样积极主动地建立或者重新开放乡村教堂、设立全日制学校。

乔治·布里尔利以及他的儿子沃尔特(walter)在布莱克顿希尔地区建立学校，像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校一样，它们都由慕勒的圣经知识社资助。在比绍普伍德这样的学校，一直到1947年才得以关门，那时，政府的教育体系已使得它显得多此一举。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圣经知识社全额资助将近80所的儿童全日制学校以及六所成人学校，除此之外，还负担5到10所学校的部分费用。从1879年到1880年，圣经知识社全额负担全世界76所学校7000多名孩子和7所成人学校的费用。这些学校，有14所在西班牙，4所在印度，1所在意大利，6所

在英属圭亚那，其余的在英国及威尔士。

1859年的复兴中，另外的一个归信者后来成为一位名人，那就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亨利·穆尔豪斯（Henry Moorhouse）。1861年，他是一个赌徒和酒鬼，冲进曼彻斯特阿尔罕布拉马戏场（Alhambra Circus）的一次奋兴会，寻衅闹事，但听到耶稣的名字就降服下来，他“进来闹事，但却加入了祷告和赞美的行列。”

1867年，穆尔豪斯在都柏林遇见D.L.慕迪。后来，在穆尔豪斯一次访问芝加哥的时候，慕迪又听到他讲道。慕迪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夜晚，从那时起，我开始传讲另一种不同的福音，我更能够与上帝同行，与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更有能力。”穆尔豪斯成为慕迪和桑基的好朋友。据说，穆尔豪斯“感动了那位感动世界的人”，也是他教导慕迪说，上帝恨恶罪恶，但爱罪人的。

在穆尔豪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用运送圣经的马车卖圣经和小册子，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约克郡（Yorkshire）、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工业区带领福音运动。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卖了15万本的圣经和新约，并且分发了数百万计的灵修书籍和小册子，所有这一切书籍都是由设在布里斯托尔的慕勒的圣经知识社提供的。

1878年8月，穆尔豪斯从黑潭（Blackpool）给慕勒写信说：

亲爱的慕勒先生，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时刻，一个礼拜卖了1000本的新约圣经，并且在露天向数千人传福音。随信从邮局寄去12英镑10先令，请给我们3000本2

便士一本的新约圣经，您以半价卖给我们，我们感激不尽。
亲爱的慕勒先生，上帝祝福您。

得到所要的新约圣经后，穆尔豪斯又从黑潭写信说：

亲爱的慕勒先生，您从伦敦所发的新约圣经已平安收到。您以一本 1 便士的价格卖给我们，我对您深表感谢。福音马车、马、灯光及场地的租金花费平均每个礼拜达 3 英镑，我相信圣经销售和其他能够支付这些。我盼望您能够想象数千人在露天听福音、有时几百人痛哭悔改的场面。您将会说，这是上帝的作为。我盼望有更多的福音马车活跃在乡村里，在美国和其他的地方，我就碰见好多这样的福音马车，您的讲道，给他们带来了大大的祝福。许多牧师都告诉我说，他们都非常爱您。

早在 1872 年，穆尔豪斯就被医生告知他的心脏非常不好，其实，他的身体一向都不健康。但他都以饱满的热情一如既往地继续他的事奉。1880 年 9 月，慕勒从黑潭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来信：

亲爱的慕勒先生，我们在达灵顿（Darlington）和蒂斯河畔斯多克东（Stockton-on-Tees）有一个荣耀的时刻。在后一处，有上万的人听到我们主耶稣的宝贵福音，我们赶着马车走向人群分发圣经。在这地方，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一周时间，数百人正抬着头，有的眼里还含着泪水听加略

山的故事，您能想象吗？您的心一定很喜乐，您一直以如此便宜的价格供应我们圣经和福音小册子，然而所有的损失您都已得到了补偿。亲爱的慕勒先生，愿上帝祝福您。

几个礼拜以后，穆尔豪斯去世了。在他去世的 1880 年，慕勒的圣经知识社降价卖了将近 10 万本的圣经和新约，并且免费赠送了 4000 多本。除了英文圣经外，还有威尔士文的、丹麦文的、荷兰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葡萄牙文的、西班牙文的、俄文的、瑞典文的、希腊文的，还有希伯来文的。在那一年里，圣经知识社分发了将近 500 万本的小册子和小丛书。

在慕勒先生健在的时候，由慕勒和亨利·克雷克于 1834 年创建的圣经知识社，除了孤儿院的工作外，其他投资将近 50 万英镑。这一切中，慕勒将 115,000 英镑用于全世界的学校工作；将近 90,000 英镑用于圣经、新约、小册子和书籍的发行；超过 260,000 英镑用于全世界的福音差传工作。在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福音差传的鼎盛时期，慕勒每年向海外将近两百位宣教士奉献 10,000 英镑。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叶，每年资助 130 多位宣教士，资金达 5,000 英镑。所有这些资金都不包括在慕勒有生之年在威尔逊街和阿什利顿开办孤儿事业所花费的将近 100 万英镑。

“看看慕勒仅仅通过祷告所得到的，”雅各·麦克奎肯曾经说，“这样，我也可以通过祷告得到祝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做到了。祷告就是这么简单——“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从《圣经·马太

福音》7章7节到8节得到的简单的应许，慕勒在1880年的时候，用这段经文讲了关于“祷告”的一篇讲章。

“关于祷告，经文已给我们留下应许，”慕勒在讲道中说，“我不知道你或者我能不能做得更多，而不只是说‘祈求，就得着’。然而，在任何程度上，这一应许是如此的丰富、深厚、宽广和宝贵。我们可以将其他的经文与此相对照，因为那也是适合我们的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忽略这些经文中所包含的条件，将会妨碍我们得到祷告的全部益处。”

在他的讲道中，慕勒罗列了成功的祷告所依赖的许多条件。他说，第一，我们的祈求必须符合上帝的旨意。第二，我们一定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或品德来祈求，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经·约翰福音》14章13-14节）。然而，《圣经·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这样的，”慕勒很小心地提醒他的会众，正像他经常做的，“如果我仍活在罪中，继续从事上帝所憎恨的事情，那么我就不要指望我的祷告蒙垂听。”

第三个条件，我们必须在“上帝有大能并且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上操练我们的信心。“这是极其重要的，”慕勒说，“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读到，‘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或者说不管哪一种东西——‘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如果我单单相信，那么在上帝许可的时候，我一定会得到我所祈求的东西。在我成为基督徒54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我发现都是这样不变的。我特别愿意将这些放在你们的心中，好使你们在‘上帝有大能，并且愿意垂听你们

的祷告’上操练你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有能力也愿意这样做。要知道他有能力，你们只需看看耶稣基督的复活，要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必须是全能的。至于说上帝的慈爱，你们只需看一看十字架上的基督，看到上帝的爱并没有留下他的儿子，并没有留下他的儿子脱离死亡。有了这些上帝能力和爱的证据，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将一定得到，我们将一定获得。”

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持续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所要的祝福得以成就。注意观察，经文中没有说到祷告蒙应允的时间和条件。‘祈求，就得着’，这是一个积极的应许，但是没有提到时间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我将一件事告诉上帝，有必要告诉他两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吗？我告诉他一次还不够吗？’我们可以说，甚至一次也不需要，因为他事先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只是要我们证实我们对他有信心，摆正我们被造物对造物主的位置。

“还有，我们决不能忽视，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我们的祷告不能立即蒙应允。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经过操练，我们的信心得以刚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操练，那么总是保持在原有的水平。通过试炼，信心得以刚强。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借着我们显示出的忍耐，我们可以荣耀上帝。这是一个恩典，借此上帝可以极大地得到尊崇。我们所显示出来的忍耐能使上帝得荣耀。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对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我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我将给予一个说明……”慕勒从他深知的那些人的生命中列出了一些说明，然后结合自己大量的经验。

“如果我说，在我成为基督徒的 54 年零 9 个月的时间里，

我有 3 万个祷告蒙应允，或者在祈求的同一时刻或者在同一天蒙应允，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通常早上我还没有离开我的卧室，那天早上祷告的已经蒙应允，在一天期间，我有五六个祷告蒙应允，因此，至少有 3 万个祷告当时或者当天就蒙应允。但是，如果有人或他人可能猜想我所有的祷告都这样快地蒙应允。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所有的都这样。有时，我需等待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有时还得等待好多年。

“1844 年 11 月，我开始为五个人的悔改信主祷告。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不管我是健康还是有病、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也不管约定我讲道的压力是多么大，都从未间断过。18 个月过去了，五个人中的第一个才归主。我向上帝献上感恩，并为其余的继续祷告。5 年过去了，第二个才悔改。我向上帝献上感恩，并为其他的三个继续祷告。日复一日，我一直为他们祷告。6 年过去了，第三个才归主。我为这三个人归主献上感恩，并继续为其他的两个祷告。这两个人仍然没有悔改。上帝的丰富和恩典已使他的上万个祷告在当天和当时就蒙应允的那个人，为这未信主的两个人日复一日地祷告了将近 36 年，但他们仍然没有相信。到下个 11 月，从我开始为他们的悔改祷告，将要达 36 年了。我将继续祷告，盼望上帝垂听我的祷告。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等候上帝，继续祷告，只要坚信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因为他不愿意罪人死亡。这是上帝自己的启示——‘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人人都悔改。’因此，继续祷告，盼望得到答复，期待它，最后，你将为此向上帝献上赞美。”

在慕勒讲道的时候，那两个人仍未悔改，一个在慕勒去世之前成为基督徒，另一个在几年之后也归信基督。

第 21 章

忍冬花的芳香

从 1878 年 9 月到 1879 年 6 月，慕勒进行了第五次旅行布道。其中的高潮是访问西班牙的学校，这些学校近十年来完全由圣经知识社资助。在巴塞罗那一个贫穷的郊区，慕勒向一个学校的 150 名男孩子演讲，他说得非常缓慢，以便译员能够翻译他的话。

“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很爱你们中的每一个，每天都为你们祷告。从我的内心深处盼望在天堂里能遇见你们中的每一个，作为贫穷的、失丧的罪人，为了使你们能到那幸福的地方，你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慕勒继续向西班牙的孩子讲述了在阿什利顿的男孩子的情況。紧挨着男孩学校便是一个女孩学校，也完全由圣经知识社资助。慕勒向这些女孩讲完之后，他们为慕勒唱了一首圣歌。“一个很小的女孩，大约有六岁，黑黑的头发，明亮的眼睛，站在长板凳上，那时，她很轻松地用西班牙文背诵了《圣经·诗

篇》128篇，很显然，一字不差。”慕勒夫妇又继续参观了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另外一些学校，所有这些学校都完全由圣经知识社资助。

离开西班牙之后，慕勒夫妇又在法国南部待了数月，慕勒在法国讲道多次。在他们拜访一个教会附属的弱智和癫痫孩子之家时，院长说，慕勒先生是可敬佩的。

1879年3月间，慕勒和苏撒拿呆在芒通（Menton），每日在说法语和说德语的教会聚会。礼拜天的早上，那个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小礼堂里非常拥挤，门和窗都开着，另外几个人宁愿在春日的阳光下站在阳台上听慕勒讲道。在这三个礼拜听道的人当中，有一个英国人，大约40来岁，由于身体原因，来到这里休养，他就是查尔斯·哈登·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9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那年春天有好几次机会，慕勒夫妇和司布真一同乘敞篷马车外出。一天下午，他们沿着通向卡斯蒂格利昂（Castiglione）的都灵路（Turin road）行进。

“身处这样的风景当中，”当他们沿着小山慢慢行进的时候，司布真说，“从头顶到脚跟，我感到仿佛要忽然迸出一首赞美之歌。”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或者是慕勒和苏撒拿陪伴着他们的朋友一起这样做了呢？

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医生住在芒通，司布真正在那里养病，当司布真身体好的时候，便到贝内特的花园里去。还是那个春天，司布真记着说，慕勒夫妇和他在花园里呆了一天。司布真回忆说，贝内特医生走上楼来，饶有兴趣地听慕勒先生给他讲祷告的大能。

“我非常想买靠近我房子的一块园地，但是，园主要价是它价值的100倍。”贝内特医生对慕勒说。

“你应该为此事祷告。”慕勒说。

“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向上帝祷告？”贝内特说，“你可以非常正当地为你的孤儿院祷告，但是，为这小小的园地来扩充我的花园，我不能找出很好的理由。”

“但是，”慕勒反驳说，“如果我们屈从于贪婪的要求，它可以鼓励罪人，因此，我认为你可以祷告园主不再要过高的价钱。”

“他像头脑简单的乡巴佬，”贝内特回答说，“或者尽力守住他们的土地，或者从他们想象是一个活金矿的英国人手中得到他们所有的，按我的观点，他们是可以原谅的。”

慕勒微微一笑。司布真后来评论说，“他们两个人的灵性都是好的，但是当然了，慕勒孩子式的单纯，圣洁的盼望使他更胜了一筹。他不是一个假装虔诚的人，内心充满真正的喜乐、甜蜜的平安和单纯的快乐。”小查尔斯·司布真在一次信中写道：“通过与慕勒的交往，他的父亲宣告说，自己比以前更能‘只要信，不要怕’！”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旅行布道的时候，慕勒在圣雷莫（San Remo）、佛罗伦萨和罗马讲道。之后，他们来到那不勒斯。在那里的时候，有些来自布里斯托尔的海员，听说慕勒正在那一地区，便邀请他们为他们讲道，慕勒便在港口的一艘船上给他们讲道。随着他们旅行的继续，他们爬上了维苏威火山，对那里的风景惊叹不已。在水上城市威尼斯，他们乘刚度拉（Gondola）（狭长的平底船）游玩。之后又来到瓦勒度谷（Waldensian val-

leys)，几个世纪以来，瓦勒度的基督徒，追寻使徒时代的传统，一直住在相当偏僻的山村里面，几乎没有被世界上其他教会的发展所影响。

在圣马丁和卢塞恩两个主要流域，关于小教会的信徒，苏撒拿写道：

为了参加那里的聚会，我们必须步行数英里。这些瓦勒度的基督徒通常都很贫穷，他们中许多人住的房子，房顶不是用石板瓦或者瓦片而是用粗糙的、扁平的石头松散地连在一起，他们房屋的窗户，不是用玻璃而是用纸糊着。在坡默来特（Pomaret），一些人站在家门口注视着我们，因为我们的访问是他们所盼望的，所以，当我们前行的时候，他们纷纷向乔治·慕勒牧师致以尊敬的鞠躬和敬礼。

5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牧师在威拉赛彻（Villa Seche）的家。晚上，在他的陪伴下，我们去他的教会，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瓦勒度人崇拜的地方，位于一座山的最高峰，在牧师的家以上几百英尺。一条陡峭的、崎岖的、迂回曲折的、布满松散的小石头的山间小道，将我们带到通向教会的大山中来。因为有一些小溪流过了这些斜坡，有时候水会漫过我们的踝子骨，整个地区是出奇的幽静和寂寞。经过这长途的、汗流浹背的、疲倦且几乎是气喘吁吁的旅程之后，我们到达那个教会。那是一个很大的老式建筑物，里面坐满了纯朴的信徒，他们已经宣布5点开始聚会，然而环境不允许，直到7点我们才到达那里。信徒们已在那里静候我们两个多小时。慕勒向会众讲道一个小时后，便开

始唱诗和祷告，用的是法语，慕勒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氛围中。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向会众分发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小册子，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握手道别。9点刚过不久，我们就抵达山下牧师的小屋，那是一个瑞士小木屋，有凸出的屋顶，外面有两个木制的阳台。在这山上的家里，家里的摆设都是最简单的，也尽可能地节俭，生活中许多舒服和方便的东西，甚至通常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都很缺乏，但是，我们被招待得很周到，我们对这次小小的访问都感到非常开心。

靠近最大的瓦勒度人居住地拉土尔（La Tour），在圣琼斯（St Jean）的一个学校里，慕勒再一次用法语向许多会众讲道，在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祷告说，我们这位弟兄精彩的讲道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另外一个绅士说，慕勒先生对我们需要做什么讲得很清楚，他的布道真是精彩极了。

慕勒结束第一次美国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收到了100多封邀请他讲道的信，但他并没有马上接受。因此，在从欧洲回到布里斯托尔几个礼拜后，即1879年8月末的时候，慕勒夫妇便登上日耳曼号轮船，再一次驶往美国。

1879年9月14日晚上，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南二街的卫斯理教会，牧师正向他的会众介绍一位来访的讲员。

“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从我们所尊敬的朋友的心里和口里，我们将听到他所传讲的福音。他，现在虽然已经74岁了，但在过去的四年里，在他访问过的

诸多城市和国家，讲道已达 1400 多次。你们年轻人听着、记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我们看上帝为了他的圣工，是多么乐于坚固那相信他、寻求为他荣耀而活的人。现在我以最大的喜乐，向你们介绍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来的乔治·慕勒先生。”

根据《圣经·以赛亚书》3 章 10 节到 11 节，慕勒作了一篇极有能力的讲道。

12 月，在大多伦多的沙夫茨伯里 (Shaftesbury) 礼堂召开大会，论述圣经中基督和他的再临问题，慕勒是大会其中的讲员之一。在最后的下午，慕勒公开回答九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被争论得很激烈，就是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是盼望我们的主随时再来呢，还是在某些事件成就之后再回来呢？”提问题的人问道。

当慕勒站起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数百人的心跳有点加速。

“我知道对这一问题，有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我不希望将我所得到的亮光强加给别人。然而，这一问题对我来说，已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近 50 年来，我一直是一个细心、勤奋的学圣经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根深蒂固、毫无怀疑。圣经很清楚地表明，直到那离道反教的事出现，大罪人、“地狱之子”或者是代表敌基督的一个人已经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正像《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2 章所描述的。许多上帝的话语都清楚地教导说，某些

事情要成就，然后救主耶稣基督才来。然而，这改变不了基督再来的事实。死亡，不是教会的最大盼望，如果用正确的心态，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作的，我们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10节）。”

最后，慕勒在多伦多的首都大教堂（Great Metropolitan Church）向广大的会众讲了一场道，题目是《圣灵的内住和能力》，取自《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在这次旅行布道中，慕勒讲道300多次。

他们于6月16日到达利物浦，第二天到达阿什利顿，孩子们早已集合起来，准备欢迎他们，当他们第一眼看到慕勒夫妇归来的时候，他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一个小女孩走向前来，送给苏撒拿一大把的忍冬花，慕勒微笑着站在一边。许多年以后的1939年，还是那位女孩，已经60岁了，写道：

我总是追逐着忍冬花的芳香，但是从没有发现有那样的一把忍冬花进入我的记忆——每一支看起来很小也并不美丽……我刚从威尔特郡（Wiltshire）工作两个礼拜回来。我很盼望有机会访问布里斯托尔，也可能我没有时间，可能那可爱的老家看起来已经变了。我在那里的11年感到非常美丽、非常幸福。我将永远留住那美好的回忆。

乔治和苏撒拿也是如此，回到老家非常高兴。

慕勒上次离开北美的时候，又有150封邀请他讲道的信。

因此，1880年9月，慕勒和苏撒拿又一次离开故土前往魁北克。又一次见到达顿船长分外高兴。他在萨丁尼亚号船上讲道八次，带领了三次查经会，向乘客和船员分发了大约200本的小册子。这一次，大雾没有耽误萨丁尼亚号轮船的航行。

停留在波士顿的日子里，慕勒参观了普利茅斯并在移民教堂讲道，该教堂由1620年12月首先到达那里的英国清教徒建立。慕勒和苏撒拿还参观了建在新英格兰的第一栋房屋，造访了由“五月花号”带到美国的圣物博物馆。

在纽黑文、康涅狄格，慕勒好几次向耶鲁大学的老师、同学讲道，有一次在演讲中，他说：“我得到的最大益处就是，当我还是哈雷大学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归信基督。”

从1880年12月到1881年3月，慕勒和苏撒拿在纽约度过了冬日。在30年不遇的最冷的冬日里，他们常常乘船经过冰河，因为冰块太厚，轮船被迫破冰艰难前行。慕勒讲道将近100次，其中包括将近40次向纽约布鲁克林地区的50万德国人讲道。

在他们的第八次旅行布道中，慕勒和苏撒拿参观了埃及、巴勒斯坦、土耳其和希腊，在埃及的时候，还忙里偷闲参观了金字塔。

慕勒夫妇乘着由三匹马拉着的一辆俄罗斯敞篷马车向南穿过巴勒斯坦，他们发现旧约圣经提到的“流奶与蜜之地”已经变得贫瘠、沙化、不宜耕种。苏撒拿说上帝的咒诅不仅落在犹太人身上，也落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不清楚是否她的丈夫赞同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今天被争议得很激烈。但是，她记得《圣经》上说过，在耶稣回来的时候，那时以色列国都要悔改并得救，“旷野将要欢呼，玫瑰将要开花”。

在耶路撒冷的地中海宾馆，他们搬进了第一层一个理想的角房，从那里能够很好地看到橄榄山。住在那里的整个日子里，他们每日都在宾馆的平顶走廊上散步，欣赏壮观的橄榄山全景。

慕勒在耶路撒冷用英语和德语讲道数次，当需要的时候，就请人翻译成阿拉伯语。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足3万，包括8000个住在最贫穷地区的犹太人。从圣经中的预言来看，苏撒拿观察说，“在当时，还没有一点迹象表明犹太人将从世界各地大范围地聚集并回到自己的国家。”

12月的时候，78岁的慕勒和苏撒拿加入了英国朋友的一个团队，骑着驴去伯大尼，在路上他们越过汲沦溪，参观了从岩石上凿出的山洞，人们认为拉撒路曾埋葬在那里。他们看到一座很老的毁坏了的房子，他们被告知说那是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曾住过的。从橄榄山的山顶，他们能够看到约旦的平原，那是水土滋润的平原，罗得曾为自己挑选那里；还能看到远处的摩押山、围绕亚度兰洞的乡村、还有约旦河流入死海的人海口。气候宜人，日落以后，整个地方被一轮满月照得雪白，从橄榄山下来时，他们惊叹耶路撒冷风景的壮观。他们还经过客西马尼园，其中的一些橄榄树可以追溯到主耶稣的时代。

另一天，他们骑驴去伯利恒，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六英里，在一个拉丁女修道院的回廊里吃过午饭以后，他们参观了建在主耶稣出生的马槽位置（按照传统说法）的一座教堂。当他们停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参观了苦路、奥马清真寺（建在以前所罗门圣殿的地方）、圣墓堂（按照传统说法，我们的主耶稣在此钉十字架）、押沙龙柱、毕士大池、希律王宫旧址、保罗被抓的城堡遗址和西罗亚池。

在耶路撒冷呆了九个多礼拜以后，慕勒夫妇又回到雅法住了一个礼拜，然后登上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本打算将他们带到奥地利的大船“花神”号上，这大船停泊在海岸以外，正准备开往海法（Haifa）城。一阵大风吹来，于是：

我们的小船冲过巨浪，避开岩石，在浪尖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那艘大船。此时，正好一个巨浪扑来，把我们的船连上了大船，我们加倍小心，冒着生命危险一个挨着一个，爬到通向大船甲板的梯子上。

在海法，一些德国的基督徒遇见他们，用敞篷马车冒着倾盆大雨将他们载到杜梅蒙卡梅尔旅馆（Hotel du Mont Carmel）。据说，慕勒的讲道使那里的众多德国移民的信仰有所复兴。

2月的时候，他们骑驴去迦密山，住在靠近山顶的一个修道院里，在那里修士们用黑咖啡和桑葚酒招待他们。修士们还带他们去了一座教堂，在教堂里，他们带慕勒夫妇参观了一个山洞，修士们告诉他，以利亚曾在那山洞里住过。然后领他们去看一个灯塔，站在悬崖上，他们可以看到壮观的景象。阳光普照、风和景明，站在这里，他们想象着，以利亚怎样通过祷告，让火从天上降下，将坛上的祭物烧掉。

在后来的旅途中，慕勒在君士坦丁堡讲道多次，并且与苏撒拿一道参观了位于斯库台（Scutari）的营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曾在那里救治克里米亚战争的伤员。从他们所住的宾馆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著名的 d'Angleterre 宾馆，他们对一些人跳伊斯兰教托钵僧舞极感兴趣。苏撒拿回忆

说，“他们一共有 18 个表演者，穿着褐色的大氅，戴着高高圆圆的毡帽。在一个特殊的暗号下，他们都侧着脸平躺下，但后来又站起来，围着房子转几圈，双臂合拢，一边鞠躬一边转圈好多次。然后，他们的大氅忽然脱下来，露出长长的、吊钟形的裙子和夹克，尽力伸臂后，又开始跳舞和旋转，像陀螺一样旋转大约 15 到 20 分钟，能转多快转多快。”

慕勒在雅典的讲道安排非常繁忙，但是仍能抽出时间参观雅典的最高法院、玛尔斯山（Mars Hill），并且到了保罗当年发表著名演说的地方。他们也考察了卫城，看到许多古代神庙的遗迹，在 1800 年以前，这些拜偶像的神庙曾把使徒们的心搅动得非常不安。

经过哥林多（corinth）、罗马和佛罗伦萨，前后经过九个月的行程，最后又回到阿什利顿的家。

第 22 章

被众人爱戴

不论长途旅行布道何时归来，慕勒都发现，在能干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的女婿雅各·赖特使阿什利顿的各项工作运转得都很好。每当出现问题，需要慕勒来评判，而他又适逢在国外旅行的话，赖特便经常写信相告。一开始人们忧虑慕勒不在孤儿院的时候奉献会减少，但这种忧虑在慕勒开始海外工作的第三年便减轻了，因为那年的总收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因此，慕勒和苏撒拿毫不犹豫地于 1882 年 8 月开始了他们的第九次旅行布道，这次他们再次前往欧洲。在迪塞尔多夫，慕勒很高兴被城市教会的牧师问安，六年之前，他曾见到过这位牧师。

牧师告诉他说：“我决心采取您的建议，我更加迫切地为我的儿子祷告，您离开后两个月，六个儿子中的五个便归信基督，现在第六个也在慎重考虑此事。”

离开迪塞尔多夫，他们沿着莱茵河来到海德堡、曼海姆 (Mannheim)，然后来到维也纳，在那里他们有好多次聚会。他

们参观了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然后经过莱比锡，到达在他学生时代呆过好久的哈尔伯施塔特。在这里，他绕着大教堂漫步，62年前，他第一次在这里接受圣餐。第二天早上，他们沿路一直来到克罗彭施泰特。

“这条路与我孩童时代看起来是那么相似，只不过那时路的两边是白杨树，现在是水果树罢了。”慕勒对苏撒拿说道。

从他的孩童时代，这是慕勒第一次回到克罗彭施泰特，在一个大厅里，他聚了两次大会，当地的乡亲蜂拥而至，来听他们最出名的儿子汇报他的生活和工作。慕勒发现他出生的房子还在，慕勒带领苏撒拿参观了位于海姆斯勒本的房子，当他四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离了那里。

离开海姆斯勒本，他们来到柏林，向好多会众讲道数次，也向那时还不盛行的家庭聚会点讲道。接着来到但泽（Danzig），慕勒遇上了他在哈雷大学的两位同学，他们两位都已经作牧师50年了。在柯尼斯堡（Konigsberg），在圣诞节的那一天，他向那天早上聚集在特拉黑莫（Tragheimer Kirche）教堂来听他讲道的3000会众讲道。

在12月底的时候，他们登上了开往圣彼得堡的普鲁士火车，坐的是有暖气设备的舒适卧铺车厢。当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行驶在广大的雪原里，在圣彼得堡火车站，列文（Lieven）女王殿下和帕斯考夫（Paschkoff）陆军上将到车站迎接他们。后者是帝国卫队的一名军官和富有的绅士，慕勒描写他是“整个大帝国最活跃的基督徒之一”。

“当你们在俄罗斯的时候，你们愿意跟我住在一起吗？”女王问道。苏撒拿称她是“在主里面的亲爱姐妹”。

“然而，我们很少接受朋友的邀请而住在朋友家里，因为我想得到尽可能多的休息和自己的时间，我们谢绝了她的邀请，我们去了一家宾馆，在那里住了两夜。然而，结果发现女王特别渴望我们成为她的客人，如果我们对她热情好客继续拒绝的话，她将会非常失望。于是，1月1日，我们来到她的官邸，在那里受到最热情的接待，总共有11个礼拜之多。”

女王安排慕勒夫妇住在著名的孔雀石大厅这一房间，因为它华丽的孔雀石顶棚、柱子和檐口，所以被称作孔雀石大厅。孔雀石是采自乌拉尔山脉的一种坚硬、绿色的石头，擦洗以后，非常漂亮。尽管膳宿供应相当奢华，但是，慕勒在圣彼得堡既不悠闲也没有兴奋。他在属于英国和美国的教堂讲道16次，8次用德语在德国改革宗教会讲道，11次用德语在莫拉维教会讲道，在英国和美国的教会三次为瑞典人讲道，由译员翻译成瑞典语。参加了三次牧师的聚会，在陆军上将帕斯考夫的官邸里举行了五次大的家庭聚会，在考夫（Korff）伯爵家里举行两次，在女王列文家里举行了35次。除此之外，每天接待来访者和慕名而来的人，与基督徒工人小组有40次的单独会谈，在探访医院病房和孤儿院时，他也不时地讲道。

19世纪末期，托尔斯泰的《复活》描写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举行的家庭聚会。耐克黑多夫（Nekhlydov）的婶婶，卡特瑞纳·伊万诺娃（Katerina Ivanova）女伯爵，被描述为“相信救赎是基督教的中心这一教义的热心支持者”。托尔斯泰描写说，信

徒坐着豪华的马车，去参加安排在女伯爵舞厅里的家庭聚会。女士们穿着绸子、丝绒和花边，戴着假发，绣着花边的紧身上衣上有衬垫的图形，坐在装饰豪华的舞厅里。在女士中间，是穿着制服和晚礼服的男人，其中有五六个来自下层阶级：两个看门的，一个店主，一个男仆和一个马夫。凯瑟威特（Kiesewetter）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传道人，有着灰白的头发，说着英语，一个苗条的女孩戴着夹鼻眼镜，翻译得又快又好。传道人说，我们的罪太大，该受的惩罚是巨大的和不可避免的，想想这些惩罚，简直不能活下去。

托尔斯泰对凯瑟威特几分令人反感的描写可能基于慕勒先生，但更有些像 F.W.贝尔德克（Baedeker）博士，他是大陆旅行指南的作者贝尔德克（Baedeker）的堂兄，而他自己也出了好几本旅行指南。贝尔德克的家在滨海韦斯顿，自 19 世纪 60 年代就成为慕勒的亲密朋友，他常常造访圣彼得堡，住在列文女王家里。他曾提到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和托尔斯泰伯爵促膝长谈英国和俄罗斯的生活问题。

慕勒从俄罗斯内务部长那里得到应许，可以在圣彼得堡的德国教会讲道，也可以在英国的教会里向瑞典人讲道。从部长得到的许可证是用俄语写的，慕勒看不懂，但是他被告知，他想要的许可证已经得到了。

2 月 9 日，礼拜五的晚上，在女王的官邸里，慕勒接待了一些不速之客——警察，他们感到很吃惊。

“明天早上，你们去见警察局长。”

第二天早上他们来到警察局，警察局长对慕勒非常客气，握着他的手，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歉意。

“有人控告你们说，举行聚会并翻译成俄语，但却没有内务部长的许可证。”

从那时起，在陆军上将帕斯考夫家里的聚会被警察禁止，几年以后，陆军上将帕斯考夫因为热心传道、私设家庭聚会和分发福音小册子，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流放到西伯利亚。

慕勒夫妇发现这里的寒冷比他们以前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时候更甚。然而，寒冷阻止不了他们的一点儿冒险。3月间，他们乘雪橇游览了住在涅瓦河冰层上的拉普兰人（Laplander）的居住区。慕勒夫人写道：

一群拉普兰人穿着皮衣，暖和的皮毛朝里，看起来好像是用他们的衣服缝合起来的。他们靠近一个帐篷站着。有人告诉我们他们不穿内衣，从不洗澡也从不换洗衣服，除非长时间穿用或污垢使其破烂。拉普兰人的小棚内部也是如此，建在冰上，显出蹩脚的、不舒服的样子。小棚由兽皮做成的帐篷组成，皮毛朝里，顶上敞着，有人告诉说，这样既作窗户又作烟囱。一个铁皮锅，盛着汤，吊在帐篷中央的一堆小火上，小棚的冰层地板上盖着地毯，但是里面的摆设极其难看……

他们经由波兰回到英国。在波兰，慕勒工作的高潮是成功触及到罗兹（Lodz）人的心灵，罗兹是一个工业城镇。在那个城镇聚会满满一个礼拜后，慕勒收到一封信：

我，还有几乎全城的人，奉主耶稣的名，请求您大发

善心，跟我们一起住到下一个礼拜天。我代表数千市民，对您的事奉，说一声“谢谢。”

参加慕勒聚会的人数继续增长，达到了德国浸礼会教堂的最大容量，大约有 1200 人。慕勒太太注意到，“讲道的内容成了工厂、公共场所和许多私人家庭谈话的主题”，他们尽可能地延长了他们在此的访问时间。

5 月，他们回到英国，慕勒在人数众多的迈德美大会 (Mildmay Conference) 上讲道七次。然后，当 6 月间回到阿什利顿的时候，那么多的孩子在等候欢迎他们的归来，他们两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1883 年 9 月，慕勒夫妇离开蒂尔伯里 (Tilbury)，坐上西姆 (Siam) 号轮船前往印度的马德拉斯 (Madras)。10 月末的时候，他们到达马德拉斯码头，慕勒在那里讲道多次，包括一次在苏格兰自由教会向 400 印度教信徒讲道。他们雇用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男仆跟他们一道游历印度，亚伯拉罕会说兴都斯坦语、泰米尔语和卡纳里语。

12 月，他们登上“同伽” (tonga) ——由小马拉的有篷的双轮马车，带他们去位于科纳 (Coonoor) 的尼尔吉里 (Nilgiri) 山脉。然后他们去贝拿勒斯 (Benares) 旅行，它是印度教圣城之首，在那里，他们跟伦敦宣教会的约翰·休利特 (John Hewlett) 牧师住在一起。要考察那座城市，必须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因此有必要早早出发。2 月 22 日，他们 5 点便起床，乘一辆敞篷马车开始畅游该城和市郊。他们游览了一个著名的印度教哲学学校，在那里许多婆罗门教徒、老师和学生都很忙

碌。然后，他们登上了一艘小汽艇，沿着恒河欣赏该城的壮丽风光。他们看到许多上下河道的洗澡阶梯、一个烧东西的架子，用来烧死人的尸体。还有许多的寺庙、清真寺和圣井。当他们在船的甲板上观望的时候，他们看到三具尸体顺河而下，乌鸦站在其上啄食腐肉。

“有些印度人很穷，买不起烧尸体的柴，因此，他们的尸体被直接扔在河里。”他们的导游这样告诉说。

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和阿格拉（Agra），他们得以游览泰姬陵，在拉合尔（Lahore），他们与查尔斯·艾奇逊（Charles Aitchison）先生一起住在政府大楼，之后，他们去德里（Delhi）和波那（Poona）旅行。他们一大早便向距波那四英里的帕布特山（Parbuttee）出发。在山脚下，他们下了马车，登上山顶，惊叹那里的风景。山顶上有一庙宇，供奉湿娃神（God Shiva）、另外的神及女神的牌位。他们的向导是一个印度教徒，自然向他们谈起这些神明，苏撒拿对别的宗教不感兴趣，以她一向的直言不讳打断他的话：

“我们不相信湿娃是主，但是相信那位派他的儿子为可怜的、失丧的罪人死，在圣经中启示出来的那位。”

“我也相信一位上帝。”他们的向导说。

“你曾经听说过耶稣基督吗？”

“没有。”

“那么，你怎么不问一下善良的宣教士告诉你关于耶稣的故事呢？不相信耶稣，你将永不能到达天堂。”

“我一定尽力了解他，”导游说，“我一定尽力，我一定尽力。”

孟买乱哄哄的行程使他们的印度之旅宣告结束。在他们离开印度之前，苏撒拿收到一封信，说慕勒“被印度数以千计的人所爱戴，我相信在别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

1884年5月初，他们与仆人亚伯拉罕依依道别，然后登上了去亚丁（Aden）和回家的印度斯号船。6月5日，他们在帕丁顿区（Paddington）赶上了快车，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布里斯托尔，在经过两万多英里的旅途后，终于到达3号院的家里。

接下来的三次旅行布道都在英国的诸岛上。

第14次的旅行布道经由美国，把他们带到以前从未去过的国家。1886年1月23日，他们登上了“澳大利亚号”轮船开往悉尼的杰克逊（Jackson）港，在那里他们住在佩里宾馆（Perry's Hotel）直到3月初，慕勒举行了好多次布道会，并由阿尔弗雷德·史蒂文（Alfred Stevens）先生引荐给卡林顿（Carrington）勋爵、新南威尔士长官，并拜访悉尼市的总检察官雅各·马丁（James Martin）先生。

旅行的下一站是巴瑟斯特（Bathurst）和墨尔本，在皇家剧院，慕勒曾两次向3000多听众讲道，在墨尔本城市礼堂，慕勒有机会向5000听众讲道。

8月间，他们继续向爪哇进发，然后是香港，并在香港讲道多次。然后直到中国的核心上海、汉口和南京讲道数次。在这次对中国的旅行布道中，慕勒遇到了泰勒·戴德生以及好多与戴德生一起在中国内地会事奉的宣教士。慕勒又前往日本的横滨、东京、神户、京都及大阪，许多听众都来听慕勒先生讲道。

1887年8月到1890年3月，是乔治和苏撒拿最后一次离开

欧洲海岸的旅行。他们首先经由美国来到阿德莱德 (Adelaide)、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 (Tasmania)，在持续几个月的停留中，慕勒讲道多次。在皇后镇 (Queenstown) 一系列的聚会，拉开了他们在新西兰旅游的序幕，然后，他们在金斯敦赶上了去达尼丁 (Dunedin) 的火车。在一个很长的客厅式车厢里，有一位绅士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坐在他们的对面。这位绅士大声地向周围的乘客读着报纸。

他读道：“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乔治·慕勒牧师，将要来达尼丁访问，我极想见到他。”

“慕勒先生就坐在你的对面呢！”一个旅客说。

那位读报纸的人高兴极了，摘下帽子，与慕勒和苏撒拿连连握手，苏撒拿写道：“我们这位同行的旅客看起来对我们很有兴趣。”

在达尼丁，他们住在一个豪华的宾馆里，每一次聚会听众都爆满，包括在可以容纳将近 3000 人的加里森大厅 (Garrison Hall) 里的聚会。他们在新西兰，去了查墨斯港 (Port Chalmers)、奥玛鲁 (Oamaru)、蒂玛鲁 (Timaru) 和惠灵顿。1888 年 2 月 27 日礼拜一，一份惠灵顿的报纸这样说：“昨天晚上，从英国布里斯托尔来的乔治·慕勒牧师，在大剧院讲道，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听众，不仅座无虚席，还有几百人不得不站着听道。”在他第三次访问悉尼的时候，慕勒讲道 86 次。

12 月末，他们到达加尔各答，开始了他们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不久他们就雇用到一位印度的男仆陪同他们旅行。这次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一位马德拉斯 (Madras) 人，名字叫约翰·拿但业 (John Nathaniel)，慕勒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辛苦，尽

管天气非常炎热，他仍然讲道多次。不管白天黑夜，蚊子对他们都造成很大威胁。虽然苦力拿着大葵扇不停地在客厅、餐厅甚至晚上的时候也在卧室不停地扇着，但很难让他们真正凉快下来。

慕勒已经 83 岁了，苏撒拿对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放心。

“你必须听听医生的建议。”苏撒拿告诉慕勒说。

医生对慕勒说：“这里太炎热了，你一天也不能再呆在加尔各答，否则，就是拿你的生命作赌注。”

因此，4 月 29 日下午 4 点半的时候，他们乘火车离开加尔各答，但没过多久，慕勒的情况变得很严重，苏撒拿认为他将要死了，这一地区也找不到设备好一点的宾馆和车站。

在他们的车厢里，慕勒躺在长凳上喘着粗气，苏撒拿将一个枕头放在他的头底下，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扇着扇子，并劝他稍微喝一点酒，吃一点三明治。

“请为慕勒先生取一杯茶或一杯柠檬汁。”苏撒拿对约翰·拿但业说道。

苏撒拿迫切地为慕勒祷告，想方设法维持他的生命，晚上 9 点，他们到达达姆克达（Damookdea）码头。发现慕勒的脉搏还比较正常，苏撒拿便鼓足勇气登上了一艘渡轮。她发现甲板上有两把椅子，因此慕勒可以坐在那里，得到来自恒河夜风的吹拂，在萨拉（Sara Ghat）码头，他们上岸了。

他们来到火车站，在另一列火车上，约翰·拿但业找到一个舒服的卧铺包厢，让慕勒先生躺下。第二天早上 9 点，他们到达西勒盖瑞（Silgari）。他们乘蒸汽有轨电车从那里起程，驶向喜马拉雅山方向，到达大吉岭（Darjeeling），慕勒被送上一辆人

力车，两个尼泊尔的苦力用肩膀抬着一个小轿（dandy）把苏撒拿抬上了一条又陡又长、通向罗克维尔（Rockville）的路。在一个位置很好、可以望见喜马拉雅山风景的一个旅社里，慕勒从死亡线上恢复了过来。

第 23 章

渴慕上帝的美善

在好几次旅途当中，有时我们连续几周处在零下 45 到 48 度的寒冷中，在另外的时候，则处在 33 度到 43 度以上的酷热中。我们还经历到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之处，而这些若不亲身体验便无法完全理解它们给人带来的痛苦。在海上，我们则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大风，有时甚至有台风忽然临到我们，那时，情况相当危险。在陆地上，我们不得不紧张地旅行，有时须不间断地旅行 20 或 30 个小时，更有一次我们一直在火车上待了六天六夜。虽然如此，总体说来，在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都受到极好的接待，但有时我们得忍受最难受和次等的待遇。有两次，虽然是很宽敞的一等船舱里的最好的房间，但由于蚊叮虫咬，我们还是极度的劳累。在美国、新南威尔士、锡兰和印度，蚊子都很厉害。有两次在一等船舱里，竟有那么多耗子，夜里的时候，它们从我们身上跳来跳去。然而，到目前为止，上帝一直帮助我们，我们也毫不怀疑，他将帮助我们到底。

上帝确实是这样的，在从加尔各答到大吉岭的火车上，短短的几天，慕勒几近死亡，但他能从繁忙的工作——定时讲道、作演讲、带领查经会、起草圣经知识社第 50 年的年度报告等等中恢复过来。

在印度的旅行布道中，他们去过西姆拉 (Simla)、马索雷 (Mussourie)、德拉敦 (Dehra Dun)、阿格拉 (Agra)、坎普尔 (Cawnpore)、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在阿拉哈巴德，慕勒向来自五个不同教会、在露天举行爱宴的 700 位印度基督徒讲道。

在贾巴尔普尔 (Jubbulpore)，慕勒收到一封来自他女婿雅各·赖特的电报：慕勒唯一的孩子丽迪亚·赖特于 1890 年 1 月 10 去世，享年 58 岁。对他女儿的病情，以前他毫不知情，因此，他描写这一消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他从罗马书 8 章 28 节得到安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慕勒决定从孟买坐第一班合适的轮船返回英国。

甚至在孟买等候第一班开出的轮船时，慕勒还利用这时间讲道 15 次，并向一艘普鲁士军舰的水手用德语讲道。当他们到达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理由赞美上帝，因为整个工作在失去爱妻的赖特先生的带领下，正运转得井井有条。”

1890 年的夏天，有四个多月慕勒在阿什利顿工作。然而，他极需要休息。于是，8 月间他和苏撒拿离开英国，沿莱茵河顺水而下，经过优美如画的古迹，这些古迹分散于美丽的树木和茂密的乡村间。在海德堡，他感到疲乏已去，精力倍增，于是在德国宣道会堂，慕勒讲道四次。他将他的休息扩展成长期的旅行布道，在德国和瑞士向许多听众讲道。

然后他们向东转移，慕勒在维也纳讲道，在那里邂逅他的朋友 F.W.贝尔德克，慕勒按手为 68 岁的贝尔德克博士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你仆人分别出来，专门服事被放逐的弟兄，我将他交托在你的恩翅庇护下。”

前些年，俄罗斯东正教已经下定决心将浸礼会、Stundists 和跟随“帕斯考夫异端”的人加以严惩。陆军上将帕斯考夫是数千个流放到西伯利亚、外高加索或者帝国的其他偏远地区的人之一。贝尔德克越过西伯利亚来到萨哈林岛（库页岛），探访和鼓励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团契。

慕勒继续向南旅行，来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讲道。5 月间，他和苏撒拿回到英国，直接回到阔别了 21 个月的阿什利顿。

旅行布道结束了，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慕勒和苏撒拿先后旅行 20 万英里，去过 42 个国家，现在，慕勒已经 87 岁了。

那一财政年刚刚过去几个礼拜，慕勒夫妇回到阿什利顿，那年的财政结算止于 1892 年 5 月，是孤儿院历史上第二个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第一次这样的情况是 1881 年至 1882 年间，那一年的支出大于收入将近 500 英镑，但是不到一月，在新的财政年开始的时候，收到了一笔遗产捐献，并且是头一年财政赤字的三倍多，这些都发生在年度账目出版之前。

这一次，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开支比收入几乎多 2000 英镑，然而有 16 份，价值近 3000 英镑的遗产，已经被捐赠者留给孤儿院，可以随时支取。另外，还有 40 到 50 份的遗产，也已经留给孤儿院，价值接近 2600 英镑，但需依靠立遗嘱人的遗孀和亲戚方能支付。然而，阿什利顿的五座孤儿院已经

建立并装修好了，总共花费 11 万 5 千英镑，没有一个因为抵押而欠债。孤儿院还拥有 19 英亩价值数千英镑的建筑用地。凭借这一切，慕勒毫不费力地从银行借到短期贷款，以填补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在欠债的情况下，慕勒感到不快乐，他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上帝这样待我们，指明我们应当缩小我们的规模，这是上帝的旨意。孤儿院当如何办、办多大的规模？我们正在等候上帝的带领。兴办孤儿院，我们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即荣耀上帝。当我建立孤儿院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则这样写道：‘不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同样的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应付目前的开支，那么业已存在的规模我们也不能运转下去。”

在这一情况下，首先工作的收缩即在全日制学校方面。1892 年 7 月末，慕勒宣布国外大部分的孤儿院和学校将在 10 月 31 日关闭，在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坡顿（Purton）学校，其校舍归孤儿院所有，那里的教师经过培训后，来阿什利顿工作，像通常一样继续开办。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所有学校，还有英国的三所，都将继续开办，但圣经知识社不再支持他们，当圣经知识社有能力的时候，再帮助他们。而主日学校将继续得到资助。

至于孤儿院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后，慕勒和他的工作人员最终领会上帝的旨意：规模不能再继续扩大了。本来，慕勒已经买下了 10 英亩的土地，对着四号和五号工程，他计划再建两所更大的孤儿院。1893 年 3 月，他以每亩 1000 英镑的价格卖了这块地，换回将近 10500 英镑。

19世纪结束的时候，慕勒所关注的孤儿问题本身也得到了缓和。民意领袖诸如查理斯·狄更斯、沙夫特波瑞（Shaftesbury）的厄尔（Earl）等，已经在全国唤起对儿童的关注。除了慕勒之外，另外如巴纳多（Barnardo）、费根（Fegan）以及英国教会儿童协会等也开办了孤儿院。他们效法慕勒的榜样，十八世纪入住孤儿院的重重障碍、通过捐款人选举入院的人住制度，也由于慕勒的影响，统统一去不复返了。

苏撒拿·慕勒现在已经73岁了。1894年1月13日，慕勒在日记中记着：

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上帝将她赐给我23年零6个礼拜后，将我亲爱的妻子取走。靠着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作为，我不仅十分满意，而且我亲吻掌管这一切的手。在此事上，我再一次看到上帝话语的成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圣经·罗马书》8章28节）

慕勒又成了鳏夫。他写道：“经过62年零5个月幸福婚姻生活后，我感到非常孤独，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但对上帝所曾给我的，这么长的时间他留给我、现在又拿去的，我都持续不断地献上赞美，因为这一切对我都是好的。在我妻子去世这件事情上，我仍然不断地赞美上帝的美善，因为他现在已完全释放我的妻子脱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疾病，因此，在上帝面前，我有说不出的喜乐。因为上帝大大地托住我，并且使我完全胜过了孤独。”

在最后的旅行布道结束以后，慕勒很少离开布里斯托尔。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放弃了保罗街 21 号的住宅，搬进阿什利顿 3 号院的一套房子，这里，成了他余生的家园。

1895 年 9 月，在他 90 岁生日的时候，毕士大教堂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

“我的声音比 69 年之前更宏亮，我的头脑仍像以前那样灵活。”在他的答谢发言中，他这样说道。

同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思路清楚，头脑仍像 1825 年 3 月我通过大学考试时一样（71 年前），因此我仍能胜任工作。”

他仍然定时参加毕士大教堂、奥马路教堂（Alma Road）和斯托克斯克罗夫特（Stokes Croft）教堂的周日聚会。但是，在晚上的聚会中，他不再讲道了。然而，在孤儿院的工作上，他仍继续做他通常的工作，包括写年度报告等。

第 24 章

宝贵的前景

1897 年初夏，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到孤儿院三号院慕勒的书房里拜见慕勒。慕勒先生亲切地握着他的手。

“非常欢迎。”慕勒说。

“对上帝的应许，你发现总是信实的吗？”帕森斯问道。

慕勒回答说：“是的，上帝的应许总是信实的，他从没有使我失望过。将近 70 年了，他提供每一个与此工作有关的需要。从开始到现在，总共有 9500 个孤儿，他们从来没有挨饿过一次，从来没有！数百次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身无分文。但是，当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天父都送来供应。从没有一次这里没有健康的饮食。这些年来，我一直能单单相信上帝、永活的上帝。通过祷告，上帝送来了 140 万英镑，有一年，我们需要 5 万英镑，都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之前到达。

“世界上没有人能说我曾经向他要过一分钱，我们没有募款委员会，没有筹集人，没有投票也没有捐款。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祷告。我也单单依靠上帝，上帝有许多办法感动全世界的人

来帮助我们。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对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说话，在这一洲或另一洲传达，然后将帮助送给我们。只有一次，一天晚上，当我在讲道的时候，一个绅士便写给我一张数目很大的支票以帮助这些孤儿们，当崇拜结束的时候，他便递给我。”

“我读过你的生平，慕勒先生，注意到许多时候你的信心曾经历巨大的试炼。现在也跟以前一样吗？”

“我的信心遭受非常大的试炼，目前的困难比以往都大得多。除了我们财政上的压力，我们需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同工，还经常需要为数百个离开这里的孤儿提供合适的去处。我们的资金常常短缺，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召集我们可爱的同工在一起，对他们说：‘弟兄们，祷告，祷告。’马上，100 英镑送来了，一会儿又是 200 英镑，不几天，1500 英镑送来了。我们总是一直祷告，一直相信。哇，相信永活的上帝真是太好了。因为他说过，‘我永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如果您期望从上帝得到伟大的事情，那么你将得到伟大的事情。没有他不能做的事情。他荣耀的名字永远是当赞美的！凡事谢恩，事事谢恩。许多次，当他给我 6 便士的时候，我赞美他，当他给我送来 12000 英镑的时候，我同样赞美他。”

“你从没有考虑一个储备基金吗？”

“那是最蠢笨的想法。”慕勒加重语气说，“如果我有储备，我怎么能祷告呢？上帝将会说：‘乔治·慕勒，先把那些储备的拿出去。’没有，我从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储备资金在天上。上帝，永活的上帝是我们的富足。为 1 英镑我相信他，为 1000 英镑我也相信他，我从没有徒然相信。‘相信他的人有

福了。’”

“那么，当然你也从未为自己考虑过积蓄吗？”

查尔斯·帕森斯永远不会忘记慕勒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慕勒一直坐在他的对面，两手交叉，双目平静、镇静，若有所思。大多数时候，向前探着身子，眼睛注视着地板。但是，当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直了直身子，看着帕森斯的脸庞一会儿。帕森斯回忆说：“他明亮的眼睛里有一种威严和崇高，他如此习惯于属灵的异象，深知上帝深奥的事情。”帕森斯不敢确定是否这一问题对慕勒来说是不舒服的，或者是否可能触及到慕勒心中的“老我”。不管怎样，这一问题看来把他整个身心都激发起来了。

停顿了一会，在此期间，“他的脸就是一篇讲道”，“他明亮的眼睛里闪着光芒”。慕勒解开他的纽扣，拿出他的钱袋——一个老式的票夹子，中间有网子，将各种硬币分开。他将它递给帕森斯。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票夹子里面，每一分都在里面。为我自己储蓄？从未有过！当有人送钱给我自己用时，我双手奉献给上帝。有一次，有人给我送来1000英镑，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钱属于我自己，它属于上帝，我属谁？我在事奉谁？为我自己积蓄？我不敢，对爱我、满有恩典、全然丰富的上帝来说，那将是一个羞辱。”

帕森斯将那票夹子又还给了慕勒，慕勒告诉他里面有多少钱。

“你花费多少时间跪下祷告呢？”

“每天或多或少，”慕勒回答说，“但是我活在祷告的精神

中，当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在祷告，当我躺下、起床的时候，也在祷告。我的祷告总是蒙垂听，成千上万次我的祷告蒙垂听。每当我被说服某事是对的，也能使上帝的名字得到荣耀时，我便为此事祷告，直到事情成就。‘慕勒从不放弃!’”

慕勒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

“借着慕勒的祷告，数以千计的靈魂得蒙拯救，在天堂上，我将遇见几千个、上万个借着我的祷告蒙拯救的人。”

一段停顿，帕森斯没有说什么。

慕勒继续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放弃，直到祷告蒙应允，为我年少时的朋友的两个儿子，我一直祷告了52年，且天天如此，他们却仍然没有悔改，但是，他们会！相反又会怎么样呢？有耶和华不变的应许，我抓住应许永不放松。上帝孩子最大的错误，乃是他们不再继续祷告、不再持续祷告、没有坚持到底。如果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渴慕某些事情，他们应该祷告，直到得到为止。哇！上帝是多么真、多么善、满有恩典，乐意赐恩给我们，我们就是向这样的一位上帝祷告。虽然我是如此不配，但是，他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我仅仅是一个贫穷的、脆弱的罪人，但是，他垂听我数万次的祷告，并且使用我作为器皿，带领成千上万的人走到真理的道路上来。我所说的成千上万，有本地的，更有外地的。而这些不配的人，又在向更多的人宣讲上帝的救恩，有许许多多的人又已经相信永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自己的评价。”帕森斯说。

“只有一件事情是慕勒应该得到的，那就是——地狱！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应该得到的，我确实是一个该下

地狱的罪人，唯靠着上帝的恩典得蒙拯救。虽然我天生是个罪人，但是我不活在罪中，我恨恶罪，我越来越恨恶罪；我喜爱圣洁，是的，我越来越喜爱圣洁。”

“我猜想在你这这么多年为上帝做工中，你一定遇到好多让你失望的事吧？”

慕勒回答说：“我的确遇到好多让我失望的事，但我的盼望和信心总在上帝那里。在耶和华应许的话语上，我的心灵得以安息。哇，相信他真好，他的话语永不落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更适用于我公开的服事。62年前，有一次我讲道非常空洞、枯燥、没有圣灵的恩膏，对我自己没有安慰，因此，我想对别人更没有安慰。但是，好长时间以后，我听说借着那篇讲道，曾使19个不同的人得以蒙福。”

慕勒走到另外的一个房间里，取出一本他的生活故事，签名后送给帕森斯。当慕勒走出房间的时候，帕森斯四下环顾着他的书房。家居简单实用，桌子上有一本打开的圣经，清清爽爽，没有笔记也没有参考书。帕森斯想：这就是当今最有能力、最属灵的人的住所，他是上帝特别兴起的人，为的是向这个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自私的时代显示上帝的真实。并且教导教会，如果教会足够聪明，得以抓住全能者的膀臂，那么，教会可以得到很多。

正当慕勒跟帕森斯在一起的时候，有敲门声。慕勒打开门，一个有着漂亮头发的小女孩站在那里，她是院子里的一个孤儿。

“亲爱的，”慕勒说，“现在我不能照顾你，请等一会，回头见。”

那年夏天，慕勒92岁了。正好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

年纪念。6月16日，从布里斯托尔市长那里送来一份50英镑的礼物，附有一张条子：“取自市庆祝基金，以此纪念女王60年幸福繁荣的统治，祝孩子们节日快乐。”慕勒用这些钱安排五个孤儿院的孩子们参观了克利夫顿动物园。他说，孩子们特别喜欢那次出游，除了参观有趣的和有意义的动物外，孩子们还享用了一顿相当丰盛的美食。

1897年6月20日，是纪念女王统治60周年的礼拜天，慕勒打破自己最近制定的不在毕士大教堂晚上讲道的规定，当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的慕勒站在讲台上开始讲道时，众多的会众是多么渴望啊！这位讲员在年轻的公主成为女王三年前就创办了他的圣经知识社，在女王就职之前14个月，就开始在威尔逊街上照顾30个孤儿。在过去的60年里，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信心的记号。这就是那位在信中向英国和世界圣经公会宣称说，从头到尾读了100遍圣经的人。这将是值得你驻足而听的讲道。

“今天晚上我们默想的，”他开始了，“将是短小而宝贵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愿上帝帮助我们。”

慕勒开始逐节解释并应用，当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

“现在我们讲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穷人被富人邀请，成为他的朋友，穷人到富人那里去，发现那里很好，非常高兴。这一切正是他盼望的。现在，他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发现住在这里很好，我将呆在这里，我再也不走了。’这就是上帝的孩子所发现并带到我们面前的，在与耶稣基督的交往中，我们

不仅说，‘我的杯已经满溢，真是福杯满溢。’但是，我有更高的要求，我发现这里真是太好了，是特别的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我再也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被带到的地方！我们也确实行在上帝的道中，确实委身于上帝，这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结果。我们发现真是太好了，甚至对今生也是太宝贵了，我们再也不愿离开上帝的道路。在世俗世界里我们寻找幸福，但是，我们得不到，除了失望，没有其他的结果，因为世俗的幸福一会儿就要过去。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后所得到的幸福，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乃是永远的幸福。因此，我们心里说：‘我愿意这样呆下去，这样我很幸福，我再也不要离开上帝。’

“不仅如此，并且‘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现在我是一个永远幸福的人，我要一直呆在我天父的面前，我再也不离开他的殿，因为我发现成为上帝的孩子真是太宝贵了。”

“你事奉上帝的秘诀是什么？”有人曾经问慕勒说。

“有一天，我死了，完全死了。”慕勒回答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腰一直不断地弯下去，直到快接近地板。“慕勒死了，他的观点、喜好、兴趣、意愿——向这个世界完全死了。宠辱不惊，即使面对我弟兄、朋友的毁誉，也是如此。从那时起，我专心寻求上帝夸奖。”

在那个夏天，有人劝说慕勒到得文的比斯普斯顿休息几周。

“在这里有事奉上帝的机会吗？”刚刚到达的那天晚上，他便问道。

“你从持续不断的工作中刚刚脱身，这不是休息的时间吗？”

“现在，我从通常的工作中脱身，我一定要用另外的方式事奉上帝，荣耀上帝是我生命的目的。”慕勒回答说。

因此立即在比斯普斯顿和廷茅斯给他安排聚会。

阿什利山上的树叶黄了又落了，秋去冬来，慕勒又回到布里斯托尔，在3号院慕勒的房间里，慕勒继续工作和祷告，当天气变得很冷的时候，他仍然不时地在布里斯托尔讲道。那年冬天的一个主日晚上，许多人来到老市场街教堂听他讲道，据说，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好像被圣灵充满。

他说：“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圣经·耶利米哀歌》3章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在他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虽然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但我们最宝贵的朋友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他上万年之前如何，现在也如何，当他在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的心充满温柔、怜悯和同情，现在也是如此。

“虽然你是最大、最老、最顽固的罪人，虽然你屡次三番地与真光和真知识为敌，但如果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你将因为他的缘故被赦免，因为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能洗净人最大的罪。

“学习本身不能给您带来真正的、真实的幸福。只有耶稣基督，会给你真正的、真实的幸福。我懂得七国的语言，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仍然应该下地狱。唯有基督！唯有基督！成为救主耶稣的门徒是多么有福啊！

“我是一个幸福的老人，是的，我是一个幸福的老人！我在

房间里散步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我不孤单，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埋葬了我的两个妻子和孩子，但是，主，你与我同在，有你与你的微笑与我同在，我永不孤独，永不寂寞，你的同在与微笑比生命本身更好。’

1898年3月6日，礼拜天的早上，从埃文峡谷吹来的海风看起来已不那么凉了，克利夫顿的居民看到了春天到来的迹象，在奥马路教堂，早上崇拜迟来的人立即就会发现：布里斯托尔最著名的人早已来到，他们急切地想听他讲道，他确实讲了。在通常的“掰饼”纪念主之前，年迈的圣徒站起来了。

“我们读《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好吗？”

他读完这段圣经，然后要求会众跟他一起翻到《圣经·约翰福音》12章37-41节。

“以赛亚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看到了耶稣的荣耀，并且论及他的事情。这最后一节，以及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6章，都是指值得我们敬拜的救主耶稣的荣耀。在整个神圣的见证中，我们发现没有一处不在述说他的威严和荣耀。那些宝贵的、值得我们敬拜的救主耶稣的经文，我们现在再一节接一节地读一遍。”

用他无与伦比的风格，慕勒又读了一遍，每一节都做了清楚的、简明的解释，从中得出教训，但从不牵强附会。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慈悲、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宝贵！他所做的他仍在做，并且一直做到我们在此世界满足的日子——他从不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再过一会儿，他将带我们到他自己的家。我们贫穷、悲惨的罪人，通过相信耶稣得到的，将是多么光明、荣耀的前景！最后，带我

们到天家与上帝永远在一起，见到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自己，我们将获准亲吻他的脚，获准亲吻他的手！多么宝贵的前景在等待着我们。”

慕勒坐下了，圣餐饼掰开并恭敬虔诚地一个一个传递着，圣餐杯倒出来并喝了，人们又一次纪念那最完美的奉献牺牲。

慕勒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本杰明·佩里（Benjamin Perry）度过了下午的时光。

慕勒微微一笑，告诉佩里说：“你知道吗，一两个礼拜之前，我去拜访两位朋友，都比我小八岁或十岁，但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参与上帝的工作。与他们相比，我感到非常年轻！哇，上帝对我真好！我都 93 岁了，仍然没有风湿病，也不痛也不痒，仍然像 70 年前一样，满心感激地在孤儿院里做平常的工作。”

的确如此。第二天，礼拜一，他又在 3 号院他的办公桌前像通常那样工作了。晚上，他又去毕士大教堂参加晚祷。后来，弗雷德·伯金先生（Mr Fred Bergin）又介绍给他两位朋友，他们刚从巴恩斯特珀尔赶过来。

一个人对慕勒说：“罗伯特·凯普曼先生让我问候您。”

“亲爱的凯普曼先生，请代我向他问好，他是最老的朋友。”慕勒说。

他们两个已经保持了 68 年的亲密友谊。

礼拜二，慕勒像平常那样工作。礼拜三的早上，他对雅各·赖特说：“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感到很虚弱，休息了三次，才把衣服穿好。”

“是不是在你的卧房里应该有一个服务生帮你穿衣呢？”赖

特问道。

“明天再说吧。”慕勒说。

就在那天，过了一会儿，他对赖特说：“我感到又很好了。”

到了晚上，在3号院，他又带领了每周的祷告会，最后宣布唱“被杀的耶稣”。最后一节他跟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单唱这一主题，
我们的嘴唇不提其他。
在那边荣美福地，
更了解他的大爱。”

慕勒对雅各·赖特说“晚安”，便开始爬往通向他房间的楼梯。

紧接着跟上来的，是一个住在3号院的年轻老师，但是，她却不知道谁在她前面，跑着上了楼梯，嘴里还唱着“我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我，仁慈的上帝给我蒙上了眼睛”。

当她登上第一层楼梯顶的时候，她看到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那里，那是慕勒。他在那里等待，直到她到达他跟前，并且与她握手。

“看到你如此快乐我真高兴，”他说，“但是，你不能一步跨两个台阶，不然会伤着你，晚安。”

慕勒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一段时间以来，他总习惯吃一点夜宵。像通常一样，那天晚上，有人在他的梳妆台前放了一杯牛奶和一些饼干。

第二天早上，他在五六点钟的时候醒来，起床后朝梳妆台走去。

然后，在那一瞬间，四天之前他所说的光明前景，变成了一个荣耀的现实，乔治·慕勒看到了他所爱的那一位。

第 25 章

责备怀疑分子

礼拜四早上大约 7 点钟，慕勒的服务生端着一杯茶来叩门。一进门，发现慕勒已经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去世了。桌子上是一篇他永不会再讲的、未完成的讲道笔记。

慕勒去世的消息在布里斯托尔引起一阵轰动，礼拜天的聚会中，从圣公会到新教徒，每一个讲台都在纪念该城已故的慈善家、祷告的人和传道者。

第二天，即 1898 年 3 月 14 日，是慕勒丧礼的日子。据说，他的丧礼在布里斯托尔是空前绝后的。店铺关门歇业、员工放假，以纪念这一事件，表达他们的敬意。成千上万的人加入送葬的队伍中，布里斯托尔教堂和其他教堂降半旗致哀，钟声低鸣，主要街道关闭或者拉上窗帘。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哀痛中。

在 3 号院进行了短暂的追悼仪式后，人们列队走向毕士大教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隆重追思仪式。慕勒在威尔逊街办的第一个孤儿院里面的四个人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他们记得 1849 年 6 月的一天，他们来到阿什利顿，参观他们宽敞的新家。

数百人不能进入毕士大教堂参加追思仪式，在那些挤进去的人中，坐在主要位置以及边座上的是圣公会及自由教会的牧师。雅各·赖特及本杰明·佩里讲话后，大约有 100 辆马车，包括市长豪华的马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他们跨过大河，来到墓地，墓地里大约有 7000 人早已等候在各主要门口。仆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清出一条道来，那些抬棺椁的人将棺椁抬到山边，放在一棵紫杉树下，那里埋葬着玛丽和苏撒拿。结束的时候，墓旁的全体会众齐唱五天前慕勒在他主持最后祷告会时选唱的一首赞美诗。死亡，正像他所盼望的不是悲哀，而是对“那边光明喜乐福地”的期待。

英国的大多报纸上刊登出了他的讣告，其中《时代》杂志登出的最长、最详细，我们在 14 章和 15 章中早已引用过。下面我们还将继续引用。几份报纸将慕勒一生的事实与当代的理性主义作比较。布里斯托尔新闻晚报说：“慕勒先生在 19 世纪的慈善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一个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的年代，许多人热衷于空谈大理论，他却付之于实践。”

《利物浦信使》报导说：“上千个孩子需要吃饭、穿衣、受教育，但却没有任何有影响的组织和机构为其筹措经费，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呼吁和宣传。”他们问道：“这一奇迹是怎么实现的？慕勒先生告诉世人说，这完全是‘祷告’的结果。今日的理性主义对这一回答将会嗤之以鼻。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等待去解释。当他们很难解释的时候，便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使阿什利顿的孤儿院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需要许多的花招和欺骗。这本身就是不合科学的。”

每日电讯报，也以同样的语调说：“慕勒先生的一生和榜

样，通过极有说服力和可以摸得着的美德，即使在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时代，也不能不产生影响。”关于慕勒深远的社会成就，每日电讯报说，慕勒“使大街上减少了数千个令人痛苦的受害者，使监狱里减少了数千个囚犯，使济贫院里减少了数千个无助的流浪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里斯托尔的新闻报道对慕勒的称赞远远比英国报纸重要得多。因为是在布里斯托尔，慕勒试图证实上帝垂听人的祷告。数以百计的布里斯托尔人曾在孤儿院里短暂或长久地工作，更多地在那里进行短期的教学、护理、修理或者运送东西，另外的则利用周末参观五个孤儿院。如果慕勒的原则失败了，真相就很难逃过布里斯托尔人那敏锐的眼睛。西方世界从没有缺少怀疑主义者，19世纪也从未缺少玩世不恭者。孩子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遭受残酷虐待的消息就会从阿什利顿传到布里斯托尔的市中心及更远的地方。然而，布里斯托尔时报，将慕勒先生的过世，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且发表了社论和讣告，评论道：“可以证明，几乎关于慕勒的所有事情，都是完全真实的。”报纸说到慕勒是“少有的有着惊人天赋”的天才人物，并且归纳说，他“为展示神迹没有过时这一目的而被兴起，也谴责了当代怀疑主义的倾向”。

慕勒去世后，我们怎样评价他90年的人生呢？

他的一些个人品质非同寻常，当它们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时，要说明最小的一点也是不容易的。第一，我们可以指出，他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 he 自己是公务员的儿子。他创办了一个有30个孩子的孤儿院，后来扩大规模，负责上万个孩子的康乐和教育，并且指导数百个全职工作人员。还是慕勒，作为圣经知

识社的指导者，支配着数十万英镑的开支，帮助和推动着海外的宣教事业，资助国内外孩子和成人的学校教育。有人描写慕勒对这一切事务的监督管理时说：对他的每一项工作，他都保持精确的记录，即使在孤儿院的顶峰时期，他以知道许多孩子的名字而著名，在早期的时候，他知道所有孩子的名字。对毕士大教堂如此众多会友的事情，他都怀有同样的个人关注，对全世界他所资助的宣教士也是如此。

当工作发展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是严格审慎的，不管是决定扩大规模还是维持原状，谁将成为他的工作人员等，他都以一个真正管理者的作风，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仔细斟酌。除此之外，还要花上好长时间祷告和默想，他对细节的注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既不固执，也不缺少远见。

其次，我们可以指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在哈雷和伦敦求学期间，他每天学习 12 到 14 个小时。在他 70 到 80 岁高龄期间，旅行 20 万英里，到达 42 个国家周游布道，这一切，都说明了他非凡的能力。

慕勒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喜欢指导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指导。他喜欢成为雇主而不是雇员。作为受训人，他与伦敦传道会早期的交往不久之后，便发现他们的约束是不能接受的，他更喜欢走自己的路，然而他们的分手是相当友好的。但是，有一位主人他愿意顺服，在事奉基督中，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工作。从在得文的那年夏天起，他发现了“在上帝那里他的全部价值”，将他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主。他写道：“我的尊严、喜乐、金钱、身体、头脑，都放在基督的脚前，为主所用。”

因此，慕勒不是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有证实他见证的

证据说，有一天他死了，“乔治·慕勒的观点、喜好、嗜好和意愿都死了。”在事奉上帝和他同工的时候，他的干劲和才能都指向无私。他一生收到的个人开支大约 93,000 英镑，他从中奉献出 81,000 英镑，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唯一的财产价值 160 英镑。

毋庸置疑的普鲁士人的倔强，非常有礼貌的性格，为他赢得了朋友和工作人员的爱戴和尊敬。在他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赢得了所遇到的许多人的爱戴和敬仰，还赢得了布里斯托尔市民明显的尊敬。查尔斯·帕森斯非常了解慕勒，记着说：“慕勒本身是一个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他的心里流露出爱，对孤儿，不管是单个还是好多，他说话总是用能想象的最温柔的语气。一天，一位校长，他本身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对我说：‘慕勒先生对待我们大家，远远超过父亲对他的儿女。’”

我读过他的全部著作，远超过 100 多万字，从没有发现一个严厉的或者是挖苦的评价：像任何聪明的法官的性格一样，慕勒更愿意谈论人类良善和健康的方面，对于其他的，他常常保持沉默。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一个心肠狭窄的人。他一定认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都处在那恶者手下——基于他的观察和圣经，就像《圣经·约翰一书》5 章 19 节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慕勒一直都捍卫这种观点。他归信基督以后，除了在戏院里讲道之外，又去了两次戏院，还去了一次舞会，但是感到“作为上帝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出入，对我来说是不得体的。”即使他喜欢正常的娱乐，在他忙碌的一生中，也很少有时间玩这些。反之，他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心胸狭窄呢，还是一心一意呢？你自己

判断吧！而且，他对世界的看法并没有阻止他走向“全世界”宣讲福音。至于他对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基督徒的态度，我们看到他旅行布道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宗派中劝阻偏执的态度，正像他自己说的“在所有的宗派中讲道”。

至于布里斯托尔时报说慕勒是“少有的具有惊人天赋的天才人物”，是有点让人感到吃惊的。当然，他天资聪颖：在学校里就表现出来，尽管他生活粗野，但他仍以优异的成绩从哈雷大学毕业，会说七国的外语。但是总体来说，他更乐于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当他教导基督徒的时候，他的事奉主要是实际的，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发现祷告的真实，直到具体的祷告蒙应允，或者鼓励信徒更加委身于基督。他对这些比那抽象的神学思辨更有兴趣。只有一次，他是不情愿的但也是必要的，即在19世纪40年代，他被卷入基督的人性和受难的争辩当中。他对涉人的问题很有见地，他对争论的评论确实非常透彻，但是他拒绝沉湎于这一问题，拒绝参加不起启发作用的文字战。

他最为显著的知识分子的特质是他思路清晰的能力。例如，1839年，在关于教会按立的争论中，毕士大教堂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于是慕勒和克雷克静修两个礼拜，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和祷告。他们回到毕士大教堂，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在会上，他们阐述了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慕勒所做的论文包含他们所说的要旨，逻辑性强，是简明的杰作。关于长老、教会的纪律、主的圣餐等，他们列出了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将“圣经明确地显明”和“圣经看起来更喜欢”两者之间作了细致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慕勒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争论者。不过，他有持久的、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例

如，牛顿后期著作对他最具吸引力的乃是其精准性。

一个世纪后，人们感兴趣、受鼓舞的不仅仅是慕勒其人，还有他所做的。他的个人品格非同一般，他的成就也极为特别，就算我们从使徒时代起，或者更早从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最辉煌的时代算起（《圣经·列王记上》18章），慕勒的成就也是毫不逊色的。因为慕勒为表明上帝的真实存在而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以此向那些怀疑上帝会听祷告的人作见证。总有那些愿意宣称他们已经证实这种能力或者单单相信上帝的人帮助他们。慕勒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他实践信仰，或者他喜爱祷告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他的宣告，当他开始这项工作的時候，他就表明他要证实上帝是真实的。1837年，慕勒在回忆他在1836年建立第一个孤儿院的原因时，他写道：

现在，如果我，一个穷光蛋，仅仅凭着信心祷告，从不向任何人求援，建立和维持一个孤儿院。除了向那些未归信之人的良心见证上帝的真实外，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在上帝的祝福下，在坚固上帝儿女的信心方面有所帮助。

因此，慕勒向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发起挑战，他们对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持观望态度，是否真有一位上帝在资助他。如果上帝证实是信实的，那么他邀请基督徒不仅看到上帝的作为，并要思考他们的反应。

前面已经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在以后的63年里，慕勒收到将近150万英镑，更确切是1,453,513英镑13先令3便士。他有许多的工作，包括关爱数万个孩子。他宣

告说，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从未为资金发出一个呼吁，也从未要求任何个人资助他们的事业。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只有一次有辩解说，慕勒曾经公开祷告，祈求上帝将钱送到孤儿院来，慕勒说这是“十足错误的”。按照慕勒的说法，60多年来上帝都这样供应金钱，以此证实上帝的真实。

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于这一点，人们的反应将是如何呢？

我们不能说慕勒一生的事件构成了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他愿意或者有能力垂听祷告。然而，我相信，慕勒所描述的“上帝对他的作为”即使不能构成这些事情的证据，也需要我们来认真对待。

我们先把如何筹款的问题放在一边，你可以去布里斯托尔一游来证实这一看得见的事实。那五座巨大的建筑仍然屹立在阿什利顿，现在用作布鲁内尔技术学院，3号院是他居住和去世的地方，现在清楚而又合适地命名为：慕勒的住宅。当你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你应该参观位于克撒姆（Cotham）公园的慕勒的另一处住宅，那是乔治·慕勒基金会事工总部（参看26章），今天他们依然在探寻慕勒的原则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原则一直没有背离过。

慕勒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相信在19世纪，他仍是永活的上帝，这位永活的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并且“感动人们”去从事他指导的工作。说上帝不像他信的那样听他的祷告，或者根本就没有上帝支持他的工作，就是说慕勒完全被欺骗了。这就是说，他真诚地相信上帝提供他一切是弄错了。而另一种观点是，慕勒是一个骗子，这虽然更难证实，我们会在本章稍后来讨论。

我们可以不怀恶意地同意慕勒被欺骗了的观点，而且持有这种观点并不妨碍我们钦佩甚至爱慕他本人：他是一个好人，可能是有着相当成就的伟人——但是，他错了，确实错了。然而，我相信，慕勒一生的见证一点也不支持这种观点。有充分的证据指出他不是一个被欺骗者或者幻想破灭的人，而是一个信仰日渐巩固和刚强的人。

是的，慕勒的信仰经历了试炼。本书的9章和10章描写了1838年到1846年的这一阶段，资金很少有剩余，尽管孩子们对这事一无所知。需要当天或者即刻才送来。在这段时间，仅仅一次，慕勒用自己的话说，变得“信心软弱”，“第一次，上帝似乎对我们的祷告遮眼不看。（9章）”但是一小时以后，一位来自伦敦的访客送给他一笔金钱，她已经在威尔逊街男孩院隔壁住了几天，她在伦敦的女儿已把这笔款托付给她，慕勒能够“当我独自一人的那一时刻，赞美和感谢脱口而出”。对慕勒来说，这笔钱离孤儿院这么近但却没有奉献的事实，正是上帝本想要帮助他的证据。“因为上帝喜欢听他的孩子祷告，他允许我们要恒久地祷告，并且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使得祷告蒙垂听时更加甘甜。”

慕勒显然将早期的这段时间看作是对他顺服的一种试炼，对他的同工们也是如此，“当他们无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时，那些投身于这项事工的所有人的信心没有一起软弱下去，他们没有厌弃以这种方式从事上帝的工作，也没有回到这罪恶世界的行为和准则中，我只能归于上帝特殊的怜悯。”这是一段他性格受塑造的时期，为他一生的工作做准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足够的供应，但却只是刚好够用，

因此我们岂能不同意这正是上帝作为的证据？这与 150 万英镑的总收入不是同样不寻常吗？拒绝相信慕勒对供应的解释不就是同意另一种更不可置信的解释吗？那就是说，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慕勒的同情者，不是由于上帝的介入，而是以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仅送去总数足够的资金使其能扩大这项工作，而且还是分阶段的，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送来的仅仅够用，但是，从来没有太少过，哪怕是一天。

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认为慕勒是在欺骗，就是说他是一个骗子，用另外的话说，就是他说的与事实相反，有些日子，孩子们其实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但是，这种观点与慕勒在布里斯托尔的名望不可能相符，还有，我们已经看到该市市民对他的尊重，以及摆在市民面前他的证据。

说慕勒在欺骗或者是一个骗子，如果没有一点证据支持这一假设，我相信，那就更没有证据支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幻想破灭了。他从来没有给他同时代的人印象说，他是一个忧心忡忡极力要保存神话的人，或者他有理由怀疑超过两千人的需要能否被满足。“安静和庄重的举止……没有烦恼，”一个西部农村的农民这样做见证说，“诗篇 23 篇好像都写在他的脸上。”

慕勒的长寿一定与他内心的平安有关，这种平安是一种从上帝而来的喜乐，而这喜乐则来源于祷告蒙应允的经历。“我所投入的事奉带给我多大的喜乐，我简直不能述说。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说我是一个焦虑和烦恼的人，相反我没有一点焦虑和烦恼，相信上帝，使得我把一切重担统统都卸给他。不仅是关于金钱的重担，而是涉及一切事情的重担，因为除了与金

钱有关的事情以外，我还有数百种需要。在任何事情上，我发现上帝都是我的帮助，即使我为所有的事情相信他，像孩子一样单纯地为所有的事情向他祷告……在我很久的基督徒生活中，我总是发现，只要我相信，在上帝所定的时间，我一定能得到我祈求的东西。”

19章所描述的那件事，他急切地要参加早已定好的在魁北克的聚会，那时，借着慕勒祷告，云雾散去。这件事是真实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

有一次慕勒写道：我们不要自称有神迹，也不要渴望说，我们所投入的事业应当被看作是非凡的或者是显著的。有好多的人，轻率地将它看作都是神迹，我们确实感到痛心。这些原则像圣经一样古老，但是被许多人忘记了，另外的人在自己的信仰中也没有坚持，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不仅如此，许多人否定它合乎圣经，被认为是狂热的和盲信的。

与大雾事件特别相关联、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慕勒对达顿船长所说的“52年来，从没有一天，我的王、我的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这当然是一个总看到他祷告蒙应允之人的信心。

另一件显示上帝将满足他孩子们的需要这一坚定的信念，乃是他乐意将数千英镑的资金用于海外的宣教事业，以及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英国及海外的教育事业。他认为没有必要将每一分钱都要放在阿什利顿孤儿院的账号上，他发现上帝是富足的上帝。

《时代》杂志写讣告的人，被慕勒在他工作人员中博得的忠诚所打动。“在生命的危急关头，他对上帝的依靠，被许多人看作是简单的盲信。但是他得到的结果却是奇妙的，虽然有时

候被误解，但他能够点燃他周围之人的奉献心志和热情，这是非凡的，也是独特的。”这种“非凡的热情”，能作为这些像慕勒这样的人已经找到了上帝真实的解释吗？

《时代》杂志观察，慕勒也常常承认，有些人认为他的原则是“狂热的”。字典里将一个狂热的人定义为“一个人特别在信仰方面，被极度的和错误的热情所充满”。慕勒是一个狂热的人吗？《西方每日评论》以为不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慈善家，有着较少的狂热和较多的方法。他的举止和言谈不是那种易动感情的情热者，用轻松愉快的心情接受重大的责任。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那么他的生活将不会像现在那么令人诧异。是他的镇静和信心，加之在花费方面过分小心谨慎，还有他最有条理的习惯，才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和完全令人吃惊的全面品质的结合。

当然，对这一说法慕勒自己也加以否定。“我不是一个狂热者或热情的人，许多认识我的人都深深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镇静、沉着、安静、精打细算的商人。”大多数的商人都不会同意，在19世纪就成功地筹集了150万英镑并指导这些开销的人，能否轻易地被说是“被错误的热心所充满”吗？

当然，慕勒不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更不像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勋爵一样，通过影响国会立法，来试图改进社会的条件。他也没有力求唤醒维多利亚时代基督徒的社会良心。虽然他也饶有兴趣地参加了“教养院、收容所协会”，沙夫茨伯

里勋爵在其中任会长，奎亨·霍格（Quintin Hogg）（是现在 Hailsham 勋爵的祖先）也是其中的杰出会员。也有可能因这种联系，沙夫茨伯里勋爵才访问阿什利顿的孤儿院，慕勒的日记里才记录有关于济贫院和监狱的条件、政府关于贫穷的研究结果等等。但是，他主要关心的是通过他能做的直接行动，给孩子们的生活一个好的开端，而不是试图改革现存的贫穷法的制定。一份政府报告揭露说在英国的监狱里有 6000 个年轻的孤儿，他的反应是：“靠着上帝的帮助，我将尽其所能，使这些贫穷的孤儿远离监狱。”总体来说，他并不急于改变这种社会制度，而且把这样的尝试留给了其他人。

重述慕勒的故事，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很盼望自己也有慕勒那样从上帝而来的信心。当然，慕勒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常常否定自己有信心的特别恩赐。

他说：“我的信心，与每一个信徒的信心一样，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自己试一试，你将看到上帝的帮助。”

“但是我们怎样做才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呢？”人们通常问他说。

他将会回答说：“首先，认真地研读、默想圣经，那么，你就会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属性——多么良善、慈爱、怜悯、智慧和信实。然后，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就能在上帝的的大能上安息，上帝愿意帮助你。

“第二，尽力使你的良心清洁，不要养成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习惯。否则，当你的信心接受试炼的时候，因为你有罪的良心，你就会对上帝失去信心。

“第三，你的信心可能遭受试炼的环境，不要尽力逃避。我们自然不喜欢单单地相信上帝，但就在此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最后，请记住，上帝不会试炼你超过你能承担的。要忍耐，上帝将向你证实，他是多么愿意帮助和拯救你，那一时刻对你来说，正是恰到好处的。”

如果你从未开始信心生活，慕勒 150 年前写的关于“基督教”的两句简洁的话今天仍经得起重复，他说：“在你的神圣信仰中，有生命、力量和真实，如果你从未知道这些，那么亲自来品尝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上帝仍是慕勒以他为乐的上帝。你应该注意他的宣告：“永活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从没有减弱，他的膀臂也从没有缩短，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的能力是无穷的。因此，今天、明天或下一个月，只要生命还在延续，他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和朋友。不但如此，他是昔在、今在并永在的上帝。”

第 26 章

新的基金会，相同的基金会

“为什么这里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为什么这里的人充满关爱？”一位母亲花了八个月的时间试图管教一个脾气古怪的孩子，最后绝望地来到由乔治·慕勒基金会经营管理的日托所，她这样问道。

“这里有上帝同在，我们每日为您和您的家庭祷告。”有人这样静静地回答说。

“几个月后，”这位母亲回忆说，“我遇见上帝并且得以重生。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新造的人。我为这些了不起的人感谢上帝，因为是透过上帝在日托所的作为我才得救的。”

从 1836 年慕勒在威尔逊街创办第一家孤儿院开始，到位于阿什利顿的宏伟气派的孤儿院，到较小的家庭式的孤儿之家，再到今天的社区与家庭关爱中心，慕勒基金会一直都在关爱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的需要发生了变化，当今社会的需要也与 19 世纪 30 年代大不相同。而且现在的孤儿或是需要关爱的孩子们与以前相比都少多了。然而，

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对于关爱的需要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在关爱中心的工作中，在与地方教会联合进行的社区工作中，慕勒基金会的全体员工从未忽略“关爱”这一人类的基本需要，他们一直都致力于更有效地为有需要的家庭和孩子服务。尽管在工作中他们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技巧，他们总是想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童和父母都感觉到上帝的爱。（慕勒基金会从不停止关爱孩童与家庭，因为上帝的关爱一直在继续。）

因为深知人的完全只有通过上帝建立关系，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才渴望向人表达上帝的爱，渴望与人分享耶稣的怜悯。我们身体、物质和情感上的各种需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满足，而我们灵性的需要却只能由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以满足。尽管慕勒基金会从来都不是一个以宣教为主旨的组织，不用公开的方法和策略宣讲福音，他们所做的每一件表达上帝之爱与怜悯的事都由于定意要分享福音而有了更多的推动力。这需要“通过具体的生活来传讲”。许多人在一种不受威胁，充满鼓励的氛围下听到福音，透过工作人员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接受了基督信仰。不可否认，慕勒基金会的工作具有明确的基督信仰特征，但它是用言语和行为同时述说与实行上帝的爱与救赎。

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小型孤儿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结束之后，由日托所、家庭关怀、社区工作和学校工作所取代。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许多显而易见的机会表达和分享上帝的爱，很多人都愿意为他们所得到的关爱做见证。慕勒基金会在完成本身的工作之余，与地方教会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这些教会期望对他们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这些社区中往往有很



基金会的儿童工作

多孩子和家庭需要相当大的帮助。慕勒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之所以与地方教会共同工作，是希望看到他们在所做的各样事工上更有功效，希望能够鼓励、唤起、装备并培训当地的基督徒。这是上帝的旨意，也是爱的彰显。

有一项工作是关心孩子们的日常所需。慕勒基金会帮助照顾2岁到5岁的孩子们在心智、身体和情感上的需要。工作人员在每一个关爱中心创造环境，为孩子的父母提供建议和实际帮助，同时也跟他们分享福音。关爱中心为孩子们提供学习自我保护、玩耍和提高学习能力的机会。在保育室护士们的照顾下，孩子们5个人或者10个人一组，自己动手做饭、画画或者

尝试其他各种各样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孩子们就有足够的玩耍、探索和发展的空间。工作人员诚恳地付出诸般努力使孩子们能参与各项活动，并帮助他们解决各样的困难，孩子们也得到一个轻松愉快的生活空间，对此，父母们非常感激。令人难忘的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家长和孩子一道参加夏天的特色郊游和冬天的圣诞特别活动。每年圣诞期间，家庭困难的孩子们都能得到许多玩具礼物，用这些礼物来鼓励孩子们，其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在日托所工作的员工经常有机会跟孩子和家长一起分享上帝的爱。情况往往是这样，孩子们把白天在日托所经历的事情告诉父母，父母们便开始向工作人员提出有关信仰的问题。许多问题儿童有机会开始全新的生活，家长对孩子取得的进步表示感激。一些非常孤僻的、深受行为问题困扰的孩子们走出封闭的自我世界，开始成长为健全的儿童。

许多工作是与重建家庭有关的。我们努力做到让整个家庭，孩子以及父母，都感受到上帝的爱。参与这项工作的包括健康检查员、社会工作者和当地教会。慕勒基金会与其他的关爱组织密切配合，以便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来到这里的家庭各有所需。对一些家庭来说，来到这里是为了交到一些新朋友，或者为了暂时逃离狭窄的住所。也有的家庭是为了给孩子们找一个玩耍的地方，或者为解决某些困难来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尽力提供一个欢迎和支持的氛围，因此父母们在这里能够树立起信心并且使他们具体的问题得到相应的帮助。比如：摆脱债务、学习操持家务和烹饪、解决婚姻问题以及如何与孩子愉快地玩耍和建立亲密关系。父母们也参与烹调和一些有趣的活动，诸

如健身、做手工艺品、小组活动和戏剧。一些孩子有特殊的个人需要，例如讲话困难、行为问题或者发育缓慢，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遭受过性虐待。工作人员开展的一对一的工作有助于建立信任和自信。

“我已经逐渐改变，通过与人接触，我变得比较自信。我已经不再服用我一直用的抗抑郁药了。两年多来，由于沮丧和生病，我一直呆在屋里，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不但如此，我在耶稣基督里，发现了活着的信仰。”一位母亲如此说道。

在关爱中心里的生活，帮助这位母亲除去了她一直以来对女儿的怨恨和苦毒，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建立。恢复家庭关系这样的工作一般是在布里斯托尔和滨海韦斯顿开展，首先服务于在社会地位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最需要帮助的家庭。一个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内可能参与下面类型和范围的活动：

在关爱中心为孩子们提供白天的看护；

帮助监督管理教会办的家长、幼儿活动室、育婴室和孤儿院；

在当地的小学开展一个自信辅导小组；

帮助和支持家长小组；

帮助家长们学习圣经；

负责一个亲人治丧小组；

组织一次游玩方案；

负责开展家长怒气控制小组；

协助家长自助小组；

咨询；

为家长们提供辩护帮助；
帮助处理家事，包括烹饪、持家之道和探访之道；
为社区小学组织集会、校园俱乐部或当教师助理；
主持一个课后俱乐部；
评估社区的需要；
与有关法律部门的代表会晤；
……

需要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城市重要的地区。有许多的压力使得家庭生活失调，家长常常需要帮助成为更好的家长，孩子们需要帮助知道并明白美好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

如何使儿童关爱工作进一步发展，如何实现乔治·慕勒对学校发展的初衷是基金会教育关怀处一直以来的工作。一个全职的学校工作小组有机会在布里斯托尔的几所中学里进行教育关怀工作。这个小组致力于向在中学读书的年轻人传达有关上帝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基督信仰是如何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他们在中学里组织各种活动，比如聚会、社会学科的学习、宗教教育和人文课程，也组织个人和团体的学习小组。基金会鼓励他们到学校观察、了解青年人面对的一些问题，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许多青年人对福音以及这个信仰对他们生活的实际的教导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不同学校之间也开展了一些联合活动，比如营会和晚间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学校活动周和音乐会倍受重视，因为这些年轻人在演讲、歌唱等活动中得到展现自我的机会，感受到被认可、被尊重。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一个男孩子在上到第五课中



基金会的青少年工作

间的时候问道。

这是一个充满挣扎的心灵绝望的诘问。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谁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盼望呢？现代的年轻人需要活生生、真实的、能真正触及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上帝里彰显出来的爱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答案。慕勒基金会的学校事工小组盼望与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州立学校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课程中按照法律要求教授精神上的价值观。慕勒基金会在寻求多种方法帮助这些学校解决这一问题。一份教育资源清单已经送往当地学校，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建议。学校怎么能更好地讲授价值观？慕勒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如何为这项任务进行更好的装备？

志愿者在慕勒基金会的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基金会所涉及到的范围中，曾经接受过基金会帮助的人们，常常被鼓

励来做志愿者。通常会看到被工作人员帮助过的人作为志愿者回来奉献出他们的时间和才能。看到前来寻求帮助的朋友又转过来帮助别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看到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盼望也没有上帝”，但却在这里经历到救主耶稣的爱和救赎，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基金会也培养一年期的志愿者队伍，他们需奉献他们一年的时间在学校和社区作义工。他们贡献出了时间和才能，因此他们也得到祷告和教导方面的帮助，在信仰上也更加成熟。许多参加社会工作、护理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学生，也由基金会负责安排。

慕勒基金会还和一些联合事工组织合作。他们是单独运营的组织，独立于基金会。然而，这些联合事工组织和基金会都看到拥有伙伴关系的益处。在许多方面，他们共同做的就是在关怀儿童、青年人和家庭工作方面的扩展。这些基督教慈善机构的工作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基金会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具体的操作上可能会有不同，双方都非常珍视这一伙伴关系，彼此祷告，互相支持。有许多基督徒义工在这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延伸到数百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过去的几年内，布里斯托尔地区的关爱工作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关爱组织越来越受益于一起工作、互相分享、同心祷告和彼此交流。

基金会现在有许多联合事工组织，其中包括一个专门负责贫穷和无家可归的青年人的机构，常常处理生活管理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咨询机构，一个戒毒中心，一个青年公共汽车项目，一个青年营地，还有一个为无家可归的青年人提供住房的

机构。基金会也与其他一些基督徒关爱组织联合，但它们在正式意义上并不是基金会的联合事工组织，只是起推动伙伴关系的作用。这些组织共同形成联合基督徒服务组织（简称UCM），这是一个平台，为小的机构提供互相分享、共同工作的机会。这些小机构主要是来帮助贫穷和需要的人。

1987年，乔治·慕勒基金会成为慕勒基金会工作的总称。它包括三个慈善机构，最大的一个是“慕勒孤儿院”，本书提及的许多活动都与这个机构有关。然而，最初由乔治·慕勒和克雷克创办的“圣经知识社”，仍然每月为海内外的宣教士奉献。这项工作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许多宣教士对这一奉献的渠道表示感谢。一些工人也参与孩子和家庭的事工，但“圣经知识社”资助最大范围的是宣教士。

许多年以来，在布里斯托尔、巴斯和滨海韦斯顿，圣经知识社经营着三个非常忙碌的基督徒书店，这些书店是圣经书屋的后继者，圣经书屋也叫圣经和小册子书屋，1849年由慕勒创办。然而，考虑到基督教的书籍销售已变得很特殊和复杂这一事实，因此决定把经营基督教福音文学（ECL）书籍的商店卖给桑德赖特公司（Send the Light）^①，它是世界福音总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些商店现在以卫斯理·欧文（Wesley Owen）的名义经营。基金会仍然认为基督教文学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们的财政资助是通过圣经知识社这一途径来完成的。

基金会最新建的慈善事业是“慕勒老年之家”（建于1983年）。许多在阿什利顿接受关爱被养大的孩子发现，当他们年老

^① 编者注：Send the Light 是欧洲最著名的基督教文化图书公司。

的时候，没有一个家庭来照顾他们，其他的一些基督徒也盼望有一个基督徒的环境，这样他们可以在其中安度晚年。在滨海韦斯顿的蒂尔斯利公寓现在是一个老年之家，为 24 个老人提供膳宿供应，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在海外事奉后退休的宣教士。

当孤儿院隔壁的房子待价而沽的时候，它就被买过来改装成舒服的公寓，这种收容性住所由一位院长进行管理。当这里的居民到了老年的时候，隔壁就是老年之家的优越性就非常明显了。现在，蒂尔斯利公寓对老年人已经实施这样重要的服务，需要做出决定在布里斯托尔地区也开展这样的工作。到 1997 年，布里斯托尔 65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16%，75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8%。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在布里斯托尔地区有需要进行老年关怀工作，包括收容性住所和以社区为中心的关怀工作。就像乔治·慕勒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一切那样，基金



基金会的老年工作



会也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得到上帝更清晰的带领而祷告。

同样，儿童工作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也需要来自上帝的带领。在许多地区，有许多的需要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在儿童和老年人的工作中，基金会寻求上帝的带领，他们充满了信心，因为上帝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他是信实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许多祷告已蒙垂听，今天也是如此。因此虽然今天基金会工作的方式与乔治·慕勒时代有很大差别，但是工作的基本原则保持不变。

人们经常会问，基金会是否还遵循当年乔治·慕勒开始这项工作时设立的基本原则。许多人置疑单单相信上帝是否足以应对当今社会的种种需要。我们想重申我们对圣经原则的信心，这些原则在下面这段话里有所体现，也折射了当年慕勒的最初目的：

孤儿院首先和最根本的目的是上帝以这样一个事实得到尊崇：即在我看顾下的这些孩子们的一切所需得到供应。而这仅仅凭借祷告和信心，我和我的同工未曾向任何人开口寻求帮助。借此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仍然在垂听和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仍然仰望上帝，不以任何方式募捐，也不向任何人说明我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特点。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也是真实的。上帝今天仍然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

今天，基金会由罗伯特·司各特·库克（Robert Scott-Cook）

任董事会主席，朱利安·马任执行董事，你可以从下面地址得到更多的信息：

The Executive Director

The George Müller Foundation

Müller House

7 Cotham Park

Bristol Bsb 6DA England

博物馆在每天办公时间开放，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慕勒工作的资料，包括文献和照片。欢迎前来参观，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以前所有男孩女孩的纪录。如有兴趣请与执行董事联系。

附录

《司布真传》简介

冀玉静

美国著名作家阿诺德·达里茂 (Arnold Dallimore) 所著、真理之旗出版社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出版的《司布真传》 (Spurgeon: A New Biography) 近日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司布真的影响

查尔斯·哈登·司布真 (1834-1892)，基督教历史上大有能力的布道家，19岁时就以他的讲道震动整个伦敦。司布真深受清教神学影响，他有清教徒的藏书上万册。3岁时就开始阅读约翰·班扬所著《天路历程》的插图版，6岁时，就可以熟练地阅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世代敬虔的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司布真16岁时就开始讲道，17岁时就成为全职牧师。他的讲道极有能力。当时正逢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渐趋缩小的时候，但在司布真的侍奉下，他的教会每年都有上千人认识上帝和基督。

除了以讲道服侍外，他还辛勤地写作。从 1855 年开始，他的讲章被印刷出来，每年 1 月 15 号，都会把前一年的 52 篇讲道稿集成一册重新出版，起名《新花园街讲坛》。这些印刷稿不仅在英国广为流传，也传播到另外几十个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内。1903 年一位英国作家宣布说：“司布真的讲道稿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版发行的总数，肯定在 200 万到 300 万册之间。”司布真还每月出版一期他办的杂志《剑与铲》。除此之外，司布真还写了大量的书，其中包括七卷本的诗篇注释《大卫诗篇宝库》，还有《评论与注释》，我们还必须提到《每日清晨默想》和《每日晚间默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看到的是司布真对真理坚定不移的宣告，同时，他的宣讲又是平易近人的，让众人都能明白基督教的核心真理，而不是追求什么高深和玄妙。

司布真的服侍范围很广。他建立了牧师学院培养年轻的传道人，他组建了流动售书者协会，到全英国各地推广圣经、他的讲道稿以及其他属灵书籍。50 岁的时候，司布真本人亲自建立的福音性组织就已经达到了 66 个。他还身体力行地关注慈善事业，建立了一所为老年妇女开办的救济院和一个为有需要的孩子开办的孤儿院。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他带给社会的一些进步。

本书的特点和地位

司布真的传记有多个版本。1892 年司布真去世之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大约每个月都会有一本关于他的新传记出版。但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对他的赞美。某些应当记述的方面——比如作为神学家的能力，带领灵魂归向基督的方法——都几乎被完

全忽略了。同样，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品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真实的司布真比他们所描写的更为坚强。1894年，G.霍尔登·派克（G.Holden Pike）撰写的长达六卷的《司布真生平与业绩》（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问世。1897年，司布真的妻子和秘书所编的四卷《司布真自传》（C. H. Spurgeon's Autobiography）出版。但是这两部作品都过于冗长，不利于广泛发行；而且，尽管这两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书中却连一个生动的故事都没有描写，没有让司布真的形象跃然纸上。再者，这两部长篇巨著和那些篇幅较短的传记一样，都没有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司布真的心灵——那才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司布真。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本阿诺德·达里茂的《司布真传》对于司布真的神学和讲道方法有更详尽的描述。作者努力去理解并向读者展现司布真的内心世界——他的祷告、苦难和沮丧、软弱和力量、成功、幽默、喜悦，以及他令人惊叹的成就。书中按年代顺序记载了司布真生平的三个部分，读者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司布真生平的概况，认识司布真一生的服侍之路。

本书是中国大陆首次出版的司布真全传，也是著名的真理之旗出版社的书籍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司布真传》，作者阿诺德·达里茂，华夏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字数160千，定价24元）



《爱德华滋传》简介

1620年9月，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远航新英格兰。在清教徒移民美洲的热潮中，爱德华滋的先祖于1630年代到达新大陆。爱德华滋作为清教徒的后裔，也继承和光大了先辈的信仰，钟马田博士称他代表了清教徒精神的顶峰。

19世纪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了解19世纪新英格兰思想的巨大影响力，那他“必须夜以继日地研究约拿单·爱德华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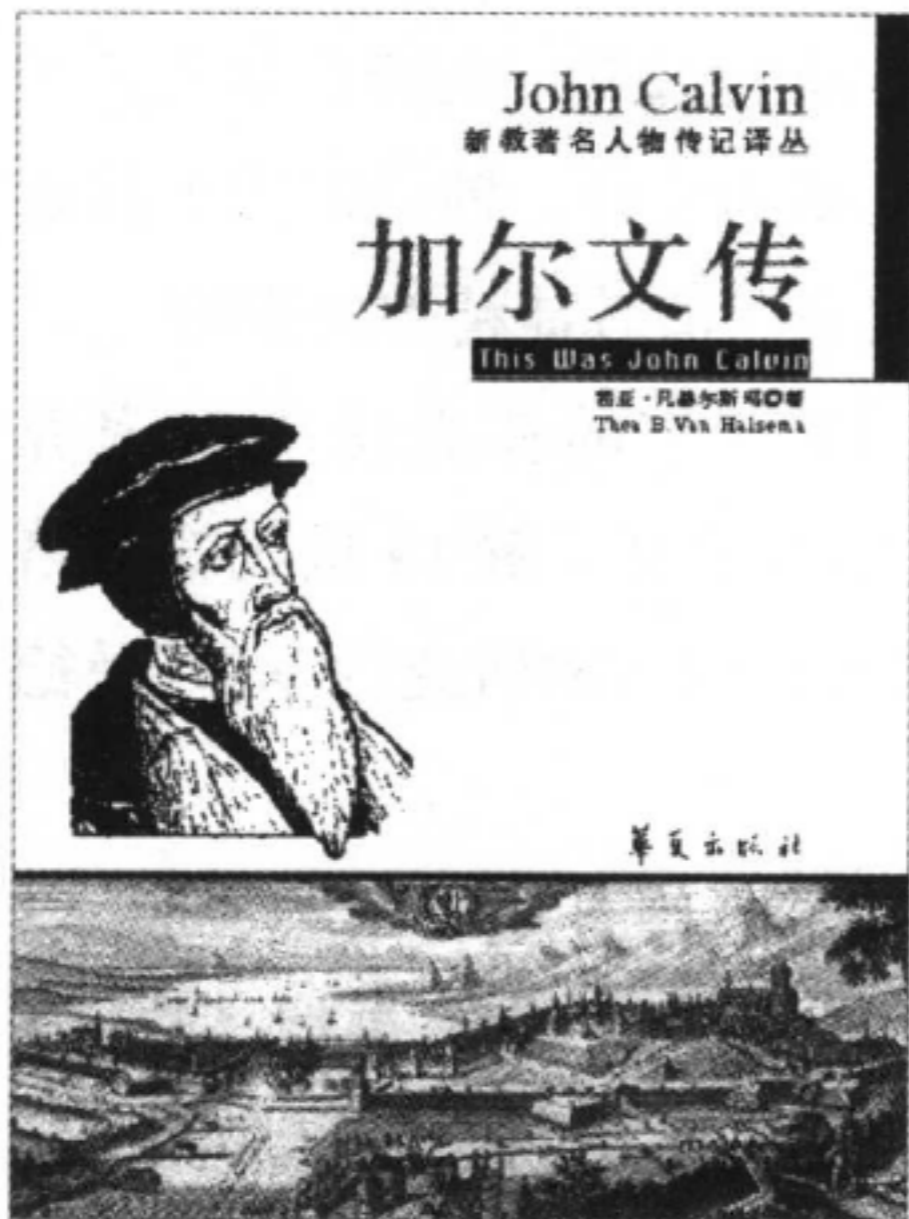
许多著名的学者认为爱德华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哲学、科学和教育领域都很有贡献。

爱德华滋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任南安普敦教会牧师，他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出色的讲道者之一。1734年，他的教会开始出现复兴，点燃了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烈火。这场复兴横扫北美殖民地，为此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奠定了基础。

爱德华滋曾深入蛮荒向印第安人宣教，晚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本书附录为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爱德华滋》的节选本，选用了爱德华滋的自述、日记、及一些著名的讲道，包括最广为人知的《落在愤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

(《爱德华滋传》，作者：海伦·K·霍西尔 定价：20.00元 华夏出版社
2006年3月出版)



扬起真理的旌旗

游冠辉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加尔文传》，深深为上帝奇妙的作为而赞美，为加尔文荣耀的见证而惊叹。

一、奇妙的装备

加尔文14岁的时候，在巴黎的马尔什学院上学。在这里，他遇到了科尔耶迪。这位出色的法国教师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拉丁文和法文基础。此后，他发奋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以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的著作。

19岁那年，他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学习法律。不到一年，加尔文的拉丁文就学到了可以做老师的水平，教授不在时，就让他教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精通希腊文同时又在研习路德思想的德国教授沃尔默。加尔文在沃尔默那里学希腊文，然后用希腊文研读圣经、阅读各种希腊文书籍。这时候，加尔文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人文主义学者，能够享受宁静的写作生活。22岁左右的时候，加尔文突然被信仰之光照亮：“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了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27-28页）。这一转变打破了他所寻求的宁静生活。从此，他便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了上帝的手中。加尔文转变之前所有的教育都是上帝对他的装备。这些装备为他后来解释圣经、阐明基督教神学体系、建构教会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加尔文的经历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谁能想到，在全能者的手中，我们蹉跎的岁月竟能成为他所使用的宝贵资源。因此今天，我们不必再为过去浪费的青春而懊悔。使人复活的主能叫我们过去的经历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二、活着是为荣耀上帝

他全然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救赎他的上帝手中。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苦难，然而，他没有埋怨上帝。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他被迫长期流亡在外。他深深地体会流亡生活的艰难，但他却说：“这在人眼里看为何等痛苦的事，上帝却将它变为十足的喜乐。”（47页）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日内瓦邀请他回去当牧师。那是曾经驱逐他的城市，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在

那里他会“一天死一千次”的地方。但他还是顺服了。他把自己视为“被杀的祭牲”，只要是他的主差遣他，他就愿意去。他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面对这样的患难，他说：“上帝自己是一位父亲，他知道什么是对儿女最好的。”（133页）他40岁的时候，失去了他深爱的妻子。他几乎被悲痛压垮。在给朋友法雷尔的信中他写道：“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138页）就是在这样患难中，他也没有放下神交托给他的工作。他的朋友维雷在给他的信中惊叹道：“您怀着一颗如此破碎的心……竟然……履行了您的一切职责，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139页）他常年体弱多病。在给医生的信中，他说：“这20年来，头痛从未离开过我。关节炎、痛风病使得四肢关节几乎残废。肾结石太大排不出，给了我尖刀般的疼痛。胸口像压了铅块，每一口呼吸都必须付出努力。”（187-188页）可他却肩负着牧养、教导、治理、写作等多重的任务。他没有因疾病的围攻而抱怨上帝，更没有以疾病为理由放松对上帝的侍奉。临终前，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我为基督而活，也为基督而死，我已知足！无论生、死，基督自己是属他之人的奖赏……”（193页）

苦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跟从他要背十字架，但是，当具体遇到苦难时，我们总要问：“神啊，你是慈爱的，又是全能的，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历这样的苦难？你的慈爱在哪里？”

倘或我们是真心求问上帝，那并不可怕，上帝也必以他的方式回应我们。然而，许多时候，因为上帝没有按我们的愿望帮助我们，我们就埋怨上帝，甚至远离上帝。我们在加尔文的身上看到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保罗，看到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耶稣。我们要成为荣耀上帝的器皿，只有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接受他所许可的一切苦难，并且在苦难中仍竭力忠心，以至于死。这不是我们凭血气所能做到的。求主怜悯我们，像怜悯加尔文一样。

三、扬起真理的旌旗

从加尔文被上帝光照的那一天起，他的心中便燃起了追求真道的热情。他为了新教信仰而被流亡。在流亡中，他写下了《基督教要义》。此后，他一直扩充此书，直至将基督教教义系统、清晰地阐明为止。他在各种侍奉的繁忙之中，准备了他的讲章、书信，写下了那些伟大的著作。他与异端论战，认同处死否认三位一体、破坏教会的异端分子塞尔维特。今天我们也许不赞同他的态度，但我们无法漠视他捍卫真理的热情。他自己愿意为真理而死，因此也认定亵渎真理、破坏教会的人罪当受死。为了真理，他自己面对逼迫，丝毫没有退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天上主人的法律对我来说是那么宝贵，我存一颗清洁的良心来维护它，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畏缩，哪怕后退一步！”（140页）多少个日日夜夜里，他都在用他的笔与异端和逼迫作战。在临终前，他语重心长地对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说：“至于教义，我一直忠心地教导，上帝也赐我恩典让我写作……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一

直活在这教义中，也盼望在这教义中死去。愿你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得到至终的保佑！”（192页）他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写就了《基督教要义》，阐明了基督教真理的体系，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神学遗产。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 4）

2006年4月24日

（《加尔文传》，作者茜亚·凡赫尔斯玛，华夏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6元。）



“不从国教者”约翰·班扬

班扬属于清教徒中的“不从国教者”。由于英国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英国国教留下了大量的天主教遗风。清教徒们起初谋求在国教内推进改革，经历了几代人的失败后，到17世纪初，已有一批清教徒决心完全抛开英国国教，成立自己的教会，他们被称为“不从国教者”。

做一个“不从国教者”在当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班扬兴起成为一个传道人是在克伦威尔的年代。那时，经历了一百余年的苦难后，清教徒已经享有了相当大的信仰自由。

1658年9月，克伦威尔逝世。查理二世于1660年4月在威斯敏斯特宫加冕，英国从此进入了28年的复辟时代。在宗教政策上，查理二世刻意恢复英国国教的影响。

面对这样的局势，班扬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说：“新国王不会容忍我这样不从国教者的传道人。”

班扬第一次被捕是在1660年11月，罪名是“非法聚会罪”，定他罪名用的是在100年前伊丽莎白年代的一条法规。那天事先班扬已接到警告，地方行政官已经签发了逮捕令，他一讲道就会被抓起来。面对逮捕令，班扬决定决不退却，他刚开始讲道就被投入了监狱。

狱中，他只要答应停止讲道就可以自由，否则他将被流放美洲或者更惨，但是班扬拒绝了。

1665年，因为从伦敦传来的瘟疫，监狱被暂时遣散，班扬得以短期与家人团聚。

1666年班扬被假释。同年7月他因讲道再次入狱，罪名仍然是“非法聚会罪”。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宽容宣言》，不从国教者可以聚会，班扬第二次出狱。班扬所牧养的自由教会取得执照，成为覆盖六郡的教会网。此前许多时间自由教会都是坚持秘密聚会。

1675年，英国议会取消1672年给不从国教者教会及牧师的执照。约翰照讲道不误，因此第三次入狱。这次入狱使他得以完成第二次入狱时已完成大部分篇幅的《天路历程》。

6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仿佛他一生的牢狱

之灾就是为了写作《天路历程》而精心预备的。

本书这样评论这次出狱后的班扬：“现在他已不去揣测不同政局变化的含义，一心只传扬基督。”

（《班扬传》，萨姆·韦尔曼著，朱文丽译，华夏出版社出版，定价 18 元。）